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5](#_Toc54606054)

[導讀 國家以什么理由來記憶 6](#_Toc54606055)

[前言 14](#_Toc54606056)

[序：敵人們 17](#_Toc54606057)

[第一部分 21](#_Toc54606058)

[第一章 反對西方之戰 22](#_Toc54606059)

[第二章 廢墟中的浪漫 35](#_Toc54606060)

[第二部分 44](#_Toc54606061)

[第三章 奧斯維辛 45](#_Toc54606062)

[第四章 廣島 55](#_Toc54606063)

[第五章 南京 63](#_Toc54606064)

[第三部分 73](#_Toc54606065)

[第六章 歷史站上審判席 74](#_Toc54606066)

[第七章 教科書風波 90](#_Toc54606067)

[第八章 紀念堂、博物館和紀念碑 100](#_Toc54606068)

[第四部分 115](#_Toc54606069)

[第九章 一個正常國家 116](#_Toc54606070)

[第十章 兩座普通小城 125](#_Toc54606071)

[第十一章 告別廢墟 136](#_Toc54606072)

[注釋 143](#_Toc54606073)

[鳴謝 148](#_Toc54606074)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 導讀 國家以什么理由來記憶

徐賁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是一部政治性的游歷思考記錄，就像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和《新大陸游記》或英國移民作家奈保爾（V. S. Naipaul）的一些游歷作品，可以稱其為“政治游記”（political travelogue）。梁啟超第一次到他不熟悉的歐美進行考察，他是帶著中國問題去尋找對強國智民有用的經驗，從一開始就是很明確的。然而，布魯瑪卻不是這樣，無論是在日本或周邊國家學習、工作，還是在德國游歷，他起初并沒有“研究戰爭”的想法，這個目的是后來才漸漸形成的。《罪孽的報應》便是他的研究結果。然而，這并不是一本關于二次大戰本身的書，而是關于戰后德國和日本如何“應對”各自戰時罪孽的不同方式：一個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責任；另一個則是以抵賴和健忘來躲避報應，但歷史失憶同樣時刻伴隨著罪孽的重負，不拿起只會變得越加沉重。

一、戰爭與國家罪孽

對孩提時的布魯瑪來說，頭號敵人是德國人。他于二次大戰結束了六年之后出生在荷蘭，對德國的“敵人”意識是他那個國家的成年人傳遞給他的。盡管荷蘭與德國有著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許正是因為如此，戰后的荷蘭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與德國人劃清界限。一直到四十歲出頭，布魯瑪才開始思考德國人如何記憶二戰的問題。這時候，他作為學生和編輯[[1]](#_1_Ta_Shi___Yuan_Dong_Jing_Ji_Pi)已經在日本和周邊國家呆了許多年。所見所聞引起了他的思考，“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記憶戰爭的，他們對戰爭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過去后，又如何審視自我”。 他對德國人的相同追問也隨之產生。因此，《罪孽的報應》中對日本的觀察和思考顯得更加深入、透徹，對于作為日本侵略戰爭受害者后代的中國讀者來說，是特別值得關注的部分。

布魯瑪注意到，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言談中經常“摻雜著大量德國人名：斯賓格勒、赫爾德、費希特，甚至還有瓦格納。日本的浪漫主義者越是強調日本性的精髓，他們的口吻就越像德國的形而上學者”。特別耐人尋味的是，“戰前德國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魯士威權主義、浪漫民族主義和偽科學種族主義——在日本留存了下來，反觀在德國卻十分不受歡迎”。為什么會這樣？正是帶著這個問題，他決定拓寬原先的認識，寫一本關于日本和德國戰爭記憶的書。

這是一部由個人游歷觀察、見聞、對話、訪談，以及對文學、電影、大眾文化作品和知識分子爭論等相關話題之感想和思考所合成的“游記”。書可以一段段分開來閱讀，隨處都有亮點。但是，那些似乎獨自成章的部分之間有著多重議題聯系，貫穿著對戰爭記憶、國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問題的思考。從二次大戰結束至今，這些問題一直是世界乃至中國的思想界和政治、歷史研究領域的重點關注對象。這不是一部專門的學術研究著作，卻以其翔實的具體材料和敏銳的思考在學者中引起了不同尋常的回應。

布魯瑪通過他的政治游記要表明的是，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不是其種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質特征，而是政治結構。對德國和日本戰后悔罪起到關鍵影響的，是兩國戰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過程。

這令人想起蔣百里在日本發行的學生雜志《浙江潮》上以筆名“飛生”對梁啟超《新民說》的批評。梁啟超提出用鑄造新民、改造國民文化來改造中國政治。蔣百里對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寫道：“自理論上言，則有新民固何患無新政府；而自事實上言，則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 蔣百里認為，政府容易改變，但國民性則積重難返，“不教之以變少數、短年易變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數、積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萬不可期”。他主張：“治亂國，則當用簡單之法……教野蠻柔弱之國民，則當簡單直捷，以鼓勵其前進之氣。”梁啟超寫了《答飛生》回應道：“大抵有新政府而后有新民歟，抑有新民而后有新政府歟？此二說者，殆與‘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之語，同一理論，互相為因，互相為果，強畸于一焉，均之非篤論也。”能夠通過改變政府來改變國民性固然好，但現在的政府不足以依賴，怎么辦？還不是非得“從新民處下一番工夫”不可嗎？所以，“今日欲改造我國家，終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養”。

布魯瑪認為，德國人從納粹統治轉變到民主憲政，之所以發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變，表現出新的國民風貌，是政治制度發生實質變化的結果，不是一下子有了不同的德國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沒有發生這樣的實質變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國那樣悔罪的根本理由時直奔主題地指出，“沒有對政治責任——準確地說，是對戰爭與和平的責任——的承擔，日本就不可能產生一種面對過去的成熟態度。必須先有政治變革，接著才會有心態變化。修憲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換政府起碼同樣重要。因為只有一個新政府才能與戰后秩序一刀兩斷，而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戰時政權的玷污”。裕仁天皇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續和無法一刀兩斷的具體代表。

美國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提出一種人類學上的解釋，認為德國與日本戰后的表現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亞洲人的“恥文化”，而德國人則屬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對此布魯瑪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德國人和日本人是危險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種劣根性”這種文化差異本質論觀點是錯誤的。

在布魯瑪看來，問題的關鍵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訴那些抱怨民族弱點或以民族文化特色為借口的人，文化決定論和命定論都不應是歷史發生的解釋。無論一個國家曾經在罪孽和災難中陷得多深，出路還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價值和制度的建立。而即使是德國，在悔罪成為共識的今天，仍然會有新納粹分子從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顛覆。布魯瑪警告：

當領袖掌握的權力不受限制，追隨者又獲準可以欺凌弱者時，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為危險分子。脫韁的權力會勾起個體和暴力團伙心中的野蠻。盡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奧斯維辛和南京大屠殺永遠都是其例證。可是，在聯邦德國，或者說在日本，今天的形勢并不是這樣。人性并未改變，政治格局卻已今非昔比。這兩個國家的人可以用選票把卑鄙無賴趕下臺。那些選擇無視這點而去尋找民族性“該隱記號” 的人，并未從過去當中吸取教訓。

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比較戰后德國與日本在悔罪問題上的巨大差異。涉及對戰爭性質的思考和國家認同，它們分別是：政體的改變和國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義的影響；確認加害者和受害者；天皇制與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極權的不同。這四個方面都尤其與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覺得無罪可悔有關，也都歸結為布魯瑪的基本論點：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點，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國家對過去罪孽的記憶與悔悟。

二、差別的憲政與政治成熟

國家政治制度的改變可以成為轉變國民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條件和推動力量。然而，改變主要是通過內部自主發生，還是由外部力量逼迫著強制發生，這二者間有著極大的不同。戰后德國和日本便是這樣兩種不同的情形。布魯瑪指出，德國戰后的政體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國人自己主導的，“1949年，德國法學家起草了《德國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為主權國家，盡管國內仍然留有西方大國的駐軍。德國通過了一部緊急狀態法，授權自己掌管本國防務。除柏林以外，占領已正式宣告結束。但在日本，從某些方面看，軍事占領至今仍未完結”。

戰后日本的憲法是由美國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導的，布魯瑪評述道，這部“讀起來就像是直接從英語翻譯過來的憲法，剝奪了日本的自衛權。多數日本人已對戰爭無比厭倦，且高度不信任軍事領袖，于是欣然接受”。這里主要涉及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人民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此外“不保留陸、海、空三軍和其他戰爭力量”。但是，冷戰的爆發又促使美國人做出一個自相矛盾的政治決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憲法，建立一支本不應該存在的軍隊———自衛隊。

這就造成了德國與日本戰后政治發展和國民政治成熟的差異。德國戰后有明顯的文化斷層，德國人通過廣泛而積極的憲政討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相比之下，日本人則一直處于政治幼童階段，遲遲沒有成熟起來。布魯瑪介紹了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哈貝馬斯（他們對問題的討論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參考和新語言），文學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思想貢獻，以及發生在德國的相關爭論，包括對紐倫堡審判的不同立場與觀點。是民主制度保障了戰后德國思想活力，德國人是在不同意見的存在、交鋒和爭論中成熟起來的。布魯瑪提供了這樣一個細節，生動地展現了德國人政治討論的熱情：“德國電視里，唇槍舌劍的討論節目比比皆是，人們圍坐在圓桌旁，就時下熱點問題展開辯論。聽眾坐在小桌邊，邊小口呷飲料，邊聽嘉賓們滔滔不絕的發言。氣氛一般很嚴肅，有時爭論會趨于白熱化。人們很容易嘲笑這類節目的一本正經，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稱道之處。部分得益于這類談話節目，大批德國人才對政治辯論熟悉起來。”

相比之下，日本沒有德國的那種思想斷層和活力激蕩，“沒有流亡作家和藝術家返回故鄉，拷問那些留下來的人的良知。日本沒有自己的托馬斯·曼或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來。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棄他們的政治立場，過程頗為正規，被稱為Tenko，直譯是改宗，但戰爭一結束他們就重新撿起馬克思主義。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風，曾在私底下表達過對戰時日本狀態的震驚，并在日記里嘲諷軍國主義的粗鄙拙劣。然而，‘內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數共產黨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議了”。

德國人能從憲政和自由民主的立場反思過去，而日本人則做不到。大多數上了年紀的日本人承認，確實發生了罪惡的事情，然而，就算是那些非常厭惡戰爭的人士，他們也缺乏合適的道德參照和政治哲學語言，無法像雅斯貝爾斯或哈貝馬斯那樣對過去進行深入反思和討論。布魯瑪在文中曾一筆帶過這種缺失的“公共發聲”：在1990年為期一周的法蘭克福書展，德國的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之間進行了一場公開討論，“兩人都在戰爭期間長大成人，也就是說，都在學校里被灌輸了軍國主義宣傳。他們也因此成為了反法西斯事業的文學倡導者，盡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還沒怎么就政治發過聲”。

美國人對日本人政治上不能成熟負有責任，布魯瑪指出，“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爾賽條約》之下：雖喪失主權，財政卻未遭壓榨。美國鼓勵日本人致富，但他們危險的雙手不得再染指戰爭。此時的國家管理者，和當初管理日本帝國的幾乎是同一批官僚。選舉體制被人操縱，使得一個腐朽的保守派政黨在幾乎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里一直大權在握。這一安排既合乎美國的心意，也很對日本官僚、自民黨政客、大財團的胃口，因為其確保日本一直會是一個富強、穩定的反共盟友。但除此之外，這種安排還扼殺了政治辯論，阻礙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日本社會在對待國家罪行的思考上嚴重滯后于德國。與善于獨立思考的德國公眾相比，日本社會里卻充斥著沉默的大多數和糊涂的大多數。在日本始終難以形成對戰爭罪責、人道災難、記憶倫理、新型國家認同等重大問題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討論，也使得日本難以擺脫在國際政治中的被動局面。作為一個強大的、非西方的現代國家，日本需要有更大的國際尊敬和影響，但是，由于與曾經被它侵略的亞洲國家之間的宿怨無法肅清，日本難以真正贏得他們的信任和尊敬。日本由于不能徹底地清算過去，所以總是困擾于一些被忽略或不能認真對待的問題，處在道義和政治雙重被動的窘境之中。

三、浪漫民族主義和憲法愛國主義

戰后日本和德國不同的第二個方面，是日本沒有辦法像德國那樣擺脫戰前和戰時起過關鍵作用的浪漫民族主義，從文化的自我認同轉變為對自由憲政共同體的認同。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義原本受德國影響，自認為在“民族性格”上與德國人相似，但戰后的德國人摒棄了這種浪漫民族主義。相比之下，日本人不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識到浪漫民族主義的虛妄和危害。這標志著日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同時也是政治上不能成熟的必然后果。

布魯瑪從政治而非文化的角度提出德、日兩國的浪漫民族主義問題：“在對戰爭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國人之間存在一道鴻溝——我們這里姑且暫時拋開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的區別。問題在于，為什么會這樣呢，為什么德國人的集體記憶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還是政治因素？答案是從戰后，還是從戰爭本身來找尋？或許德國人更有理由哀悼過去？”德國人更有理由對浪漫民族主義戀舊，但德國人并沒有這樣做，而日本的情況則正好相反。

在與德國人和日本人的接觸過程中布魯瑪發覺，“我經常從德國人那里聽到‘典型德國做派’這句話，而且口氣幾乎清一色都是貶義。相反，日本人說‘典型日本做派’時，通常都帶著一絲自我辯護和自豪”。日本在19至20世紀師從德國，獲益良多，但學到的東西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自由氣氛已經格格不入了。戰前的日本同德國一樣，以知識分子和政客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義，來抵消某種民族自卑感。他們引進費希特的浪漫民族主義理論便是為了振奮日本人的自尊心。

戰后的日本繼續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戀舊。布魯瑪在觀察中發現，“時至今日，在經過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這些（民族主義）理論中的大多數依然廣泛出現在電視、大學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猶太人主宰世界這一憑空想象出來的陰謀論在日本民間神話外圍沉淀了下來，而在戰前受到舶來德國思潮大力提倡的單一種族意識形態在日本則遠未絕跡”。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覺得自己像德國人，但德國人卻不愿意拿自己與日本人對比，這是因為兩個國家有了不同性質的國族自我認同，正如布魯瑪所看到的，“這兩個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噓的品質：尚武精神、種族純潔、自我犧牲、嚴于律己等等。戰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擺脫這種形象，日本人則不同。這意味著，在日本任何對昔日德日聯盟的眷戀之情，在德國則很可能讓人感到難堪”。布魯瑪提供了一個例子———他的書里穿插著許多這樣有趣的例子———1987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對外開放。為了慶賀其誕生，“日本人提議舉辦研討會，探討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話之間的相似性。這么做并無批評或嘲諷之意：出主意的是東京一座神道教寺廟的僧侶。德國人禮貌地回絕了”。

戰后，德國人以認同德國憲法來構建自己的國族認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來找回自我。在這一點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點。布魯瑪寫道：“日本的左翼和平主義同常和右翼有聯系的浪漫民族主義存在共通之處：左右兩派都對被美國人奪去集體記憶一事心懷怨恨。浪漫民族主義者認為，戰后的美國占領者有意瓦解了神圣傳統，比如說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會喪失身份認同。”許多左翼和平主義者實際上是浪漫型的反戰主義者，他們相信，“美國為了掩蓋自身罪行，且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以利冷戰，便試圖抹去有關廣島的記憶”。在這里，“廣島記憶”成為日本人受害者心態的悲情國族認同的一個主要元素。

德國人戰后之所以能夠擺脫浪漫民族主義，一個重要原因是出現新的憲法愛國主義觀念。哈貝馬斯說：“憲法愛國主義是唯一能讓我們不與西方疏離的愛國主義。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對普世憲政原則的忠誠，只有在奧斯維辛之后———也端賴奧斯維辛———才在德意志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樹立起來。”這是一種自由的愛國主義，它“意味著要斬斷和過去、和‘文化民族’的聯系”。

只有運用新觀念，才能更有效地終結舊觀念，因此政治啟蒙和教育下一代成為關鍵。布魯瑪對比了德國和日本教科書對下一代國族認同的不同影響。德國教育法明確規定，教學材料“不應阻礙學生形成自己的主見”。以巴伐利亞州高中歷史教材為例，這個規定得到了嚴肅的對待，“課本每一章節的提問用意不在考驗政治正確性，而是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教材摘錄了一段納粹桂冠法學家卡爾·施密特1933年為納粹黨合法性辯護的話。施密特說，納粹既非私人組織，也不是國家，它自成一體，法庭無權過問。緊隨這段引言之后的是黨衛隊軍校某校長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講詞，告訴軍校學員說，他們將要成為新型希臘城邦國家里的貴族，只對希特勒惟命是從。巴伐利亞州高中的學生在讀完語錄后，被要求圍繞“在一個建立于錯誤規范之上的國家，個體應如何行事”這一問題展開討論。這便是德國人學習在政治上成熟起來的基本教育。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書在文部省的監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隱瞞日軍的野蠻罪行。布魯瑪詳細介紹了日本歷史教授家永三郎的遭遇。他1952年編寫了一本高中歷史教材，1956年文部省認為，家永對日本亞洲戰爭的描寫太過“一邊倒”——換言之，太負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寫。家永終于忍無可忍，于1965年起訴政府違憲。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別和政府又打了兩場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刪除有關南京大屠殺、日軍奸淫婦女和日本在偽滿的醫學實驗等段落。家永稱，審查教科書有違戰后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經七十九歲的家永仍然在東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間經歷了不斷的上訴和被駁回。家永感慨萬分地說：“納粹德國及其軸心國伙伴日本之間的最大區別在于，不少德國人抵抗過，并為之獻身。而在日本，幾乎沒人抵抗過。我們是個唯命是從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們是否打贏這場官司，而是應該毫不動搖地斗爭下去。”像家永這樣的人在日本是絕對的少數。

四、“戰爭受害者”的神話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義民族主義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態——不僅是受害者，而且還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從戰前到戰后，日本一直存在著“日本人領導亞洲對抗西方”的神話。“反西方”是日本人國家認同的一個元素。在戰后的日本，“反美”成為一個從“反西方”翻新而來的國族認同元素，焦點是美國加于日本的《和平憲法》：“鷹派憤怒于美國人把日本變得一蹶不振；……鴿派則恨美國人閹割了《和平憲法》（指冷戰時美國讓日本擁有軍隊）。雙方都很反感被人當成幫兇，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這也從一個角度解釋了要日本人承認他們的戰時問題為什么比德國人更難。”

記憶是有選擇性的，就在日本人選擇了“受害者”記憶的同時———也因為他們選擇這一記憶———他們消除了自己作為對亞洲其他國家人民“加害者”的記憶。這是日本人歷史短視和拒絕承認戰爭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歷史失憶”與德國對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特別典型的便是“廣島記憶”。日本人每年有兩個紀念日：一個是8月6日的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日，另一個是8月15日的日本戰敗投降紀念日。廣島成為美國“戰爭罪行”的證明，也成為“和平”反對一切戰爭的“民眾抵抗”旗幟。廣島記憶成為日本人作為二戰受害者和犧牲者的象征。布魯瑪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討論戰爭，通常是指和美國的戰爭。許多對侵華戰爭持強烈保留態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聽到日本進攻美國后，心中都洋溢著愛國主義自豪感。對南京大屠殺心懷愧疚，絕不意味對偷襲珍珠港也抱有同樣的罪惡感。德國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記納粹和屠猶歷史；反觀日本青年，他們想到的只有廣島和長崎——興許還有南京，不過僅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學校老師和新聞記者的開導之后。”

在許多日本人看來，現在的廣島，特別是廣島的和平博物館，是“世界和平的麥加”，一個具有宗教色彩的紀念中心，絡繹不絕的來訪者來此見證戰爭的罪惡和對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廣島的一位教授稱美國投擲原子彈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犯罪”。在廣島，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護著，人們堅稱廣島死者是無辜的，這種“無辜受害者”的記憶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記憶。布魯瑪指出，“和平廣島”其實是一個神話。他寫道：“廣島根本談不上無辜。1894年，日本同中國打響‘甲午戰爭’時，部隊正是從廣島出發、開赴前線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揮部搬到了廣島。這座城市因此變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戰爭則讓它更加富庶。廣島一度還成為軍事行動的中樞……在遭到核打擊時，廣島是帝國軍隊第二大本營（第一在東京）。簡言之，這里遍地都是軍人。”布魯瑪進一步指出：“廣島市民的確是受害者，但兇手基本上是他們自己的軍事領導人。”諷刺的是，1987年，當廣島當地一伙和平活動人士向市政府請愿，要求把日本侵略歷史納入和平紀念館展覽內容時，這個要求被拒絕了。

“日本是戰爭受害者”，這個神話能被日本不同意識形態的陣營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釋，他們之間雖然有分歧和對立，卻能在這個神話周圍結成某種同盟的關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國主導的日本憲法視為對日本主權和尊嚴的侵犯，日本的左派雖然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但一樣對美國抱有敵意，他們反美，認為冷戰期間華盛頓干預了日本憲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為冷戰沖突的幫兇。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經常聲稱，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擲的兩顆原子彈清洗了日本的戰爭罪孽，使日本人獲得道德權利，可以“審判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布魯瑪指出，這種態度成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調（當然在日本國內也是有爭議的），在相當程度上，美國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應該為此負責。但是，日本的“和平主義” 將國家罪孽變成了美德，在與他國相比較時，幾乎成了優越感的記號。這種和平主義也會造成歷史短視。

當日本人把目光從廣島轉向南京時，這種歷史短視尤為明顯。許多日本人否認有南京大屠殺，這與德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德國，只有極少數人不承認大屠殺，但在日本，相當龐大的保守勢力堅持認為，對日軍大規模屠殺中國平民的報道是夸大其詞，平民傷亡是戰爭必然造成的結果。日本年青一代對日軍罪行的認識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書回避歷史事實是一個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師的爭論對峙陷入僵局。德國教科書把對納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當年支持戰爭的信仰價值觀（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批判和否定。

五、從天皇脫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礙日本充分認識侵略戰爭和人道災難罪行的再一個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魯瑪敏銳地看到，日本國內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和立場就涉及天皇制度。這是他從對南京大屠殺的多種說法中一點一點仔細剝離出來的——像這樣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報應》還有許多，細心的讀者不妨根據自己的問題意識細細體會。

布魯瑪匯集了多種關于南京屠城的觀點。有一種觀點是，由于經過精心策劃，廣島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殺嚴重得多，“不像歐洲或中國，在整個日本歷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廣島那樣）有預謀、系統性殺戮的事件”。布魯瑪認為這種觀點并不是簡單地否定南京大屠殺，是值得關注的，因為“既然作為暴行符號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視為日本實施的‘屠猶’，對二者加以區分就顯得很重要”。就連反對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士也認為這場屠殺并不具有系統性。其中一位寫道，他不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規模之大和慘絕人寰，“但這或許是對淞滬抗戰中守軍激烈抵抗的一種報復”。另一位則認為：“在戰場上，人面臨生存的終極選擇，要么生，要么死。盡管一些極端行徑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無法避免。然而，在遠離戰場的危險和無奈后，若仍按照一項理性計劃實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惡的兇殘行為。我們的德國‘盟友’設立的奧斯維辛毒氣室，以及我們的敵人美國投下的原子彈，是理性暴行的經典案例。”還有一種說法同樣把南京屠城與希特勒滅猶加以區別：“南京屠城的（軍事力量）并不是某種足以毀滅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滅亡整個民族計劃的一個步驟。”

面對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說法，布魯瑪一針見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識形態的教唆下”發生的，“侵略者殺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他寫道：“這正是右翼民族主義者最恥于承認的一點……對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殺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國主義崇拜）所支撐的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象征，這也就是它成為戰后和平主義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場南京大屠殺，就有必要堅持《和平憲法》第九條。民族主義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認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認同，必須恢復天皇作為國家宗教領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條，以使日本重新成為一個具有合法性的軍事強國。鑒于這一原因，南京大屠殺或任何日本極端侵略行為的范例都必須被忽視、淡化和否認。”也就是說，否認南京大屠殺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認識問題，而是涉及維護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權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

認識納粹德國與天皇日本的不同，是理解戰后德國和日本在悔罪問題上出現巨大差異的關鍵之一。納粹德國是現代極權的一黨統治，它的宣傳和組織對人民所進行的洗腦是與德國人的自由精神相違背的，德國人被納粹意識形態改造了。日本是一種古老的宗教（神道教，它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日本人并不是在裕仁天皇時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這種國家宗教仍在延續，仍然是許多日本人的信仰。戰后德國與希特勒的納粹極權制度完全切割，戰后日本則無法與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戰期間，德國犯下的是“反人類罪”，而日本犯下的則是戰爭罪行，厘清這一罪行的最大障礙，是天皇在戰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義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義一直延續至今。德國放棄了這種浪漫民族主義，代之以“憲法民族主義”，甚至比許多其他西方國家更加堅持和強調憲政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普適價值：自由、平等、人權和人的尊嚴。

日本之所以難以與過去斷絕，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曖昧不明的政治體制——日本并不是一個真正的“法西斯”國家。布魯瑪指出：“比較容易做到的是改變政治體制，繼而希冀人們的習慣和偏見會隨之變化。這點在德國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國被控制在一個罪惡的政權手中，掌握政權的是一群興風作浪的政治流氓。鏟除這一政權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這個國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沒有明確界限。事實上，日本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西斯國家，它既沒有法西斯或國家社會主義執政黨派，也沒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過哪些頭銜，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獨裁者。”

日本也沒有德國那種明確的責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種被稱為“不負責任的體制”（構成它的是“神轎”“官吏”“浪人”三種角色），日本的指揮系統“根本就是一筆糊涂賬。因此，盡管戰后德國的納粹領導層被一鍋端，但反觀日本，不過是少了幾位海陸軍將領罷了”。天皇是這個不負責任的體制中最大的“神轎”，“1945年后，麥克阿瑟將軍選擇保留的恰恰就是這種權威象征，這一最神圣的‘神轎’…… 利用帝制象征鞏固自己的權力。結果，他扼殺了日本民主制度運轉的希望，并嚴重扭曲了歷史”。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權威，“裕仁的過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點；可以說，象征物必須和以其名義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東京審判時，裕仁天皇不僅逃脫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傳喚他出庭作證。日美兩國達成協議，最高“神轎”不得受一絲牽連。這是一筆政治交易，犧牲了戰爭受害者的正義，其非正義的后果一直延續至今。只要天皇還擺在這個位置上，“日本人就會在坦白過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為天皇對發生的一切均負有正式責任，而通過免除他的罪責，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天皇不是希特勒，但這不是為天皇免罪的理由，“日本人的意識形態雖然并不包含‘最終解決方案’，但在種族主義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難分高低。它即便沒有驅使日軍大開殺戒，也為其野蠻行徑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亞洲的‘主宰者民族’……一位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兵在電視訪談節目上說，他之所以殺起中國人來能絲毫沒有良心不安，只因為他根本不把他們當人看。殺人甚至還有一層宗教意味，因為這是‘圣戰’的構成要素”。裕仁天皇和希特勒并不具備可比性，但發揮的心理作用卻有著驚人的相似，而這種心理作用所驅使的行為——以活生生的無辜者為對象的殺戮和殘暴——也是同樣罪惡的。

\*\*\*\*\*

任何簡單、粗糙的對比都無法解釋為什么戰后會出現德國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別。布魯瑪的《罪孽的報應》為我們深入細致地理解這一差別提供了幫助。他對這個差別的解釋不是“歷史化”的，而是有著明確的記憶倫理和人道價值取向，那就是，德國的悔罪是一種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進步。

歷史化可能成為逃避歷史責任的借口，它的目標是“拉開與過去的距離，冷眼看待歷史”，其結果往往是以常規歷史來看待并非常規的、非常邪惡的事情。這樣的歷史態度會讓“冷眼看待”變成“冷漠旁觀”，甚至讓旁觀者因為“理解”加害者而對他們產生認同感。認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非正義的。

日本的保守勢力就是這樣對日本二戰侵略戰爭進行歷史化處理，進而為之辯護的。他們說，戰爭是為民族存亡而進行的斗爭，日本軍人并不比其他國家的軍人更壞，就榮譽心和犧牲精神而言，他們甚至更加優秀。這種歷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殺這樣慘絕人寰的殺戮正常化了。

然而，拒絕對過去罪惡歷史化并不等于已經替受害者說話，事實上，今天的后人是無法代替當年的受害者說出真相的。我們今天所能做的也許正是像布魯瑪那樣，不只是從個人道德良心，而且是從國家政治制度的優化（憲政和自由民主）來期待絕大多數人有意識地改變他們舊有的思考習慣和偏見，也就是布魯瑪所說的，在政治上成熟起來。

這不僅是針對日本的二戰罪責，而且也適用于其他國家的嚴重政府過失或罪過。德國戰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普遍承認和贊許，也成為政府改正錯誤的道德決心和行動勇氣的象征。尤其是在政府仍拒絕對過去罪行懺悔的國家里，人們不斷用德國的悔罪作為正面榜樣，要求政府悔罪并要求政治制度有相應改變。這是20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人們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成熟的一種表現。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長，表現為——用歷史學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國家的罪過》（The Guilt of Nation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xviii）中的話來說——“以越來越強的政治意愿，甚至緊迫感，來承認自己的歷史罪過。承認罪過可以讓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凈，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無論是其一還是其二，道歉都表達了一種因造成他人傷害而背負罪孽重負的痛苦，以及對受害人的同理心（empathy,即換位思考）”。了解日本戰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礙，不是為了單純的道德譴責，而是為了對國家之罪和歷史非正義有一個更好的認識，也是為了看到，在新的國際人權道德環境下，加害者對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經是一種必需的道德義務，也是一種對未來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誠政治承諾，在國際間是如此，在國家內部也是如此；對日本是如此，對所有其他國家也都是如此。

[[1]他是《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美術編輯。](#_1)

獻給我的父親

# 前言

足球，特別是歐陸足球，是檢視各國國情一個很有用的風向標2006年，德國舉辦了世界杯。除開決賽中齊內丁·齊達內的“鐵頭功”讓人大跌眼鏡外，這屆世界杯還因為德國人迸發出的毫不做作歡天喜地的愛國熱情而顯得與眾不同。在過去，德國人有充分理由對在全世界面前揮舞民族標志物感到猶豫。這一次，他們這么做了過程中流露出的友善讓人無法將其誤認為是什么邪惡的事。盡管德國隊在2006年未能殺入決賽，但德國人似乎很驕傲于自己是德國人

那屆世界杯的另一大非凡之處在于，德國隊贏球時，似乎沒人會太往心里去。在過去可不是這樣。比方說你是荷蘭人、法國人捷克人或波蘭人的話，輸給德國就好像又被侵略了一樣。因此，難得戰勝德國隊時就會大肆慶祝，仿佛甜蜜復仇。二戰結束半個多世紀后，這種情緒似乎終于消散了。對了，德國最好的兩位球員都是波蘭裔[[1]](#_1_Zhe_Li_Zhi_Bo_Lan_Yi_Qiu_Yuan)。

隨著記憶淡去，人們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盡管有些歷史記憶揮之不去，很是要命。但我相信，這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當我在1994年寫作《罪孽的報應》一書時，世人仍很畏懼德國，也不信任這個歐洲經濟強國。就在前不久，德國人在德累斯頓、萊比錫和柏林街頭歡慶兩德統一，震天響地高喊“我們是一個民族”的口號。這在那些記憶尚未淡去的人聽起來有一絲不祥的意味，某些德國人尤其如此。但到2006年時，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那句名言——“有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慘痛回憶，德國就應該永遠分裂”——聽著比1989年時更像是在自抽耳光，荒謬得無以復加。作為歐洲一分子的德國做得十分出色，幾十年來一直規規矩矩參與歐洲機構和北約的事務，因此若再對新一代德國人心懷戒備，會顯得心胸狹隘。畢竟二戰時，他們可尚未降臨人間。不過，德國人之所以獲得鄰國更多信任，是由于他們正一點點學著信任自己，盡管這一過程緩慢而痛苦，且有時并不徹底。

總而言之，在西德，小說家、史學家、記者、教師、政客和電影導演都已經反思過德國最近的一段殘暴歷史，有時會執念于此，但態度往往相當開放和坦誠。很少有德國學童會不知道自己國家過去的滔天罪行。如果說有雜音的話，那么也確實有部分人開始對這種不間斷、填鴨式的教育感到厭煩。直到21世紀，依然有公眾人物就戰爭發表不甚光彩或不成體統的言論，但這些人隨即會遭到其他德國人的口誅筆伐。

對于德國人，二戰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說笑的事，也不應該是。但在2008年，一位猶太裔瑞士導演拍攝的電影《我的元首》（Mein Führer）票房大熱。這或許是個好現象。拿自己的國家開涮總比自抽耳光要好。倘若說人類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應對”的話，那么德國人總體而言可謂應對自如。

\* \* \* \* \*

同樣的話，為什么不能理直氣壯地用來形容日本呢？日本人在2002年同韓國聯袂舉辦了一屆世界杯。日本國家隊的球員年輕而時髦，在他們意外獲勝時，日本年輕人也會懷著同四年后德國人一樣興高采烈的勁兒，為國家隊歡呼叫好。然而，韓國等亞洲鄰國對日本的不信任感卻并未消失。因為盡管那些揮舞旗幟的日本青年看著沒有什么好勇斗狠的念頭（或者對歷史一點概念都沒有，這也成問題），但他們一部分供職于政府和大眾傳媒的前輩，卻仍在就戰爭發表起碼是讓人不安的看法。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復一年地參拜供奉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對戰爭罪行的辯解和否認之聲依然不絕于耳。很明顯，太多有頭有臉的日本人并未“應對”過戰爭。

按理說日本人對此應感到更自如才對。亞洲的戰爭很血腥，既發生過南京大屠殺和馬尼拉浩劫，也見證過勞工被迫修建泰緬鐵路最后活活累死的血淚史；從新加坡到蘇門答臘，遍布著慘無人道的戰俘營；中國在戰時死亡上千萬人。凡此種種，都在亞洲的歷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傷疤。但與納粹德國不同的是，日本并沒有系統性滅絕一個民族男女老幼的計劃——這個民族出于意識形態原因，被認為不配有生存權。

反常的是，這一切也許使日本人更難正視歷史。第三帝國倒臺后，除了部分精神失常的邊緣群體外，鮮有德國人會容忍猶太人大屠殺，更別提以此為榮了。“我們并不知情”在1950年代是一種普遍反應，但到了1960年代，這句話在年輕一代眼里已經變得令人不齒，因而羞于提起了。這場蓄意的種族滅絕罪惡滔天，昭然天下因此根本不容辯駁。

日本人從沒取得像德國人那樣的共識。右翼民族主義者喜歡借日本沒有屠猶這點做文章，以此證明日本人根本沒必要對這場戰爭感到愧疚。在他們眼中，這場戰爭跟其他戰爭一樣。殘酷么？沒錯但歷史上所有大國參與的戰爭都是殘酷的。事實上，鑒于太平洋戰爭的對手是西方帝國主義者，這就是一場可以被正名的——甚至是神圣的——亞洲解放戰爭。

從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鮮有日本人會采納這一觀點，反觀這一時期的多數德國人，卻還在竭力忘卻歷史。戰后最初幾年，日本小說家和導演在面對軍國主義罪行時都十分坦誠，這點實屬罕見。這份坦誠在2009年反倒失色了。目標讀者為年輕人的流行漫畫書贊美日本軍人和神風隊員的英勇事跡，而中國人和他們的西方盟友則被描繪成一群奸詐好戰之徒。2008年，日本航空自衛隊參謀長宣稱日本是被中美兩國“拖入”戰爭的。

怎么會這樣呢？人們往往認為這一定能在文化上得到解釋。在東方人的觀念中，恥感必須靠沉默、抵賴等做法來加以掩飾。我在寫作本書的時候，對這一說法予以了大力駁斥，如今我依舊這么看。德國人在道德上并不比日本人更高尚，罪感和恥感也不比后者更強。曾幾何時，他們的普遍態度也是逃避。

事實情況是，日本依然為歷史問題所困擾，這些問題早在幾十年前就應得到解決。之所以沒有，更多是出于政治而非文化原因。這不光同1946年美國法學家起草的《和平憲法》有關，也同天皇體制扮演的角色有關。戰后，麥克阿瑟將軍出于權宜之計，豁免了日本皇族的戰爭罪行。

在德國，第三帝國走向覆滅是歷史的一次徹底扭轉。但即便處在盟軍占領下，在天皇被迫放棄神圣地位后，統治日本的大抵還是同一批官僚和政治精英，不過凌駕在他們頭上的是一部全新且更民主的憲法。因為在日本不存在類似納粹黨的組織，沒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日本軍國主義就被歸咎為“封建”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惡果。正如人們難以信任一個洗心革面的酒鬼會對烈酒點滴不沾一樣，日本憲法禁止日本使用武力或保留武裝力量。自此，美國就要肩負起保衛日本的責任。

縱然多數日本人對不用再上陣打仗由衷感到高興，縱然為了便于成立自衛隊，憲法很快被敷衍了事，但部分保守派對他們眼中這一踐踏國家主權的做法感到甚是屈辱。對他們而言，從盟軍主持的東京戰爭罪審判，到左翼教師和知識分子譴責日本的戰爭行徑，所有這一切從今往后都將被視為民族恥辱。較為“進步”的日本人越是搬出戰時暴行的歷史來警告人們切勿背離和平主義，右翼政客和評論家就越會為日本的對外戰爭進行辯護。

\* \* \* \*

換言之，歷史觀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化和兩極分化的。憲法和平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之間的沖突在1950年代曾導致政治動蕩，為了拔掉這枚“肉中釘”，主流保守派嘗試通過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戰爭和政治上轉移開。

這一策略很成功。日本日漸富強，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建立了某種壓制的穩定秩序。但歷史拒絕遠去。自民黨內的民族主義右翼對戰后協議的怨氣持續發酵，并以一種粗鄙的形式呈現出來。兇神惡煞的青年穿著卡其軍裝，站在旗幟飄揚的卡車上，伴著高亢的戰時軍隊進行曲喊出他們的反對之聲——這跟2002年時球迷的歡騰氣氛可不太合拍。

幾十年來，奉行沙文主義的右翼無論對高中教育，還是對天皇地位等問題，觀點都很反動，他們能得到約束，要拜有時同樣教條的日本左翼所賜。馬克思主義曾是教師工會和學界奉為圭臬的意識形態。然而，同世界各地一樣，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在1990年代初蘇聯帝國解體以及波爾布特[[2]](#_2_Pol_Pot_1925____1998__Jian_Go)一手釀成的慘劇廣為人知后，已經日漸式微了。

這一思想體系的崩塌導致新保守主義在美國的崛起———或許只是曇花一現。在日本，后果更為嚴重。由于自民黨實際上一黨專權，邊緣化的日本左翼又因為自身的教條主義顏面掃地，不只是走向衰落，而是徹底瓦解了。這等于幫了為戰爭唱贊歌的右翼民族主義者一個大忙，他們甚至在東京大學這樣的進步思想堡壘里壯大力量。形形色色的委員會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宗旨是“改革”歷史課程內容，把教科書里有礙愛國自豪的史實一概閹割干凈。

也許是因為對純粹物質追求的厭倦，也許是因為對身不由己背負罪惡感到懊喪，也許只是因為無知———或者更有可能是以上三種情況兼而有之———日本年輕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這套愛國主義的甜言蜜語。中國慣于以日本的歷史罪行作為把柄，進行政治施壓，因此日本人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催生了一種好斗的愛國心理，甚至不惜以無視歷史事實為代價。

就在《罪孽的報應》首版后不久，我曾短暫地認為事情會朝積極的一面發展。自從1955年以來，自民黨第一次大權旁落，將執政地位拱手讓給以社會黨人、首相村山富市領銜的自由派和左派組成的聯合政府。這位好好先生上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五十周年之際，明確為日軍的暴行道歉。

許多日本人同情村山。他對日本戰時行徑的明確悔悟定能讓理性探討日本防務和修憲變得較為容易。可惜，人們對于與戰后秩序一刀兩斷的期待為時過早。村山無力改變日本政壇。到了1996年自民黨再度掌權時，非但歷史問題沒得到解決，就連歷史辯論也仍然充斥著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實際上，這些根本就不算是辯論，不過是立場反動的政治宣傳罷了。

鑒于德國和日本之間的這些區別，也許讀者會以為我的書在德國更受好評。其實不然。該書在日本不僅銷量更大，而且獲得了更為積極的反饋。對此，我只能猜測個中原因。日本人樂見自己的國家被拿來和德國作比較，它們都有高效、干凈、勤奮、守秩序等優點。而戰后的德國人堅定不移地想成為自由、進步的西方社會的模范成員，他們可并不熱衷于被人拿來同日本人作對比，因為這太像是對戰前“東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種肯定和贊許。

然而，如若我的看法是對的，即兩國之間在歷史記憶上的差異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那么德國人這種神經過敏就毫無必要不過，認為文化無關緊要、世界各國的人都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想法很天真——在過去也被證明很危險。但文化差異絕對論——學界的理論家喜歡管這叫“抓住本質”——同樣大謬不然，而且也很危險。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部分是想檢驗這些想法，探求類似的心理創傷何以影響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在進行這項冒險之前，我的直覺是——您愿意的話也可以管這叫偏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相似局面下反應大致相同。總而言之，德日兩國人的行為并不一致——但在東德、西德和日本，無論戰時還是戰后，局勢也都迥異，今天亦是如此。

[[1]這里指波蘭裔球員米羅斯拉夫·克洛澤和盧卡斯·波多爾斯基。——除特別標明，本書頁下注均為譯者注](#_1_1)

[[2]Pol Pot（1925——1998），柬共領導人，奉行恐怖統治，導致上百萬人死亡。](#_2)

# 序：敵人們

在我的孩提時代，關于誰是我們的敵人這點從來就不是問題蘇聯當然是一個，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荷蘭小學童眼里，蘇聯太過遙遠。不對，敵人是德國鬼子。在我度過童年的海牙，德國人是漫畫書里的魑魅魍魎。我這里說的德國人，不是納粹，就是德國人1940——1945年間德國占領荷蘭，由之而生的恨意屬于民族仇恨，而非政治敵對。德國人侵占了我們的國家，他們強迫我父親在他們的工廠里勞動。他們沿著荷蘭海岸線留下了一連串低矮的碉堡，活像一只只巨型石頭蛤蟆，黑乎乎、濕漉漉的，還散發著陣陣尿臊味它們是不久前一段淪陷史的遺跡。大人不許我們走近這些地堡，有傳言說，曾有不聽話的小孩兒進去了，結果被生銹的德國手榴彈炸得血肉橫飛。

老師給我們講德國人怎么怎么壞，他們自己又多么英勇。似乎老一輩人人都在抵抗組織里干過。確切地講，大街轉角處那個賣肉的要除外，因為他過去是“通敵荷奸”。沒人去他那兒買肉。另外還要算上擺煙攤的女人，她曾有個德國相好，大家也不去她那兒買煙。

每年5月4日下午，同學們會齊聚大禮堂，聽校長訓話，紀念戰爭死難者。5月4日是追思日，隔天就是光復日。5月4日晚上，一支隊列會邁著緩慢的步伐，穿過海邊的沙丘，去往當年的德國刑場。我在黑白電視機上看到過這一幕。唯一能聽到的聲音是人們沙沙的腳步聲、遠處教堂鐘聲和風掠過話筒的響聲。5月4日這天，年輕人還會敲碎德國車的車窗，或者隔著老遠辱罵德國游客。

校長平時是個風趣的人，但在5月4日這天會變得多愁善感。他身披長長的皮大衣，總是走在通過沙丘的隊列之首，臉上的表情出奇堅毅，似乎再度與敵人狹路相逢。一次，我在畫納粹黨徽“卐”時被他逮了個正著，他語重心長地教育我，可不能再畫這玩意了，這是邪惡的象征，人們看到后依然會心情沉重。我當然是我行我素地接著畫，不過是偷偷摸摸的，像是做了什么虧心事，心里卻又無比興奮，覺得自己打破了成人世界某條神秘禁忌。

漫畫書里的德國人（還有其他德國人么？）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體態肥胖，頭腦遲鈍，滑稽可笑，加特·弗羅比[[1]](#_1_Gert_Frobe_1913____1988__Hao)在好萊塢電影里將這一角色演繹得惟妙惟肖；另一類是瘦長個兒，老奸巨猾，戴著單片眼鏡，刑訊時總會操一口德國腔“我們有辦法讓你開口”，比如《卡薩布蘭卡》里的康拉德·維特（Conrad Veidt）。敵人既讓人生畏，又十分可笑。對很多人來講，加特·弗羅比的電影和模仿希特勒的段子讓德語本身淪為笑柄，結果是我們都不肯好好學。德語老師不甘示弱，說這是歌德和里爾克[[2]](#_2_Lai_Na__Ma_Li_Ya__Li_Er_Ke__R)的母語，想借此喚起我們的學習熱情，但弗羅比和希特勒徹底毀了這門語言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

長大成人后，我們聽到了更多的故事。在本地流傳的有關德國情人和通敵分子的段子讓位給了更宏大的敘事，比如集中營和屠殺猶太人，在此過程中，我們的歷史觀得以形成。我母親幸虧出生在英國，才免于遣送出境，否則難逃一死。我們從漫畫書中接受的偏見已然轉化為一種道德義憤。這在一定程度上讓生活變輕松了。知道有條鴻溝把我們和一個象征邪惡的國家分隔開，讓人很是欣慰他們是惡棍，所以我們肯定是好人。戰后，在一個曾經被德國占領的國家長大，意味著自己站在天使這一邊。

我們不去德國度假，不結交德國朋友，也很少聽人講德語，更別提自己講了。我在說我們的時候，無疑是在以偏概全，但就算到了1989年，生平第一次我開始在德國廣泛游歷，這對我的荷蘭朋友來說還是既有趣又略有些不可思議。對他們而言，倫敦、巴黎甚至是紐約感覺都比柏林近。盡管荷蘭和德國在文化、語言和飲食上有明顯的相似性，朋友們和德國還是很疏遠。

也許這是問題的一部分：荷蘭人受的罪沒有波蘭人或俄國人多畢竟，只要不是猶太人，他們會被劃定為“北歐人種”。戰前，荷蘭國內對國家社會主義準則和“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觀念有很多同情之聲。對此，我的老師們并不樂意記起。德國入侵不只是戰爭行為，更是一種辜負。對于一個始終活在被鄰國吞并的危險之中的小國來講，德國入侵猶如噩夢成真這就解釋了荷蘭人為何在戰后跟德國形同陌路。文化相似性令人尷尬，甚至存在威脅。邊界務必清楚劃定，這不僅是地理上的，還是心理上的；德國的形象必須變得不堪入目。

對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去兄長和父親的人，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曾描述過他們的成長過程。他說有些人年紀太輕，還不能上陣打仗，為國捐軀，他們便覺得自己似乎面臨一項男子漢氣概的考驗，這項考驗周而復始，必須一次又一次地通過，因為一個人沒有辦法彌補錯過血灑沙場的遺憾。對于我們這些1945年后出生的一輩，情況和衣修伍德形容的雖大為不同但戰爭還是投下了陰影，以至于我們當中一些人近乎為之著魔。因為我們也面臨一項想象力的考驗。讓我們著迷的不是如果自己身著戎裝，會不會表現英勇，一躍沖出戰壕，頂著槍林彈雨和芥子氣沖鋒陷陣，而是我們會不會加入抵抗組織，會不會招架不住酷刑，會不會甘冒自己被遣送的風險也要藏匿猶太人。在我們頭頂上投下陰影的不是戰爭，而是軍事占領。

軍事占領向來都是一件讓人恥辱的事——不僅因為主權淪陷，政治權利喪失，而且還因為其戲劇性地凸顯出人性弱點。在這一時期，英雄寥寥無幾，只有白癡才會臆想自己是什么英雄。這樣一來，也就更容易理解人們明哲保身而做出的卑劣妥協，比如偷偷摸摸討好穿軍裝的主子，或者在蓋世太保踹開鄰居家門時當做沒看見。在我長大的時候，人們竭盡所能想忘卻恥辱，向英雄靠攏。我讀過一堆有關荷蘭游擊隊員和戴絲巾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的故事書。然而，真正讓我感興趣的不是英雄人物，而是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他們為求自保，不惜背叛祖國，對別人的遭遇熟視無睹，置若罔聞，他們身處痛苦的兩難境地，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毫無疑問，這么說部分是因為我擔心自己在同樣情況下，也會落得和面目可憎的人一樣不堪；部分又是因為在我看來，比起英雄主義，失敗才是更典型的人性。這就是我想要深入了解我們昔日敵人記憶的原因，因為他們記憶中的過去充斥著最最可怕的失敗：道德失敗，政治失敗，最后還有軍事失敗。這倒不是說納粹比他們的受害者更有人性，但認為他們沒人性的想法一樣也是錯誤的——盡管這么想無疑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

二戰的另一個敵人是日本人，不過他們距離太過遙遠，因此難以在我們的想象空間留下多少影響。盡管我的一些朋友出生在荷屬東印度，但這個地方對我而言毫無意義。然而，日本人也是漫畫書里的魑魅魍魎：他們是小個子的黃種人，齙牙，戴眼鏡。在一部膾炙人口的漫畫書里，長著一頭金發、風度翩翩的主人公巴克·丹尼（Buck Danny，百分百是“北歐人種”）和他的機組成員率領一群勇敢的美軍飛行員與日本人作戰。駕駛零式戰斗機的日軍在向他們進攻時大喊“萬歲！”（Banzai!）。人們告訴我，不能相信日本鬼子，他們對人命沒有半點尊重，未作警告就偷襲了珍珠港。他們拔掉人的指甲，逼迫白人婦女向天皇鞠躬。我的某位高中老師曾作為奴工參與修建泰緬鐵路。我的嬸嬸曾是“鬼子集中營”里的階下囚。亞力克·吉尼斯[[3]](#_3_Alec_Guinness_1914____2000__A)曾在日本人的威逼下鉆進一個滾燙的鐵籠子。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日本或周邊國家，倒不是為了研究戰爭。但我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記憶戰爭的，他們對戰爭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過去后，又如何審視自我。我的所見所聞對歐洲人來講常常十分驚人：雖然《桂河大橋》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西方戰俘遭受的虐待幾乎無人記得。（我經常想，日本人到底更認同誰，是那個日本司令官，還是亞力克·吉尼斯？都不認同，一個日本朋友回答我：“我們喜歡的是威廉·霍爾登扮演的美國英雄。”）巴丹死亡行軍、馬尼拉浩劫、新加坡大屠殺，這些事在日本鮮有提及。反之，日本人對在中國、菲律賓，特別是廣島和長崎所經受的苦難卻記憶猶新，同樣印象深刻的還有日本軍人戰后被關押在西伯利亞一事。日本人每年有兩個紀念日：一個是8月6日的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日，另一個是8月15日的日本戰敗投降紀念日。

想要探討日本戰爭記憶這個念頭把我引向了現代日本民族主義這一相關話題。我醉心于諸多天皇崇拜者、歷史修正主義者和一心追求日本獨特性的浪漫主義者的文字。盡管觀點晦澀，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成為電視脫口秀的座上客，也不妨礙他們的作品在日本名刊大報上廣為發表。我開始注意到，這些人拐彎抹角且辭藻華麗的文章中摻雜著大量德國人名：斯賓格勒、赫爾德、費希特，甚至還有瓦格納。日本的浪漫主義者越是強調日本性的精髓，他們的口吻就越像德國的形而上學者。這點也許是世界各地浪漫派民族主義者身上的共性，但19世紀德國的影響在日本尤為驚人。我越是研究日本民族主義，就越想追根溯源。打個比方，我渴望探尋那口滋養了諸多現代日本思想的泉水。自19世紀末以降，日本常視德國為楷模。耐人尋味的是，戰前德國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魯士威權主義、浪漫民族主義和偽科學種族主義——在日本留存了下來，反觀在德國卻十分不受歡迎。為什么會這樣？正是帶著這個問題，我決定拓寬原先的認識，寫一本關于日本和德國戰爭記憶的書。

1991年夏，即兩德統一后第二年，我因為要給一本雜志供稿，前往柏林出差。我在當地一份報紙里留意到一則告示，說猶太社區中心將舉辦一場講座，演講人是心理學家瑪格麗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講座的題目叫“緬懷的努力：對于無法哀悼的心理學分析”。哀悼涉及的是納粹時期。我本以為講堂最多只會坐一半人，卻發現聽眾不少，且多是年輕人，穿著很隨意，乍看更像是來聽搖滾音樂會的。長長的隊伍一直排到馬路盡頭。對此，我其實不應感到意外。德國人不僅僅在電視、廣播、社區會堂、學校和博物館里上演著對戰爭的記憶，更是積極地開展圍繞戰爭的檢視、分析和反復剖析。人們有時能得出這樣一種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德國人的記憶就像一條巨大的舌頭，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顆隱隱作痛的壞牙。

一些日本人對此困惑不解。一位年邁的德國外交官曾語氣悲涼地向我回憶道，曾有日本同事告訴他，德國人對昔日罪孽的念念不忘和向受害者道歉的誠懇勁兒，必然會導致喪失德國人的本色。另一位年輕得多的后生跟我講述了訪問東京時的見聞，說他在啤酒館里聽到日本人唱德軍進行曲時驚得目瞪口呆。我無意夸大這些反差。不是每個日本人都有歷史健忘癥，再說也有不少德國人想要忘記過去，比如有人就巴不得能在啤酒館里聽到這些老歌再度唱響。然而，我無法想象日本也會有米切利希這樣的人，在東京市中心開辦講座探討為何“無法哀悼”，還能吸引到這么多聽眾。日本也沒有一名政客像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遺址下跪的維利·勃蘭特[[4]](#_4_Willy_Brandt_1913____1992__De)那樣，雙膝跪地，為歷史罪行道歉。

即便在戰時，軸心國的關系也不是那么親密無間。希特勒對一個黃皮膚的“主宰者民族”難免感到不放心，而日本人說到底是想把“白種人”趕出亞洲。然而，這兩個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噓的品質：尚武精神、種族純潔、自我犧牲、嚴于律己等等戰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擺脫這種形象，日本人則不同。這意味著在日本任何對昔日德日聯盟的眷戀之情，在德國則很可能讓人感到難堪。

原日本國駐柏林大使館的故事就很能說明問題。這座使館建于1936年，是一座納粹風格的新古典主義豐碑，也是希特勒對新首都日耳曼尼亞（Germania）構想的一部分。使館是希特勒和施佩爾[[5]](#_5_A_Er_Bo_Te__Shi_Pei_Er__Alber)宏偉計劃里為數不多真正破土動工的幾幢建筑之一，戰后被廢棄這個破敗的空殼落到了自治主義者[[6]](#_6_Autonomen_Er_Zhan_Hou_De_Guo)手里，這是一群身穿黑衣的年輕人，蹲在成堆沒用的外交信件中間，追求無政府主義式的生活但到了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決定在大使館遺址上修建一個日德中心，供學者使用。德國人很清楚日本人身上有民族主義戀舊的毛病，他們希望中心能反映出自軸心國以來的時代變遷。中心于1987年正式對外開放為了慶賀其誕生，日本人提議舉辦研討會，探討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話之間的相似性。這么做并無批評或嘲諷之意：出主意的是東京一座神道教寺廟的僧侶。德國人禮貌地回絕了。

所有這一切表明，在對戰爭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國人之間存在一道鴻溝——我們這里姑且暫時拋開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的區別。問題在于，為什么會這樣呢，為什么德國人的集體記憶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還是政治因素？答案是從戰后，還是從戰爭本身來找尋？或許德國人更有理由哀悼過去？借露絲·本尼迪克特[[7]](#_7_Ruth_Benedict_1887____1948__M)的話來講，這是不是因為日本人有亞洲人的“恥文化”，而德國人則屬于基督教的“罪文化”？

這些問題限制了我的探討范圍。由于引起我興趣的是這些至今仍在德國和日本觸發最激烈爭議的部分，許多著名歷史事件都被我排除在外。日軍對陣朱可夫將軍（Gen. Zhukov）麾下坦克部隊的諾門罕戰役（Nomonhan）[[8]](#_8_1939Nian_Ri_Ben_He_Su_Lian_Za)具有重大的軍事意義，同樣重要的還有英帕爾戰役（Imphal）[[9]](#_9_1944Nian_Er_Zhan_Qi_Jian_Ri_J)和諾曼底登陸，但我對這些一概沒有提及。以日本為例，我強調的是侵華戰爭和廣島原爆，這是因為這兩件事相較于其他事件，已經以高度符號化的方式，牢牢嵌入日本的公共生活。無獨有偶，在談到德國時我著重寫到了排猶，因為是它在（聯邦）德國人的集體記憶上留下了最為敏感的傷疤，而不是大西洋上的U型潛艇戰，甚至也不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在著手寫作本書時，我還無法預知之后發生的新聞事件將為我的敘事提供一種越來越戲劇化的背景。首先是冷戰結束，接著是德國統一，再接著是海灣戰爭，最后，1993年的日本大選一舉打破了保守派自民黨的政治壟斷。我決定從海灣戰爭寫起，那時我正好身在德國或日本，況且，那幾個星期比1945年以來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上一次世界大戰留給兩國的創傷和記憶甚至連越戰也無法與之相比——盡管兩國都未受邀參戰。日本和德國的憲法均禁止自己國家卷入戰爭，這一安排引發了激烈爭論：它們能否獲得世人的信任，或者它們有沒有信心參與到今后的武裝沖突中？如今，在我寫作本書的同時，德國飛行員正在前南斯拉夫上空巡邏，而日本自衛隊亦在柬埔寨嘗試進行維和，盡管他們還是沒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利。

我們所處時代有許多陳腔濫調，其中之一是兩個昔日的軸心國輸掉了戰爭，但贏得了和平。許多人忌憚日本和德國的實力。歐洲人害怕德國人占據主導地位，而部分美國人已經將日美經濟矛盾形容為一場戰爭。但是如果說其他國家的人對德日兩國的力量寢食難安的話，那么許多德國人和日本人也一樣。倘若說這兩個民族在戰后依然有什么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身上都殘留著對自己的不信任感。

德國正式統一一事并未在1990年為期一周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引發多少喧囂或喜慶。書展每年都會關注一個特定國家的文學作品那一年聚焦的是日本。作為書展的一個環節，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進行了一場公開討論。兩人都在戰爭期間長大成人，也就是說，都在學校里被灌輸了軍國主義宣傳。他們也因此成為了反法西斯事業的文學倡導者，盡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還沒怎么就政治發過聲。無論如何，他倆都是堅定不移的自由主義者（本書中的“自由主義者”都取美國通行的意義）。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格拉斯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哀嘆德國統一。他說，有了奧斯維辛，德國應該永遠分裂。一個統一的德國對自己和全世界都是一種危險。大江鄭重其事地點點頭，補充說日本也是個巨大威脅。他說，日本人從未正視過自己的罪行，日本仍是個種族主義國家。格拉斯回應說，沒錯，但德國也一樣，在這點上無出其右者，所以德國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實上，德國更糟不然對波蘭人、土耳其人和外國人的普遍仇視又作何解釋呢？啊，那日本人歧視韓國人和阿伊努人[[10]](#_10_Ainus_Ju_Zhu_Zai_Ku_Ye_Dao_H)不也一樣么？所以不對，日本才是最壞的，大江說道。

這一連串細數德國人和日本人不是的“雙簧”進行了有好一會兒，接著對話陷入冷場。兩人都琢磨著還能再說什么。冷場變成了讓人不快的死寂，人們調整坐姿，等待散場。但緊接著，兩人的思想恰到好處地擦出了火花，他們終于達成一致意見。我忘了究竟是格拉斯還是大江提出來的，總之有人說到三菱株式會社和戴姆勒——奔馳公司宣布達成了全新的“合作伙伴關系”。新聞記者戲言其為戴姆勒——三菱軸心。格拉斯和大江表情嚴肅，口徑一致地稱一段危險的友誼才剛剛開始。隨后格拉斯從椅子里起身，給大江來了個熊抱。身材矮小的大江雖然不太習慣這套，卻也盡力地予以回禮。

[[1]Gert Fröbe（1913——1988），好萊塢德國演員，以飾演007系列中的大反派“金手指”聞名。](#_1_2)

[[2]萊納·馬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20世紀最有影響的德語詩人。](#_2_1)

[[3]Alec Guinness（1914——2000），奧斯卡影帝，曾因為在《桂河大橋》里的精彩表演摘得影帝桂冠，他在片中飾演被俘盟軍軍官，被迫鉆進直不起身的鐵籠。](#_3)

[[4]Willy Brandt（1913——1992），德國總理，曾在華沙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前下跪，提出過與共產主義陣營和解的“新東方政策”（Ostpolitik）。](#_4)

[[5]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1905——1981），二戰德國軍備與戰時生產部部長出色的建筑師和工程師。](#_5)

[[6]Autonomen，二戰后德國政治極左派的一個分支，組織成員之間聯系較松散，但共同理念是反對既有的社會秩序和權威，主張自主空間，追求社會革命和無政府的理想狀態。——編注](#_6)

[[7]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國文化人類學者，著有《菊與刀》這部研究日本文化的名作。](#_7)

[[8]1939年日本和蘇聯在遠東發生的一場戰役，以日本關東軍慘敗告終。](#_8)

[[9]1944年二戰期間日軍從緬甸對英屬印度所發動的戰役。](#_9)

[[10]Ainus，居住在庫頁島和北海道的原住民，與日本人外貌明顯不同，更接近西方人種。](#_10)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反對西方之戰

波恩

夜色籠罩。康拉德·阿登納[[1]](#_1_Konrad_Adenauer_1876____1967)搭乘火車橫穿易北河，那時離戰爭爆發還有些年頭。坐在開往柏林的臥鋪火車里，他打著盹兒。隨著列車駛向東方，阿登納睜開一只眼，自言自語道：“亞洲，亞洲。（Asien, Asien）

這則故事當然有可能是虛構的，但是作為英占區基督教民主黨的主席，阿登納在1946年的確給美國的友人寄去了一封信，信里寫道：“我們面臨巨大的危險。亞洲就在易北河的那頭。只有一個由英法這樣的西歐國家引導且經濟政治運轉良好的歐洲，才能阻擋亞洲意識形態和強權進一步來犯。而德國的自由地區是西歐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阿登納口中的來犯者指的是蘇聯共產主義。不過，他所用的“亞洲”一詞耐人尋味。對于這位來自德國西部邊陲、昔日古羅馬城市科隆的政治家而言，野蠻源于東方。無論是文明開化的羅馬人還是查理曼帝國的勢力，都沒有滲透進那里。自由和民主定義了繼承古羅馬文明、信仰基督教和經過啟蒙運動洗禮的西方世界，而亞洲則意味著古板、專制和戰爭。第三帝國就是亞洲的。阿登納的使命是把他的德國——西德——帶向西方，并去除亞洲的痕跡，就好像切除癌癥毒瘤。

我在海灣戰爭爆發后的第二周——也就是1991年1月的最后一周——來到阿登納欽定的西德首都波恩。雪下得很大。波恩這個地方挺有意思，因為海灣地區的軍事沖突讓人不斷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戰。有時候，舊傷口看著像是新近才形成，似乎德國依然滿目瘡痍。

同全世界大多數人一樣，之前一個禮拜我通過電視關注著戰事的進展。我看的是英國電視臺的節目，氣氛簡直可以用歡快來形容。每天早晨和夜晚，退役的海空兩軍將領穿著雙排鈕夾克出現在熒屏上，在地圖上指出戰事推進的路線。他們的話語中透露出一股職業自豪感和愛國熱情。在專業性探討和新聞記者揣測之余，人們不由感到，英國重現了往日的雄風，雖然排場不大，但也令人欣喜，就好像幾十年來的經濟恥辱、帝國消亡和整體衰落只不過是一場噩夢。輪到打仗，誰是真漢子誰是小毛孩，即見分曉。

一位以煽動性沙文主義觀點著稱的英國報紙專欄作家寫道，外國人或許在制造汽車或電腦方面比英國人在行，但等到打仗的時候，等到要有人來捍衛西方、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等事物的時候，英國人是靠得住的，能和美國人肩并肩站在一起。德國人做得到么？由于德國政府在是否全力支持這場戰爭上躑躅不定，其作為西方盟友的可靠性飽受質疑。又一次，膽怯的歐洲大陸人得指望英國人充當他們的救世主。在這種危難時刻（諸如危險、勇氣和榮譽這些詞再度流行），什么“共同市場”政策不啻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是小商販之間的討價還價；在這種危難時刻，英國人再度一枝獨秀。

彼時的英國，既有讓人感動又有讓人同情之處。就在薩達姆·侯賽因發兵攻打科威特前不到一年，一個由噴火式戰機和颶風式戰機組成的飛行編隊，與一架蘭開斯特轟炸機飛越倫敦上空，以紀念不列顛戰役。那天陽光明媚，戰機的機翼掠過白金漢宮，機身閃閃發光我在北倫敦一座山頂上目睹了這出飛行表演，周圍人山人海，有老有少，還有年輕人，均仰首凝視著空中的老式飛機。沒有叫喊，沒有歡呼，也沒有笑聲。更多的，只是一種默默的自豪和憂傷，這種憂傷近乎痛苦。英雄遲暮，回首過往時一向如此。

在波恩，氣氛則大為不同。機場巴士駛進城時，我首先留意到的是老舊住宅樓窗戶上垂下來的床單，上面用紅黑兩色寫著各種標語：“莫用鮮血換石油！”“我們還年輕，不能死。”“世上沒有正義戰爭。”“每顆炸彈都在摧毀我們的希望。”一周前，波恩爆發了大規模反戰游行。樓房的窗戶和墻壁上依舊貼著“我們很害怕！”“別再打仗了！”“布什是戰犯！”這些字樣的海報。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難以抑制的狂躁，一種世界末日近在眼前的氣氛。這個世界就要完蛋（Weltuntergang），埋葬它的是戰爭和生態災難。

波恩的建筑是18世紀風格，很樸素，襯托出啟蒙時期的古典主義之風。這座城市沒有德皇威廉治下的柏林那種恢宏氣勢。覆蓋著骯臟積雪的集市廣場上屹立著一尊貝多芬的銅像，一面白旗插在他冰冷的手中，上面是“禁止轟炸”的圖案。銅像前扎著幾頂帳篷也繪有橫幅和標語。帳篷外，一塊塊展示牌上滿是各種照片和文字橫幅和我之前看到的一樣，還是“莫用鮮血換石油！”等口號。一塊展示牌寫著：“記住這些圖片。”底下是一堆照片、剪報和素描主題各式各樣：一戰時躲在戰壕里的士兵；二戰期間被轟炸的城市納粹士兵在烏克蘭行軍；赤身裸體的越南小女孩逃離凝固汽油彈轟炸；以軍在黎巴嫩；美國轟炸機起飛，赴巴格達執行任務。“世上根本就沒有正義戰爭。”標語寫道。

一個四十出頭、留絡腮胡穿滑雪衫的男人在分發宣傳冊，見我拿了一份，便跟我談起他的見解：“這場戰爭完全是出于物質原因而打的。伊拉克用毒氣對付庫爾德人的時候，我們袖手旁觀，現在倒開打了。必須立刻停止戰爭。”他說話語氣并不盛氣凌人，像個習慣于被人誤解的先知，有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味道。

我的反應和旅德外國人經常按捺不住要說的一樣——帶著不同程度的自以為是。我提醒他想想納粹：“1938年的‘水晶之夜’[[2]](#_2_Kristallnacht_1938Nian_11Yue)后我們也是袖手旁觀，這是1939年不動武的理由么？”“呃，”他應了一句，“我那時還沒出生，所以說不上來。但我知道，以色列在1948年屠殺過巴勒斯坦人。可如今我們的外長根舍（Genscher）卻還跑到以色列去送錢、送武器——全都因為我們心中有愧。你覺得這樣對么？”

我沒有料到他會說德國人“心中有愧”，因為他是個和平活動者、綠黨成員，從年齡來看應屬于“六八一代”[[3]](#_3__68er__1968Nian_5Yue__Xi_Ou_G)，成長于激進的六十年代。他關于以色列和德國人“罪孽心理”的那套論調在諸如《德國國家報》（Deutsche National-Zeitung）這份極右刊物上不難見到。這份報紙出版地在慕尼黑，發行人是老牌極右翼人士格哈德·弗雷（Gerhard Frey），他與阿登納的“西方”素不對付。該報最近出版的一期對前往以色列提供幫助和安慰的德國政客冷嘲熱諷，并譴責海灣戰爭是美國人搞種族滅絕的典范。“波斯灣地區的種族滅絕，”該報寫道，“是典型的反人類罪行。”該報還刊登了“屠殺美國印第安人”和“以色列的恐怖戰爭”等文章。這倒不是說《德國國家報》是份反戰主義報刊。它對德國國防軍乃至黨衛隊大肆吹捧，還以折扣價向讀者兜售印有德國軍人戎裝照的日歷，并推銷閃電戰的紀錄片錄像帶。

然而，這些宣傳所流露出的情緒，和那些上了英國電視節目滿面紅光的退役空軍將領身上洋溢的自豪感，幾乎完全不是一回事因為前者旨在為自己開脫，似乎有些事有必要被掩蓋，又似乎德國人的罪孽通過宣揚以色列的恐怖行徑或美國屠殺印第安人就能得到緩解，甚至一筆勾銷。在這里——或許也只有在這里——德國政壇的兩個極端才產生了交集。一頭是《德國國家報》，另一頭是柏林和平運動的一位發言人，他稱空襲伊拉克是“自希特勒以來最嚴重的戰爭罪行”。

上一次世界大戰的回響隨處可聞，但其在極端政治思潮中發出了最強音。對美國物質主義毀滅世界的擔憂，長久以來就是左右兩派共有的論調。海灣戰爭期間，這種擔憂似乎成為了現實。對美國的怨氣由來已久，人們以為是右派的專利，其實左派也有1991年11月，斯圖加特出現了一座非官方背景的戰爭罪法庭，對美國人的“生態戰爭罪”和在伊拉克犯下的“種族滅絕”進行審判。聲名顯赫的和平活動人士阿爾弗雷德·梅西特斯海默（Alfred Mechtersheimer）提醒聽眾，紐倫堡審判是勝利者的正義。一位社會黨政要批評西德人對美國卑躬屈膝。但如果說左右兩派對美國共同的敵意還算相對直觀，他們對待以色列的態度則從來沒那么簡單美國讓人想起的是轟炸機摧毀德國城市，是諾曼底或阿登戰役的激戰，是黑市和拿著巧克力、絲襪勾引德國姑娘的黑人美國兵。而一提起以色列，便是大屠殺（Holocaust）。

我被人引介給旅居波恩的一個以色列人，鑒于對方想隱去真名我姑且管他叫邁克爾。邁克爾是德國罪行方面的行家，怨氣頗重我在以色列大使館見到了他，這是座位于波恩市郊、守衛森嚴的別墅。我倆坐在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里聊了會兒，屋里只有一張空蕩蕩的寫字臺，墻上掛著以色列的風景照。邁克爾身材敦實，一頭卷發三十出頭的他是“六八后”，出生在俄國，還是孩子時就移民西德童年是在科隆附近度過的。他是學校里唯一的猶太孩子，這段經歷很不是滋味，因為他總被當成特例區別對待。老師會請他給全班講發生在奧斯維辛的事。別的孩子調皮搗蛋時免不了挨罰，但老師會對他網開一面。

幾個月后，我在讀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的小說《爸爸》（Vati）時聯想到了邁克爾。小說的主人公是個男孩，爸爸是納粹戰犯，原型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醫生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兒子老抱怨他在學校受到的待遇：“他們的想法讓我感到壓抑。生物老師因為給我打低分還向我道歉，讓我千萬別把這看成是對我家里人所作所為的懲罰。哪怕不做功課，老師也不會罵我偷懶。他們說，這是因為‘我家的實際情況比較復雜’。”

邁克爾說，德國有心結。“我相信，如果你給德國人做心電圖測試，隨便誰，老少都行，你會發現，一提到猶太人，對方的腎上腺激素水平就會猛增。”

他說，這就是海灣戰爭在德國造成如此巨大恐慌的原因。以色列大使館成天接到帶著哭腔的人打來的電話。其中一些人詢問一旦戰況惡化，他們能否幫助以色列兒童避難，戰爭結束后又能不能把孩子送回去。得勸這些德國人平靜下來，邁克爾說完聳聳肩。“哈，”他微微一笑，“做德國人可真難啊。”

邁克爾不光討厭年輕的和平主義者，也討厭老一代的人，那些為人父者，那些有罪的人（Täter）。他說，老一輩人戰后幾乎統統變得很親猶。牧師、市長、教師、神甫一有機會就去以色列。一種有趣的角色互換出現了。邁克爾稱，戰前猶太人給人的印象是一群溫和、文弱的和平主義者。反之，德國人則有著普魯士式的紀律性，如“克虜伯鋼材一般堅強”云云。可如今，以色列人已是嚴守紀律和不辭辛苦的戰士。不少上了年紀的德國人為此很佩服他們，而看不上懶惰而又不愛衛生的阿拉伯人。于是德國人倒成了和平主義者。“我們以色列人現在看不上這些德國士兵。”邁克爾說。

到了六十年代末，特別是1967年的“六日戰爭”后，人們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許多德國年輕人對他們父母支持的事物一概反對。他們批判父母的過去，憎恨他們的沉默，也反感他們的親猶立場學生中的激進派宣稱自己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尤其是和巴勒斯坦人他們永遠也不會和罪人——也就是那些兇手——扯上干系，在德國不會，在越南不會，在以色列也不會。他們會為父母的怯懦作出補償他們會抵抗，他們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會為了把世界從生態災難中拯救出來而戰斗，抗擊美國的消費主義和以色列的窮兵黷武。邁克爾說：“他們覺得支持左派是杜絕反猶主義的一劑疫苗。”因此，在邁克爾眼里，成千上萬的德國和平示威者不是成千上萬個吸取了歷史教訓的良善之人，而是代表了“百分百德國新教徒的刻板，既咄咄逼人，又缺乏寬容，不通人情”。

1991年2月，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就海灣戰爭這一話題接受了《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縮寫FAZ）的采訪。[(1)](#_1_15)奧茲是自由派，而FAZ是保守派報紙，對和平運動、綠黨、左派或“六八一代”鮮有同情。報紙編輯贊成德國出兵參加海灣戰爭，或者最起碼也應該堅定支持聯合國軍。FAZ立場反共，親北約，奉行自由主義（這里取19世紀歐洲通行的詞意，而非20世紀美國語境中的自由主義）。其中一位編輯是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他寫過一本關于希特勒的著名傳記，后翻拍成電影，讓他發了筆財。希特勒時代——尤其是在影片中——被描繪成某種集體瘋狂，一場殺機四伏的鬧劇，一個偉大國家歷史中一次精神失常的偶發事件。

那一周，費斯特情緒激動，因為在他看來，德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缺乏堅定，卻對和平過度憂慮，再度顯示出這個國家是自身歷史的囚徒。費斯特經常表示，德國理應重新成為一個正常、負責任的大國。他指的“大國”，和阿登納說的是一回事：一個正常的西方大國。在他看來，這一目標在受到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負罪心理所妨礙后，反而催生出了道德優越感：我們這些罪孽深重的人如今要治愈世界的痼疾。這一點阻礙了德國承擔其作為西方盟友的義務。英、法、美三國在缺乏德國積極支持的情況下仍然不惜動武，愛國人士費斯特對此感到很尷尬，甚至很丟臉。我提到反戰示威時，他嘆了口氣，說道：“都賴希特勒。”

阿摩司·奧茲跟《法蘭克福匯報》不是一路人，因為他信奉的自由主義屬于中間偏左。然而，他在采訪中以批評的口吻談到了歐洲左派，特別是德國左派看待第三世界時的浪漫主義眼光。從他們的態度中，他讀出了幾分盧梭對“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的崇拜之情——對那些不幸受難的人有一種近乎神學般的推崇。“或許，”他談到，“這是基督教高度簡化和富于感情的印象造成的，根據教義，受害者經過受難，靈魂可以得到凈化。”

也就是說，猶太人經過大屠殺，靈魂得到了“凈化”，“仿佛毒氣室里噴灑在受害者身上的是一種道德清潔劑”。他們肯定要比別人更純潔，也更出眾。但是，這種純潔性在有罪之人的子子孫孫身上作用如何呢？能說他們心底里其實也想成為受難者么？

海灣戰爭期間曾曝出新聞，說德國公司賣給伊拉克的毒氣不久后將被安裝在飛毛腿導彈上，用來對付以色列，這對道德純潔構成了殘酷的考驗。世上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但猶太人正面臨德國毒氣的威脅。這可不是道德悖論的問題，和平運動因此內部分裂，詩人兼詞曲作者的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過去曾經反對美國的導彈基地落戶德國。他的政治信仰和《法蘭克福匯報》相去甚遠，但因為聲援海灣戰爭，惹惱了昔日許多同仁。“莫以鮮血換石油，”他在《時代周報》（Die Zeit）里寫道，“這是最新的一句反美口號。哎！美國人當然也關心石油……而我為此感謝上帝……沒錯，我樂見有齷齪利益的存在。要不然以色列就會孤軍奮戰了。”[(2)](#_2_13)比爾曼的父親死在了奧斯維辛。

有個德語詞，很難譯成英文，但概括了不少德國人在海灣戰爭期間的情緒：betroffen。辭典給出的翻譯如下：“受到震驚、失望、驚駭和迷惘的沖擊或影響。”這些解釋沒一個確切的，也許法語詞bouleversé在語義上最為接近。betroffen在和平主義者、自由派和社會黨人中間使用很廣泛，出現頻率和經常掛在德國保守派嘴上的“正常國家”（normal nation）一樣高。betroffen意味著一種罪惡感恥辱感，甚至是無地自容。說某人betroffen，就是說他無言以對但它還隱含了道德純潔性這層意思，betroffen是“掌控過去”的一種方法，展示悔悟和認罪的態度，并換取寬恕和靈魂的升華。

西德國內頻繁出現勸人“哀悼”過去、“為哀悼努力（Trauerarbeit）的訓誡，這是凈化過程的一個環節。在六十年代發表的著作《論無法哀悼》中，亞歷山大·米切利希和瑪格麗特·米切利希剖析了影響戰后德國人不愿面對過去的道德麻木。他們因為戰敗而麻木；記憶又似乎出現了阻塞。他們既不愿意也無法為哀悼努力，或承認罪過。他們似乎全然忘記了自己曾頂禮膜拜一位致幾百萬人死亡的領袖。不少德國人在過去沉醉于納粹運動所提供的自吹自擂戲碼，樂此不彼。米切利希夫婦認為，德國人在第三帝國倒臺后對此抵賴，是希望不僅能逃避懲罰或罪惡感，而且還能逃避戰敗后接踵而至的那種徹底一蹶不振的情緒。只有那些失去過的人才有資格哀悼。但德國人到底失去了什么？當然，猶太人算一個，但這很難讓人感到是德國人的損失。許多德國人失去了家園、兒子荒唐的理想和領袖，但是這一切并不是米切利希夫婦“為哀悼努力的對象。恰恰相反，1945年后，對希特勒的憑吊應該是不可能存在的。三十年過去，瑪格麗特·米切利希會說，無力哀悼這點再也不適用于年輕一代。她說的沒錯：德國處處哀悼猶太人，而在個別極端主義圈子里，希特勒一樣有人緬懷。

betroffen的狀態有些許宗教涵義，這和在德國有悠久、深厚傳統的敬虔主義（Pietism）有些近似，后者創始于17世紀菲利普·雅各布·斯本納（Philipp Jakob Spener）的著作。斯本納一心通過強調辛勤勞動和個人精神付出來改革教會，并在日常生活中傳播福音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這樣寫道：“敬虔主義的核心是個體的道德自新，這點可以在經歷懺悔的煎熬、幡然醒悟并認識到上帝必然的仁慈后獲得實現。”[(3)](#_3_11)敬虔主義是對法國啟蒙思想中世俗和理性觀念的消解。它影響了19世紀的德國中產階級，也鼓舞了普魯士軍官和俾斯麥身邊的人。我認為，波恩的以色列人邁克爾在談到德國反戰人士身上的新教刻板時，所指的正是這一精神。

海灣戰爭期間，波恩就有betroffen之感。本來不應該是這樣，因為當時正值狂歡節，是人們穿著奇裝異服參加派對、喝啤酒、抱女人、放聲歌唱的時節。但這一切在戰爭時期和大難臨頭之際顯得不合時宜，于是狂歡節委員會改頭換面，成了危難關頭委員會。對于所有自愿取消狂歡節慶典的團體，萊茵蘭——普法爾茨（Rheinland-Pfalz）地方政府都給予資金補償。這一手段果然奏效。只有科隆舉辦了一場非官方的街頭慶典，口號是“我們照樣過日子”。

柏林一個由音樂學院學生組成的團體搞了一場反戰日活動，據他們的發言人說，原因是“所有學生都感到很難過，很彷徨（betroffen），我們覺得有必要聚集在一起，表明大家的擔憂”。學生們造了個祭壇，點燃蠟燭。當地一家電臺播放了他們的和平之歌，歌詞不斷地重復一句話：“我們彷徨無措，深感震驚。”

我下榻賓館外的廣場又陰冷又空曠。一個不起眼的啤酒攤旁，幾個年輕人喝著酒，不時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就像在過節。浸透醉意的歌聲從我房間的窗戶飄了進來。聽著他們用力跺腳打節拍，我腦海里浮現出不計其數的戰爭片，片中德國人的歡天喜地與其殘暴行為形成了極具諷刺的反差。身在德國，最好還是盡力避免做這樣的聯想，因為哪怕一個人的記憶來源只是電影，也很容易變得自以為是和偏激。

看著電視，我再度感嘆英德兩國間的區別。德國電視里，唇槍舌劍的討論節目比比皆是，人們圍坐在圓桌旁，就時下熱點問題展開辯論。聽眾坐在小桌邊，邊小口呷飲料，邊聽嘉賓們滔滔不絕的發言。氣氛一般很嚴肅，有時爭論會趨于白熱化。人們很容易嘲笑這類節目的一本正經，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稱道之處。部分得益于這類談話節目，大批德國人才對政治辯論熟悉起來。

海灣戰爭期間，電視觀眾很難避開圓桌討論。實在是太多了不停換頻道的話，還能同時關注幾場辯論。牧師是這些節目的常客一些西裝革履，一些穿著牛仔褲。他們的出現恰到好處，因為辯論的核心是良知問題。一個人能問心無愧地參戰么？某位德國戰斗機飛行員表示自己很難對別人痛下殺手，他不知道自己良心上是否過得去。一位在美國空軍基地附近醫院工作的年輕醫生則說，自己為救治在海灣戰爭中受傷的美軍飛行員感到良心不安，因為這么做讓他成了幫兇。

在一檔具有代表性的節目里，討論嘉賓席中坐著曾經的反納粹抵抗主義戰士、應征入伍的新兵、年事已高的家庭主婦、上班族母親和幾名高中學生。二十七歲的母親安格莉卡發言說，鑒于“我們在二戰時干的壞事”，德國必須幫助以色列。不過，參戰的話肯定一點好處都沒有。

“那英國人和法國人怎么說？”原抵抗主義戰士開口了，“是不是應該把臟活都交給他們干，我們自己躲在家里？”（他沒提美國人）

“哦，”安格莉卡回應，“我們不能違背自己的信仰。過去接受的教育告誡我們再也不要打仗，我們怎能不予理會呢？身在他國時我們恥為德國人，世人一直都怕我們，現在他們卻責怪我們不夠果敢……”

十八歲的高中生安德烈亞說道：“我們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叫人怎么忘得了？我可不為自己身為德國人感到自豪。”

但是，等到年長的家庭主婦談起她在二戰期間的磨難——轟炸吃不飽飯、出征的父親和兒子沒能回來——并呼吁應反對所有戰爭時，年輕學生發話了：“我能理解，戰爭時期會發生很多可怕的事但是如果我們在該出手時不出手，壞事一樣會發生。”

聽眾席中發出了難以置信的叫聲，然而學生的話得到了原抵抗組織戰士的支持。后者把薩達姆·侯賽因比成希特勒，認為應該制止薩達姆，就好像當初應該制止希特勒一樣：“薩達姆已經殺害了上萬人。難道就因為我們良心有愧，開不了槍，就可以對他聽之任之么？”

最后，穿著牛仔褲和花襯衫的年輕士兵終于開口了。當被問及他對殺人有何感想時，他答道：“如果德國或北約遭到攻擊，我將不得已而為之。但如果是我不支持的戰爭，我會抗命。”

他的回答沿襲了戰后聯邦德國憲法給出的正統解釋。在德國，新兵是可以以良心不安為由拒絕參戰的。“命令就是命令”（Befehl ist Befehl）這句話再也不能成為實施暴行的借口了。另外，德國軍隊只能為保衛德國或盟國領土作戰。德國是北約成員，因此對盟國領土的普遍理解是北約領土。右派想要擴大這一解釋的外延，左派至今都堅決抵制。

但是這位士兵參與的并非是法律層面的討論。他試圖回答一個有關道德和良知的問題。而且他給出了誠實的答案，比起許多和平主義者一味拒斥戰爭——所有戰爭——的立場，這或許更能反映出當今德國青年的心態。“六八一代”胸懷一種高于一切的道德目標：要和父母那輩人徹底劃清界限，打破他們罪惡的沉默，散播和平的訊息，或者干脆就說德國人再也不會受到戰爭的誘惑。社民黨主席奧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在海灣戰爭期間宣稱，要德國人參戰就“好像給一個改過自新的酒徒吃酒心巧克力一樣”。你幾乎能聽到焦慮的尖叫。

費斯特說的也許沒錯。事情之所以這樣，恐怕是因為希特勒。然而海灣戰爭顯示出，對于德國和平主義，不能簡單斥之為反美主義或對阿登納口中西方世界的背叛。現實的矛盾是實實在在的：至少有兩代人所受的教育是放棄戰爭，再也不把德國軍人送上前線。換言之，他們所受的教育就是盼望德國成為放大版的瑞士。可是，他們也被教育要對以色列的命運負有責任感，而且若要成為西方國家的公民，就要堅定地融入西方盟國大家庭中。問題在于，他們是不是兩方面都能做到。如果薩達姆果真是另一個希特勒，而且德國沒能拉猶太人一把的話，那該如何是好？

這就是拿希特勒做類比會讓人痛苦的原因。而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也正是決定拿這點開刀。他在《明鏡周刊》（Der Spiegel）里把薩達姆比作希特勒。[(4)](#_4_11)恩岑斯貝格爾是出色的詩人和散文家。他很清楚怎么觸及德國同胞的痛處。他能用美輪美奐的語言煽動人們的情緒。有人欣賞他在《明鏡周刊》上的文章，但也有不少人對之怒不可遏，特別是左派知識分子。在柏林時，我曾聽過一名批評家斥責恩岑斯貝格爾是叛徒。他背叛了什么？我追問。背叛了精神（Geist），對方回答。許多年來，恩岑斯貝格爾本人一直是左派知識分子。他這代人，在納粹統治下成長起來，上學念書，然后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在戰爭末期被征召進防空部隊。戰后，恩岑斯貝格爾同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öll）等作家一道，形成某種左派的反納粹團體，旨在掃除德國威權主義的殘余勢力。多年來，追剿納粹思想余孽或多或少成了他為之全身心付出的一項事業。

在為《明鏡周刊》撰寫的文章里，恩岑斯貝格爾表示薩達姆同希特勒一樣，不僅是個獨裁者，還是全人類的敵人，是個熱衷制造死亡、自尋死路的惡魔。他若有條件，定能摧毀全世界，當然，他自己的人民也包括在內。他和希特勒一樣，蔑視自己國家里的一部分人。問題是，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這些十惡不赦的惡棍？恩岑斯貝格爾的答案是那些被侮辱的人。一群永遠的失敗者，因為知識水平不如人，因為貧困，抑或因為自感無力左右生活，長久以來變得垂頭喪氣，心灰意懶。德國人能在阿拉伯人身上發現自我的存在，恩岑斯貝格爾寫道。

毫無疑問德國人很難接受這樣的類比。恩岑斯貝格爾寫道，這一認識“將顛覆任何從種族角度闡述眼下軍事沖突的基礎。另外，它還將揭示，盡管沒人愿意重提法西斯主義，但它仍具有潛在的延續影響。德國實業界從來就不必為其向希特勒提供的殷勤服務進行懺悔。如今他們抱著同樣的熱情急于幫助希特勒的繼任者，只能說是一脈相承。單靠無知不足以解釋為何相當一部分德國青年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或者反對喬治·布什甚于反對薩達姆·侯賽因”。

對潛在延續性的批評是戰后反納粹團體的一貫主張，但恩岑斯貝格爾的話確有其新穎之處。也許他對伊拉克人的評價有失公允，畢竟他們可沒有像德國人支持希特勒那樣傾力支持薩達姆。但對于那些自認為通過悲天憫人的修行，或急不可耐地手持蠟燭、企盼和平就能甩掉歷史包袱的人，他們身上的延續性沒能逃過恩岑斯貝格爾的眼睛。

恩岑斯貝格爾這代人學會了不信任德國人。四五十年代的延續性依舊清晰可見，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和防空部隊的經歷仍然歷歷在目。恩岑斯貝格爾的反納粹團體對西德人興沖沖地奔向物質繁榮滿腹狐疑。物質繁榮就像一層厚厚的白雪，把過去覆蓋起來，掩藏所有痕跡，也遮蔽一切聲音。恩岑斯貝格爾寫過一首著名的詩，開頭是這樣的：

我的父母，

天真地把我帶到這片土地上，

但我在這里失去了什么？

土生土長，卻又無所適從，

我人在這兒，心卻不屬于這兒，

這片溫馨的骯臟之地，

是我舒適而溫存的墳墓。

由于一年前發生的事，海灣戰爭期間世人對德國人的不信任感格外強烈。眼看兩德合并，鄰國心里忐忑不安。這很好理解；它們曾經淪陷，很清楚德國人能做出什么事來。但同時顯露出來的還有恩岑斯貝格爾這代人，或至少是反納粹團體成員對德國人的不信任君特·格拉斯反對統一的理由是一個統一的德國制造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在使用“奧斯維辛”一詞時，幾乎帶有宗教意味，好像這是個護身符，拿在手里搖來晃去，如同一只兇煞之眼，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奧斯維辛”長久以來一直是對抗潛在連續性的主要驅邪物。

換個不那么抽象籠統和老生常談的說法，西德人不信任東德人——東德軍人行進時依然踢正步，他們的小布爾喬亞做派很有三十年代的遺風；東德政府體制雖然建立在反法西斯基礎之上，卻殘留了許多納粹時期的余毒，令人擔心；簡言之，東德人生活在“亞洲”。以色列人邁克爾將“西佬”（Wessies）與“東佬”（Ossies的相遇比作是展示道林·格雷（Dorian Gray）的畫像[[4]](#_4_Ying_Guo_Zuo_Jia_Wang_Er_De_Z)，西德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形象，對此并不高興。

一位知名的西德作家在我提到東德人時翻了翻白眼，說他厭倦了歷史的重蹈覆轍。“凈化，再教育，這些我都見識過。我不喜歡那些東德人，他們是什么樣的人我一清二楚，我不想跟他們扯上關系。”聽到這話我很驚訝，后來將其轉述給文學批評家羅蘭·維根斯坦（Roland Wiegenstein）。他的寓所在柏林，十分寬敞，里面擺放著鋼結構的黑色皮質家具，墻上掛著大幅抽象畫。

維根斯坦穿著入時考究。他的品位有很顯著的戰后（après guerre）風格。“我很清楚他這話是什么意思，”他說道，“我比他大不了幾歲。聯邦德國變身文明人的速度之快，真乃奇跡。我們現在算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了，吸收了民主體制，但原民主德國的人依然困在前現代時期。他們是丑陋的德國人，和戰后的西德人像得很，我是和這批人一起長大的。他們現在都還不算是文明人。”

丑陋的東佬們穿著剪裁蹩腳的西服，牛仔褲洗得發白，腳蹬塑料鞋。對他們文化的鄙視不僅僅是勢利眼在作祟。其中的潛臺詞是，西德人自己也險些變成踢正步的納粹地下支持者，好在他們脫胎換骨，算是成了現代歐洲人。就在德國統一前不久，“六八一代”的小說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著文道，在他看來（潛臺詞是對其朋友和西德同胞亦是如此），托斯卡納都比德累斯頓要近。

猜忌心是德國政治語言的一部分。諾伯特·岡澤爾（Norbert Gansel）是德國聯邦議會議員兼外交問題專家。海灣戰爭期間，他正好年滿五十，和維根斯坦一樣，他的穿著也很時髦，上身是一件紫紅色的西裝。他給我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日本清酒。“口感跟石油一樣滑爽。”他評價道。我猜這句話里有諷刺之意。他講話很小心：“我個人信奉的政治哲學，也許連我的政治抱負，都和不信任感有關。我不信任我代表的選民，他們的父輩和祖輩把希特勒推上臺，縱容他迫害猶太人。”他的寫字臺上方掛著一幅德國北方港市基爾（Kiel）的照片，那是岡澤爾出生的地方。圖片展現的是1945年滿目瘡痍的基爾。看到我盯著這幅圖，他說道：“不管誰挨炸，保管都能得到我們同情。”

岡澤爾在研究納粹歷史上花了不少時間，他大學論文寫的就是黨衛隊。1970年代時，他曾嘗試推翻納粹法庭作出的判決，但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取得成功。其中一大障礙是納粹的司法系統從來沒得到過清算。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延續性才宣告終結。岡澤爾告訴我，五六十年代司法失靈的情況再也不可能出現了，新一代政治青年業已成熟。行兇者（Täter）的子孫在質疑過去時已經不像“六八一代”那樣自以為是了。德國人變現實了，岡澤爾說，比日本人現實得多。海灣戰爭的爆發就像沖了個涼，精神為之一振。

很難說到底哪一點更讓人振奮：海灣戰爭還是東佬們的到來二者幾乎同時發生，這點則平添了幾分壓力。德國社民黨素有一種民族主義式中立（nationalist neutralism）的傳統，不少左派政治家認為與西方國家結盟阻礙了德國統一。1950年代，社民黨在這方面的民族主義色彩比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還要濃厚。多年來，左派一直抨擊阿登納治下的德國繼承了納粹遺產，還對美國卑躬屈膝。但如今德國統一了，“奧斯維辛”的幽靈又回來了，外加一群思想狹隘的“東佬”的涌入，阿登納當年的看法算是得到了證實。德國需要西方，西方也需要德國，只是其需要的方式讓德國人尤其是社民黨人感到深深的不安。

將德國推入西方盟友的懷抱之中，譬如北約和歐共體，意味著埋葬對德國人的猜忌心，起碼人們是這么希望的。成為歐洲人的德國人會感到更加正常，為西方所接納，也更像文明人。德國，這個古老的“中央之國”，位于中歐的龐然大物，曾對其身份定位憂心忡忡，又為歷史包袱所累，如今搖身一變成了西方國家。這種美好的狀態在一年里卻兩次遭到挑戰：先是兩德合并，接著是海灣戰爭不出意料，結果有幾種。一種是對民智未開、非西方的“東佬”本能的排斥，另一種是在要不要同西方盟友一起出兵一事上瞻前顧后躊躇不前。

在波恩的最后一個晚上，雪依舊下個不停。我約了位年輕的政治學者共進晚餐，晚餐是土豆餃、香腸配啤酒。說他年輕，其實也還好，只是不屬于“六八一代”。此君并非和平主義者，對德國政府在支持西方同盟一事上的優柔寡斷頗有微詞。他似乎并未受到對本國文化猜疑心的掣肘，熱情地給我介紹本地菜肴和一兩家酒吧點唱機里播放的音樂，音樂歡快得有些瘮人——海灣戰爭鋪天蓋地的世界在此恍如隔世。他告訴我，德國軍隊現在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民軍隊了，所有人都必須服役。這也正是討論良知和道德如此重要的原因，所有人都有這方面的顧慮。另外，由于德國憲法規定國家安全和盟友的安全是綁在一起的，軍事冒險幾乎斷無可能。“你看，”他說道，“我們德國人真的不想再自行其是了。”

天色不早了，我倆結伴走回我下榻的酒店。酒店年代久遠，過去曾有許多顯赫的客人入住，但在前臺發放的歷史簡介里，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早期這段歷史不知為何被跳過了。一路上，我們走過拿著和平旗的貝多芬雕像，走過“警示柱”旁舉行燭光禱告的反戰青年，走過寫著“莫用鮮血換石油”和“德國的錢和毒氣正被用來屠殺世界各國人民”的標語。我向他透露自己計劃寫一本探討德國和日本戰爭記憶的書。他的反應似有幾分愕然，甚至說得上是震驚，但嘴上并無表示。過了不久，我倆道別后，他突然轉身跟我說：“拜托，請別夸大我們和日本人的共同點，我們很不一樣。我們德國人可不會為了把公司做大做強就睡在公司。我們只是人，普通人罷了。”他沒有說西方人，但也許就是這個意思。

東京

在東京，海灣戰爭似乎離人們很遙遠。沒有橫幅，沒有警示柱，也沒有燭光禱告或和平示威。比起廢墟和彈痕依舊清晰可見的德國，戰爭的概念在日本顯得更為遙遠。鑒于整個東京在1945年陷入一片火海，這座城市沒剩下什么可以讓人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戰的事物。1936年未遂軍事政變中被占領的賓館沒有毀于戰火，倒是在1980年代一波房地產熱潮中被拆除了。過去對日本主要戰犯實施絞刑的監獄，如今被一棟摩天大樓和購物中心所取代。

1970年代至1980年代早期，人們仍能在火車站候車廳和神道教寺廟前見到日本帝國軍隊的退伍老兵，他們或失明或殘疾，靠做工粗糙的義肢方能站立；這些身穿白色和服、戴著墨鏡的老人拉著破破爛爛的手風琴，曲目都是傷感的軍旅老歌，指望人們賞幾個錢。一身美國最新款行頭的年輕人走過他們身旁，大多瞥都不瞥一眼好像這些糟老頭兒根本不存在，又好像他們只是游魂野鬼，只有自己才看得見自己。年紀大一些的路人偶爾會扔給他們幾個銅板，還是偷偷摸摸的，好像在用錢把丟人現眼的親戚給打發走。這些身穿白色和服、鬼魂一樣的人勾起了誰都不愿記起的往事。而如今連他們也永遠消失了。在東京，唯一能喚醒上一次世界大戰記憶的只有飄散在空中的一些零散片段，比如彈子房里傳出的軍隊進行曲。

六本木是東京最時尚的幾大區之一。1945年來，這里一直籠罩著一種淡淡的西方味道。從前這里有個美軍基地，如今則散發出奢華氣息。外國模特快步奔向時尚工作室，年輕男子開著保時捷在大街上飛馳，淑女們在意大利北部風味的餐廳里享用簡便午餐。浮華之間，矗立著一片難看的灰色混凝土樓群，破敗的模樣與周邊環境很不相稱，好像它們壓根兒就不該出現在那兒。日本防衛廳總部（編按：2007年升格為防衛省）就設于此，當時其還算不上部級機構僅僅是一個廳，盡管防衛廳長官擁有內閣大臣的職級。這些老樓是上一次戰爭僅剩的一點印跡。戰前，這里的主人是日本帝國陸軍戰后換成了美軍。

在官方層面，日本是沒有海、陸、空軍的。1946年，牢牢盯著日本人的美國占領當局塞給前者一部憲法，其中第九條聲明“日本人民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此外“不保留陸、海、空三軍和其他戰爭力量”。自衛隊是一個并不牢靠的妥協產物。實際上日本的兵員人數相當龐大，只是憲法禁止其向海外派兵。

隨著1950年前后冷戰爆發，美國人再也不希望日本只充當解除武裝、奉行和平主義的楷模。于是國家警察預備隊應運而生。左派對此表示抗議，但無濟于事。隨后，同樣頂著國民巨大抗議聲浪的《美日安保條約》簽署通過。理查德·尼克松在1953年訪日期間曾說憲法第九條是個錯誤。許多日本保守派同意他的說法，但他們的意見不占上風。冷戰惡化后，部分得益于朝鮮戰爭，日本商界開始欣欣向榮，左派則不斷丟失陣地。再后來，自衛隊的身份得到了合法化，不少日本人至今仍然認為這么做的前提不僅值得懷疑，而且違憲。

防衛廳主樓不管從內還是從外看，都一樣毫無特色。我約了防衛廳副官萩次郎（Hagi Jiro）在這里見面。他的辦公室布局簡單，甚至有些寒酸：只擺了張寫字臺、一張沙發、一個碗柜和幾個鐵皮文件柜。墻上掛著一幅日歷，圖案是太平洋海灘上少女的招貼畫。萩次郎身材瘦削，身穿一件藍西裝。我向他打聽日本公眾輿論。大多數國民覺得日本在這場戰爭中應扮演什么角色？他回答說多數人反對出兵。1990年11月曾出臺過一部支持派兵的特別法案，但后來不得不撤銷。多數日本人一談起軍隊就聯想到過去的帝國陸軍，他說。但是不同年齡階層的人們立場不盡相同。萩次郎告訴我，對二戰有切身記憶的人激烈反對日軍出境作戰，不管戰場在哪兒。30——50歲之間的人態度沒那么強烈。至于年輕人，他們很容易受大眾媒體影響，不是倒向這邊，就是倒向那邊。

他提到了日本憲法第九條。信任的問題在德國經常出現，現在又冒了出來。萩次郎說：“日本人不信任自衛隊，因為他們連自己也信不過。這就是他們為什么需要憲法，好阻礙任何安保措施通過。”

這句話頗為耐人尋味：日本人信不過自己。在我倆的談話臨近尾聲之際，這種說法又出現了一次。我告訴萩次郎自己剛去過德國。他笑笑，蹦出一句讓我意外的話：“我很喜歡德國人，但我覺得他們是個危險民族，說不出為什么——也許是因為種族、文化和歷史吧，諸如此類。其實我們日本人也一樣：我們也習慣于走極端。從民族性來講，我們日本人和德國人都具有高度的集體自律。當我們把精力用在正道上時，就是好事，但一旦濫用就會出大亂子。”說到這兒，他頓了頓，補充了一句：“我還認為日本人和德國人都是種族主義者。”

當然，很多人對這點深信不疑。他們曾勸我相信德國人和日本人是危險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種劣根性。但我未曾想在日本防衛廳總部也會聽到同樣的話。盡管萩次郎將兩個民族放在一塊兒，但依我個人經驗來看，德國人對二者之間的聯系傾向于避而不談。我經常從德國人那里聽到“典型德國做派”這句話，而且口氣幾乎清一色都是貶義（相反，日本人說“典型日本做派”時，通常都帶著一絲自我辯護和自豪）。許多德國人對自己被和日本人相提并論——甚至進行比較——感到很不自在（這一點又和日本人不同他們經常這么對比）。我遇到的德國人常常強調他們和日本人有多么不同，正如“西佬”會強調他們和“東佬”的區別。這讓我感到，“道林·格雷”這層因素或許在起作用。對于部分西德人而言，他們如今如此“開化”，如此自由，如此個人主義，又如此西化。反觀日本人他們的集體紀律、對權威人士的俯首帖耳，以及對待工作的軍事化態度，似乎離一個才剛剛克服——也許遠未克服——的自我形象并不是太遠，這點讓人不悅。

這么想并非全然沒有道理。日本在19至20世紀師從德國，獲益良多，但所學之物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自由氣氛已經格格不入了。同德國一樣，以知識分子和政客為首的日本人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義，來抵消某種民族自卑感。引進費希特的浪漫民族主義（organic nationalism）理論是為了振奮日本人的自尊心，即便那時的日本正在經歷全盤西化，向西方列強看齊。1920——1930年代日本遭到了西方列強的排擠，這時斯賓格勒關于西方衰落的思想則讓人感到寬慰。但時至今日，在經過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這些理論中的大多數依然廣泛出現在電視、大學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猶太人主宰世界這一憑空想象出來的陰謀論在日本民間神話外圍沉淀了下來，而戰前受到舶來德國思潮大力提倡的單一種族意識形態在日本則遠未絕跡。

在希特勒的德國，日本因為在思想深處實現了納粹主義的抱負而備受推崇。拿納粹宣傳家烏拉赫（Albrecht Fürst von Urach）的話說，日本人的天皇崇拜是“世上最獨特的一種糅合了國家形態、國家意識和宗教狂熱的產物”。[(5)](#_5_10)當然，狂熱在納粹的詞典里是個褒義詞。讀到納粹關于日本的著作時，人們的印象或許是德國宣傳家希望通過宣傳，向德國人灌輸類似日本遠古諸神傳承給后人的那種文化。

對于國家行為——恰如個體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歷史、文化或民族性決定的這一命題，多數日本人表現出了近乎走火入魔的關切。海外戰爭期間，日本電視里看不出多少彷徨失措（Betroffenheit）的跡象，也沒有退役將領詳細盤點戰術和戰略。相反，媒體和學界專家大談這場發生在十萬八千里之外的戰爭，姿態頗為超脫。這場戰爭在他們口中往往被描繪為西方和中東地區之間的一場文化或宗教沖突。關于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教之間宿怨的討論有很多，此外還有人詳細分析美國人的性格，以求理解喬治·布什和施瓦茨科普夫將軍（Gen. Schwarzkopf）的行事風格。

這種對文化的關切在私下談話中也層出不窮。一次，我和三三兩兩的日本朋友相聚在東京某條巷子里，把酒言歡。這條巷子是戰后為數不多的幾條沒變過樣的街道之一。當中一段人稱“黃金街”，過去是廉價紅燈區。我們坐在一家居酒屋里，地方十分狹小，只能容納大概十個人。居酒屋的名字取自一部先鋒派法國電影，煙霧繚繞的空氣中飄著比莉·荷莉戴[[5]](#_5_Billie_Holiday_1915____1959)的歌聲；這家店以經常招攬知識分子光顧為榮。多數酒客對海灣戰爭的看法是，這純粹是一場為美國利益而打的戰爭。我的朋友均是四十出頭，熱衷文藝事業。他們認為海灣戰爭關乎文化認同，美國人想要迫使阿拉伯人接受和美國人一致的世界觀。

那么自由和民主呢？我問。這些原則難道不值得捍衛么？我們能容忍一個窮兇極惡的國家侵略他國么？我很清楚自己這么說并不很有說服力；科威特很難算得上是民主國家。但我的初衷是拋磚引玉。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是一種變相的反西方論調。

“民主，”一個漫畫家開口道，“并不是普世的，它只是一種西方理想，西方人謊稱其具有普世意義。這恰恰是這場戰爭錯誤的原因西方試圖把想法強加給非西方國家。美國人不僅偽善，還很傲慢。”

一位著名的電影導演使勁點頭，表示如果當初美國人不來的話日本只會更好。他指的是1853年美國海軍將領佩里率部侵入日本的“黑船事件”。“他們奪走了我們的文化，”他說道，“我們現在幾乎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與他相熟，知道他這么說只是在煽情。但是，同日本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交談時經常會出現這一幕：但凡在討論日本和外部世界的時候，身份認同這個話題幾乎無一例外都會橫插一腳，導致的結果是怪異的認同感。我曾在左傾的《朝日新聞》里讀到過下面這封來信，作者是中村哲（Nakamura Tetsu）。中村是醫生，屬于“六八一代”，對中東事務很積極。信件內容如下：“當我們談論世界新秩序的時候，有必要理解我們的亞洲同胞，他們有著和西方人不同的價值觀和文化。我們必須反思對亞洲的態度。僅僅五十年前，我們日本人處在傳統社會和西式現代化這對矛盾中，同美國打了一場仗為此吃盡了苦頭。這場戰爭至今尚未終結。是時候重新思考在廣島和長崎逝去的幾百萬（原文如此）‘英靈’有何意義了。”[(6)](#_6_7)

這種說法在語氣和思路上與風靡三四十年代的日本泛亞民族主義高度相似。自19世紀以降，日本曾激烈地抗擊過西方對亞洲的主導，時而顯得缺乏變通，但始終值得敬佩——這一觀點并不新鮮。它肇始于1860年代的“驅除韃虜、擁護皇權”運動，在日本的戰爭宣傳中頗為促銷。在1964年出版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中，林房雄曾為其進行辯護。戰后，他的反西方民族主義觀成了右翼衛道士的模板。但林房雄過去是共產黨，而且他曾寫道，在一個理想世界里，日本再也不會因國際政局而分化，所有日本人都會往一處想。他的原話是：“一種日本式思維將會誕生。”[(7)](#_7_7)這些字眼里能讀出懷舊。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人被教導“一萬萬心一齊跳動”（一億一心）。

海灣戰爭期間，理想中的世界還遙不可及。《朝日新聞》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七成的受訪者反對對伊拉克動武，但在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中，有29.6%的人支持動武，還有起碼相同比例的人回答“說不上來”。中村刊登于《朝日新聞》的來信反映出，投書該報的讀者中間存在一種普遍的論調，只不過他文字中的感情色彩更加鮮明而已。有封具有代表性的來信是這樣寫的：“縱觀歷史，我們日本人如今總算有權利和義務對戰爭說不，并向世界傳授我們的切身經驗，訴說我國無辜平民如何淪為慘烈轟炸的犧牲品。”

這一論調在許多日本人看來，代表了憲法第九條的立場。1946年，當時的日本首相幣原喜重郎向麥克阿瑟將軍提出抗議。他說，日本應該放棄戰爭、作出道德垂范這種說法固然很好，但在現實世界里，沒有國家會效而仿之。麥克阿瑟回應道：“就算沒有國家效仿，日本也不會吃什么虧。那些不支持的人才是不對的。”長久以來，多數日本人一直秉承這一看法，然而海灣戰爭讓他們有所動搖。

這一看法值得尊崇，但也建立在某種“虛無的背叛說”之上。根據這一傳說，日本成了個崇尚道德、愛好和平，獨樹一幟的國家，卻遭到了清算其戰爭罪行的戰勝者的背叛；在越南、阿富汗和尼加拉瓜，它遭到了背叛，在軍備競賽和冷戰中也是如此；針對廣島和長崎的“毫無必要”甚至是出于“種族報復”的核打擊，以及之后各大國發動的一切軍事行動——包括討伐薩達姆·侯賽因的決定——都讓日本成了受害者。對此最篤信不疑的是左派的男男女女，他們對憲法第九條的堅持，就好比牧師愛護其禱告書一樣。

海灣戰爭正式結束后幾個月，一位名叫松本健一的文學批評家在《東京新聞》上撰稿，文中他將薩達姆入侵科威特比作日本偷襲珍珠港。[(8)](#_8_6)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和恩岑斯貝格爾在《明鏡周刊》里拿薩達姆和希特勒作比較有異曲同工之處。松本寫道，薩達姆為泛阿拉伯理想而戰的聲明“讓人不寒而栗地聯想起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夕曾傲慢地宣稱‘亞洲是一家’”。伊拉克和日本都與西方帝國主義展開了“圣戰”。但是在松本眼里，二者的相似性還不止于此：“日本和伊拉克出于幾乎完全一致的理由發動了戰爭。”西方大國因為切斷兩國的貿易和原材料供應，被指責讓戰爭變得無法避免。于是乎，戰爭對日本和伊拉克就成了一件名義上關乎生死存亡的大事。“日本，”松本寫道，“尚未對其戰時暴行進行過懺悔，因此如果我們不能自我批評，就沒有資格指責伊拉克人采取非人道行為和違反國際法。”

寫到這兒都還不錯。類似的自省文字在主流日本媒體中十分罕見。但是緊接著，指向自己的手指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另一方面，美國大眾傳媒對于空襲伊拉克之初的反應，讓人回想起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捷報頻傳時的欣喜若狂……”結論是：“海灣戰爭再次讓我認識到了戰爭的乏味和殘酷。在聽聞首相海部俊樹表達對多國聯軍的堅定支持，并謀求向中東派遣自衛隊之后，我大為震驚。日本陷入野蠻狀態也就是五十年前的事，但這個國家的保守派政客似乎并未從中吸取多少教訓。”

那么，我們就得出這樣一條結論，即各方一樣野蠻：戰時的日本薩達姆、布什、日本保守派政客，概莫能外。和平主義目標也許很高尚，質疑美國媒體的興高采烈或許不無道理，但這種看法為圖省事，不分青紅皂白。比如所有戰爭都是非正義的：這就好像波恩集市廣場上的警示柱，或認為轟炸巴格達是1945年以來最嚴重戰爭罪行的主和派教授。歷史就是一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

然而，日本和德國有一處天壤之別：以色列。日本人對猶太人沒有負罪感；沒人會發了瘋似的給以色列駐東京大使館打電話；日本也沒有自己的沃爾夫·比爾曼。海灣戰爭勾起了不少德國人對大屠殺的回憶；但對于多數日本人來說，這只是另一場戰爭，一場距離他們十分遙遠的戰爭，其爆發過程有點像自然災害。或許，如果聯軍的轟炸目標不是伊拉克而是中國乃至朝鮮的話，日本的戰爭罪孽就會起作用。但就算是那些對中國和朝鮮抱有歉意的日本人，也不會把日本發動的戰爭和屠猶看成一回事。

拒絕對歷史作出區別對待，并不僅僅是一種逃避罪責的辦法。它也是和平主義的核心。就連對不同戰爭作區分，或承認有些戰爭師出有名，都已經是一種不道德的立場了。所幸對于德國和日本而言，和平主義恰好是一種用來麻木歷史罪行之痛的辦法。或者反之，如果一個人沉浸在里頭無法自拔，和平主義就會把對國家罪行的內疚轉化成一種美德，相比于其他國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為一種優越感的標志。這也可以是歷史短視的成因。

小田實是日本反對越戰運動的鼻祖，也是一部描寫廣島原爆小說的作者。他告訴我，日本必須堅持和平主義：“所有國家當中，日本必須充當有良知的反對者。”但成為軍事強國的日本會十分危險，小田說道。德國也一樣。他認為，德國很快就又要成為一個單一種族的國家了。當我表示他的話有待商榷時，他說我是西方人、是白種人，根本沒資格說三道四。

我問他對越戰怎么看，他說自己看不出越戰和日本的亞洲戰爭之間有什么區別。其實，正是越戰促使他反思日本對亞洲的征服。他也不認為歐洲殖民主義同日本侵略中國和東南亞有何不同。當我指出我認為存在的區別時，他惱了，嗓門也大了起來。“你看，”他叫道，“我可沒工夫陪你討論歷史的差異。殖民主義是罪惡的，事情就是這樣。”他的圓臉漲得通紅，大手砸得桌面砰砰響。坐在他身旁的朝鮮裔妻子沒出聲，只是盯著茶杯。我被提醒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小田生于1932年，他記得當初在日本大敗美國人之后，自己揮舞著旭日旗，心里別提有多驕傲了。他同樣記得并且無法釋懷的是，就在天皇宣布“戰事發展對日本不利”、是時候投降了的前一天，家鄉大阪被炸了個稀巴爛。小田說自己沒有哭，讓他真正難以接受的是，日本在戰后本有機會和過去一刀兩斷，卻被美國人生生給攪了。是美國人允許天皇保留皇位，并同意那些把日本引向戰爭的官僚和政客繼續統治這個國家；也是美國人，通過建立自衛隊，促使日本人親手削弱了本國憲法；同樣還是美國人，把日本人變成了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幫兇。

小田的怨恨不無道理，但他對于西方的矛盾心理要比政治幻滅來得更復雜。這種矛盾心態接近于敵意，部分或許與年齡有關。畢竟他少時接受的教育是仇視“盎格魯——美利堅妖魔”。而泛亞主義宣傳與富有浪漫色彩的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其實相距并不遙遠。但是，盡管小田信奉第三世界理論，他并非只同情受壓迫者壓迫者他也同情。他發起“越南和平”運動，目的之一就是要幫助美國逃兵和反戰示威者。在小田眼中，美國大兵和原日本帝國軍人一樣，既是侵略者，也是受害者；說他們是侵略者，因為他們殘害無辜百姓；說他們是受害者，因為他們也是迫于命令。

在日本，對待西方的態度除了復雜，沒有第二個字眼可以形容表面上，日本是亞洲最西化的國家，就連在小田實眼里，他大概也覺得紐約比北京更近吧（我敢說他對托斯卡納也比對德累斯頓更熟悉）。即便19世紀的日本曾出現過一股驅逐外夷的運動，但與此同時也存在“脫亞”運動。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戰爭促生了一批浮世繪版畫，在這些作品里，日軍的身材普遍高大，膚色較淺，穿著歐式軍裝；而他們的對手則是侏儒一般的黃種人留著辮子，身穿絲綢衣服。日本人的優勢一露無余。

矛盾心理形態紛呈，這在不同觀點的交鋒中顯露無遺。右翼自民黨政客龜井靜香幾乎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小田實的對立面。雖說他們年齡相仿，身材都很敦實，有著農民般的粗線條，不過這也就是兩人所有的共同點了。龜井在防務問題上是鷹派，他希望廢除憲法第九條，在教育中注入更多愛國主義元素，讓軍人英雄成為學生引以為榮的對象，等等。他不相信日本的亞洲戰爭真有那么惡貫滿盈。另外，他希望恢復天皇在這個家族式國家里神圣的一家之主地位，并重新確立神道教的國教地位。他認為，美國人在戰后奪去了日本的認同感、自豪和雄風。

我在龜井位于東京、距離國會大樓不遠處的辦公室里拜訪了他。和小田一樣，他的談吐很是粗鄙，而且是有意為之，倒不是為了表現得和我熟絡，而是為了突出某種不拘小節的男子氣概。我們交談過程中電話響過一兩次，對話也因此中斷。龜井接電話時吐字不清，能聽到的只有哼哼聲或嘟噥聲，分別表示肯定、否定或道別之意。

我問他怎么看海灣戰爭。他嗯了一聲，開口說道：“我們日本人有個詞叫‘建前’（tatemae），就是官方真相的意思，你說事情什么樣就是什么樣。但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詞，叫‘本音’（honne），指的是真實感受、事情的真正面貌。現在，‘建前’是指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這點無法容忍，‘本音’則是說美國人在開戰前沒有征詢我們日本人的意見。”不滿的情緒清晰可見。龜井從相反的角度闡釋了小田的觀點：美國逼迫日本當了它的幫兇。

“接下來，”他繼續說道，“還有以色列的問題。你知道，我們日本人消息很靈通。我們知道美國的真實面目。這兒的人在電視上見過亨利·基辛格。他是猶太人，我們知道猶太人在美國有多大勢力。這些我們都知道。所以‘本音’告訴我們，這場仗是為以色列而打的。”

這種論調在日本很普遍，很刺耳，但也容易產生歧義。問題的重點不在猶太人，而在于美國。在頭腦閉塞的日本人看來，美國人和猶太人的利益常常被混為一談，這種混淆也不只日本才有。正如所謂“永恒的猶太人”，“美國”是沒有根基的世界主義、國際陰謀論等概念的代名詞。龜井選用如此怪異和民粹（Volkish）的口吻來探討這種普遍的偏執，具有多層含義：一是某些最丑惡的歐洲傳說在日本扎下了根，二是屠猶歷史在日本沒有影響，三是日本在某些方面十分閉塞。我覺得這三種解釋都說得通。

“在19世紀，”龜井解釋道，“日本受到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中東的邊界都是西方列強劃定的，英國人對巴勒斯坦負有責任。伊拉克現在的行為和西方列強不久前的所作所為并沒有什么兩樣。我個人就是這種印象。當然了，薩達姆肯定是不對的，但也不能說西方大國就是對的、其他民族的人就是錯的。不能這么說。”

和小田乃至許多左翼人士一樣，龜井也在種族的象限中思考問題。他用了jinshu這個詞，直譯是種族的意思。他甚至沒用minzoku這個更常用的詞，在日本右翼的話語中，這個詞對應的是德語里的人民（Volk）；或者kokumin，后者較中性，意思是國民。

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場是支持海灣戰爭，并出資九十億美元聲援聯軍的行動。日本社會黨對此堅決反對，態度之強硬遠超德國社民黨但政治永遠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龜井分析了自民黨的立場：“我黨的‘本音’和社會黨人差不多。我們支持戰爭，只是為了讓美國人高興。

龜井不算是主流保守派，他是黨內的極右派。作為右派，他在反美或反西方一事上比政府更加積極。他對在亞洲建立新同盟關系脫離美國卵翼能說個不停。他表示日本人感覺亞洲比西方更易親近我告訴他，德國保守派堅持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可以說，他們把西方同盟變成了德國民族認同的組成部分。我還跟他介紹了阿登納的亞洲觀。

龜井聽完哈哈大笑，露出一排整齊的鑲金牙。“哦，”他承認道“美日關系的問題很難解決。這是個種族問題，真的。美國佬很友善也很坦誠。但你也知道，關系要搞好不容易。你懂的，我們必須保持友好……”

他的話中同樣能讀出一絲混淆，這種混淆在日本司空見慣。龜井把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混為一談，以為它們是一回事。事實上日本官員之所以覺得他們必須與美國保持友好，和文化無涉，和種族更是扯不上邊，倒是和兩國之間一邊倒的安保協定有莫大的關聯。當然了，迥異于西方的文化傳統也可能使日本比起西德來，更難融入西方世界。要是日本和西方之間確實存在一道邊界的話——這條邊界會比易北河還要難以跨越——這會有助于解釋另一種成見（idée reçue）：在民主自由的西德，許多德國人嘗試過坦誠面對自己國家的可怖過去，而日本人由于和他們不同，則做不到這樣。

誠然，相較于西德人，日本人較少關注他們帶給別人的苦難，更傾向于推卸責任。另外，不管形式上如何規定，自由民主體制在日本并未取得像在聯邦德國那樣的成功。文化差異也許能作出解釋，但人們也能從更政治化的角度來審視這一情況。在1938年發表于倫敦的著作《同西方的戰爭》（The War Against the West）中，匈牙利學者奧雷爾·科爾奈（Aurel Kolnai）效仿希臘人，對西方進行了定義：“對于古希臘人，‘西方’（或‘歐洲’）意味著擁有自由憲法和公認規則賦予的自治權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法律為王’；而在‘東方’（或‘亞洲’），神權社會掌握在上帝般的統治者手中，他們的臣民‘像奴隸一樣’為之效勞。”[(9)](#_9_6)

根據這一解釋，希特勒的德國和戰前的日本都屬于東方。正如科爾奈的書名所暗示的，德國跟西方打了一仗。如今，阿登納的德國也許算是找到了回歸西方的道路。1949年，德國法學家起草了《德國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為主權國家，盡管國內仍然留有西方大國的駐軍。德國通過了一部緊急狀態法，授權自己掌管本國防務。除柏林以外，占領已正式宣告結束。但在日本，從某些方面看，軍事占領至今仍未完結。

日本的神圣統治者被美國人勒令卸下其神圣外表。這個喜歡罕見的甲殼類動物、也喜歡各種米老鼠手表和英式早餐的天皇，也許反而感到一絲寬慰，很快就順從了。美國人隨后頒布了一部讀起來就像是直接從英語翻譯過來的憲法，剝奪了日本的自衛權。多數日本人已對戰爭無比厭倦，且高度不信任軍事領袖，于是欣然接受。這之后，冷戰的爆發又促使美國人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憲法，建立一支本不應該存在的軍隊。世上最糟糕的局面就這樣產生了：主權沒有復得，不信任感依然存在，而不滿情緒在日積月累。龜井等鷹派憤怒于美國人把日本變得一蹶不振；小田等鴿派則恨美國人閹割了《和平憲法》。雙方都很反感被人當成幫兇，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這也從一個角度解釋了要日本人承認他們的戰時問題為什么比德國人更難。

就算真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這句話在日本也經受不住考驗在沒有正式主權的前提下，諸如是否要安撫侵略者的問題沒有半點意義。我在東京邂逅一位社會黨政治家，問他如果西方早點動武的話，是不是德、日兩國與西方就可不必兵戒相見了。他回答說：“也許吧，我不知道。但我們拒絕任何依靠軍事手段的解決辦法。”當我問小田，一個國家是否有權幫助他國、對抗侵略者時，他的回答是“沒有”。我指出，照他這么說的話，贏得戰爭的就會是軸心國了對此他答道：“你的思維方式顯示你接受的教育是從受害者角度出發的，而我接受的則是從侵略者角度出發的那一套。”

這話固然沒錯，但依然堅信日本人和德國人是危險民族的是他不是我。這里隱含著巨大的諷刺：麥克阿瑟將軍和他的幕僚在努力使日本成為西方一分子的過程中，成功地讓日本在精神上做到了這點。一個受脅迫且孱弱無力的幫兇根本算不上什么幫兇。近年來日本往往被稱作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然而，這一特征和傳統日本心理——孤立主義、和平主義、在外國人面前的膽怯，或諸如此類的品格——的關系并不大，倒是和戰后美國參與創造的政治大環境有莫大關聯。要理解日本人對亞洲戰爭記憶的復雜性，就必須理解其戰敗之后面臨的局面，必須退回到1945年。

[[1]Konrad Adenauer（1876——1967），戰后西德首任總理，曾任科隆市長。](#_1_3)

[[2]Kristallnacht，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團、蓋世太保和黨衛隊襲擊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砸毀猶太人的商店，導致街上堆滿了碎玻璃，史稱“水晶之夜”。](#_2_2)

[[3]“68er”，1968年5月，西歐各地爆發學生造反浪潮，始于法國，稱為“五月風暴”。青年抗議的矛頭表面上對準越南戰爭，但內里其實是對歐洲深刻的社會矛盾發泄不滿，特別是反對精英和權威人物。](#_3_1)

[[4]英國作家王爾德作品《道林·格雷的畫像》中的美少年，他為了永葆青春出賣靈魂讓畫像代替他變老變丑，自己則走上墮落的道路。](#_4_2)

[[5]Billie Holiday（1915——1959），美國爵士樂傳奇歌后。](#_5_2)

## 第二章 廢墟中的浪漫

對于日本人和德國人，很難說戰爭到底是何時開始的。我想不出公眾印象中有什么畫面標志著戰爭拉開序幕。在一張攝于1939年的著名照片里，德國士兵正移除波蘭邊境的路障，但那算是戰爭打響的時候么？如果不是，那德軍1936年挺進萊茵河地區算不算？抑或者是吞并蘇臺德區、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至于迫害猶太人的行動，應從希特勒上臺的1933年算起，最遲也不會晚于1935年。當年，紐倫堡頒布了種族法。再或者，那些記錄1938年11月9日晚猶太教堂起火的照片才真正標志著大屠殺的最初階段？也許是為了避免混淆，許多德國人傾向于談論“希特勒時代”（Hitlerzeit），而非“戰爭”。當人們真的提到“戰爭”時，浮現在腦海中的是東線戰場上挨凍的德國士兵，以及被炸彈摧毀的德國城市。

對于日本，1931年建立偽滿政權是走向虎視眈眈的一步棋，預示著日后的局勢將愈加波詭云譎。針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始于1937年北京郊外的“七七事變”，四年后的偷襲珍珠港則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這里順便提一句，只有自由派的日本人才管二戰叫太平洋戰爭。那些堅持認為日本打仗是為了把亞洲從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白人殖民主義魔掌中解放出來的日本人，管這場戰爭叫大東亞戰爭，一如“大東亞共榮圈”的說法。持這一論點的人將1941——1945年的戰爭與侵華戰爭區分開，至今依舊堅稱后者為“支那事變”另一方面，自由派和左派傾向于將這些戰爭糅合在一起，統稱為“十五年戰爭”（1931——1945）。《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的作者林房雄斷然不會是自由派，他的看法是，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斗爭實際上始于1853年，標志是海軍司令佩里率黑船來到日本。他以此為由提出了“百年戰爭”的說法。

如果說戰爭的開端難以判定的話，那么標志其結束的畫面則十分明顯，比如廣島上空升騰而起的蘑菇云。這一無比震撼的場景被美國空軍攝影師記錄在膠卷中。此外，日本天皇于8月15日通過廣播宣讀停戰詔書，本來雜音就大，他還操著一口模棱兩可的宮廷語言，懇請哽咽的臣民“忍受不能忍受之事”。這些歷史片段在無數日本小說里都有記載，也被多次搬上銀幕，成了戰后日本最老生常談的一部分話題，是國家戰敗、苦難和恥辱的縮影。

至于德國戰敗的符號，我想最有代表性的畫面莫過于蘇軍士兵手舉紅旗、登上柏林斷壁殘垣的國會大廈樓頂了。有個東德人曾告訴我，照片里一個蘇聯軍人的手臂上戴著好幾塊搶來的手表，就像一串串鐲子。此君很有洞見地評論道，解放通常摻雜著非正義，因為解放者往往沒比征服者好到哪兒去。為此我又端詳了會兒照片但沒見有手表。長達四十年的蘇聯統治肯定讓他的記憶出現了偏差但他的直覺應該沒有錯。

要是希特勒燒焦的尸體有照片為證的話，毫無疑問它將成為1945年的象征之一。可惜沒有，有的只是戈培爾[[1]](#_1_Paul_Joseph_Goebbels_1897)一家服毒自殺后的照片。他偏大的頭顱形似一個畸形的葫蘆，輪廓至今清晰可辨除此之外，還有一張著名的照片：希特勒站在藏身的地堡出口處帶著傷感的眼神（也許不是傷感，只是惱怒？）最后看了一眼他被摧毀的帝都。這張照片有一種浪漫的甚至是戲劇性的吸引力：邪惡天才終于走到了窮途末路。

希特勒的覆滅和天皇玉音放送既象征著終結，又是一種詭異的延續。不管寓意有何區別，二者永遠都將與毀滅牢牢聯系在一起——毀滅的城市、毀滅的人、毀滅的理想。1945年最震撼人心的影像是廣島、柏林和東京的默片：寸寸焦土，彈坑連連；柏林這個帶有19世紀建筑風格的城市面目全非；東京則到處都是焦炭和溢滿水的彈坑。

1945年夏，就在廣島和長崎原爆前一個月，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受英國政府委派，前往德國探查幸存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他見到的只有廢墟。這里有段他在科隆期間寫下的文字：“這座城市的廢墟反映在居民內心的廢墟中。他們不僅沒能成為覆蓋城市傷口的瘡疤，反而成了噬咬死尸的寄生蟲，在廢墟間翻揀埋藏在下面的食物。他們還在大教堂附近的黑市上做著買賣——這是毀滅而非創造的營生……科隆這座城市遭遇的滅頂之災，其前世今生一并毀滅，就像是對依然生活在那兒的人的一種責難。德國的亂石堆宣講著虛無主義的布道。”[(10)](#_10_5)

沃爾夫岡·施多德（Wolfgang Staudte）于1946年拍攝的《兇手就在我們中間》是戰后德國首批故事片之一。片中，我們見到滿腔怨氣的梅爾滕斯博士匆匆穿行于柏林破敗的街道。他喝醉了，眼神看起來像發了瘋。不久前剛發生過的一幕幕可怕事件縈繞在這個男人心頭，揮之不去。老鼠不時從斷壁殘垣間爬出來，在他腳邊竄來竄去。“老鼠，”他輕聲自語，“老鼠，老鼠，哪兒都有老鼠。”

德國人管這叫“覆滅”（Zusammenbruch）或“零時”（Stunde Null）：所有一切似乎都來到了終點，需要推倒重來。日本人管這叫“戰敗”或者“終戰”。后面一個詞淡化了戰敗的打擊。與此同理，美國的軍事占領被稱為“美國駐軍”。所有德國人和日本人曾經被教導要篤信不疑的事物——從“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到天皇崇拜，從“主宰者民族”到武士道精神，從“生存空間（Lebensraum）到全世界同在一片（日本人的）屋檐下——所有這些概念都已灰飛煙滅。正如小說家野坂昭如所寫的那樣，大阪焦土上唯一閃閃發亮的，便是美國大兵扔下的銀色口香糖包裝紙。

斯彭德采訪了時任科隆市長的康拉德·阿登納。阿登納告訴他德國人精神空虛，“想象力必須得到滿足”。這可不是件簡單的事特別是考慮到德語這門語言受到了大屠殺術語徹底的感染。人們如何從劊子手的語言中營造詩意呢？又怎么能將這門語言從一位著名德國語言學家所稱的“第三帝國的語言”（Lingua Tertii Imperii當中分離出來呢？[(11)](#_11_3)“語言再也不是人類經驗的載體，”喬治·斯坦納說道，“僅僅只是供人言說。”

日本人倒沒有這方面的問題。日語相對毫發無傷地躲過了戰火的摧殘，盡管戰時一代人中有些相當敏感，聽到某些特定詞匯時無法不愁眉緊蹙。哲學家吉本隆明在1960年代早期曾寫道：“戰敗后沒多久聽到諸如民族或種族這樣的字眼，會有一種又添新傷的感覺。”[(12)](#_12_3)話雖如此，日語里的kokka（國家或政權）和minzoku（種族或民族），和德語里的Sonderbehandlung（特別對待）或Einsatzgruppe（特別行動隊）并不能等量齊觀。日本帝國主義的術語有種族主義色彩，且夸大其詞，卻并不散發滅絕營的腐尸臭氣。

不過，日本文化的確存在一個問題，既與德國的困境有可比性，也不完全一致。困擾德國的是納粹主義。雖然一些人相信希特勒主義的禍根及德國獨特的歷史進程（德語稱之為“特殊道路”Sonderweg）可追溯至路德，或至少是赫爾德或瓦格納，但不管是瓦格納還是赫爾德的作品——遑論路德的著述——從未被列為禁書。在德國，還有傳統可以倚仗。在蘇占區，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左派文化得到了大力復興。在西占區，作家靠做“歌德夢”來逃避老鼠橫行和廢墟遍布的現實。人們常援引歌德的大名，以此證明德國同屬歐洲文明中崇尚人文關懷和啟蒙思想的那一脈。

但據占領當局所知，日本從沒有過類似歌德式的人物，況且在日本傳統文化多年來被沙文主義宣傳嚴重扭曲和異化后，美國人（以及不少日本左派）對任何與“封建主義”有關聯的事物都疑心重重，他們對“封建主義”的闡釋涵蓋了日本前現代大部分時期。封建主義是民主的敵人，因此美國審查官在向日本人傳授民主的過程中，不僅取締了武俠片和武士題材的劇目，一度還將九十八部歌舞伎作品歸入禁演之列。中世紀的詩集因為流露出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而備受批評。甚至連長期在神道教自然崇拜中被奉為圣物的富士山，都被禁止出現在文藝作品中。過去，自然崇拜經常蛻變為對日本國家政權的崇拜。于是，1946年上映的一部故事片里，農民在富士山山坡上勞作的一幕被剪掉了。這就好像說德國——不管有沒有“特殊道路”——只需肅清納粹主義，而日本的整個文化傳統都必須回爐重造。

然而，戰敗和廢墟的確醞釀了一種新的文學（和影視）派別。在德國，這叫“廢墟文學”（Trümmerliteratur）。在斷壁殘垣間長大成人的日本作家管自己叫“化為灰燼的一代”（焼け跡世代）。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的許多文學作品都蒙上了一層虛無和絕望的陰影。參過軍的日本小說家工于描繪人類在極端條件下的行為模式。人吃人是個普遍主題，大岡升平在作品《野火》中，回顧了戰爭結束前夕在菲律賓服役的歲月。那時，饑腸轆轆的日軍被包圍在呂宋島的深山中，要么是殺了敵人吃肉（原住民為“黑皮豬”，美軍則是“白皮豬”），要么只能自相殘殺。此外還有講述士兵返鄉后發現妻子跟別的男人跑了的故事，以及良家婦女淪為娼妓、體面的男人在黑市行乞的作品。

外國占領引發的恥辱感和怨恨情緒，直到占領結束后才成為一個普遍——以及可供出版——的主題。在德國，這方面的例子是恩斯特·馮·所羅門（Ernst von Salomon）所著的《問卷》（De Fragebogen）。該書出版于1951年，在商業上大獲成功。所羅門是個大惡人，曾于1922年參與暗殺德國猶太裔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問卷》里（書名指德國人被迫填寫問卷，交代他們是否當過納粹），所羅門稱美國人跟過去的德國人一樣粗俗、愚蠢和野蠻。“愚蠢，”小說主人公如是說道，“是世上最容易理解的。讓我情緒低落的不是我們戰敗了，而是戰勝者使其變得毫無意義。”[(13)](#_13_2)

在日本，這樣的文字也并不少見，沒準比德國還要泛濫，因為占領當局的審查人員十分積極地封殺封建思想和反美情緒。1950年代，日本涌現了一系列批判戰爭罪審判不公和美軍轟炸慘絕人寰的影片，由此誕生了一個全新的文學種類，專注于描繪廣島和長崎原爆的后續影響。觀影者對于美軍基地內的陰暗面有著近乎色情般的癡迷：犯罪、賣淫嫖娼、強暴無辜日本婦女。如果說蘑菇云和天皇的廣播講話是關于戰敗的俗套印象，那么美國大兵（往往是黑人強暴日本少女（總是又年輕又天真那種）——而且施暴地往往是潔凈的水稻田（象征樸素和田園牧歌式的日本）——則是戰后軍事占領題材影片的一種標準套路。

對于德、日兩國多數國民而言，戰后最初幾年純粹是一段苦難深重的歲月。然而，這一時期大部分文學作品，或者更確切地說有關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因為大部分都是日后才寫就的——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蘊含著一股深刻的浪漫主義氣息乃至懷舊氣息。這也影響了戰后不久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個體記憶。比方說回憶起當年在東京隅田川附近彈坑里玩耍的情景時，日本劇作家唐十郎說道：“四周能看見地平線，天空如此明亮，亮得所有一切看著都那么刺眼。在廢墟里玩耍真好，就像是夢境拼成的風景。”

散文和小說家坂口安吾在戰爭結束時已年逾四旬。他因為恰好超齡而未被征召入伍，戰后以描寫轟炸及其影響的作品而揚名立萬有人稱其文風具有虛無主義特征，我不敢說這一用詞是否恰當。總而言之，他完美地詮釋了一個滿目瘡痍的戰敗國的精神，只不過其筆觸顯示作者是個經歷了祛魅的浪漫主義者——前提是人們要能想象這一形象。在名作《墮落論》中，坂口把東京遭遇的空襲描繪為一幕壯麗的奇觀，一場足以致命的焰火表演。[(14)](#_14_2)他陶醉于“人們聽天由命的詭異之美”，樂見少女們在一片焦土上四處走動，在破敗與毀壞間綻放笑容。

然而，戰后初期是一段徹底墮落的歲月。微笑的少女臉龐——即坂口筆下“廢墟中的愛”——不見了：“未像櫻花一樣為天皇凋零的青年如今搖身一變，成了黑市商人。”但在他看來，比起戰爭的浪漫，墮落才更真實，也更可貴，前者不過是政治宣傳刻意營造的幻覺罷了，比如舍生取義之美、天皇崇拜、尚武氣概、天神下凡的民族等等。必須擊碎這些幻覺，讓日本人重新“落入凡塵”：“哦，日本人，哦，日本，我希望你們都變得墮落。日本和日本人必須墮落！只要天皇體制還在，只要這種歷史設計依舊是民族觀的一部分，他們就會被操縱，而我們也就無法像人一樣在這個國家活下去。”

當時，對于坂口安吾或者其他作家來說，廢墟提供了希望。終于，日本人在脫下了傳統和理想的“虛假和服”后，只剩下最基本的人類需求；終于，他們能感知真正的愛和痛苦；終于，他們將變得誠實。廢墟里容不下虛偽。

這是知識分子中間普遍的一種自負：貧窮是美德，一文不名的人是純潔的。這種自負在那段日子里因為社會主義愿景的短暫復蘇而獲得了額外的動力。部分左派人士，包括一些共產黨人，是唯一在戰爭中幸免于難且未染指日本帝國主義冒險的人。1940年代，美國占領當局曾鼓勵他們積極參政，一做就是幾年。左派政黨或相繼成立，或恢復活動，工會也得以組建。也許，在一貧如洗、萬眾一心的國民的努力下，一個真正民主的（當然是社會主義的）日本終于可以從戰爭的廢墟里站起來了。

作家沃爾夫迪特里希·施努厄（Wolfdietrich Schnurre）在1963年回憶起，德國也曾有過類似愿景。在他看來，這提升了德國人的道德水準。他表示：“在毀于戰火的德國，存在一股真實而迫切的熱望。那時，幸存者仍能聽到死難者無聲的哀求。那時，和平的清風一如往昔，拂過被燒毀的房屋。人們心中仍有信念。他們仍期待一個中立的、統一的德國。新歐洲的理想尚未被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撕成碎片。自由還盡在掌握，反對軍國主義和求生欲望依然是一回事。”[(15)](#_15_2)

斯蒂芬·斯彭德在德國感受到的并不是這種情緒，但人們的語言具有典型的左派懷舊特征。小說家海因里希·伯爾比坂口安吾年輕約十歲。他和大岡升平同是返鄉士兵。跟施努厄一樣，他也在德國的殘磚碎瓦中看到了人類救贖的真正機遇。他是“四七社（Gruppe 47）這一文學圈子里的積極分子，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和君特·格拉斯也是該社成員。這一非正式組織成員的共性在于他們的左傾傾向，偏愛海明威式言簡意賅的報告文學文風反感浪漫的避世主義。在一篇寫于1952年、名為《我屬于廢墟文學的文章里，伯爾同情“黑市商人和其受害者，同情難民和所有失去棲身之所的人，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同情我們這代人。這代人身處一種奇怪而難忘的情境：他們返回了家鄉”。[(16)](#_16_2)

和坂口一樣，伯爾在孑然一身的人那里看到了某種神圣性。他對返鄉士兵亦投去了浪漫主義眼光，以至推舉荷馬作為“廢墟文學的代表。“荷馬的大名在整個西方文明世界都是無可指摘的：荷馬雖為歐洲戰爭文學鼻祖，作品描寫的卻是特洛伊戰爭，特洛伊如何滅亡，以及尤利西斯的返鄉之路。這是記錄戰爭、廢墟和返鄉的文學——我們沒理由對這一描述感到慚愧。”

這么說也許是想挽回些顏面。拿尤利西斯來對比希特勒的部隊或許并不太合適，但卻典型地折射出這位德國作家想要成為“西方文明世界”一分子的急切心情。當然了，回過頭來看，當初這幾年算不上是什么絕望時期。伯爾和與他想法一致的人要再晚些才能體會絕望。伯爾能夠準確地指出德國“覆滅”的結束，以及資產階級虛偽和道德健忘癥的開始，即1948年6月20日，也就是貨幣改革開啟的那天。是日，由美國人指定的英、美占區經濟管理局局長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創造了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自此，DM將成為象征西德人國家榮譽感的新符號；它同時還將蘇占區里的東德人排除在外。艾哈德的口頭禪是“人人致富”（Wohlstand für Alle）。對于不少相信一個嶄新世界里人文精神將戰勝自私和貪婪的人而言，這意味著一段浪漫史的終結。

伯爾（在1960年）說過：“消費者，我們是個消費者組成的國家。領帶和因循守舊，襯衫和推陳出新。隨便什么都有人消費。唯一重要的是，所有一切——管它是襯衫還是因循守舊——都可以出售。”[(17)](#_17_2)

正因為德國人“無法哀悼”，同中東歐各處堆積成山的尸骸撇清了關系，第三帝國——借米切利希夫婦的話——才“像夢一般褪了色”，從而使得認同美國人、戰勝者和西方變得較為容易。[(18)](#_18_2)如果說伯爾和米切利希夫婦的話可信的話，那么從“覆滅”伊始，德國人就存在一種強烈的逃避現實的傾向。這一刻意遺忘的進程最終以人們焦急投身重建、奔向繁榮而收場。

冷戰的來臨催化了這股致富熱潮，在一定意義上加深了健忘癥，也必然強化了對西方的認同感。西德于是和西方盟友建立統一戰線，它們共同的敵人是“亞洲的”蘇維埃帝國，其他無需多問。正如只要在外籍兵團服過役，過去都會一筆勾銷。誠然，在一些人眼里，冷戰只是坐實了他們一直以來的看法：德國從來都站在正確的一邊，要是我們的美國朋友早點明白這點就好了。對于那些盼望出現一個反戰的社會主義德國的人，冷戰不啻為致命一擊。

米切利希夫婦在《論無法哀悼》中對德國的心理分析有些一概而論——真能為整個民族作心理分析么？也許，稍稍健忘一點，對西方多認同一點，多點精力投入經濟復蘇，這些并不是多壞的事三十年前的德國遭到羞辱和壓榨后發生了什么，我們一清二楚。因此“人人致富”恐怕是西德人能有的最好待遇了。它剝離了戰敗播下的仇恨（以及日后的極端主義）種子，而對西德融入西方同盟也不無裨益。然而，伯爾等人對一個民族變得腦滿腸肥（“松松垮垮這個詞出現頻率很高，意指惰性和頹廢），以及忘卻過去累累血債感到厭惡，是可以理解的。這可不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景象”。

在施多德的影片《兇手就在我們中間》里，反派是個叫布呂克納的工廠主，很顧家，過去是陸軍軍官。1942年圣誕節當天，他下令槍殺一百多名波蘭人，其中不乏婦孺。梅爾滕斯博士曾是他的手下，這位在柏林躲避鼠患、忿忿不平的老兵嘗試過阻止屠殺。他計劃當著大腹便便的布呂克納的面，揭露他的老底，然后一槍斃了他。梅爾滕斯博士找到后者的工廠，布呂克納正和工人歡慶圣誕節。他方才做了節慶演講，祝福“一個我們都熱愛的德國，一個永不會消亡的德國，一個正義終將勝利的德國”。梅爾滕斯博士還記得1942年那個圣誕節，夜里，布呂克納帶領部屬一起歌唱《平安夜》。與此同時，一戶戶波蘭家庭卻在雪地中被殺害。梅爾滕斯尾隨著布呂克納，來到他的住處，提醒他想想自己下令殺害的那些人。

“可那時在打仗，”布呂克納辯解道，原本的自得變為了驚恐，“情況不同……現在是和平年代了……圣誕節……和平的圣誕節……”

梅爾滕斯打算朝布呂克納開槍，但他的情人蘇珊娜在最后一刻制止了他：

蘇珊娜叫道：“你無權審判別人！”

梅爾滕斯回敬：“但我們必須提出指控，為了那上百萬無辜的死難者。”

布呂克納嚷道：“你到底想怎樣？我是無辜的！我是無辜的！我是無辜的！”（隨著受害者的臉龐忽隱忽現，他的聲音不斷回響）

這部影片雖然攝于艾哈德的貨幣改革為人知曉之前，但很有預見性。“布呂克納們”是德國重新振作必須付出的代價。實際上，他們在這一進程中也的確能派上用場。這群官僚在任何體制內都能發揮作用，像魚兒一樣，雖然小但很靈活。他們有的把票投給了西德的基督教保守派，有的在東德加入了共產黨。同許多德國人一樣，施多德對此顯然很苦惱，但他給出的解決辦法讓人為難。也許這樣會讓人好受些：滿身贅肉的民主派，其危害總比一心復仇的老納粹們要小吧（一絲不茍監視自己鄰居的共產黨則另當別論）。諸如沃爾夫迪特里希·施努厄等批評家認為施多德的電影還不夠強有力，前者在1946年寫道，影片應該以一場戰爭罪審判收場，以顯示我們中間的兇手實際將受到的處置。

施努厄的愿望在現實生活中也落空了。很少有“布呂克納”會因為自己的罪行受到懲罰，特別是那些曾充任希特勒的醫生、律師、科學家和官僚的人。占領軍在德國搞“去納粹化”一開始勁頭十足，但到了1940年代末逐漸式微，冷戰的開始轉移了重心。至少一代德國作家和藝術家得出以下結論：從許多或明或暗的層面上來看，健忘、富有和資本主義的聯邦德國依然是希特勒帝國的延續。這點正合民主德國宣傳家的心意，他們時不時會炮制出原納粹分子的名單，那些人在西方過得如魚得水。名單的準確性往往令人咋舌。

1977年的一部著名影片闡明了這種延續性。它既可算是劇情片，也可算是紀錄片，主創者包括一批德國作家和電影導演（伯爾也是其中之一）。電影名為《德國之秋》（Deutschland im Herbst），德國官方對于漢斯——馬丁·施萊爾（Hans-Martin Schleyer）遇害一事的反應，促成了該片的拍攝。施萊爾是戴姆勒——奔馳公司的董事（順便提一句，他過去是黨衛隊軍官），死于赤軍派[[2]](#_2_Chi_Jun_Pai__Yi_Cheng_Ba_De_E)恐怖分子之手。那時整個國家（或起碼是德國知識界）瀕臨一種癲狂的狀態。許多人認為西德民主體制的終結近在咫尺，當權者將會露出其“褐衫軍”本色。影片中反復出現的一幅畫面是在斯圖加特舉行的施萊爾的葬禮與之拼接在一起的則是1944年隆美爾將軍（Gen. Rommel）的葬禮隆美爾葬禮上的納粹橫幅，同施萊爾靈堂外飄揚的梅賽德斯——奔馳旗幟交替出現。

萊納·維爾納·法斯賓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是參與拍攝此片的導演之一。一年后，他又拍攝了《瑪利婭·布勞恩的婚姻》戰后最初幾年在電影里被描繪成某種悲慘的伊甸園；廢墟里依然閃爍著人性溫暖的光芒。瑪利婭準備迎接東線戰場上失蹤的丈夫赫爾曼歸來。順便插一句，這個德國兵是故事里最正直、最富榮譽感的角色。1948年后，重建西德城市的沖擊鉆發出的噪音猶如機槍掃射瑪利婭靠利用和打壓身邊每個人，一步步往上爬，變得越來越富有電影以一幅元首的畫像拉開序幕，最后在一連串戰后歷任總理的畫像中畫上了句號，他們都以黑白色調出現，似乎依然活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陰影下。

延續性這一印象隨著1990年兩德合并卷土重來，就連語言也復活了，又有人說“零時”到了。貨幣改革得以重啟，過去共產黨治下的東德人可以用1比1的比例把手里的東德馬克兌換成西德馬克。無獨有偶，知識分子中間又興起一陣議論，他們憂心于錯失的機遇、物欲橫流和歷史失憶。1989年冬，柏林墻被正式打通后，東德作家施蒂芬·海姆（Stefan Heym）恥笑同胞們身上流露出“物質主義”，但他絕不是唯一這么做的人。東德人生平第一次渴望享受西方的富裕——雖然剛開始只能間接感受感受。與此相反，海姆這位養尊處優的作家一直都身在其中。他大聲質疑，東德人在經過了四十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后，難道真的什么也沒學到么？君特·格拉斯管統一叫“合并”（Anschluss），西德企業家被比作1939年俯沖波蘭的施圖卡轟炸機（Stuka）。海姆稱，用不了多久，“一個民族”的口號就要變成“一個帝國、一個民族、一個元首”了。對于那些畢生投身于反法西斯事業且素來相信聯邦德國是納粹德國繼承者的人而言，兩德統一就像是1933年的復辟——他們就是這么說的。諷刺的是，許多“西佬”認為他們來自東德的新同胞讓人尷尬地回憶起一段同樣不幸的過去。

不管怎么說，這解釋了昔日邊界兩端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為何不約而同地認為兩德合并是一記敗筆。君特·格拉斯視“奧斯維辛”為反對統一的理由，而東德劇作家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在無數次采訪中提到，資本主義——其“淘汰”機制——和科技、工業進步的內在邏輯，直接導致了奧斯維辛和廣島原爆。記憶的符號蛻變為政爭的工具，這點或許無法避免。“奧斯維辛”這個詞在統一期間出現得最為頻繁，部分是一種有益的警示，告誡德國人永不能忘；部分是一種惱怒的表示，說明一個更完美、反法西斯、反資本主義的理想國度，一個誕生于1945年廢墟之中并在東部艱苦維系四十年的德國，只不過是一種幻覺，如今已不復存在。

\*\*\*\*\*

在日本，與路德維希·艾哈德幾乎可以完全畫等號的人是池田勇人，他從1949年起開始擔任大藏大臣，并在1960——1964年期間升任首相。艾哈德的“人人致富”口號在他這里的翻版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該方案許諾用十年時間，讓日本人實現收入翻番。1960年代，日本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11%。當時，池田在征詢了底特律銀行家約瑟夫·道奇（Joseph Dodge）的意見后，成功推翻了與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一同到來的“新政派”（New Dealer出臺的通脹政策。此外，在工會被賦予巨大權力之后，他設法架空了其部分權力。他還參與起草了與美國等五十一個國家在1951年簽署的《舊金山和約》。這些國家里并沒有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國，也沒有朝鮮或蘇聯。隨著舊仇成為新敵，朝鮮戰爭如同后來的越戰——另一場亞洲范圍內的戰爭——讓日本經濟大放異彩。

1960年，十幾萬人在東京等城市示威，抗議政府通過新的《美日安保協定》。根據協定，美軍在日本的權力其實被削弱了，但這依然被看成美國干涉日本內政的一個例證。人們不無道理地認為美國和日本保守派精英串通一氣，削弱和平憲法。池田的前任岸信介強迫日本國會通過這部法案。公眾的反對情緒十分強烈，以至于艾森豪威爾總統被迫推遲訪日，哪怕有“愛國”黑幫自告奮勇申請站馬路，護送總統進城。

所有這一切說明，池田的致富承諾是日后所謂“逆轉”[[3]](#_3_reverse_course_Zhi_Mei_Guo_Du)的最后一個階段，目的是讓一個左傾、反戰和中立的日本轉型——這樣的日本原本再也不會卷入戰火，抵制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而且簡言之，能夠徹底告別血雨腥風的過去。“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的策略，為的是把公眾注意力從憲法問題上轉移開因此，左派人士會把戰后初期看成是一段錯失機遇和遭到背叛的歲月。日本人不僅完全沒有建立起享有廣泛擁護的反戰烏托邦，反而締造出一個受物質主義、保守主義和選擇性歷史失憶支配的國家他們還感到一種真切的似曾相識之感，比德國人還要強烈。首相岸信介從沒做過建筑師，但他的戰時生涯和阿爾伯特·施佩爾很相似1930年代做過商工省的副大臣，戰爭期間擔任軍需省次官，曾作為甲級戰犯被捕，于1948年獲釋。他在仕途上的東山再起其實并無多少特別之處。日本鮮有戰時官僚遭到過清算，多數內閣機構都安然無恙。相反，倒是歡迎美國解放者的日共在1949年——“丟失”中國那一年——后遭到了整肅。

1951年6月，一位西德外交官從東京歸國后，向波恩的經濟事務部長寄去了下面這封信：“所有那些在1945——1946年間因為政治因素或其他原因被剝奪公職的人，現已重獲自由，恢復工作。換句話說，在日本，所有類似德國以‘去納粹化’名義采取的行動都已擱置一旁。我絲毫不懷疑，不消一年，我們將看到日本政壇徹底洗牌。憑借精干律己的作風，我們的一大批老朋友將重新出山。”[(19)](#_19_2)

在這一局面出現前，日共及全體左派在鼓吹清算一事上的態度是最為積極的：政治對手迅速被貼上戰犯標簽。共產黨極力反對他們口中的“天皇體制”，但他們自己對民主的推崇并不總是坦率的，而一連串暴力罷工往往只會對他們在日本的公眾形象起到反作用。即便如此，1949和1950年的“赤色整肅”運動，以及許多民主素養和日共相比半斤八兩的政客得以重返政壇，促使許多本可成為朋友的日本人與美國為敵。因為美國人被看作右翼復蘇和鎮壓左翼的推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所有困擾未來幾代人的歷史符號中，廣島作為美國的“戰爭罪行”，是最最重要的一個。

在某個災難性的政權崩潰后，延續性總會成為問題。徹底與之一刀兩斷是不可能的。“零時”只是一種幻覺。文化習慣和偏見源于政治宣傳、宗教，諸如此類，想要改變它們向來不容易，而當引領變革的主導者是外國占領軍時，便更是如此，他們或許并不是總能認清自己所施加的影響。比較容易做到的是改變政治體制，繼而希冀人們的習慣和偏見會隨之變化。這點在德國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國被控制在一個罪惡的政權手中，掌握政權的是一群興風作浪的政治流氓。鏟除這一政權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這個國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沒有明確界限。事實上，日本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西斯國家，它既沒有法西斯或國家社會主義執政黨派，也沒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過哪些頭銜，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獨裁者。許多在戰前（指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之前）統治日本的人戰時仍大權在握，戰后依然如此。這些人都是做事謹小慎微的專制官僚和保守主義政客，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有像戈林（Göring）或戈培爾那樣的匪氣和狂妄。我們或許可以說真正統治日本的是軍隊，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要問是哪支軍隊，甚至是軍隊里的哪一個人了指揮系統根本就是一筆糊涂賬。因此，盡管戰后德國的納粹領導層被一鍋端，但反觀日本，不過是少了幾位海陸軍將領罷了。

日本也沒有出現文化斷層。沒有流亡作家和藝術家返回故鄉拷問那些留下來的人的良知。日本沒有自己的托馬斯·曼（Thomas Mann）或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來。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棄他們的政治立場過程頗為正規，被稱為Tenko，直譯是改宗，但戰爭一結束他們就重新撿起馬克思主義。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風，曾在私底下表達過對戰時日本狀態的震驚，并在日記里嘲諷軍國主義的粗鄙拙劣然而，“內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數共產黨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議了。

在展現日本廢墟間眾生相的諸多照片中，有一張格外震撼人心它攝于1945年的東京，攝影師是木村伊兵衛。照片前景里有三個人兩女一男，正朝著靖國神社的主門——日語里叫“鳥居”——的方向鞠躬。在鞠躬的人和鳥居中間有塊木牌，上面寫著“盟軍人員和車輛一律禁止入內”。占領當局嘗試取締神社的活動，這里供奉著為天皇戰死的男男女女（主要是男性）的靈位。在上百萬從未主動求死的戰歿軍人靈位中間，有幾塊屬于曾在南京和馬尼拉大肆屠殺平民、折磨戰俘、殺害勞工的劊子手。靖國神社是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天皇崇拜最神圣的廟宇。

在神社大殿前方有兩座巨大的青銅長明燈，上面雕刻著日本戰爭英雄的形象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戰爭場面。神社的看守被勒令拿東西蓋住長明燈，下這種命令是美國占領當局的典型風格。但同時，人們主要的崇拜對象天皇卻依然在位，并被小心翼翼地保護起來，使他免受歷史詰責。神道教僧侶順從地為浮雕澆上水泥，但在1957年又將其去除，且未受到追究。天皇本人在1948年，也就是岸信介獲釋出獄那年，恢復了歷年參拜神社的傳統。先前提到的相片中，兩女一男置身于1945年的寒冬，正對著帶給他們及上百萬人巨大痛苦的象征物頂禮膜拜。

在日本，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麻煩之處在于，所有變革都有賴于美國人下達的命令。當然了，這是戰勝者的特權，而且許多變化都是有益的。但是日本俯首帖耳的姿態意味著這個國家從未真正成熟。日本人的眼睛牢牢盯著美國，我相信，這種情緒比德國的反美主義要更甚，雖然后者的糾結程度往往已無以復加。德國被若干列強占領，其中兩個是歐洲國家。但日本基本上完全為美國人占領。西德曾是北約和歐共體的一部分，東德則處于蘇聯的卵翼之下。與日本有唯一正式同盟關系的是美國，綁定兩者的是許多日本人都反對的《安保條約》。在放棄國家主權后，日本的安全完全依賴美國。因此，至今美日之間仍然存在各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人們能明顯感受到美國的政治主導。

如今，日本人就算要討論戰爭，通常也是指和美國的戰爭。許多對侵華戰爭持強烈保留態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聽到日本進攻美國后，心中都洋溢著愛國主義自豪感。對南京大屠殺心懷愧疚，絕不意味著對偷襲珍珠港也抱有同樣的罪惡感。德國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記納粹和屠猶歷史；反觀日本青年，他們想到的只有廣島和長崎——興許還有南京，不過僅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學校老師和新聞記者的開導之后。日本在東南亞的戰爭鮮有人記得。年事已高的日本人倒是對本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被軍事占領記憶猶新。但對他們而言，這是一支非同尋常的占領軍。日軍給亞洲帶來的基本只有死亡、強奸和毀滅，但這支占領軍帶來的是格倫·米勒[[4]](#_4_Glenn_Miller_1904____1944__Me)的音樂、口香糖和民主課程。這番因禍得福所留下的，既有感激，也有反抗和羞恥感。

從虛構的文學作品里，人們能夠管窺當時這種情緒。《美國羊棲菜》是野坂昭如的一部中篇小說。在我看來，這是日本廢墟文學短暫歷史中出現的一部杰作。[(20)](#_20_2)戰爭結束時，野坂還是少年，小說的主人公、廣告員俊夫（Toshio）也是。對于1945年，充斥俊夫記憶的是陽光下閃閃發亮的口香糖包裝紙，臀部被緊身華達呢褲子勒得渾圓的美國大兵，豎著魚竿般筆直天線的吉普車，免費的食物和DDT噴霧，幫外國軍人拉皮條拿到的小費，抓住一切機會說“San-Q”（謝謝），以及降落傘空投下來的柳條筐，里面裝滿茶葉——日本人誤以為是紫菜（羊棲菜），于是在食用時對異國的飲食習慣大表詫異。對于俊夫那代日本人，美國的勝利不僅是軍事災難，而且是一種種族恥辱。

“Gibu me shigaretto，chocoreto，san-Q（給我香煙、巧克力謝謝）。有過向大兵乞討的經歷，還能和美國人灑脫自如交談的人一個也沒有，這我理解。瞧瞧那些長著猿猴臉的家伙，還有高鼻深目的美國人。一時間你聽到人們在說，日本人的臉別有風味，皮膚很是細膩──他們會是由衷之言么？在啤酒館，我時常看到鄰近餐桌旁坐著個水兵，或三三兩兩的外國人，如果只看他的穿著，會顯得有些寒酸，但他的臉部儼然是文明人。另外，我注意到自己正目不轉睛盯著他那充滿立體感的身材。與周遭的日本人一比，他就是顆璀璨的明星。看看那粗壯發達的手臂、雄健寬闊的胸膛，坐在他旁邊，你難道不會自慚形穢么？”

俊夫的妻子和許多現代日本女性一樣，見到外國人時不會那般神經過敏。她在夏威夷度假時結交了一對美國夫婦，邀請他們來日本做客。丈夫叫希金斯，身材魁梧、性情直率，在占領期間來過日本，甚至能講幾句日語。俊夫覺得應該給希金斯找個姑娘。

“‘我何苦要向這個老頭兒獻殷勤呢？圍著他團團轉的時候，我為啥覺得要盡我所能為他找樂子呢？他的國家可是害死了我的父親，但我對他卻一點兒也恨不起來。恰恰相反，我覺得和他很親近，有種老友相逢的感覺。我給他買酒喝，付錢供他嫖娼，我這做的是哪門子事喲？是為了抹去十四歲時見到那些人高馬大的占領軍大兵后的恐懼感么？還是為了報答他們在我們餓得不行的時候，給我們送吃的來？”

俊夫聽說有種特別的演出，一種性愛表演，表演者有雄冠全日本的最大陽具。這可得讓希金斯看看。因為這肯定能讓美國客人開開眼。于是，兩人在巢鴨的一個賓館房間里碰頭，這兒離過去日本主要戰犯被絞死的地方不遠。日本的“頭牌”跟俊夫差不多年紀，名叫阿吉（Yot-chan）。他的女伴大約二十五歲，想必很有魅力。然而，事情進行得并不順利。無論“頭牌”和那姑娘怎么努力，他就是沒法“雄起”。

“俊夫都不知道自己有多緊張，好像突然不舉的是他。‘你他娘的在搞什么呢？你可是日本第一啊，是吧？來啊，讓這個美國佬開開眼。你那玩意兒可是日本的驕傲啊。干翻他，嚇他個屁滾尿流！’這是種褲襠里的愛國主義：他那玩意兒必須挺立，否則意味著整個民族都得跟著丟臉。”

但無論怎么做都無濟于事。俊夫對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心知肚明：“‘這個叫阿吉的家伙想必有三十來歲，如果是的話，希金斯很可能是他突然不舉的原因。如果阿吉在占領期間有過和我同樣的經歷——他肯定有，不管東京都和大阪——神戶之間差別多大——如果他記得自己說過‘Gibu me chewingamu’（給我口香糖），如果他記得被大兵們健壯的身軀嚇到的話，那他會‘萎’成那樣就不足為奇了。”

電影導演大島渚同野坂和日本“頭牌”年齡相仿。他還記得日本人在戰后對娛樂活動有多么渴望，他們對任何來自外部世界的東西都趨之若鶩，那里的人們有錢，吃得飽，住大房子，而不是棲身于廢墟間。[(21)](#_21_2)日本人想見識見識美國，哪怕只是在一塊又臟又破的屏幕上閃爍的影像也無妨。但這些電影教會日本人民主了么？大島的答案是沒有。相反，他相信，日本學到的是“進步”和“發展的價值觀。日本將變得和美國一樣富足——不對，比美國還要富：“如果我們思考戰后日本無與倫比的進步和發展速度，也許應該說我們走過的道路，正是幾十年前在美國西部片里看到的那條聯合太平洋鐵路線。”

[[1]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納粹德國宣傳部長。](#_1_5)

[[2]赤軍派，亦稱巴德爾——邁因霍夫幫，是西德的恐怖組織，由激進的左派學生建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曾經興風作浪，策劃并實施了大量恐怖主義襲擊與暗殺事件，后被逐漸剿滅。](#_2_4)

[[3]reverse course，指美國對日政策從清算到合作的轉變。](#_3_3)

[[4]Glenn Miller（1904——1944），美國爵士樂巨匠。](#_4_3)

# 第二部分

## 第三章 奧斯維辛

在接受一本知名德國雜志采訪時，波蘭導演安杰依·瓦伊達（Andrzej Wajda）說過下面這段話：“德國將一直擁有多層含義奧斯維辛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說：歌德和種族滅絕、貝多芬和毒氣室、康德和長筒軍靴，所有這一切都是德國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不少德國知識分子對此會點頭同意。奧斯維辛是一段不愿遠去的過去，是民族心理上的一塊污點。這不僅僅是德國人的問題，這本來就是德國的一部分。西德歷史學家克里斯蒂安·邁爾（Christian Meier）嘗言：過去深入骨髓。“一個民族要掌握其歷史，”他認為“就要以身份認同的視角來看待歷史”。他總結道，我們所“內化于心的”，正是奧斯維辛。[(22)](#_22_2)

他的這些論點都基于一個前提，即存在所謂的民族心理。而要做出這點假設，就要相信民族共同體是一種有機的群體，流淌在其血脈中的是歷史。我認為這是一種浪漫化的設想，更多建立在神話而非歷史的基礎上；這還是一種帶有宗教意味的觀念，對其進行表述的主體多為紀念碑、紀念堂和被塑造成圣地的歷史遺跡，而非歷史學者。奧斯維辛正是這樣一個地方，一個對猶太人、波蘭人甚至德國人都十分神圣的身份象征。問題在于，德國人應該認同的對象究竟為何。

同上百萬人一樣——朝圣者、游客、身份追尋者和只是心懷好奇的人——我參觀了奧斯維辛、附屬博物館以及比克瑙（Birkenau）滅絕營的遺址。那天春光明媚，天氣溫暖。去過奧斯維辛的參觀者在談及見聞時，很少有不提天氣惡劣的：要么是天寒霜凍，要么是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不停，讓人心情壓抑，再不然就是暑熱難耐。但我去的那天真是春光無限好，景色雖不是特別旖旎，也談不上很凄涼。

我試著想象被關在比克瑙木造營房里會是什么感覺——曾有幾百號人被塞進條件簡陋、連容納四十個人都嫌擠的軍用馬廄里。但我做不到，這就像是在嘗試想象極度饑餓或指甲被拔掉的感覺。我知道這很痛苦，但這正是想象無能為力的地方。周圍的空氣聞著過于清新，屋外綠草茵茵，青得刺眼，夾在一道道薄墻間的木板床鋪——只夠兩個人睡，卻要容納六個人——又太過整齊。既沒有虱子，也沒有泥巴。置身于此，聽不到哭聲、咒罵聲，而且最重要的是感受不到恐懼。（也許這就是惡劣天氣為何會成為奧斯維辛一種俗套形象的原因吧；起碼這點你想象得出來。）

認為參觀歷史遺跡能夠拉近與過去的距離，這樣的看法往往是一種錯覺，事實常常截然相反。在我眼里，華沙的原猶太人隔離區比奧斯維辛更能喚醒記憶，恰恰是因為在華沙什么也沒剩下。過去被抹掉了。那里如今建起外觀單調的新式住宅樓，地上的草坪臟兮兮。在一個偏僻而骯臟的角落里，立著一尊1943年華沙起義的紀念碑，出于內森·拉波伯特（Nathan Rapoport）之手：這是一尊青銅雕塑，外面圍了成堆的石塊（其用途是讓人聯想起耶路撒冷的哭墻，但按原計劃，希特勒是想利用這些石塊在柏林建一座勝利紀念碑）。紀念碑上畫著納粹黨徽，有人想將其擦掉，但沒有成功。一個滿嘴伏特加酒氣的男人在兜售猶太隔離區的地圖，他的小型卡帶錄音機里傳來一首首音質模糊的以色列民歌。在滿目瘡痍之間想象力掙脫了遺跡的束縛。這兒就是爆發華沙起義的地方，人們就算想象不出其過程，這點聯想起碼還是能做到的。

奧斯維辛則不同。來此度假的游客站在鐵門口拍照留念，門上刻有那行著名的大字：“勞動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在這里，過去已經僵化為某種紀念性的東西，或者套用阿多諾[[1]](#_1_Xi_Ao_Duo__A_Duo_Nuo__Theodor)的話來講“變得像博物館那樣”（museal，指物體和觀者之間不再有互動關系）我努力地想搜尋哪怕一丁點兒揭示這里曾發生過什么的蛛絲馬跡在比克瑙昏暗的營房里，我的視線被支撐破爛屋頂的木質房梁所吸引，好多橫梁上都寫有德語格言。在巴伐利亞的農莊或老式啤酒杯上常能見到它們的蹤影，往往是用哥特式字體寫就的——“保持整潔就是離神近了一步”——諸如此類。不知道這些箴言算不算笑話因為閱讀它們的人唯一該做的就是受死。也許不是，也許這種民間的樸素情感是暴力和死亡文化的一部分。黨衛隊軍官喜歡邊聽音樂——華爾茲、探戈、輕歌劇——邊殺害他們奴役的對象。許多通往德國集中營的路上都設有附帶傳統式樣木雕的路標。木雕的內容原本一般是神話人物或森林里的土地神，但這里只有黨衛隊毆打大胡子猶太人。

喬治·斯坦納在一篇評價君特·格拉斯的文章里寫道：“人們開始明白，德國人粗鄙的趣味——爆裂的香腸、飾有花紋的夜壺啤酒加溫器和穿著緊身皮短褲的胖子——是何以成為兼具暴力欲望和感性的納粹思想之完美溫床的。”[(23)](#_23_1)

斯蒂芬·斯彭德在1945年的文章里曾提出過一個略微更細致的觀點：“這些格言（Sprichwörter）很典型地反映出德國人的嚴肅虔誠、善良用意和自我陶醉。他們渴望從《圣經》、詩集或典籍中摘錄幾句經典語錄，當做標簽貼在任何地方。與此同時，這種欲望將思想矮化為平庸的共同要素。發展到最壞的時候，魔鬼也有沖動引經據典。”[(24)](#_24_1)

那么奧斯維辛的罪行算是德國“自我認同”的組成部分么？種族滅絕是不是德國文化里某種可憎缺陷的產物？而打開這扇文化之門的鑰匙，也許要到感性的格言、殘忍的神話和緊身皮短褲里去尋找？這么做的危險在于會將德國暴行的外在和內因混為一談。當然了，矯揉造作和野蠻殘暴總體而言的確是相伴相隨的。感性畢竟是情緒的替代品。枯燥的說教和縱酒的歡樂無疑給德國人的罪行蒙上了一層荒誕不經的色彩，但是二者真能對其作出解釋么？

在比克瑙的營房里，我打量著這些格言，念著念著我發現了某些有趣之處：它們似乎最近才粉刷過，好像集中營不久前才人去樓空。這么做是不是為了取悅游客？好比在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重建起來的營房（參觀時，導游信誓旦旦地告訴我，“百分百原汁原味”，邊說還邊用鞋跟踩了踩嘎吱作響的木地板），為的是給人一絲真實感？后來我意識到這是怎么一回事：幾個月前，這里被用作一部好萊塢大片的取景地。參演該片的影星之一威廉·達福（Willem Dafoe）在接受采訪時說，自己逐漸適應了比克瑙：“……它成為你的片場，成為電影里的布景。”

庸俗的影視作品向來都期待從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汲取靈感。它們靠注入看似虔誠、實則空話連篇的內容，使平庸的素材血肉豐滿起來。這些作品里表現的情感往往很假。參觀這片悲慘之地——任何對苦難的描繪都不足以表現曾經的慘絕人寰——讓人感到不安，這倒不是因為人們能更好地體會當年受害者的真實感受，而是因為集中營之行喚起的情感讓人無法信以為真。人們傾向于對受害者抱以閃耀溫暖道德之光的認同感，這不僅容易做到，也顯得自以為是：我完全是因為上帝仁慈的愛而去的，諸如此類。慘劇發生的地方有一種魅力，其能輕易蛻變為自虐式的快感；想象力搖身一變，成了渴望被嚇一跳的病態愿望。這或許是最難抵御的一種媚俗，尤其是當一個人——恰如和平活動家小田實所言——接受的是從受害者角度出發的教育的話，便更是如此。

然而，想象力卻是聯系過去的唯一紐帶。只有在想象中——而不是靠數據、檔案或照片——人才算是活生生的人，涌現出來的也不僅僅是歷史，而是故事。當然，由于真實歷史和通過想象還原的歷史之間不可避免會存在出入，這就有可能導致媚俗文藝作品的產生。但是，單就奧斯維辛而言，由此而生的擔憂——常能從德國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口中聽到——是象征了道德上的嚴謹，還是折射出對產生認同感的畏懼心理，無論認同的是侵略者，還是養育了他們的文化？

當然了，媚俗也可以是一種有意為之的策略，漢斯·于爾根·西貝爾貝格（Hans-Jürgen Syberberg）的電影正是如此。他相信，“在低俗、平庸、淺薄和流行中，隱藏著我們業已消失的神話傳統中僅剩的一些雛形和胚胎……”[(25)](#_25_1)在他看來，希特勒懂得這點，知道如何激活庸俗傳說中的潛在能量。西貝爾貝格曾拍攝電影《希特勒德國制造》（Hitler: A Film from Germany），在片中他幾近狂熱地對自己所說的媚俗大加溢美。他認為，否定德國的非理性主義和低俗神話會奪去德國的身份：“要對抗希特勒，靠的不是有關奧斯維辛的數據或對納粹經濟的社會學分析，而是靠理查德·瓦格納和莫扎特的音樂。”

盡管聽著基本上像是在胡言亂語，但西貝爾貝格至少在一點上頗有見地（他自己或許就是典范）：在我們的意識中，要把奧斯維辛發生的平庸之惡同納粹的媚俗一分為二，依然是一件難事。西貝爾貝格論述奧斯維辛遺產的方式，是沉湎于這股媚俗之風中，仿佛德國文化（Kultur）靠解構神話和洗凈血淋淋的歷史就能得救。他試圖重新定義德國人的身份認同，做法同日本的三島由紀夫大同小異。但是，同三島的自殺式幻想一樣，他的電影留給人一種不安的印象，即過于堅持那些曾一度將德國人變成危險民族的理想。

但在德國，漢斯·于爾根·西貝爾貝格是個桀驁不馴的人。他費盡心機想把德國人的身份認同從美國化的物質主義者和無根的猶太人中解救出來，這一行動在迂腐的極右翼報紙《德國國家報》那里獲得了欣賞和贊譽。在印有施圖卡轟炸機和坦克車的圖冊旁，他的文集赫然可見，且被列為推薦讀物——對于這位浪漫派唯美主義者來說，這是種很奇怪的處境。但自由派知識分子都不想和他扯上干系。在侵略者中間長大的那些人，不會想和前者有何牽連，而是傾向通過保持沉默、重復套話、否定過去、模糊用詞、埋頭研究、讓自己應接不暇或儀式性的修行，來同他們保持距離。

彼得·魏斯（Peter Weiss）于1964年參觀了奧斯維辛集中營[(26)](#_26_1)，同行的人里有一隊西德法官和檢察官，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給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維辛審判收集材料，具體任務是調查目擊證人的供詞。忙碌的工作人員掏出卷尺，測量火車匝道的實際寬度，或從女子集中營盥洗室到匝道之間的精確距離。有位證人稱，她曾聽到懲戒室里傳來囚犯的尖叫聲。所謂懲戒室是一種“站立式牢房”（高2米，長寬分別為0.5米，通風口只有5×8厘米），關在里面的囚犯保管會因為饑餓和缺氧慢慢死亡。之后，他們的尸體被人用鐵叉從牢里扒出來，有些受害者還吃掉了自己的手指。

為了證實供詞的可信度，一位法官命助手鉆進一個站立式牢房，弄出點聲響。法官隔著狹小的透氣孔，提示下屬唱上兩句。這個西裝筆挺的年輕人聞之照辦。他的嗓音清晰可辨，唱的是舒伯特的“少年看到一朵薔薇”。

法官在履行職責，他們注定要在工作中保持距離感。他們置身奧斯維辛，為的不是修行，不是抽象地看待奧斯維辛，不是觀光，也不是對受害者感同身受。他們的目的是篩查證據，調查某座囚犯大牢和焚尸爐中間是否有東西遮擋視線，確認一棵燒焦的樹是否能證明附近一個坑里焚燒過尸體（或者，參照官方的說辭，是“據傳曾燒過”）。他們去那里，為的是測量過去，要精確到厘米。

二十七年后，我在同一片地區周圍徘徊。這里如今已被納入奧斯維辛博物館，想當年，這里曾是集中營的中心營區。堅固的磚石樓曾讓紅十字會誤以為這里的情況不算太糟。博物館被劃分為幾大片區，每片都陳列照片和紀念物，反映被納粹占領國家的歷史，具體而言有波蘭區、匈牙利區、蘇聯區和荷蘭區，等等。

波蘭區的展覽最觸目驚心，不過于我而言或許算不上。最觸動我的是荷蘭猶太人被集中起來驅逐出國的照片，這倒不是因為其景象有多駭人。在表現華沙隔離區陷入漫天火海的照片的前景中，有一些黨衛隊士兵面帶笑容，觀看身上著火的人墜樓而亡。這樣的照片在荷蘭區里并不存在。真正打動我的反而是那種常態，風景、街道房子和火車站，一切都那樣熟悉，毫無亮點。被趕上火車的人看著很面熟。那些街道正是我長大成人的地方。就這樣，認同感再度作祟擾亂了想象。衣著考究、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荷蘭猶太人居然受到如此對待，這似乎讓人感到無比憤慨。

我想象著某個德國人在看到這些照片后會出現的反應。他盡管被教育要把奧斯維辛“內化于心”，卻無法輕易認同受害者，因為他父親沒準就是隔離區里某個哈哈大笑的黨衛隊士兵。對他而言等待自己的又是怎樣的想象力陷阱呢？一個同我年齡相仿的德國熟人——他是“六八后”（post 68er）——曾跟我聊起1974年參觀奧斯維辛的經歷，他說那是他這輩子最痛苦的一天。他告訴我，有了那次集中營之行，再加上接受的基督教教育，促使他拒絕參軍。

在波蘭區，我流連在一幅幅圖片之間。今天，這些房間已被改造成一塵不染、墻壁潔白的博物館展廳。我默默地想象很久以前在這里發生過的事，這時走來一群德國游客，多數年齡在五六十歲上下，戰時他們還是少年。一位三十來歲的波蘭婦女是他們的導游本來光看照片就夠了，但這名導游操著一口流利的德語，平靜地講解眼前的景象：德國兵笑嘻嘻地看著上了年紀的拉比[[2]](#_2_You_Tai_Jiao_Mu_Shi)在地上爬行；希姆萊（Himmler）透過窺視孔，檢查毒氣室是否運轉正常；兒童在步槍槍托的威逼下走出猶太隔離區；皮包骨頭的尸體堆積成山。游客們邁著悄無聲息的腳步，從一幕慘象移步到另一幕慘象前。突然，他們當中有人情緒激動起來，是位六十來歲的老嫗，頭戴綠帽，身穿米色套裝，腳蹬棕色厚底鞋。她來到導游身旁，抓著后者的胳膊說道：“請您務必理解，我們當時對此一無所知……”導游看著老嫗，平靜但鄙夷地回答：“抱歉，但我不相信您，我真的沒法相信。”

“但您務必要相信，”老媼堅持道，“務必。我們真的不知道……”

她說的或許是實情，她或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這么迫切地想讓波蘭導游意識到這點，或許正說明她為人正直。畢竟，肯到這兒來，足以證明自己愿意面對過去。但要是她選擇保持沉默，而不是重復太多德國人所說過的話，那就更好了。

\*\*\*\*\*

奧斯維辛是座博物館，但遠不止此。共產黨統治波蘭期間，管理這里的官方機構是“抵抗和烈士紀念碑維護委員會”。我們知道抵抗指的是什么：愛國共產黨人同法西斯主義的英勇斗爭。那些被歸入此類的抗爭者是官方認可的反法西斯烈士。1947年7月2日，波蘭政府頒布的一道政令將奧斯維辛變成博物館：“納粹集中營原址上將建起一座緬懷波蘭及各民族烈士的紀念館，它將永世長存。”

共產主義國家遍布著反法西斯主義紀念碑。布痕瓦爾德毗鄰魏瑪，位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那兒的一座紀念碑可以算是同類紀念碑當中最壯觀的了：石像中的英雄人物打碎法西斯奴役他們的鐵鏈，朝著一個光榮、和平和精誠團結的未來前進。在華沙，拉波伯特打造的紀念碑雖然體積較小，但有著肉體加鎖鏈的類似布局華沙猶太人起義領袖莫迪凱·阿涅萊維奇（Mordechai Anielewicz的銅像有著典型無產階級英雄的特征：裸露的胸膛、卷起的衣袖高舉的手中握的好像不是手榴彈，而是鐵錘。紀念碑后方還有一幅圖案，描繪猶太烈士順從地走向死亡，其中有個手捧《托拉》[[3]](#_3_Torah_You_Tai_Xi_Bo_Lai_Wen_J)的拉比。雕像底座上有一行希伯來語碑文，“向猶太人民、英雄和烈士致敬”。

在奧斯維辛，不存在對英雄事跡的謳歌，重點全落在殉難上許多人在遭受酷刑后死在了11號樓的監獄里，這兒成了祭奠逝者的圣地。花環和蠟燭用來寄托對烈士的哀思——多數為共產黨人直到后共產主義時期，波蘭政府才開始調整博物館的側重點。犧牲意味著對理想、民族和上帝的信心。烈士的死固然令人扼腕，但卻蘊含深意。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4]](#_4_Primo_Levi_1919____1987__Yi_D)曾做過一個噩夢，夢見自己活了下來，但周圍的世界寂靜無聲，一切聲音均被屏蔽。這種夢境已經夠可怕的了，但與之相比，毫無理由地殺害上百萬人更是讓人難以忍受。因此，人們便樂于通過追認死者為烈士、豎立十字架和參加宗教儀式，賦予死亡意義。

儀式既可以十分具體，也可以抽象得出奇。我在主營區的火葬場里駐足良久，像過去的許多參觀者那樣查看簡陋的焚尸爐。到了后期，比克瑙死亡營里出現了更高效的爐子，由托普夫父子公司（J A. Topf & Sons）設計。這家公司在1942年為其“能不間斷處理大量需求的焚化爐”向德國政府申請專利。1953年，在重新申請后公司總算拿到了專利。

我站在一旁，周圍還有幾個游客，多為美國人。大家都不怎么說話。一對夫婦在壓低嗓音交談，似乎我們正置身一座教堂。這份寧靜被一種異響打破了，聽聲音似乎是從外面傳來的，像是有人在喊：“ushoi！ ushoi！”聲音越來越響，接著戛然而止。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走進火葬場，手里揮舞著一根插羽毛的權杖。他長著一張東方人的臉，也許是蒙古人，身后跟著一大群年輕人，其中有三兩個德國人和日本人。一名穿著牛仔工裝褲的日本婦女輕柔地打著手鼓。一條橫幅拉開來，上面寫著“為和平奔走”。這群人向在場者分發繪有歐洲境內和平游行路線的小冊子，里面提及了若干暴行，并告誡我們應對此懺悔：比如北美印第安人被趕盡殺絕、越南戰爭、廣島原爆。他們帶頭的是那個手執羽毛權杖的高個子男人，他是印第安人，我記得名叫紅鷹。待這群不速之客在火葬場里排好隊后，紅鷹舉起權杖，開始念念有詞，像是在祈禱，他的嗓音低沉。手鼓聲又響了起來，羽毛在空氣中飄動，人們雙目緊閉，以示虔誠。

就在主營區的大墻之外，距離火葬場不遠處，矗立著一個巨大的木質十字架。1989年，卡邁爾教派（Carmelite）的修女在一座死氣沉沉的紅磚樓邊上立起這個十字架。樓房后來被改造為修道院。這棟樓始建于1914年，過去稱作“劇院”，里面舉行過各式演出，以犒勞駐扎在隔壁軍營里的奧匈帝國士兵。納粹后來把“劇院”用作齊克隆B（Zyklon B）毒氣罐的儲藏室。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告訴我，卡邁爾教派修女建十字架的初衷是為所有受害者祈禱，不管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但紐約猶太拉比亞伯拉罕·魏斯在聽聞此舉后火冒三丈，帶著六個信徒跑來抗議。他們身披祈禱用的條紋方巾，試圖沖擊修道院。波蘭工人朝這些抗議者噴冷水，并扯掉他們腦袋上的猶太便帽。這一幕迅速傳遍了全世界。奧斯維辛，這個“世界的陰溝”（anus mundi）成了一片骯臟的戰場，人們在這兒為殉難的符號爭得頭破血流。

魏斯拉比是“信仰者集團”[[5]](#_5_Gush_Emunim_Yi_Se_Lie_You_Yi)的支持者，該團體成員是以色列的虔誠定居者，說虔誠，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基于宗教原因，對土地擁有所有權。歷史在魏斯眼里具有象征意義和神秘性，是他在追尋民族認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羅盤。他對歷史的看法具有排他性。卡邁爾教派在他眼里是一群不速之客，闖入了一片象征猶太人苦難的土地，作為這段苦難史的終極符號，此地具有獨一無二的意義。基督教十字架——在其之下，大部分苦難不僅得到寬恕，而且還受到慫恿——被看作是對大屠殺記憶的一種冒犯。

但這很難算是一場民族或猶太身份同卡邁爾修女宣揚的普世價值之間的較量。布魯塞爾大主教嘗言，奧斯維辛發生在“波蘭——基督教的土地上”。在波蘭樞機主教約瑟夫·格蘭普（Jozef Cardina Glemp）的眼里，波蘭人幾乎個個都是基督徒。對于魏斯拉比沖修女興師問罪一事，格蘭普表示“波蘭人的感情和我們波蘭來之不易的主權”遭到了“控制著多國大眾傳媒”的猶太人的“冒犯”。

德國人在奧斯維辛沒有象征身份的宗教符號，那只屬于聲稱自己是受害者的群體。但德國人可以其他方式在這片圣地祈禱。他們能出錢承擔保養費。奧斯維辛博物館正在老化：成堆猶太兒童的小鞋子如今覆上了一層霉斑，焚尸爐生了銹。因此，一檔名為《全景（Panorama）的德國電視節目呼吁觀眾慷慨解囊，留住集中營，作為對后人的警示。捐款共計約十一萬馬克。不同于別的一些電視募捐活動，這筆錢的數目看似不大，但若說到用捐款來維系記憶，這必定是為數不多的幾起案例之一。不過，制片人還是收到了一些來信，比如下面這封，作者當然不會署名：“我也贊成保留奧斯維辛我希望它能重新運轉，這樣一來像你這種人就能‘通過勞動獲得自由’，另外我們也會有辦法處理所有政治避難者。我自愿捐獻五十公斤的毒氣（齊克隆B）。”

戰后最初二十年，鮮有德國人會熱衷于保留納粹罪行的遺跡。但事到如今，很多德國人，特別是西德人，把維護集中營舊址當成是一項神圣責任。一部分主集中營改頭換面后，成了紀念地（Gedenkstatte）。同奧斯維辛一樣，它們既是博物館，又是神龕，還是旅游景點，多位一體。

福斯坦堡（Fürstenberg）位于柏林北部的勃蘭登堡州，當你駕車駛入這座美麗而古老的小鎮時，會看見兩塊牌子。一塊寫著“福斯坦堡歡迎四方來客”，另一塊標注該鎮主要景點拉文斯布魯克集中營（Ravensbrück）舊址的方向。1939——1945年期間，有十三萬人——多為婦孺——被關押在拉文斯布魯克，其中一半死在了這里。

導游手冊里的文字介紹依然散發著一股濃濃的東德味道：拉文斯布魯克國家警示和紀念堂是一座祭奠“我們死難的姐妹、反法西斯斗爭的不朽英雄、為本民族的自由獨立乃至全人類幸福未來獻出生命的烈士”的豐碑。

1992年，集中營的大部分區域仍屬禁區，因為當時那里還是俄國軍事基地。大門外，來自原蘇聯的軍人向游客兜售軍裝和軍旅生活留下的其他破爛兒。俄國軍官及其家屬占據了原黨衛隊的住宅，新兵則住進了昔日集中營營房。

在通往集中營、距離大門約半英里開外的卵石路旁，有一座西爾維婭桑拿和健身中心。健身中心對面是一棟尚未竣工的現代建筑。落成后，這里將是一家嶄新的超級市場——也是福斯坦堡有史以來的第一家。然而，德國集中營團體駐拉文斯布魯克分部（German Camp Society Ravensbrück）的負責人蓋特路德·穆勒對此表示抗議：“永遠不能褻瀆這塊紀念地。”她用了entweihen這個動詞（意指奪去某物的神圣性）。抗議聲浪越來越大，而且幾乎全部來自西德，建造超市的計劃由此擱淺。勃蘭登堡州政府迅速采取行動，避免再度丟臉。新超市的選址將另謀他處，當地官員在小鎮另一頭辟了塊“風水寶地”，距其不遠處有座大型公墓和火葬場。爭議就此銷聲匿跡。日后，一名公墓看守曾向德國某雜志記者透露，在拉文斯布魯克還沒有蓋起自己的焚尸爐之前，黨衛隊曾在這塊“風水寶地”火化囚犯尸體。

\*\*\*\*\*

“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特奧多爾·阿多諾這樣寫道人們對這句話有不同的闡釋。依我看他是想說，浸淫在“私密、自負的凝思之中”的詩人找不到文字來表現奧斯維辛機械式、無靈魂和工業性的殘忍。另外，詩歌是一種創造美和愉悅的過程，用來描述大屠殺不合適。

阿多諾的話有許多地方值得商榷，日后他自己也改口了。不過除開個別人以外，似乎德國的藝術家們——導演、劇作家、小說家和詩人——都將他的話銘記在心。無論是在有政治禁忌的東德，還是在沒有政治禁忌的西德，都鮮有直面大屠殺這一素材的小說、戲劇或電影。我說的不是紀錄片、史籍、展覽或證人的口述，這些在原聯邦德國根本不算少。我說的僅僅是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例外值得玩味，因為它們折射出主流作品的沉默，或者最起碼也是拐彎抹角。關于死亡營，最著名的一首詩是《死亡賦格（Todesfuge），作于1945年，作者是保羅·策蘭（Paul Celan）。這首詩具有一種舞曲般抑揚頓挫的節奏感，與詩里集中營長官玩的殘忍游戲形成呼應。他命令一些猶太人奏樂，其他的則為自己挖掘墳墓：“鏟子再往下呀你們音樂都給我繼續你們跳啊跳。”

《死亡賦格》成了經典，并被收錄進西德的教科書。但凡受過教育的德國人都背得出下面這一名句：“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然而，人們對這首詩的看法不一。它是不是有點太抒情了？是不是太悅耳了？是不是沒有表現出恐怖，反而將其美化了？保羅·策蘭自己也有些吃不準，1960年代還曾請求編輯將其從詩集里刪去。話雖如此，在我看來，策蘭的詩依舊是有關大屠殺最感人肺腑的聲明。詩的凄美并沒有淡化字里行間的恐怖氣息，相反，倒是加深了這種感覺。

保羅·策蘭游離于戰后德語主流文學圈之外，不光是因為他的作品，還因為他不是德國人。他出生在羅馬尼亞[[6]](#_6_Ce_Lan_De_Chu_Sheng_Di_Cherni)，父母都是猶太人。母親教他德語，卻未曾想到操這門語言的人日后會要了她的命。策蘭說過，德語“穿過帶來死亡之言說的千重黑暗”[(27)](#_27_1)。他去德國旅行、訪友、領獎。但語言的確是他和德國唯一的紐帶——歷史也是——而且是最具毀滅性的紐帶。1970年，策蘭在巴黎自殺。

彼得·魏斯根據奧斯維辛審判的供詞，寫下一部戲劇作品，名為《調查》（Die Ermittlung，1965年）。[(28)](#_28_1)這既是散文，也是詩歌，取材大多來自紀錄片。但盡管其詳細描述了所發生的暴行，這部作品還是有著馬克思主義的視角。猶太人的苦難被消解，融入一種階級斗爭的宏大敘事。“猶太人”和“猶太人的”這些詞（遑論“吉卜賽人”）根本沒有提及。正如彼得·狄美茨（Peter Demetz）在《大火之后》這本書里提到的那樣，魏斯將“奧斯維辛變成了一個沒有猶太人的地方”。

同策蘭一樣，魏斯也是猶太人。一如前者，他和德國的聯系很脆弱。魏斯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旅居海外，一度還曾以瑞典文寫作。至少就他的作品而言，他從未以猶太人的身份對奧斯維辛受害者表示過同情。另外，從表面上來看，他也不認為奧斯維辛是德國人獨有的罪行，無比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他是不會這么看問題的：他滿腦子充斥著體系、經濟學、階級利益，而不是國家或文化。話雖如此，他對戰后德國的“身份認同”倒是饒有興趣。魏斯覺得，第三帝國的體制和哲學殘余滲透進了聯邦德國。他希望自己的劇作能在西德開創群眾運動的先河。魏斯認為，只有在經過了經年累月的大量“精神勞動”后，德國人才能從“精神失常”中得到解脫。[(29)](#_29_1)那時的他尚相信有民族心理這回事。

在所有關于屠猶的戲劇作品中，有一部相當出名，叫《上帝的代理人》（Der Stellvertreter，1963年），作者羅爾夫·霍赫胡特（Rol Hochhuth）是非猶太裔德國人，篤信新教。該劇漏洞百出，在激烈抨擊梵蒂岡串通納粹、屠戮猶太人一事上，猶太人居然只是一群可有可無的小卒子。這一主題與其說涉及歷史、文化或民族，不如說和神學關系更密切：反映了在牧師心中，上帝和魔鬼在做斗爭。該劇把場景設在奧斯維辛，門格勒博士（Dr. Mengele）披著黑絲斗篷，活像誘人墮落的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這一幕很是拙劣。但話說回來，該劇在對奧斯維辛展開想象這點上依然算得上是一次罕見而勇敢的嘗試，雖然它在德國收獲的評價冷若冰霜。彼時，批評家馬塞爾·萊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是少數支持霍赫胡特的文人之一。[(30)](#_30_1)他寫道，霍赫胡特的作品讓德國作家陷入了難堪的沉默，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完全沒有能力駕馭這一主題。

但正如彼得·狄美茨所言，“不管是德國人的生活還是德語文學沒有哪個方面未曾受到奧斯維辛遺產的影響。”[(31)](#_31_1)此言不虛，起碼符合聯邦德國的情況。戰后出版的德語小說中有不少提起過大屠殺但大部分要么拐彎抹角，要么是作為隱喻。1950——1960年代的作家比如海因里希·伯爾和西格弗里德·倫茨（Siegfried Lenz），往往都不愿對納粹直呼其名。伯爾管他們叫“吃水牛肉的人”，他們的受害者則是“羊羔”。在小說《德語課》（Deutschstunde，1968年里，倫茨管納粹叫“穿皮風衣的人”，或者索性簡稱“柏林當局”1964年，在談到難以對大屠殺進行描述時，亞歷山大·克魯格（Alexander Kluge）這位活躍在戰后早期的導演兼作家表示：“真的難以形容，但是，對其進行回顧、清算倒還是有可能的，甚至很有必要。我嘗試給出兩端的界限，希望讀者的想象力能在其中不受拘束。”[(32)](#_32_1)

很顯然，比起直觀描述，一個精心挑選的比喻更能激發想象力。Oświęcim（奧斯維辛的波蘭語）火車站岔道旁突然響起的汽笛聲，讓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博物館之行，而是一種威脅感。然而，德國文學在直面奧斯維辛一事上一直是扭扭捏捏，人們對在圣地、博物館或學校課堂外反思“最終解決方案”[[7]](#_7_Die_Endlosung_Ji_Na_Cui_Mie_J)幾乎普遍持拒斥態度，暗示出他們生怕這么做會冒天下之大不韙。這似乎在說，“世界的陰溝”是上帝的臉龐，而任何嘗試給難以想象或難以名狀之物勾勒外貌的舉動都會讓其神圣性變得微不足道。目擊證人在法庭上、博物館里和錄像帶中——比如說在德國電視上反復播放多次的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談他們的經歷無可厚非，但要德國藝術家發揮想象力則萬萬不可。

1992年冬，一部名為《希特勒青年所羅門》（Hitlerjunge Salomon）的電影在德國上映了。這部片子在德國以外有個別名，叫《歐羅巴，歐羅巴》（Europa, Europa）。影片翻拍自一位大屠殺幸存者的真實故事，在美國大獲成功。

所羅門·佩雷爾（Salomon Perel）生在德國，父親是波蘭猶太人。他和家人逃到了波蘭，靠冒充自己是種族德意志人（Volksdeutsche）而幸免于難。一位納粹軍官收留了他，送他去一所納粹精英學校念書。影片的一些地方，納粹式的媚俗元素大行其道：荒唐的制服、瘋狂的演講、在森林里和金發納粹少女談戀愛、希特勒青年團高唱要用德國刀子捅得猶太人鮮血四濺。但這些元素中的大部分還是符合史實的。

學校放假期間，所羅門坐著電車，駛過洛茲猶太區，試著找尋失散的雙親——他估摸著他們應該在那兒。電車的車窗被涂上白漆，以免德國乘客看到窗外奄奄一息的猶太人，然而，所羅門還是透過縫隙，和觀眾一起看到了窗外的場景。映入眼簾的景象既不老套也不媚俗，而是猶如地獄降臨。影片最后出現了所羅門·佩雷爾的原型他如今生活在以色列，哼唱著希伯來語歌謠（這倒是挺俗的）。

《希特勒青年所羅門》在德國的口碑十分一般。導演沃爾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ondorff）將其視為人們對之“無聲抵制”的明證。當該片落選德國官方候選影片名單，失去競逐奧斯卡的機會后協同攝制的波蘭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憤怒了。她聲稱，這是一部德國電影，拒絕送報該片再次說明德國人否認過去的行徑。《明鏡周刊》點評道，這部電影或許讓人感到難堪因為它“打破了德國人的一條禁忌”。所羅門的性格并不符合親猶主義者眼中善良猶太人的形象，這可是戰后多數德國文學作品里猶太人的標準。

實際上，電影為何沒能送報奧斯卡一直是個謎。德國評審委員會給出的理由是，由于導演是波蘭人，因此該片嚴格來講不能算德國片。左派報紙《法蘭克福論壇報》（Frankfurter Rundschau駁斥這種說法是“形式主義”，讓人聯想起“強調種族純潔的形式主義”。

也許委員會的做法很官僚，又或者影片主題實在太讓人臉上無光。令人驚訝的是，在同德國人談起該片時，我常能聽到他們對其媚俗化傾向表達擔憂。《法蘭克福匯報》在德國人自尊心受辱時總會迅速發難。這一回，該報發表了一篇影評，罵《希特勒青年所羅門就是部爛片。影評人寫道，這是廉價的鬧劇，是對類似“異鄉奇遇記（innocent-abroad stories）的拙劣模仿。煽情的音樂和俗氣的場景與主題格格不入。但究竟怎樣才算是切題呢？審美上的吹毛求疵發展到一定境界，就成了完全不呈現主題的一種借口。

然而，在憂心糟糕品味和褻瀆共識的表象之下，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問題。把過去的人想象成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披著黑絲斗篷惹人發笑的魔鬼，會賦予他們人性。這倒并不一定是要為他們開脫，或給予同情，但這么做的確會打破我們和他們之間抽象的壁壘。我們在特定情況下也可能變成他們。對于一位對受害者有天然同情的藝術家而言這不是什么難事。猶太作家不會因為構想出一名奧斯維辛的黨衛隊軍官而冒名譽上的風險。但對于一個被教育要把奧斯維辛這一德國罪行銘記在心的非猶太裔德國人來說，風險是實實在在的。將和大屠殺中心相隔十萬八千里的納粹地方公職人員寫得有人情味兒是一回事——從西德的君特·格拉斯到東德的克里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許多德國作家都這么做過——但尋找自己同屠夫之間的共性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做到這點，首先得從受害者的角度來想象過去。

在為《燔祭》（Das Brandopfer，1954年）所作的序言里——喬治·斯坦納曾評價該書是“為數不多專注于探討昔日慘劇全貌的嚴肅文學作品之一”——作者阿爾布萊希特·格斯（Albrecht Goes）寫過下面這段令人叫絕的文字：“作為講述這一故事的人……只要我還活在這世上，一想到下達所有這些死亡命令——發號施令者有海德里希（Heydrich）、艾希曼（Eichmann）等人——所使用的語言是我思考、表達、寫作和做夢所使用的語言，我就無法不顫栗。盡管如此，我還是壓根嗓音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但絕非綿軟無力。當然了，這種力量有其來源——只有以色列才有這力量。它建立在一條紐帶之上，這條紐帶讓‘以色列的子民’，或者說‘錫安的子民’得以活在這個世上。他們知道這條紐帶將永遠存在。”[(33)](#_33_1)

這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懷有身孕的猶太婦女，她在被捕前夕，無奈地把自己未出世孩子的手推車送給了非猶太裔小店主老板娘。小說在主題的選取上可謂卓爾不群（Brandopfer在德語里是大屠殺一詞的直譯），但是其親猶立場對作者那代德國人而言根本談不上有何不同尋常。在格斯的作品里，女主人公，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受害者，不僅是一名猶太裔德國女性，她還是“先知的后代”。這就好像說，為了能講述大屠殺的故事，格斯不得不采納受害者在神話里的身份認同。

也許更值得稱道的是沃爾夫岡·柯朋（Wolfgang Köppen的小說《雅各布·利特納寫自地洞里的筆記》（Jacob Littner Aufzeichnungen aus einem Erdloch）。該書于1948年首版時，柯朋用的是雅各布·利特納的筆名，1992年再版時署回了本名。柯朋在1950年代還寫過另外三本小說，講述納粹留給戰后德國的心靈創傷都非常出名。

雅各布·利特納實際上不只是個文學人物，他是慕尼黑的猶太郵票經濟商，靠行賄說服了一名波蘭反猶分子放他一條生路，波蘭人同意讓他住在自己房子底下一個黑洞洞、臭烘烘的地穴里。就這樣，他在對波蘭茲巴拉茲（Zbaraz）猶太區的“掃蕩”和戰火中撿回了一條命。移民紐約前，他把這個故事講給慕尼黑的一個出版商聽。[(34)](#_34_1)出版商做了記錄，這部分筆錄為柯朋的小說奠定了基礎。柯朋從利特納本人那里獲得了寫作該書的報酬，后者從紐約給他寄食品包裹。這個例子再度說明，非猶太裔德國人會借用猶太人的身份講述大屠殺的故事。

也許這么做是因為沒別的辦法——特別是在一開始的時候。但即便用了猶太人的筆名，作者也忍不住要賦予作品一個抽象和宗教化的結尾。通篇來看，此書行文多數時候很清醒，對慘象的描寫也很具體，但結尾處話鋒一轉：“仇恨是個可怕的字眼……我誰都不恨我甚至對那些罪大惡極之徒也恨不起來。他們迫害我，但我無意成為審判他們的判官。不過，我拒絕且無力擔當判官還意味著下面這點：不應當由我來原諒和寬恕有罪之人。在我眼里，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凌駕于人類審判能力之上，只有上帝才能對非人類的罪行作出判決……”

戰后三年，那時還輪不到德國人來懇請暫緩“人間審判”，只有受害者才有權這么做。但是這種宗教化的抽象表達傾向在納粹時期成長起來的德國人中間太普遍了，他們的下一代亦是如此；猶太人這么做，通常是為了給“猶太復國主義愛國者”這一新身份注入神秘性，德國人則不同；恰恰相反，他們是為了逃避對一種德國獨有罪行的繼承，逃避將奧斯維辛“內化于心”的不得已，甚至是逃避做德國人。

\*\*\*\*\*

接下來要提的是《大屠殺》（Holocaust）。打破不得呈現奧斯維辛這一實質性禁忌的不是德國藝術家，而是一部好萊塢肥皂劇。這部劇在處理流行元素的手法上很老到，使其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滲透進了德國人的想象空間。《大屠殺》于1979年1月在德國首播，觀看人數達到了2000萬人次，相當于聯邦德國成年人口一半左右。有58%的人希望這部劇能重播。廣播公司收到了12000封來信、電報和明信片。有5200人在首播后給電視臺打去了電話，72.5%的觀眾給出了好評，7.3%的人給出了差評。千言萬語，都在《明鏡周刊》刊登的海因茨·荷納（Heinz Höhne）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概括：“一部美國電視劇，盡管拍攝風格十分瑣碎，且制作動機更多考慮商業而非政治因素，更多作為娛樂節目而非啟蒙教育，卻做到了成千上萬的書籍、戲劇、電影、電視節目以及上千份檔案和所有集中營審判在戰后三十多年來都未能做到的事：讓德國人了解了以他們的名義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為此，上百萬德國人都受到了深深的感動和震撼。”[(35)](#_35_1)

《大屠殺》從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播放過，不過邊境地區的居民還是能收看來自西德的電視節目。他們也的確這么做了，盡管官方明令禁止。1992年，我詢問一位住在昔日東柏林的學校教師，她是否看過這部劇。她回答說看過。那學校里討論過么？沒有，要不然當時的師生就得承認他們犯法了。這么說來，人們假裝自己沒看過《大屠殺》咯？是啊，這位歷史老師答道。但無論如何，“過去對我們的孩子來說并不存在猶太人問題，現在得跟他們講授這段歷史。可他們甚至都不明白猶太人有什么特別，逼得希特勒非要把他們趕盡殺絕。您瞧，在這兒（東德），我們對《圣經》不太了解不管是《舊約》還是《新約》。”

在聯邦德國，《大屠殺》讓部分西德知識分子在震驚之余大為惱火。這是出于對媚俗文藝一貫的恐懼，以及對“好萊塢價值觀”——往往這指代美國——的疑心病。《法蘭克福論壇報》憂心忡忡，生怕這部劇會使過去的慘劇商業化：奧斯維辛會成為“某種被消費的對象”。執導過遠比《大屠殺》制作更精良的肥皂劇《故鄉》（Heimat的埃德加·萊茨（Edgar Reitz）曾抱怨道，“美國人借《大屠殺偷走了我們的歷史”，因為類似《大屠殺》這種風格的影片阻礙了德國人“掌控自身歷史的話語權和掙脫全世界對我們的指摘”。實際上，《大屠殺》從未構成過阻礙，倒是德國藝術家自己未能對奧斯維辛發聲。

廣播公司收到了一些泄憤的信件，通常是不署名的，寫信人將《大屠殺》斥為猶太人的一派謊言。整件事就是猶太人的陰謀詭計為的是讓德國人顏面掃地，自己好從中撈錢。巴伐利亞州已故州長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ss）就秉承這種觀點，至少他親口承認過。但換個角度來看，一些左派知識分子又何嘗不是這樣。對他們而言，好萊塢的商業操作就是萬惡之源。德國某個學派在解釋奧斯維辛成因時，把分析建立在對商業操作和沒有嚴格定義的“現代性”這兩者的鄙夷之上——“現代性”既可以表示啟蒙運動后的理性主義，也可指批量生產、資本主義，等等。東德劇作家海納·穆勒接受采訪時說，“奧斯維辛是啟蒙運動的最后一個階段。”[(36)](#_36_1)不但如此，“奧斯維辛還是資本主義的祭壇，理性作為唯一有約束力的標準，把人類剝離得只剩下物質價值。”就這樣事情的外在和本質再度遭到混淆：即便大屠殺的方式可算作工業化甚至是理性的，但其成因斷然與之無關。

諸如穆勒、西貝爾貝格或阿多諾等知識分子有理由對大眾文化的力量心存忌憚。然而，《大屠殺》造成的沖擊并不難解釋，尤其是在德國。存在于法庭、教堂或博物館里的奧斯維辛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一種隱晦的比方、一堆無法想象的數據，以及上百萬個沒有名字的死難者。隨著《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的問世，似乎某個無名無姓的死者從萬人坑里爬出來，重新獲得了身份。哪怕約瑟夫·魏斯博士[[8]](#_8_Dr__Josef_Weiss___Da_Tu_Sha)一家是以美國肥皂劇中人物的面目出現，也有著每個德國人都能辨別的身份：家境殷實、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沒準還是你的鄰居；實際上，倘若你上了年紀，過去你的鄰居就是這些人。

《大屠殺》證明了一點，隱喻和影射并不足以使歷史復活。魏斯一家必須被創造出來，過去必須得到再現。肥皂劇的體裁之所以如此有影響力，是因為其與布萊希特式（Brechtian）[[9]](#_9_Bei_Tuo_Er_Te__Bu_Lai_Xi_Te)的“疏離”姿態截然相反：情感泛濫，觀眾產生共鳴。我們感到和自己最喜歡的肥皂劇人物認識，就像和一位知名脫口秀主持人相熟一樣。然而，大部分戰后德國文藝作品所回避的恰恰就是這種認同感。對猶太受害者的認同不可能真正發自內心；而同情加害者——也就是說，同情你的父母、祖父母或你自己——又太令人痛苦。

倘若《大屠殺》的主角不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德國人，而是，打個比方說吧，貧窮的羅馬尼亞吉卜賽人的話，那么德國觀眾或多數非德國觀眾會如何看待這部劇，倒是個挺有意思的問題。要真是這樣，我很懷疑《大屠殺》會有同等的影響力。認同感顯然是有限度的。

“看過《大屠殺》后，”一位西德婦女在寄給本地電視臺的信中寫道，“我對第三帝國的那些畜生感到深深的鄙夷。我二十九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一想到有許多母親和孩子被送進毒氣室，我就不能不熱淚盈眶。（即使在今天，猶太人依然不得安寧。我們德國人有責任為了以色列的和平夜以繼日地奮斗。）我向納粹的受害者深深鞠躬，并為自己是德國人感到羞愧。”[(37)](#_37_1)

從《大屠殺》播放后發表的許多信件來看，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反應。戰后出生的一大批人都恥為德國人。這似乎驗證了克里斯蒂安·邁爾的觀點，歷史“深入骨髓”，我們背負著父輩的罪孽歷史流淌在我們的血液中。誠然，德國人對奧斯維辛負有責任。但是，后世的德國人一提奧斯維辛就羞愧難當，這種反應恰當么？有用么？小說家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在戰時尚未成年，同邁爾一樣，他相信奧斯維辛是將德國人聯結起來的紐帶，一如歌德的文字。當一個法國人或美國人盯著奧斯維辛照片的時候，“他不用感慨：我們人類啊！他會想：這些德國佬！我們能想‘這些納粹！么？換做我，我可做不到……”[(38)](#_38_1)

這番用詞表明了說話人的民族認同感出了問題。納粹在高雅的德國文化上留下了血淋淋的手印，對于一心想挽救它的德國猶太人阿多諾，奧斯維辛是一種德國罪行的觀念讓他難以接受。對他來講罪行的根源是一種現代病，或曰“權威主義人格”病癥。慘無人道的黨衛隊就得了這種病，他們是龐大工業輪盤上喪失人性的齒輪瓦爾澤和阿多諾的看法針鋒相對，除此之外還有第三種說法么？我相信有。

奧斯維辛無疑是德國人犯下的一項罪行，“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嘛。但這里的德國是另一個德國。一味堅持通過“身份視角審視歷史、復述史學家克里斯蒂安·邁爾的老話，意味著抗拒凡事皆會改變的觀念。一個人能從侵略者的角度銘記奧斯維辛同時避免陷入過度自責甚至是妄自尊大這種庸俗的情緒泥潭么？認為奧斯維辛是德國人身份中某些可悲缺陷造成的想法，就好像說是德國人的集體天才造就了歌德和勃拉姆斯，只會固化某種神經質的自戀癥：往好了說，這是一種永恒的擔憂，生怕德國人是個危險民族；往壞了說，這是一種畸形的自豪，自豪于一種近乎原始部落的稟賦——既能創造美輪美奐的音樂，又能犯下難以啟齒的罪行。

[[1]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當代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_1_6)

[[2]猶太教牧師。](#_2_5)

[[3]Torah，猶太希伯來文經卷中最重要的經書，猶太人一直視《托拉》為經典中的經典。](#_3_4)

[[4]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作家、化學家，曾為奧斯維辛集中營囚犯。](#_4_4)

[[5]Gush Emunim，以色列右翼團體，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著濃厚原教旨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色彩。該團體以捍衛和實踐早期移民先驅的精神，在被占領土建立定居點，并最終拯救整個以色列為己任。](#_5_3)

[[6]策蘭的出生地Chernivtsi乃昔日羅馬尼亞舊省，1944年后劃歸烏克蘭。——編按](#_6_2)

[[7]Die Endlösung，即納粹滅絕所有猶太人的計劃。](#_7_2)

[[8]Dr. Josef Weiss，《大屠殺》里的主人公。](#_8_2)

[[9]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國著名戲劇家和詩人，提出“陌生化”的戲劇理論。](#_9_2)

## 第四章 廣島

位于柏林的原日本和意大利使館都建造于1930年代，具有希特勒夢想之都日耳曼尼亞雍容華貴的古典法西斯主義風格。兩棟建筑之間夾著一條短又窄的馬路，過去叫格拉夫·施佩路，以紀念1914年和英國海軍在馬爾維納斯島激戰中陣亡的德國海軍上將格拉夫·施佩（Graf Spee）。同柏林的許多街道和廣場一樣——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廣場、赫爾曼·戈林路等等——格拉夫·施佩路在戰后被重新命名。現如今這條馬路叫廣島路。

之所以選這個名字——據說意大利人對此十分惱火——跟日本人沒有半毛錢關系。左傾的柏林市議會選這個路名是為了表達反戰立場。但即使日本人在當中沒扮演什么角色，新路名恰到好處地抓住了戰后日本社會的普遍情緒。對于大多數日本人而言，廣島是太平洋戰爭的終極象征。日本人民所經歷的一切苦難都濃縮在這個近乎神圣的詞匯當中：廣島。但廣島不僅象征著民族殉難，還象征著極度邪惡，常被人拿來和奧斯維辛相提并論。在廣島，有個廣島——奧斯維辛委員會。在至少一部以廣島為題材的小說中，日本人和猶太人作為白人種族主義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受到了格外關注。1980年代，日本人甚至計劃在離廣島不遠的一個小鎮里建造奧斯維辛紀念館。

用廣島大學教授雑賀忠良（Saika Tadayoshi）的話來說，發生在1945年8月6日的原爆是“20世紀最惡劣的罪行”。廣島和平公園的中心處有一口石棺，上面刻著所有原爆受害者的名字。公園還有一座原爆紀念碑，那段著名的碑文正是出自雑賀教授之手：“愿所有靈魂安息，我們永遠不會讓錯誤重演。”

這種用詞很模糊，而且是存心為之。由于生怕和平公園的參觀者誤以為“我們”僅指戰時日本政府，1980年代末，這里又冒出一塊英、日雙語標牌以示澄清：“此碑號召世界各地的人們為原爆死難者的靈魂安息而祈禱，并一同宣誓再也不重蹈戰爭的覆轍。這闡釋了‘廣島的靈魂’，在忍受舊痛、放下仇恨后，渴望實現世界和平。”

廣島（Hiroshima，這一地名的寫法多用音譯外國地名的平假名，為的是讓其聽著更國際化、更顯普世主義）洋溢著一種宗教場所的氛圍。它有殉難者，但沒有神靈。它有祈禱者，也有一個現成的關于人類墮落的傳說。在一份由廣島和平文化基金會出版、名為《廣島和平讀本》的小冊子里，廣島“再也不單單是一座日本城市，而是寰宇公認的世界和平圣地”。

在廣島火車總站候車大廳里，總是擠滿了穿著校服的小學生、童子軍、退休老人、外國旅客、名流顯貴和村民，手持旗子的導游走在他們前面。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前往廣島朝圣，他們是其中一部分。所有人都去參觀和平公園，原子彈就在其上空爆炸，那里曾是繁華的商業區，如今則成了膜拜廣島的中心。

要想象當時的情境，只會比奧斯維辛更困難，因為發生在廣島的慘劇可以被濃縮為單一事件，而且幾乎沒留下什么肉眼可辨的痕跡。當然，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整個廣島城都是原爆的證據。漂亮的商業街、公園、棒球場、高層酒店，以及混凝土建造的古堡——所有這一切在1945年8月6日之前都是不存在的。就像犯罪現場被徹底清除；抑或者說，被埋在了一座煥然一新的城市底下，好比現代特洛伊，或原華沙猶太隔離區。

然而，訪客很難淡忘原爆造成的影響，尤其當他們是白種人的時候——日本人眼里永遠的外國人，而且往往被當成美國人。這不僅是因為紀念碑、銘牌和紀念堂的數量多到讓人沒法不留意到，還因為穿行在和平公園之中會生出一種不自在的感覺。日本人倒不會魯莽地走到你跟前，呵斥說“這是你犯下的罪孽，害死了多少人你這個兇手”，但是，小學生在老師的慫恿下會走上前來，詢問你對和平的看法。這種時候，你感到有必要表現懺悔，或者最起碼也得說兩句表示遺憾的話。你被要求代表你的種族——也就是日本人眼中扔下原子彈的罪魁禍首白種人——宣稱自己熱愛和平。

公園里匯集了神龕、紀念碑、亂石、銅鐘、噴泉和寺廟，是座名副其實的盧爾德城[[1]](#_1_Lu_Er_De__Lourdes_Wei_Yu_Fa_G)，既紀念死難者，也為和平祈福。公園商店售賣鑰匙圈、圓珠筆、T恤衫、杯墊、明信片、書籍、茶杯、佛珠筷子等商品，上面都印有祝愿和平的禱文。多數紀念品上都繪有一幅畫，描繪的是在原爆后只剩殘骸的原廣島縣勸業館，如今那里成了原爆紀念館。和平公園的一端有條河，畫中景物的原型便矗立在河對岸，無時無刻不提醒著人們這里發生過的罪惡。現如今那里是祭祀場所，人們放著河燈，紙質的燈籠象征死難者的靈魂。成百上千只灰白色的和平鴿在樹叢中飛來飛去。據導游解釋，這些樹為“日本國內外個人和團體所種，借此告慰罹難者的亡靈，祈禱和平”紀念塔附近有塊標語：“如果您碰過和平鴿，請漱口并洗手，避免感染上它們攜帶的病菌。”

紀念塔后方是和平之火，由日本青年商會捐贈。火焰的形狀像兩只攤開后伸向天際的手掌。宗教團體和諸多日本企業界代表帶來的火炬讓火焰一直生生不息。和平之火旁是一座禱告紀念碑，三人構造的雕塑，分別為一男一女和兒童。雕像底座前有塊石頭，人一站上去，音樂盒就會播放《英靈啊，請不要在九泉下哭泣》這首歌。

在并無特別祭祀活動舉行的日子里，紀念塔前的游客表現得和日本寺廟里的信眾差不多。他們嘴里念念有詞，朝石棺后的和平池里扔硬幣，還給彼此拍照留念。穿著海軍藍和黑色校服的學生排隊從眼前走過，有些歡聲笑語，有些打著哈欠，還有些拖著懶洋洋的腳步。老師給他們布置的作業是在筆記本里抄錄碑文。此地氣氛并不莊嚴；日本的宗教場所都是這樣。透過孩子們稚氣的童聲，唯一的肅穆來自不遠處嗡嗡作響的一口和平鐘，鐘設在一棟混凝土穹頂建筑內，據導游手冊介紹，這“象征著宇宙”。

看著笑容燦爛的孩子們，我想起幾年前參觀的另一座紀念館。那時的我，同樣詫異于日本人參觀血流成河之地時的那種漫不經心。紀念館位于塞班島上。這是一座太平洋上的小島，靠近天寧島。后者面積更小，當年艾諾拉·蓋號轟炸機（Enola Gay）便是從這兒出發飛往廣島。曾幾何時，塞班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日本殖民地，但美國海軍陸戰隊1944年登上該島后，日美兩軍展開了一場激烈廝殺，短短幾天，就有至少兩萬五千名日軍和四千名美軍喪生。但最慘的莫過于成百上千名平民——多為婦孺——選擇跳崖，集體玉碎。一些面露遲疑的人被日軍狙擊手從身后開槍擊斃。人們為這片感傷之地做了記號，標牌上有用英、日雙語書就的“玉碎崖”字樣。年輕的日本游客嬉笑著互相拍照，其中絕大多數是姑娘。

只有在要講究等級尊卑的時候，日本人才會變得莊重肅穆，肅穆得近乎壓抑。就在廣島之行的第二天，我來到九州的最大城市福岡。因為有半小時的空閑，我在中央火車站前觀看了一場宣傳交通安全的儀式。穿制服的年輕姑娘身披“1992年福岡公路安全小姐”的緞帶，站姿一模一樣，手戴白手套，雙手交叉垂于身前，雙腿并立。與此同時，一襲黑西裝的老頭兒神色憂傷，不斷呼吁人們遵守交通法規。銅管樂隊恭候一旁，樂手直挺挺地站著，畢恭畢敬的樣子活像普魯士軍人。福岡市的若干名流也肩挎緞帶，佩戴表明各自工作單位的徽章，列隊站在演講者身后，仿佛參加閱兵的將軍。他們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也聽不到竊竊私語。在這里所有人都明確自己的地位，秩序井然；在這里，人們集會的目的不是為了在戰場上殺戮幾萬萬人，而是為了在和平年代倡導安全駕駛。

廣島——這里說的是作為圣地而非現代日本城市的廣島，后者雖然繁華，但了無生機——的有趣之處在于，這座城市的普世主義抱負同它作為日本受害者情結獨家紀念地之間，存在一種張力。和平公園外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立著一尊憑吊原爆朝鮮死難者的紀念碑，他們中不少人在戰爭期間被迫赴日做苦役。在旅日韓僑的努力下，紀念碑于1970年落成。其底座是只巨大的石頭陸龜，算是朝鮮人的墓碑。龜身蓋滿花環、鮮花和寫有朝鮮團體名字的千紙鶴墓碑旁有一行字，用英、韓雙語寫成，說的是兩萬名朝鮮人的故事他們“圣潔的生命”被“突然從我們身邊奪走”。既沒安排葬禮也沒舉辦追悼會，因此，“魂魄常年游蕩，無法升抵天堂”。這些朝鮮人的靈位不在和平公園供奉之列，日后曾有朝鮮僑民試圖將紀念碑移至公園內，但無不以失敗告終。廣島市政廳給出的說法是，只能有一座紀念塔。而這座紀念塔上沒有朝鮮人的位置。

1946年初，廣島縣知事曾邀請大批當地名流為重建這座幾乎消失的城市獻計獻策。小說家太田洋子在原爆中幸免于難，她希望重生的廣島能多栽些樹。“我希望夢想和現實能和諧交織在一起，豐富市民的生活。”她曾表示。某位獻言者覺得有必要豐富文化生活還有一位（寺廟住持）希望看見整座城市里佛教廟宇林立。但是最轟動的建議出自吳港市副知事。吳港是廣島郊外的一座港市，戰時為大批戰艦的建造地。他想要“保留大片焦土，用以緬懷和憑吊過去，并祈求永久的世界和平”。

一些人對這一愿景未能實現心存遺憾。自1980年代起，來自大阪的原高中教師宇野正美寫下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作品，大談向猶太人學習的必要性，特別是他們主宰世界的方式。這些書賣出了幾十萬冊，其中一本名為《美元變廢紙的那天》，里面一個章節寫到了廣島。宇野寫道，應該保留廣島滿目瘡痍、斷壁殘垣的樣子，就像奧斯維辛被猶太人刻意保留下來一樣。[(39)](#_39_1)通過讓全世界了解他們的殉難，猶太人保住了自己的種族認同，恢復了他們的陽剛氣概。與之相反，日本人在遭到美國人誆騙后，誤以為應立即著手重建廣島，掃除日本人的苦難痕跡。結果是戰后的日本人缺乏認同感，他們的陽剛之氣也因為美國對日本戰爭罪行的宣傳變得一蹶不振。

這是一種極端立場。少有日本人會走此極端，縱然作為讀者，他們或許會覺得這種觀點具有煽動性，但并不讓人反感。倘若撇開其中的反猶主義元素和讓廣島保持廢墟狀態的觀點，宇野的看法在日本民族主義者中間并不缺乏市場。右派向來擔心美國人強制推行的戰爭罪宣傳會削弱日本人的身份認同。然而，右翼民族主義者對廣島的關心程度要遜色于對“大東亞戰爭”的頑固認知（idee fixe），他們認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師出有名的戰爭。

左派有他們自己的日本殉難說，廣島在其中占據核心地位。舉例而言，一種被廣泛采納的看法是，不計其數的日本平民淪為了一場邪惡軍事實驗或冷戰第一波軍事打擊的犧牲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根據這一論述，美國人之所以投下原子彈，是為了敲山震虎，嚇退有可能出兵日本的蘇聯人。這種看法起碼還值得一辯，但認為投下原子彈是種族主義試驗的看法則不那么合理，因為原子彈是為了對付納粹德國而開發的。盡管如此，許多日本人對此仍然深信不疑。圍繞這一話題涌現過一些文學作品，比較荒誕不經的一本由河內朗所作。[(40)](#_40_1)河內曾在聯合國工作，他認為原子彈是白人種族主義者蓄意策劃的一起種族滅絕。宇野正美也抱有類似看法，聲稱這些種族主義者是猶太人。需要重申的是，此類觀點都很極端，但就日本期刊的內容和暢銷書目來看，其與主流輿論的距離并非那般遙遠

不過，左派和自由派可不會一心想著要為“十五年戰爭”辯解他們秉持另一套看法。在他們看來，原子彈是上天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某種懲罰。在領受過這獨一無二的苦難并吸取教訓后，在經過地獄之火和煉獄的淬煉和洗滌后，可以說，日本人已經有權——甚至有神圣義務——去評判他國的行為，特別是美國。只要對方一露出違背“廣島精神”的跡象，日本就有權對其指手畫腳。這是所謂和平教育的要義，左派日本教師工會對之大力弘揚，保守派政府則疑慮重重。和平教育傳統上指反戰主義、反美主義，以及對共產主義國家的強烈同情，尤其是中國。

在紀念原爆一周年之際，幸存者聚集在一所神道教寺廟，高舉寫有“世界和平始于廣島”這一口號的黑色橫幅和旗幟。1987年8月6日，廣島市知事宣稱：“世界依舊為‘權力哲學’所控制，我們必須讓全世界都信仰廣島精神。”這意味著，從盟友日本處獲得后勤和財力支持的美國只要一動武——比方說在朝鮮、越南或者波斯灣——就會被視作是對原子彈受害者的背叛和對廣島精神的致命一擊。

\*\*\*\*\*

至少從某一點來看，日本的左翼和平主義同常和右翼有聯系的浪漫民族主義存在共通之處：兩者都對被美國人奪去集體記憶一事心懷怨恨。浪漫民族主義者認為，戰后的美國占領者有意瓦解了神圣傳統，比如說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會喪失身份認同。浪漫的和平主義者則相信，美國為了掩蓋自身罪行，且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以利冷戰，便試圖抹去有關廣島的記憶。

關于原爆給長崎留下的精神創傷，黑澤明拍過一部充滿感情的電影《八月狂想曲》（Rhapsody in August）。該片不僅是對原爆的一曲哀歌，也是對記憶流變為歷史、而歷史又迅速被遺忘的一聲嘆息。柏林的一份報紙曾刊登加西亞·馬爾克斯對黑澤明的訪談。作家問黑澤明，“這種歷史健忘對日本的未來和日本人的自我認同意味著什么”。[(41)](#_41_1)黑澤明答曰，日本人不愛公開談論原爆。“特別是我們的政客，他們緘默不語，也許是因為忌憚美國人吧。”除非美國有朝一日向日本人道歉，“否則這出戲將永無終結之日”，黑澤明說。

誠然，占領期間，美國當局不希望日本人對原爆念念不忘。他們不想日本人產生受害者情結。戰后最初幾年，關于原子彈的話題只有科學類書籍才獲準出版。就算到了1949年，廣島市政府力推的電影《廣島的事再也不要重演》（No More Hiroshimas），也因為占領當局反對片中出現“原子彈導致破壞和人類痛苦”的場景而流產了。[(42)](#_42_1)直到1950年，也就是占領結束前一年，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婦的畫作《原爆圖》還不得不改名為《1945年8月6日》。

不過，黑澤明還是說錯了，因為二戰中很少有事件會像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后者受關注度要小得多——那樣，得到過如此密集和頻繁的敘述、分析、哀嘆、還原、重現、呈現和展示。長崎之所以被淡化，不僅因為廣島率先遭到打擊，還因為長崎的軍事目標比廣島多。位于長崎的三菱工廠為日軍制造了大量軍火。除此以外，還有一層鮮有提及的因素：長崎原爆的位置恰好在社會棄兒和基督徒的生活區。長崎市余下大片區域躲過了一劫，這點也和廣島的情況不同。詳細探討原爆會揭露令人難堪的隱情，所以最好還是閉口不談。然而，戰爭差不多剛結束，以廣島為題的小說就算不能出版，也已見諸文字。1983年，一批總共十五卷的日本原爆文學精選集問世。[(43)](#_43_1)

占領甫一結束，就涌現了大批原爆書籍和電影，多半帶有反美色彩。據我猜測，占領期間的報刊審查制度是導致這種局面的一大原因。被封殺之事終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另一個原因在于導演和小說家的政治背景。一些人素來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心中充滿了對西方的不信任感，尤其是美國。另一些人在戰前是馬克思主義者，迫于軍事當局的淫威才不得不改弦更張，效忠帝國大業。但即便戰后他們重新撿起過去的信仰，也沒有帶來一場徹底的改變。敵人依舊是同一個——貪得無厭、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美國。

因此也就有了諸如《廣島》（Hiroshima）這樣的電影。[(44)](#_44_1)影片攝于1953年，導演是關川秀雄。在影片結尾的一幕里，美國游客購買被制成紀念品的原子彈受害者骸骨。恨意較之更深的，是一本出版于1969年的連環畫《黑水之河》（In the Stream of the Black River）。故事圍繞著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展開，她在原爆中撿回了一條命，但因為輻射身患絕癥，將不久于人世。不過在告別這個世界前，她要好好報復那些“白皮豬”。她當了“野雞”，專接美國大兵的客。這是等級最低的妓女，“被淹沒在惡心外國佬的體臭中”她要給所有那些“仍在日本設有軍事基地的戰爭狂留點兒紀念品”她要讓他們染上梅毒，要給他們點顏色看看！“憑什么那些戰犯不被送上審判席？”她聲嘶力竭地向同情她境遇的警察哭訴，后者拽著她離開了街道。“永遠別忘了原子彈是如何折磨媽媽的。”她告訴自己天真懵懂的幼子。這則故事發表于Manga Punch，一份發行量上百萬的畫報。

不過，撇開這些謾罵，廣島的神化及對反戰的膜拜，其產生的前提倒不是美國人有多壞，更多是來自純真慘遭戕害的印象，以及世界將要覆滅的幻想。方才還是一派祥和的生活場景——兒童歡笑姑娘歌唱，家庭主婦打掃衛生，老實巴交的男人辛勤勞作——緊接著，轉眼之間，這一切都化為了灰燼。廣島和奧斯維辛之間的對比正是基于下面這種觀念：廣島和屠猶一樣，不是戰爭的一部分，甚至與之毫無關聯，而是“發生在世界末日的某件事”[(45)](#_45_1)。這席話出自小說家太田洋子之口，她在《尸橫遍野的城市》里回憶了自己作為廣島原爆幸存者的經歷。“我們被一股力量夷為平地，它既霸道又野蠻，而且不屬于戰爭”，它或許是“新近出現的一種天體現象”順道提一句，日本偷襲珍珠港后，太田也是歡欣鼓舞的諸多日本人之一，她“感到內心燃起一團全新的火苗”。

從左派的角度來看，廣島神化的所有準宗教元素在小田實的小說《原子彈》里都有，168頁上就出現了描寫原爆的段落。[(46)](#_46_1)一位年輕嬌美的日本姑娘正要把一束鮮花送給病房里的一名馬來亞學生病號。此舉唯美而純真。接踵而至的是“一聲非自然的巨響，似乎天塌了下來”。此情此景，讓一位熟諳歐洲歷史的日本兵回憶起了《伊利亞特》里的眾神之怒。

在小田的作品里，每個美國白人嘴里都會蹦出種族主義的污言穢語：“‘所有學者都是猶太人。’威爾（Will）說道。這句話似乎激起了肯（Ken）對猶太人的厭惡，因為他張嘴就是一通罵罵咧咧。世上最垃圾的民族是日本鬼子，接著就是猶太人。”讀者由此不難得出結論：轟炸廣島是一項種族主義行徑。但在小田的文字里，日本人在對待朝鮮人和其他亞洲人時一樣也是種族主義者。故事中真正正派的智者只有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成員。部族的傳統禁止族人拿起武器，他們那端坐在沙漠里的老者具有預見世界末日的能力。廣島原爆真是世界末日么？部落里一位弟兄喬治（George）問道。“‘沒錯，兄弟，是末日，’郎（Ron）信心十足地回答，‘這世界看起來難道不和太陽一樣通紅么——或者說，這火球比太陽還要耀眼一百倍？人們被活活燒死，尸體黑得像焦炭。’”

這是佛教地獄說里的景象，四周都是鮮血淋漓的人，被熊熊烈焰所包圍。原民喜和太田洋子一樣都是廣島原爆的幸存者，著有小說《夏之花》。他眼中的世界末日在降臨前，率先登場的是一段天氣描寫，筆觸充溢著好萊塢戰爭片或萊妮·里芬施塔爾[[2]](#_2_Leni_Riefenstahl_1902____2003)作品中那種不祥之兆。[(47)](#_47_1)“黑壓壓的天空下，群山分外綠意盎然；瀨戶內海的小島也愈加輪廓分明。在最猛烈狂風的拍打下，海面，平靜的海面似乎每時每刻都會卷起驚濤駭浪。”這里的景色描寫為瓦格納式的世界末日做了鋪墊。最終，從“中世紀佛教地獄畫卷中散發出的昏暗至極的綠色微光”，為這一過程畫上了句號。1951年，或許是因為朝鮮戰爭郁郁寡歡，原民喜臥軌自殺。

1950年代，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婦將佛教地獄說搬上了現代畫布，為其取名《原子彈——廣島》（和《1945年8月6日》不是同一部作品）。我在廣島現代藝術博物館看到了這幅畫。其橫跨四塊畫板仿佛一面日式屏風，具有傳統日式元素，但構圖中也有類似基督教里人類墮落的畫面。遍體鱗傷、燒得面目全非的死尸似乎從畫面頂端散落而下，明晃晃的閃電仿佛在暗示這是天神降怒。瘋狗的血盆大口里叼著死嬰，燒焦的死尸用繩子捆綁起來，烏鴉啄食著殘缺不全的尸體。一大群沒有面目、黑不溜秋的人像排成隊的焦炭一樣邁著步子，似乎是在去向煉獄的路上。

懸掛丸木夫婦畫作的白墻上有一行字：“廣島和現代藝術：‘廣島的核心’，人類的普世主題。”我又看了一些別的展品，很明顯安塞爾姆·基弗[[3]](#_3_Anselm_Kiefer_1945_______De_G)的藝術風格為其打下了烙印。不過，對比基弗在戰后本國廢墟里篩選德國歷史和文化的碎片，他遠在廣島博物館里的仰慕者關心的只有廣島精神。比方說，荒木高子[[4]](#_4_Araki_Takako_1921_______Ri_Be)的陶瓷書——頗有基弗鉛質大部頭的風范——取名為《原子彈圣經》，希伯來語字符經過烈火的炙烤。除此之外，還有一面絲綢屏風（基弗從不使用絲綢），名為《1945年8月6日》，創作者是上野泰郎[[5]](#_5_Ueno_Yasuo_1926____2005__Ri_B)。作品展現的是身處死亡陣痛中的人類，主色調為紅色，佐以金色點綴。

所有這些作品都缺乏一種對1945年8月6日原爆以外廣闊世界的認知。廣島完全是孤立的。展品名冊編撰者之一、美術教授桑原住雄（Kuwabara Sumio）留意到了這點，他援引了香月泰男[[6]](#_6_Kazuki_Yasuo_1911____1974__Ri)的話。香月以西伯利亞日本戰俘為主題的畫作震撼人心，但是并未被廣島博物館收錄在內。他的作品是日本國內唯一能夠在思想深度上與基弗比肩的。香月自己曾是戰俘，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這沒有讓他顧影自憐，相反，他色調黑暗、幾乎完全抽象的作品——舉例而言，其中有幾幅畫是用掌印所作，就像留在刑訊室墻上的血手印——讓人對殘忍和苦難的想象遠遠凌駕于具體事件之上。在去往西伯利亞某戰俘營的路上，香月看到一具血淋淋的尸體。這是一名日本兵的尸體，死者因為心狠手辣犯了眾怒，被群情激奮的中國百姓私刑處死。香月將這具“血紅的尸體”同原子彈受害者們“焦黑的尸體”進行了對比。

“關于焦黑色尸體的故事，”他說道，“在過去二十年里講了又講。廣島和奧斯維辛成了二戰的象征，這些無辜之人的慘死襯托出戰爭的普遍殘酷。焦黑的尸體讓日本人覺得自己才是戰爭的主要受害者。他們異口同聲地叫道：‘莫讓廣島重演！’搞得好像除了美國人扔的原子彈外，戰爭就沒有發生過一樣。對于戰爭真實本質和反戰運動真實基礎的深刻洞察，必須來自那具血紅的尸體。”

此言不虛。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認為宗教比喻和廣島宛如地獄般的景象（憑良心講，廣島遭遇的轟炸的確如同煉獄）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是日本人的顧影自憐。關于佛教地獄說發揮的作用，不少基督徒——尤其是敬虔派教徒——都會認同。他們相信，反思惡行會得到救贖。正視地獄，就能超越地獄。那些成功做到這點的人會在道德境界上得到升華，散播世界和平的福音將不再遙不可及。這種觀念為多數擁有普世抱負的宗教所共享，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

當然了，倘若地獄并非自己一手釀成，那么直視它會較為容易。日本人對廣島的受害者感同身受，而德國人卻不可能因為奧斯維辛生出受害者情結。日本人的罪孽被消解在全人類的罪孽中。這點讓日本人同時選擇了兩條路：一條是民族之路，即他們是原子彈唯一的受害者；另一條是普世之路，意指他們是廣島精神的倡導者。投身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主義者正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定義日本人的自我認同。話雖如此，我胸中依然存在疑問。這種態度是否真的同許多希望將奧斯維辛“內化于心”、并從“身份認同的視角”審視奧斯維辛的德國人，在立場上有著天壤之別？不管是日本人還是德國人，他們的民族性更多以歷史、道德和宗教精神為基礎，而非公民權

這種準宗教歷史觀的問題是，它使得以世俗化口吻探討歷史事件變得十分困難。對極端邪惡形成的印象獨一無二，且凌駕于人類解釋或理解力之上。對它的闡釋不僅狂妄自大，而且還不道德。假如說奧斯維辛屬于這種情況，那么廣島更是如此。諷刺之處在于除非一個人信奉希特勒殺氣騰騰的意識形態，否則奧斯維辛便不可能翻案，但廣島與之不同，對其進行核毀滅的理由最起碼也是可以公開付諸辯論的。原子彈也許拯救了生命，也許縮短了戰爭進程但此類論點與廣島精神格格不入。

1992年7月，聯合國裁軍大會在廣島召開。這是日本人經年游說的結果，他們希望能在“世界第一個遭受核打擊的城市”舉辦這一年會。從表面上看，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直到某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捅了簍子，拋出廣島原爆“結束了二戰，并拯救了一百萬日本人的生命”的高論。他還補充道，這一事件的恐怖程度有助于避免核戰爭。由此可見，廣島和長崎的滅頂之災實際上又拯救了上百萬人的生命。日本人聞之怒不可遏，報紙社論紛紛討伐這位教授鞭笞他不了解受害者的立場。《朝日新聞》“再次感到氣憤難平”評論說“除非美國擺脫此類看法”，否則它將遭到無核國家的強烈反對。[(48)](#_48_1)

《朝日新聞》繼續寫道，撇開這一風波，大會應當說是圓滿成功的，因為與會者——當中不少人都是生平第一次造訪廣島——“無不對和平紀念博物館里的展品和遺跡表達了震驚之情”。他們還一道“合唱了《為廣島祈福》”。只有英國作家阿蘭·布斯（Alan Booth）在英文版《朝日新聞》里點評此事時，指出祈禱、儀式和不謀而合的觀點并非大會通常的目的所在。[(49)](#_49_1)

\*\*\*\*\*

在廣島，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護著，人們堅稱他們是無辜的。然而，在日本對外戰爭史上，廣島根本談不上無辜。1894年，日本同中國打響“甲午戰爭”時，部隊正是從廣島出發、開赴前線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揮部搬到了廣島。這座城市因此變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戰爭則讓它更加富庶。廣島一度還成為軍事行動的中樞。正如《廣島和平讀本》以簡明扼要的文字所闡明的那樣：“作為軍事重鎮的廣島固若金湯，得益于明治和大正[[7]](#_7_Ri_Ben_Di_123Dai_Tian_Huang_J)時期連綿不絕的戰爭和事件，人口越來越多，城市也益發呈現出一派繁榮氣象。”在遭到核打擊時，廣島是帝國軍隊第二大本營（第一在東京）。簡言之，這里遍地都是軍人。

井伏鱒二的小說《黑雨》是取材自原爆的少數幾部文學杰作之一，作品背景設為軍國主義和政治專制。[(50)](#_50_1)這本書在開篇有一段場景描寫，地點是距原爆中心不遠處的一座橋梁。爆炸前不久，初中生被勒令聆聽軍隊訓話，高唱愛國歌曲。小說末尾處，在作者一遍遍描繪了原爆及其留下的慘象后，廣島市知事令軍民繼續戰斗：“廣島市民們——損失也許慘重，但這就是戰爭！”

廣島市民的確是受害者，但兇手基本上是他們自己的軍事領導人。然而，1987年，當廣島本地一伙和平活動人士向市政府請愿，希望把日本侵略歷史納入和平紀念館展覽內容時，這個要求被拒絕了。之所以發起設立“侵略者一角”的吁請，是受到了大阪初中生的激勵。學生們要求和平博物館館員對日本戰爭責任作出解釋，這讓后者臉上無光。同上百萬人一樣（包括每年六萬名兒童），他們被人領著，參觀了原爆留下的恐怖遺物：在高溫中扭曲變形的瓶子蘑菇云的照片、衣物碎片、放射線在門前階梯上留下的奇怪痕跡還有與真人一樣大小的靜物人像：一個個面目全非的人艱難地穿過廢墟，液化的皮膚就像熔化的蠟一樣滴垂。

估計是因為受到了老師的鼓勵，大阪初中生希望看到的可不只這個恐怖之屋。他們想要知道在此之前發生了什么。同時，他們還要求官方承認某些在原爆中遇難的朝鮮受害者曾身為奴工這一事實（大阪和京都、廣島一樣，至今仍有大批朝鮮僑民）。這兩個要求都被拒絕了。于是廣島本地人——多為基督徒、反核活動家，或參與幫助被歧視的少數民族——成立了一個名為“和平聯系”的團體自然而然，這個團體遭到了右翼民族主義組織，譬如“日本愛國黨的反對。后者在和平公園周圍舉行集會，用卡車上的車載擴音喇叭高聲播放愛國歌曲。愛國者似乎占了上風。據某位和平活動家的說法，廣島市政府對“侵略者一角”這個建議持反對意見。

這件事有諸多諷刺意味，其一在于，反核活動家認為原爆是一項罪行，但右翼反對派中的一員卻不這么看。“憂思與國家修復協會主席前田和良（Maeda Kazuyoshi）認為，原爆拯救了日本，使其未被完全摧毀。但是他堅稱，戰爭責任不應盡數算在日本頭上。這場戰爭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支而已，他說。

我向和平紀念館館長川本義隆（Kawamoto Yoshitaka）詢問為何設立“侵略者一角”的建議被否決了。川本是個市政官僚，為人彬彬有禮，穿著一套藍色嗶嘰西服。他沖我耐心地笑笑，說道：“我們這兒沒法搞這種東西，侵略者在東京。我們唯一的目標是展示發生在1945年8月6日的事。”

在同他交談的過程中，川本在普世性命題（“人類”、“世界和平”和具體國家維度之間來回切換。我感到，他在向外國參觀者介紹日本民族性格一事上輕車熟路。他告訴我，日本人悲傷時會縱聲大笑，日本人和彼此交流時不必開口說話，日本人只會從主觀視角思考問題，日本人懂得“物哀”，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那么日本年輕人是不是也這樣呢？我追問。

“年輕一代再也不懂隱忍的藝術了，”他說道，“而且他們不了解我們當時的生活狀態。您瞧，他們跑到這兒來跟我說，日本人也犯有戰爭罪行，但他們不明白自己在說什么，只是重復左派老師的話而已。”

川本接著說道，要在年輕人能理解的層面上解釋過去，這點十分重要。現在的年輕人不讀書，所以你必須給他們提供視覺信息。嗯，對，但除了原爆外，難道不該給他們講講戰爭史么？那當然，那當然，他回答，但這不是本館的使命。那它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追問。

他笑了笑，覺得自己可以松口氣了。“您瞧，這座博物館其實不能算是一座博物館，建造它的幸存者是想把這兒變成一個緬懷罹難者、為世界和平祈福的地方。人類必須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就是廣島必須堅守的原因。我們必須回歸到事物的根本，必須思考人類團結和世界和平。要不然，我們最后只會為歷史爭得不可開交。”

戰爭的歷史，或者說任何歷史，的確都與廣島精神無涉。這也就是為什么奧斯維辛是日本官方唯一允許拿來和廣島作對比的事件。其余所有事都太有爭議了，與“歷史長河”的關聯又太緊密。1980年代末，吳港市知事曾提議在廣島和吳港之間的某個小鎮建造一座奧斯維辛紀念堂。廣島知事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反戰市民團體也不反對，但是他們堅持要求把建造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作為一大附帶條件納入到這個項目中來。方案悄無聲息地流產了。

不過，距離廣島不遠的一個地方——乘火車的話大概要一個半小時車程，輪渡的話四十分鐘可到——則提醒世人日本歷史還有另一面，與1945年8月6日所發生的一切無關的另一面。大久野島是瀨戶內海上的一個小島。一下渡輪，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成群的兔子。它們在整潔的小徑和清新的草坪上奔來竄去，就像點綴在自然風景之間的一簇簇白色絨毛。這些兔子很溫順，肯給人摸。島上除了一座外觀看似醫院的大酒店、幾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建筑遺跡、一門與日本本島隔海相望的舊式炮臺外，就沒什么其他景物了。防波堤附近有一棟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名為“大久野島毒氣博物館”。

那些溫順的兔子是實驗室動物所繁衍的后代，島上的毒氣工廠用它們來試驗芥子氣等致命毒劑。這是日本帝國時期規模最大的毒氣工廠。戰時曾有五千多名工人在此工作，不少是婦女和學童。大約一千六百人因接觸氫氰酸、神經毒氣和路易氏（lewisite）等毒氣而喪命，一些人終身致殘。中國官方的資料聲稱，有多達八萬余名中國人成為這座工廠所制毒氣的犧牲品。日本軍方高度重視該島的保密工作，以至于它索性從日本地圖上消失了。

戰后，這一切鮮為人知。美國人于1945年登陸后，拿走了數據資料，將大量毒氣倒進大海，然后一把火燒了工廠。島上酒店的位置過去正是工廠主車間所在地。當年的發電機和部分儲藏室的遺跡依然能一睹究竟。只有到了1980年代，一位名叫吉見義明的年輕日本歷史學教授在美軍檔案里挖出一份報告后，世人才知道，原來日本人在島上及周邊地區藏匿了一萬五千噸化學武器。另外，廣島地底下還埋藏著一個重達兩百公斤的芥子氣貯藏罐。

工廠工人中的生還者——不少患有慢性肺病——在1950年代曾懇請官方承認他們經歷的苦難，但政府予以拒絕。如果政府給工人發放賠償金的話，等于正式承認日軍從事了非法行為。有關化學戰的只言片語剛溜進日本學校教科書中，文部科學省便迅速將其刪掉了。

但是，對于毒氣工廠的記憶從未徹底掩蓋。1975年，那些能夠證明自己的確遭受過毒氣侵害的生還者終于得到了些許賠償。1985年，政府為戰時死在島上的工人立了一尊小型紀念碑。1988年，經過生還者的努力，另一座小型博物館落成了，借博物館向導的話來講，其旨在“向子孫后代傳遞歷史真相”。

說是博物館，其實只有一間展廳，館長是身材矮小敦實的村上初一（Murakami Hatsuichi）。他的體格看著十分強健，飽經錘煉，像是當過職業拳手。1940年，十四歲的村上開始為工廠干活，一開始是門衛，薪水頗豐。“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他一心想幫助日本打贏戰爭，這也是在部隊提干的好機會。村上帶著我輾轉在邪惡的展品之間：一匹戴著防毒面具的木馬；毒氣彈受害者的照片，他們的皮膚因為傷口和膿腫潰爛已經不成人樣；老式毒氣罐；女學生在工廠空地上練習劍道的素描；陸軍軍官在陽光下笑容滿面的集體照。

村上的解說很實事求是。他既沒有布道說教，也沒有滿口仁義道德。他對解釋日本人的國民性格興趣寥寥，給我的印象是為人很實誠。他告訴我，如果不是因為看過從美國帶回來的資料的話，他是不可能對這個地方的一草一木記得那么清楚的。我詢問他這座博物館的用途。他說：“在喊出‘永不再戰’的口號前，我希望人們見識一下戰爭的真面目。如果光從受害者的角度審視過去，只會助長仇恨。”

他如何看待廣島和平博物館？“在廣島博物館，人很容易產生受害者情緒，”他告訴我，“但我們必須認識到自己還是侵略者。我們被教育要為國而戰，我們給國家造毒氣，我們活著是為了戰斗。打贏這場戰爭是我們唯一的目標。”村上看著越來越像職業拳手，他的眼睛瞇縫起來，一拳砸在自己的手心里。“你瞧，”他說，“你和別人打架的時候，會對他連踢帶打，但對手也會還擊。最終，一方會取勝。這種事要怎么去記才好呢？是記得自己被踹過，還是我們挑事在先？如果不思考這個問題，和平就無從談起。”

翌日，在廣島市內閑逛時，我思量著村上的話。在被小學生問起對和平的看法時，他的這番話并未讓我內心的尷尬有所減輕。日本人在廣島地下埋了毒氣的事實也不能讓原子彈的殘酷性減色多少。但這一切讓和平公園及其全部圣跡變得更具歷史縱深感，而且從上帝手中接過了歷史，放在了會犯錯的人類手里。

[[1]盧爾德（Lourdes）位于法國南部，接近西班牙邊界，具有很濃厚的宗教氛圍，經常在宗教節日，譬如萬圣節、復活節和朝圣期間舉辦各種游行和慶祝活動。傳說盧爾德的天然圣水可治疑難雜癥，引得游客紛至沓來。](#_1_7)

[[2]Leni Riefenstahl（1902——2003），納粹德國著名女導演，曾拍攝《意志的勝利》這部宣傳法西斯主義的登峰造極之作。](#_2_6)

[[3]Anselm Kiefer（1945——　），德國畫家、雕塑家，德國新表現主義代表人物之一。](#_3_5)

[[4]Araki Takako（1921——　），日本著名陶藝家。](#_4_5)

[[5]Ueno Yasuo（1926——2005），日本畫家、多摩美術大學教授，日本美術家聯盟理事長](#_5_4)

[[6]Kazuki Yasuo（1911——1974），日本著名畫家。](#_6_3)

[[7]日本第123代天皇嘉仁在位時期（1912——1926年）的年號。](#_7_3)

## 第五章 南京

南京暴行，亦稱南京大屠殺，發生在日本陸軍1937年12月中旬攻占這座城市之后，距離日軍全面進攻中國只過去了不到半年時間。南京作為國民政府首都，是侵華戰爭中最大的斬獲。南京陷落的消息一傳到日本，便登上了報紙頭版頭條的位置，日本國內更是一片歡慶。在長達六周的時間里，日軍軍官縱容他們的手下燒殺搶掠，為所欲為。具體死了多少人并無準確數字，但少說有上萬甚至是幾十萬（中方說法是死了三十萬）中國軍民——當中有不少還是從其他城市逃至南京的難民——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下。數以千計的年齡從九歲到七十五歲的婦女慘遭強奸后被砍斷手足，多難逃一死。

但光憑數字還不足以反映出南京大屠殺的野蠻和殘忍，同樣的悲劇在中國許多城鎮和農村里一再上演。數字也無法解釋為何暴行會得到縱容。是為了故意恫嚇中國人，好讓他們屈服？軍官的參與似乎說明了有這層因素。但也有另一種可能。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在天寒地凍的冬季一路廝殺，卻領不到像樣的軍餉，吃不飽飯，對他們不加約束或許算是一種犒賞。再或者，這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一支農民軍隊失去控制？或者如許多日本人堅稱的那樣，是戰爭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日期間，有人送給我一本名為《南京暴行》的小冊子。盡管這本冊子是用日語寫的，標題卻叫“aturoshitees”，是英語單詞暴行atrocities的音譯，就好像找不到對應的日語一樣。實際上，日語里有很多表示殘忍、暴力、殺戮或大屠殺的詞匯。然而，“暴行這個詞反映的不僅僅是戰爭不可避免的殘酷性。暴行是一種存心施暴的罪惡，不僅違反法律，也違背人倫綱常。這倒不是說日本人不具備這種綱常，或者他們在道德上無法理解這一概念。可是，“暴行同“人權”、“女權主義”、“戰爭罪”類似，是從西方舶來的現代詞匯在右翼民族主義者看來，這個詞有左翼色彩，有顛覆性，甚至可以說反日。

編輯并出版這本冊子的是一群中學教師，他們曾造訪南京，為的是發掘更多有關大屠殺的史料。小冊子里包含了中國目擊者的供述、主刑場的地圖，以及陳列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的部分照片雖然日本人熱愛攝影，但他們并未留下大量記錄自身暴行的視覺檔案。日軍的查禁制度很嚴，但就已有的相片和錄像資料（多為西方傳教士所攝）來看，足以讓人對當時情況形成大致印象。這些照片當中，部分是日本攝影師拍的，部分出自中國或外國目擊者之手照片里的中國人有的被用作刺殺訓練，有的被機槍子彈射中后跌入土坑；驚恐的女人在稻田里抱緊赤裸的身子，想要遮住她們的私處有揮刀取人首級的日本兵和長江邊上堆積如山的尸體；有些女性死者的陰部還被塞進了竹簽。

這些照片取自新聞紀錄片，其中一些被貝納爾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用在了他執導的電影《末代皇帝》（Th Last Emperor，1987年）中。影片在日本上映時，日本發片方松竹映畫決定在不告知導演的情況下私自刪除這些鏡頭。貝托魯奇發現后，發片方辯解說是影片的英國制片方要求刪節——因為發片方已經料到，英國制片人恐怕會覺得這些場景“太過毛骨悚然，日本人難以接受”。貝托魯奇和他的英國制片人勃然大怒，恢復了被刪掉的鏡頭，松竹映畫隨后為這一“巨大誤解”致歉。

沒有證據顯示發片方是在受到政府或任何人的施壓才進行了刪改。可信度最高的一種解釋是，他們這么做是為了避免產生負面宣傳效果。極右翼組織可不好惹。況且，鑒于身陷爭議在日本永遠都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有時甚至意味著人身風險，所以要探討某些可能會招致不必要注意的問題便需要一定的勇氣。

南京大屠殺正是這樣一個問題，它已成為日本在亞洲戰爭中野蠻行徑的首要象征。在東京戰爭罪審判過程中，南京大屠殺所激起的反響可同紐倫堡審判中的奧斯維辛相比。而且作為一種象征，它和奧斯維辛、廣島原爆一樣，很容易被神化或被曲解。

在日本的學校，有關此事的爭議被官方以沉默的方式壓了下去。一本典型的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的描述充其量如下：“（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此外附加一條腳注進行解釋：“據報道，當時日軍殺死了包括平民在內的許多中國人，日本也因此遭到了國際輿論的批評。”這就完了，但即便這點只言片語，也讓一些保守派官僚和政客難以接受，他們希望徹底刪除這些段落。

因此，當中學老師、《南京暴行》編輯之一的森正孝（Mori Masataka）給學生們放映了一部以大屠殺為題的紀錄片后，他們都驚呆了。森老師讓學生們寫下觀后感，得到的反饋高度雷同。比方說這里有篇文章，作者是十三歲的女孩律子，她是這么寫的：“說到戰爭，我能聯想到的一直是廣島和長崎，但是核打擊發生在1940年后。在這之前，日本做的事要壞多了。看著錄像，這一切仿佛不是真的。以前我只知道日本是戰敗方，但我們日本人務必要了解1940年前發生了什么。在看這部錄像時，對我靈魂觸動最大的是當中國人被殺害時，日本兵卻還在哈哈大笑。他們怎么笑得出來？我沒法理解那時的日本人是什么心態……”

學生們生平第一次知道原來日本人還是侵略者，老師要的就是這種震撼人心的效果。森和幾乎所有投身和平教育的教師一樣擁有左派思想。盡管他能寄希望于曾幾何時如日中天的日本教師工會中普通成員的同情，但鮮有人像他那樣熱衷此事。他告訴我，多數同事倒也不唱反調，只是無動于衷罷了。大多數人都選擇不去招惹是非。森的錄像和小冊子在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教師中間秘密傳播，有別于文部省審定的學校教科書中避實就虛、輕描淡寫的官方歷史觀發出了另一種聲音。[(51)](#_51_1)

這些書反映了一種出于必要而有所簡化的政治觀點。日本人是“侵略者”，“入侵”中國，他們的行為“既罪惡又殘暴”。中國人則要么全是“英勇的抵抗者”，要么是“無辜的受害者”。在一本宣傳冊里，森正孝記錄了一次南京之行，這次經歷讓他“感到盡管痛苦但有必要從侵略者角度重新審視歷史”。這也成了他要求學生做的事：以侵略者視角取代日本人的受害者情結。

有個叫泰子（Yasuko）的十四歲女生（在1991年）表示：“我們常聽聞納粹使用恐怖手段殺死他們的受害者，但日本人一樣惡貫滿盈。不然那些日本兵在砍下中國人頭顱的時候，臉上怎么還會獰笑？他們在殺人，居然還笑得出來？看到那些插在竹竿上的人頭我真是不忍直視……”

這部影像資料的主要目的并非為了還原歷史。顯而易見，“天皇體制”下窮兵黷武的種族沙文主義被歸結為這場戰爭和暴行發生的原因，但給森正孝的學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兵臉上的獰笑官方在對待過去態度上的躲躲閃閃受到了一幕邪惡景象的挑戰，作惡者是“當時的日本人”——學生的父輩和祖輩——而且還面帶笑容。用他們老師的話來說，通過思索“南京地獄”的成因，并通過身份認同的視角審視歷史（侵略者的身份），學生可以“創造明天的歷史，與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攜起手來”。

如上文所述，這是一種政治觀念，但森的態度同時也是對露絲·本尼迪克特所謂的基督教“罪文化”與儒家“恥文化”之間區別的質疑。戰時，為了幫助美軍情報官了解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她寫了《菊與刀》，并在書中對二者作了區分。[(52)](#_52_1)在本尼迪克特看來，“顧名思義，一個主張絕對道德標準并依賴人類形成良知的社會就是一種罪文化……”但在“另一種文化中，恥感是主要的懲戒手段。與我們期待的相反，人們并不會為一些行徑自感有罪，他們有的只是懊悔”。然而，“這種懊悔不像罪感那樣可以通過懺悔和贖罪得到緩解……”，“某人哪怕是向聆聽者坦白了他的過錯，也不會感到寬慰。只要他的劣跡‘不鬧得滿世界都知道’，就沒必要心神不寧，因而懺悔在他眼里只能是自尋煩惱”。

這是一種對人類行為機械式的看法，具有典型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家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論地說這種看法就是錯誤的，但其解釋力充其量只能說十分有限：因為例外實在是太多了，有太多的德國人連一丁點兒懺悔念頭都不曾動過；也有太多像森正孝這樣的日本人一心想要公開他們國家的“罪孽”，他們的努力顯然是一種贖罪的舉動。這也正是他們前往中國和東南亞并向昔日受害者道歉的原因。不管怎么說，罪感和恥感并不像露絲·本尼迪克特所說的那樣容易區分。部分德國人身上那種夸張的親猶主義是出于個人罪感呢，還是民族恥感？這同在華旅游的日本老人跟每個中國人都熱情地打招呼，好像老友重逢一樣，又有什么區別？況且，米切利希夫婦在《論無法哀悼》一書中難道不曾提過，“否定的過程會以同樣的方式，延伸至罪感、哀感和恥感中”么？這對學術伉儷在1950年代評價德國人時寫道，許多時候人們供認過去，“只是為了拿別人的罪孽來抵消自己的罪孽。據稱，許多慘劇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敵人動手在先，有必要作出回應”。不少日本人過去操持的正是這番論調，至今依然如此。而這也正是森正孝堅持要學生從侵略者角度看待過去的用意。

孩子們的心里自然是久久不能平靜。伴隨極端暴力一起出現的戲謔元素總是讓人格外震驚。黨衛隊看守喜歡管常規拷打集中營囚犯叫“找樂子”；逼迫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人參加足以致命的體育鍛煉是“找樂子”；讓拉比騎在各自背上，再將他們毆打致死也是“找樂子”。當受害者不僅要被肉體消滅，還得蒙受羞辱之苦時殺戮就融入了戲謔的元素。在折磨和殺戮之事上別出心裁，本身就成了某種娛樂。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殺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竟然是一場殺人競賽，恐怕絕非巧合。這并非最駭人聽聞的暴行，但有著一切能激發想象力的虛構元素。這是一則關于無法無天和跋扈恣睢的故事。事情過去四十多年后，日本國內圍繞其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兩位年輕的日本軍官N中尉和M中尉（譯注：即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丙級戰犯）在進入南京城途中決定比試劍法：誰率先砍下一百個中國人的頭顱，誰就是贏家。于是，兩人一路砍殺，并割取受害者的首級作為戰利品，儼然一副真正武士的姿態。最終，M中尉的戰績是一百零六個人頭，N中尉則斬獲了一百零五個。

這則故事登上了東京一家主要報紙的版面，標題頗為惹眼：“誰先實現‘百人斬’！兩名中尉均聲稱已砍下八十個人頭。”[(53)](#_53_1)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藏的一張照片里，這對朋友樂呵呵的，神色富有朝氣，精神飽滿。N中尉在報道里吹噓自己連砍五十六顆人頭都沒把祖傳武士刀砍鈍。緊挨著的一篇報道標題如下：“快速投球取得進步！”刊發此文時，諸如棒球術語這種“危險的”美國玩意兒尚未被政府審查員取締。

后來，回到日本后，M中尉改口了。在就讀過的高中講話時他聲稱自己實際上只在實戰中砍下四五個人的頭顱，至于其他的么……“我軍攻占南京后，我面朝溝渠站在一旁，然后叫支那戰俘朝前站。支那兵都很蠢，一個接一個來到溝渠前，我就干凈利落地砍下他們的腦袋。”[(54)](#_54_1)即使這番話也可能只是子虛烏有的自吹自擂一位參加過南京攻城戰的日本老兵告訴過我，這類故事多半都是瞎編的，或者至少也經過了日本記者的添油加醋，后者被勒令寫點英雄事跡的稿件，好鼓舞國內大后方軍民的士氣。

總之，“百人斬”的故事在日本很快被淡忘了，在中國卻成了戰爭野史的一部分。本多勝一是《朝日新聞》的名記者，他從他人處得知了南京“百人斬”的故事，并將其作為自己一系列文章的主題，文章于1981年結集成冊，文集取名為《中國之旅》。[(55)](#_55_1)這本書的出版啟發了森正孝，讓他對日本的對外戰爭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同時它也在右翼民族主義圈子里引發了一陣騷動。因在作品中對比日本人和猶太人而聞名遐邇的山本七平寫了一系列文章，抨擊本多的報道。一些在需要捍衛國家顏面時總會“挺身而出”的知識分子也紛紛加入討伐的行列。整件事由此發展成“南京辯論”（Nankin Ronso）。1984年，田中正明出版了一本駁斥本多的書，《“南京大屠殺”之虛構》。[(56)](#_56_1)

這些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被批評者冠以“goyo gakusha”的頭銜。這個詞很難譯，大意是指“御用學者”，負責為政府說好話。這些人（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也許并不為學界所尊崇，特別是史學界——多數歷史學家至今仍是熱忱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上電視，作評論，開講座，給通俗刊物撰稿，因此對公眾輿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專業的歷史學家，田中本人退休前是記者。

的確，圍繞日本對外戰爭的辯論幾乎完全發生在日本大學之外，參與者有記者、業余歷史學者、政治專欄作家、民權運動家，等等。這意味著，諸如田中正明之流所拋出的荒誕理論從沒有得到過專業歷史學家嚴肅的駁斥。原因之一是研究現代史的日本學者鳳毛麟角。直到戰爭結束前，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學者如果把現代史作為寫作內容的話，會被視為危險的顛覆分子，甚至是妖言惑眾之徒。畢竟，天皇體制具有神圣性。另一原因在于，現代史的學術地位并不高，其充滿變數、政治化，爭議不斷。1955年之前，東京大學連一位現代史專家都沒有。歷史在19世紀中葉就陷入了停滯。直到現在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依然認為，現代史還是留給記者去評議比較好

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觀點并不高明。田中等人指出，一個人不可能有體力砍掉一百個人的腦袋，同理，日軍也就不可能在幾周時間里虐殺十多萬人。另外，田中寫道，當時沒有一份日本報紙報道過屠殺，那怎么就突然出現在東京審判中了呢？他承認有些無辜平民在交火中喪生，但他們的死純屬意外。個別日本兵肯定有些粗野但那是“戰爭心理”造成的。總之，“田中們”的結論無一例外都是因為經過精心策劃，廣島原爆這一罪行要嚴重得多。“不像歐洲或中國”，田中寫道，“在整個日本歷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廣島那樣）有預謀、系統性殺戮的事件。”這是因為日本人同中國人或西方人相比，“價值觀不同”。

姑且暫時拋開日本人價值觀更復雜這一論點，田中關于系統性殺戮的觀點倒還值得關注。既然作為暴行符號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視為日本實施的“屠猶”，對二者加以區分就顯得很重要。但是就連“御用學者”的左派對手也認為這場屠殺并不具有系統性。舉例而言，歷史學家家永三郎就寫道，他不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規模之大和慘絕人寰，“但這或許是對淞滬抗戰中守軍激烈抵抗的一種報復”。[(57)](#_57_1)家永對正統保守派觀點的強烈批評態度無可指責，盡管這對他的學術生涯未必起到過什么幫助。但即便是他，也會為右翼衛道士的看法進行辯護：“在戰場上，人面臨生存的終極選擇，要么生，要么死盡管一些極端行徑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無法避免。然而在遠離戰場的危險和無奈后，若仍按照一項理性計劃實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惡的兇殘行為。我們的德國‘盟友’設立的奧斯維辛毒氣室以及我們的敵人美國投下的原子彈，都是理性暴行的經典案例。”

一些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論點。日本以外，海納·穆勒嘗言原子彈是“末日審判的科學替代品”[(58)](#_58_1) ——他還說過奧斯維辛是“啟蒙運動的終極階段”。在穆勒看來，對此的回應是讓戰爭變得人性化，用人與人的戰斗取代科學的殺戮，因為“戰爭是交流，戰爭是對話，戰爭是自由時間”。

另一種論調是，戰爭就是找樂子。如果拿“百人斬”來隱喻南京大屠殺的話，會讓其顯得更人性化，或者就算是暴行，起碼也比毒氣室和原子彈更人性化吧。好吧，也許是吧。南京屠城的元兇并不是某種足以毀滅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滅亡整個民族計劃的一個步驟。但問題在于：六個禮拜當中，對數以千計的女性先奸后殺，并屠戮上萬甚至沒準是數十萬手無寸鐵的人，還能算是戰爭白熱化時期的極端行為么？這個問題問得很有針對性，尤其是當意識形態被拿來為極端暴力開脫時，更是如此。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教唆下，侵略者殺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

這正是右翼民族主義者最恥于承認的一點，而左翼教師、活動家和學者則希望對此進行強調。森正孝的錄像帶一上來就是一幅象征日本皇家的菊花圖案和部隊行軍的軍靴聲。對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殺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國主義崇拜）所支撐的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象征，這也就是它成為戰后和平主義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場南京大屠殺，就有必要堅持《和平憲法》第九條。民族主義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認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認同，必須恢復天皇作為國家宗教領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條，以使日本重新成為一個具有合法性的軍事強國。鑒于這一原因，南京大屠殺或任何日本極端侵略行為的范例都必須被忽視、淡化和否認。

這一象征背后的政治立場高度分歧，盤根錯節，有礙于對1937年究竟發生了什么進行理性的歷史辯論。正方越是堅持日本有罪，反方就越是極力否認。南京辯論中的論調，特別是修正主義者的言論，既不理性，也與歷史無關。在《“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里，田中正明指控本多勝一和他供職的自由派報紙散播“敵國宣傳”。修正派的另一員干將渡邊升一為田中的書作序。和田中一樣，他也不是史學家，而是英語文學教授。渡邊抨擊本多宣揚“東京審判式的歷史觀”，不僅將罪名強加給“當時的日軍官兵，還對所有日本人潑臟水，甚至還牽連到我們未出世的子女”。

盡管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修正主義者只能算二流知識分子，但不能因此就將他們貶為令人不齒的神經病，因為和那些聲稱屠猶從未發生過的人不同，他們不屬于極端邊緣派。相反，他們有大量聽眾，還有如日中天的右翼政客撐腰。人氣頗高、能言善辯的政客石原慎太郎曾擔任內閣官房長官，他和渡邊升一合著過一本書，叫《日本可以說不》。在該書中，作者否認南京發生過任何不同尋常的事在接受《花花公子》雜志采訪時，石原被問到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問題他的回答如下：“人們都說日本在那兒搞了場大屠殺，但這不是事實而是中國人捏造的。玷污了日本的形象，純屬一派胡言。”

自由主義左派聞之自然是義憤填膺，向來是少數派的活動家決心有所行動，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無法容忍石原言論之京都市民協會”的組織，發表了一份宣傳冊，里面收錄了石原對社會輿論批評的回應，他的態度有所軟化：石原寫道，的確，有些臺灣人和朝鮮人在被迫赴日勞役后死于原爆，他們是無辜的受害者。但他認為沒必要對涉及南京的言論作出修改。日本人理應從自身的視角看待歷史，因為“如果我們依賴那些把歷史用作政治宣傳的外國人和他們提供的信息，我們就會處在喪失自我歷史觀的危險當中”。這又是通過身份認同審視歷史這一論點的翻版。

\*\*\*\*\*

石原慎太郎的言論是我選擇在1991年之夏造訪南京的一個原因。我下榻的賓館客房十分悶熱，賓館坐落在一條繁忙的林蔭路旁周圍一片區域曾是西方國家大使館和醫院所在地——1937年，這里是“安全區”。說是“安全區”，其實根本就不安全。日軍時不時會闖入，把男人趕到一起，搜尋藏匿其中的軍人。那些手上有繭的被當成農民或工人放走了。剩下的就被當成軍人帶走并處決，然后拋尸河中。

和我一同入住這家酒店的還有另一些人，大家來自各行各業，齊聚于此，是為了參加一場關于大屠殺的研討會。會議的兩位主辦人均是美籍華人，一位從商，一位在紐約當牙醫。當牙醫的出生在戰后，經商的1937年時尚未成年。據他們自己介紹，投身其中是出于愛國熱情。其余與會者中有來自中國各地的人：一名教師、一名律師、幾位大學教授，有意思的是還有一位身著便裝的警察。此外還有個美國老頭兒，他的父親在侵華戰爭期間在中國干過記者。他隨身帶著一塊大硬紙板，上面裱著反映日本暴行的舊報紙照片。老頭兒時不時會往身后瞄幾眼，要是看得上你的話，會給你展示他珍藏的這份寶貝。最后還有形形色色的日本團體，男女都有，不少是學校老師，其中就有森正孝。

會議規模本應更大，與會代表也更多，而且舉辦地原本安排在南京大學一個體面的會議廳內。但中國官方最后時刻變卦了，決定不予承辦。反正兩個美籍華人是這么跟我們說的。據猜測，臨時變更地點的原因是日本首相突然訪華，這時候開會討論日本戰爭罪行顯得不合時宜。但是熱心人士聚在一塊兒開場非正義會議，似乎還是可以的。或許，稍微刺激下日本人的良知不能算完全不合時宜吧。

我們喝著茶，等待南京大屠殺的部分幸存者到場，他們承諾會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日本人先是給我們拍照，接著又互相留影。他們多數年屆四旬，一些男的留著長發，女性則基本穿著牛仔褲，都不諳英語，也不會講中文。給他們做翻譯的是美籍華裔的牙醫，他在日本留過學。

耽擱了一陣子后，幸存者到了，三男一女。他們有著終生在戶外勞作的人那種黝黑如皮革的皮膚，身上一襲樸素的藍衣，男人戴著毛式的帽子。其中有個老頭兒一直面帶笑容，一口牙幾乎掉光了。他是第一個開講的。他說，日本人閑著無聊，于是朝河里扔手榴彈然后逼他把死魚撈上來。接著，他們用火把貼著他的皮膚把他“烤干”。他后來被機槍子彈射中，墜入河里，但活了下來。他說日本政府有責任對他作出賠償。

接下來輪到老太太講了，她卷起一只褲管，露出一道長長的棕褐色疤痕。幾個日本人紛紛湊近了拍照。老太太說道，她當時才兩歲被日本人用刺刀捅了。說到這兒，她再也說不下去，因為回憶太痛苦但她想強調一點，日本政府理應賠償她。

一個身材矮小、神態堅毅的老頭兒開口道，1937年時他十七歲日本兵把他從家里拖了出來，跟別人一起帶到鋸木廠。他被扒光衣服后跪倒在地。隨后，這些中國人一個接一個被人用斧子砍倒。他在脖子受到重創后居然設法逃脫，卻發現自己的家已經被付之一炬他給我們看了看傷疤，也說日本人應該賠償他。

森正孝開始提問，他想知道更多細節。這些事具體發生在什么時候？幾點鐘？地點在哪兒？他拿出一張地圖。當時天氣怎么樣？這些問題也許在一些人看來無關緊要，或有些刨根問底，但我很欽佩他的不依不饒。事實對他而言比展現情感更重要。

第四位幸存者告訴我們，他和另外大約五百個人被帶到河邊他的聲音聽著有些厭倦，似乎這個故事已經重復了太多遍。他目光迷離，但所講之事卻震撼人心。他說，騎著馬的日本軍官讓這五百來號人排成一行。他至今還記得在他們腰際上下晃動的武士刀。槍聲響了，岸邊的機槍開火。他伸手抱住弟弟，父親又站到兄弟倆身后擋住他們。結果，父親、弟弟和所有人都死了。見到還有口氣的日本兵就會補上一刀，確保不留活口。老頭兒靠裝死才活了下來足足三小時，他躺在血淋淋的尸堆里一動不動。日本人在他和其他死尸身上淋上汽油，就在點火前，他奮力爬了出來。

房間里一片死寂。一位日本女性用粉色手帕擦拭眼淚，另一位日籍教師——從名片來看，他是“緬懷亞太區域戰爭受害者并將其牢記在心論壇”的代表——站起身，用日語發言，再由人譯成中文。“我們希望指出，”他說道，“過去不能僅僅歸咎于軍國主義。如今，我們自己也負有責任。這就是我們決定每年8月15日造訪南京的原因。因為我們感到，只有在得到受害者在天之靈的鼓舞后，我們才有資格談論和平。聽了你們的講述，我們感到，中日兩國人民可以建立起友誼。聽了你們的故事，我們能夠一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一位來自南京的醫生閉上雙眼，唱起歌來，邊唱還邊和著節奏拍手。見到此舉，幸存者們笑了，別的中國人也跟著唱起來。這是一首老歌，紀念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自那時起開始吞并東北。一曲唱罷，人們的演講更富激情。一位中國律師在抨擊“日本軍國主義”之余，不忘宣示自己熱愛和平。他說，政客石原慎太郎冒犯了中國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我們希望所有熱愛和平的人都能支持我們，防范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這個寒酸的房間又熱又擠，空氣中繚繞著香煙味兒。幸存者迫不及待地想把傷疤露出來給人看，可我對看傷疤興趣索然。另外，盡管我也認同日本政府有責任正視過去，也認為其在賠償方面不夠大方，但我很反感自以為是的套話。這次會議的基調所傳遞的信息是，軍國主義這一問題不但依舊存在，或許還是日本先天性的痼疾。

我問一位幸存者，他是何時開始公開講述戰時經歷的，他回答說是1982年。為什么那時才開始講？他說是因為日本教科書風波。1982年，日本文部科學省修改教科書，否認日本對侵略戰爭負有責任。這一消息傳到中國后，中國政府挑選了南京大屠殺的生還者，讓他們站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在這之前，官方并未關注過他們。這里面是有原因的，但生還者并未提起：南京曾是蔣介石國民黨的老巢。“也許吧，”老頭兒說，“也許是有這么層政治因素，但我們不會因此感到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報紙的報道中，1982年的教科書風波緣于“侵略”（中國）一詞被修改為“挺進”，另外，涉及南京大屠殺的段落也被刪去了。這則報道其實是失實的。修改幾年前就有了，當時在日本就引發了爭議，但1982年教科書修改一事則完全是無中生有。保守派的《產經新聞》為此向讀者致歉，《朝日新聞》則沒有表示。

教科書問題為公開南京大屠殺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契機。中國政府決定專門建造一座博物館來紀念大屠殺。這是個充滿傷感的地方，位于一片貧窮的郊區，缺乏維護。博物館周邊的村莊自當年日軍踏足該地后，并未經歷太大的變化：用磚頭和泥土搭成的低矮平房，狹窄的小巷里，到處是在泥地上玩耍的小孩；人們騎著自行車去趕集，車龍頭下吊著被繩子拴住脖子的雞，不時發出咯咯的叫聲。據說這里曾發生過屠殺。有人告訴我，塵土飛揚的地下還埋著死人骨頭。

博物館是一棟混凝土建筑，外圍是一片巨大的假山園林。假山形狀各異，大小不同，上面刻著屠殺地點以及死難者人數。博物館正門上方用中英文刻著一行大字：“遇難人數：三十萬。”踏進室內映入眼簾的是走道兩旁長長的沙盤，外頭罩著玻璃。砂礫中散落著一些人骨和骷髏頭，據說是中國死難者的骸骨。從潮濕的天花板垂下的窗簾沾著灰塵和蜘蛛網。大廳里，一塊告示牌解釋說，建造該館的目的是“紀念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勝利”，“教育并鼓勵人們加倍努力，振興祖國；支持國家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中日兩國民間友好往來；為世界和平而奮斗”。

最有意思的展品當屬日軍官方文件，多為屠殺現場指揮官寄出的急件。上面的文字比模糊不清的暴行照片更能說明問題。日軍對大開殺戒最普遍一種表述是“清掃”和“收拾”，好比對猶太人的“特別處置”。館方播放了一段紀錄片，我之前曾經看過：尸體被扔進深坑，女人被開膛破肚，劊子手哈哈大笑。片子結束時屏幕上出現了一行字：“南京經歷了深重的災難，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走出博物館，我看到一位年輕的日本教師，他已經換上一身袈裟，正捻著佛珠，為死難者念經祈福。另一位老師在給他拍照。與他倆同行的一位女青年遞給我一本小冊子。這是份挺有意思的資料，里面摘錄了該團體其他成員過去造訪南京后的感言。我又一次發現，日本人流露出的情感與“恥文化”和“罪文化”之分往往并不吻合。即便使用的是恥辱（hazukashii）這個詞，含義和西方人的“罪責”（guilt）其實大同小異。

“我知道這么做很難，”某位日本參觀者寫道，“但當我們置身此地，我能感到中國人的悲傷和憤怒縈繞在心頭，他們經歷了如此難以名狀的暴行。一想到我是那些日本人的后代，就覺得心情壓抑。我很彷徨，但還是堅持認為，逝者是能說話的！南京的遇害者應該站起來，譴責我們日本人！因為我們在戰后沒有坦白過去的所作所為，所以也就無法在不自慚形穢的情況下構建一種嶄新的歷史觀。”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站是雨花臺，那里見證過三天三夜的激戰，曾經是某起最野蠻屠殺的發生地，如今屹立著一座外形丑陋的紀念碑。這是一根形似男性生殖器的巨塔，遠處是中華民族無產階級英雄兒女抗擊法西斯的雕塑群，當中用樹木作屏障。另外，因“百人斬”競賽而在中國戰爭罪法庭受審的M中尉和N中尉也是在這里被處決的。

M中尉的女兒在某份民族主義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這類雜志從未中斷過對東京審判歷史觀的攻訐。她認為，本多勝一無恥至極，敗壞了父親的名聲。他難道對遺屬們毫無憐憫之心么？她父親一心只期盼中日兩國能和平和諧地相處。現在謊言滿天飛，他在九泉之下怎能安寧？在和父親的靈魂“對話”后，導游招呼M小姐該出發了，大巴還在等著呢，是時候去往下一站了。“于是，”她寫道，“我挖了些紅土，包在手帕里疊好。我感到這泥土似乎吸收了父親的味道。”

\*\*\*\*\*

1985至1990年期間，也就是教科書風波之后至裕仁天皇病逝之前，日本發生了一件趣事。一小批日本帝國陸軍的老兵開始公開談論各自的戰爭經歷。他們的供述被人錄像后在私人舉辦的展覽上播放，比方說在東京，一座天主教堂內就舉辦過名為“紀念戰爭守望和平”的展覽。這些老頭兒都已是古稀或耄耋之年，多數軍銜是二等兵或低級軍官。也許是因為時日無多了，讓他們產生了一吐為快的念頭。抑或是因為他們大部分人的長官都已不在人世；保持沉默的壓力變小了，也無需過多考慮保存顏面的問題。同樣的事發生在裕仁天皇去世后；仿佛昔日的禁忌話題突然可以打開話匣子暢所欲言了。正如一位青年歷史學家所告訴我的，天皇是所有人的最高長官。

這些老兵中有個來自京都府的商人，名叫東史郎。他最初公開談論戰爭是在1987年，當時引起過轟動。他家所在的海濱小鎮一時迎來了各路電視臺攝制組和報紙記者。他們紛至沓來，為的就是記錄他的供述。右翼愛國主義者揚言要弄死他，他所在的老兵聯誼會也把他掃地出門。然而，他再也無法保持沉默了。他講啊講，講啊講，仿佛余生只為了這一目的而活著。東史郎在1937年冬曾到過南京。

1992年，他開著車，到京都府以東某個小鎮的車站接我。那一年東史郎八十一歲。身材魁梧的他長著一張國字臉，一頭黑發染得有些泛紫，這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對此他很得意，好幾次讓我猜他的年齡，我說大概六十五歲吧。我們駕車從車站駛往他的住所。一路上風光秀麗，稻田掩映在山巒之間。途中他突然打開副駕駛前的儲物倉，從里面拿出一個黃銅指套。“右翼分子沒準會輕舉妄動，我這是以防萬一。”說完把這個銅家伙戴在了手上。

東史郎的家是傳統的日式風格，地板是榻榻米，移門糊著紙屋里擺放著琳瑯滿目的中國藝術品。墻上掛著中式水墨畫，移門上飾有一位北京畫家的山水圖。據東史郎介紹，這些東西當中有一部分是某位中國高官相贈，算是答謝東史郎對他在日留學的兒子的照顧。

我們喝著東史郎太太沏的茶，他開始講述自己的一生。東史郎出生在這個濱海小鎮上，父親是個經營有方的生意人，打小家里就很寵他，過分驕縱使得他在讀書時就荒淫無度，經常拿著零花錢去逛當地的窯子。1937年應征入伍時，他身患性病。

軍旅生活很艱苦，但他從未質疑過參戰的理由。這是天皇的旨意，因此只要能獲得勝利，可以不擇手段。不過他對長官很反感，他們是“懦夫”，他說。在他眼里，沒有比罵人是懦夫更惡毒的了。他的排長是個姓森（Mori）的青年，畢業于軍校。森就是個懦夫，他雖然表面上一副耀武揚威的樣子，可心里怯戰得很。實際上，東史郎覺得自己除了和一個叫樋口（Higuchi）的工程系學生還挺談得來外，同其他戰友就沒什么共同話語了。樋口是排里唯一喜歡讀書、“腳上沒沾泥巴”的人。但樋口一天晚上被慌亂的自己人開槍誤殺了，東史郎抱著他，任由朋友的腦漿濺到腿上。

東史郎一直很喜歡讀書。他說，除了樋口外，他是排里唯一的讀書人。我問他在中國期間都讀了哪些書。“賽珍珠的《大地》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他答道。兩本書他都很喜歡。《我的奮斗》也喜歡么？沒錯。他崇拜希特勒，對從別處聽來的一個故事印象特別深刻。據說，德國軍人嚴禁強奸外族女性，生怕這么做會玷污日耳曼人的種族純潔性。不過，這對中國戰場上的日本兵可不成問題，東史郎說。

“是人就會有性欲，”他表示，“由于我有性病，所以從來沒和中國女人做過，但我確實偷看過她們的私處。我們總會命令她們脫掉褲子。要知道，她們都不穿內褲的。不過有的家伙只要一見到女人就會施暴。這么做本來也不算十惡不赦，但完事后他們還把人給殺了。你瞧，強奸是違反軍紀的，因此我們必須銷毀罪證。那些女人被性侵的時候還算是人，但被殺掉時，她們只是豬玀。我們心中沒有半點愧疚或罪惡感，要是有的話，也就不會這么干了。”

“只要一進村，我們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偷吃的，接著就是抓了花姑娘強奸，最后再把男男女女和小孩統統殺光，這樣可以保證他們不會溜出去找中國軍隊，報告我們的位置。不這么做的話，晚上就沒法睡安穩覺了。”

很明顯，南京大屠殺是無數小規模屠殺的“登峰造極之作”但是這種大開殺戒的背后并沒有種族滅絕意識形態的支持。雖然手法野蠻，但對于東史郎和他的戰友而言，野蠻就是戰爭法則。許多日本作家都反思過這一命題，甚至在戰時也不例外：普通人搖身一變，成了殘忍嗜血的兇徒。石川達三親眼目睹過南京大屠殺，并在1938年以此為題寫了《活著的士兵》這部中篇小說。書里有這樣一句話：“殺死敵軍士兵對于笠原軍曹而言，跟殺死一條鯉魚沒什么兩樣。”[(59)](#_59_1)

東史郎接著講道：“我印象中最慘的一件事，莫過于我們對一個老頭和他孫子所下的毒手。孩子被刺刀捅了，當爺爺的居然吸起他的血來，似乎是為了盡可能延長孫子的性命。我們看了一會兒然后把他倆都殺了。這一次，我依然不覺得有什么罪惡感，但心中卻漸生困惑。我有點犯糊涂了，因此決定記日記。我覺得這樣有利于保持思路清晰。”

南京本身——盡管日后他管這座城市叫“地獄演奏場”——對于東史郎而言并未留下多少印象，他說自己大部分時間都在打牌他所在的排偶爾會外出搜捕中國軍人，但自己從未參與之后的處決行動。我問他為什么，我想知道，為何有些日軍參與了大搜捕和大屠殺，而其他人卻沒有。他說這取決于各個排的指揮官，他的排長森是個懦夫。“你是說森縮手縮腳，不敢處決人么？這當然是好事啊。”東史郎哼了一聲。“嗯，也許是吧……”

不過他的一些朋友的確參與了屠殺。其中一個叫增田六助（Masuda Rokusuke）的人用機槍在長江邊處決了五百個人。1980年末，就在朋友病逝前不久，東史郎曾去醫院探望過他。增田擔心自己要下地獄了，東史郎則試著安慰朋友，說他只是執行命令，但增田還是確信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天堂。

在南京駐留沒多久，東史郎病了，后被遣送回國。他設法把日記藏在身邊，盡管類似的日記通常會被憲兵沒收。在日本休整期間，他把所記之事用更通暢的文字重新謄錄了一遍，想著將來有一天把筆記留給自己的子女。他那時依然堅信這場戰爭是正義的，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打贏。不過，他想留存一份檔案，以證明普通人也能“極盡兇殘之能事”。

這份資料被包了起來，存放在碗柜里，就這樣一直封存著，一晃已是1987年。東史郎后來共養育了五個子女，但沒有一個對父親的戰爭經歷表現過半點興趣。“家里從來不聊這個。”東史郎告訴我。他有個兄弟，也在中國服役，為人嗜酒，在我見到東史郎的前一天因酒駕死于車禍。他兄弟也從來不談論戰爭。那老戰友呢？我問道。他們是如何探討戰爭的呢？

“哦，”東史郎應了一聲，“我們不大談及戰爭。就算談，也是為其正名。因為中國人抵抗，所以我們不得不那么做，諸如此類。我們沒人感到心中有愧，這也包括我自己。”

東史郎給我看了幾張退伍老兵聯誼會的照片。老兵們歷年都會外出郊游，去不同的鄉村旅館度假，他們所站或所坐的位置嚴格遵循軍銜的高低。個頭矮小、看著弱不禁風的森坐在第一排中間。歷史最久遠的一張攝于1940年代初期，那時這些人還很年輕，外表都不修邊幅，留著板寸頭，一臉嚴肅的軍容，看著怪兇相的。最近的一張照片攝于1984年，已經不見了一些人的臉龐，剩下還健在的看著像是退休的銀行經理。

倘若不是因為京都府計劃建造一座新的戰爭博物館的話，東史郎的記憶、日記和一切有關他過去的事情無疑都將被遺忘。新博物館位于立命館大學內，館內工作人員在四處搜羅戰時日記，然后聽說了東史郎其人其事。塵封在碗柜里的日記才得以重見天日，并在拂去覆蓋在表面的灰塵后，被寄往立命館大學。這份史料的內容讓工作人員大開眼界，他們懇請東史郎出席一場新聞發布會。他同意了，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發布會選在他家召開，形式并非某種懺悔——沒有證據顯示東史郎害怕自己會下地獄；也并未傳遞任何政治訊息——東史郎不是反戰主義者，他只是講述自己在華期間的所見所聞，以及自己做過的壞事。

很快就傳來了反饋。東史郎被控有損昔日聯隊的榮譽，他所在的老兵聯誼會甚至威脅要“懲治”他。郵箱里寄來了恐嚇信——都是匿名信，要么在署名欄寫著“一位愛國的日本人”——揚言要宰了他。但也有一些民眾寫信實名表達對東史郎的支持。支持者讓他信心倍增，可人身威脅也讓他怒不可遏。“我一直相信這是場正義之戰。但這么多威脅、騷擾電話、恐嚇信讓我非常憤怒。我只是在陳述事實，可他們卻要制止我。我要是連實話都說不了，還不如死了算了！”

東史郎開始玩命似的就戰爭、軍事教育、天皇責任、東京軍事法庭審判等話題著書立說。他說，審判是件好事，但是日本人應該獲準設立自己的軍事法庭。天皇是個膽小鬼，最大的膽小鬼，因為他逃避罪責，東史郎如是說。令他尤其憤怒的是，一份名為《天皇的獨白》——記錄于1946年——的資料于1991年方才出版。書中顯示，天皇不僅對局勢一清二楚，好戰，還自私自利。東史郎說：“我們為他去打仗，我的朋友為他戰死，他卻連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天色不早了，我倆在榻榻米地板上席地而坐，享用晚餐。屋外的風景——松樹、稻田、遠山——都被籠罩在夜色下。東史郎給我倒了杯燙過的清酒，他越說情緒越激動。“他們把天皇變成了活神仙一個虛假的偶像，就好比伊朗的阿亞圖拉[[1]](#_1_Ayatollah_Yi_Si_Lan_Jiao_Shi)。因為我們對神圣的天皇篤信不疑，所以愿意為他做任何事，不管是殺人還是強奸，任何事。但是我知道他每天晚上也會操他的老婆，跟我們這些凡人一樣……”

他頓了頓，壓低了嗓音。“但你知道在日本我們不能這么說，就算今天也不能。在這個國家根本沒法說實話。”

他又一次講起朋友樋口的事來，完全忘記自己方才講過一遍。他描述唯一的好友是如何戰死的，腦漿如何濺了他一身，他當時又是何種心情。說到動情處，東史郎還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殺千刀的天皇……！”他罵道。

我們結伴返回我下榻的民宿，這是家典型的鄉間客棧，毗鄰小小的碼頭。我倆都喝高了，跌跌撞撞地走進去。民宿老板是個面容憂郁的大塊頭，他引著我倆去我的房間。但在這之前他想先給我們看樣東西。他的小舅子剛在屏風上作了幅畫，我們可真得看看。于是，我倆晃晃悠悠地站在一間寬敞的日式房間里，周圍都是用墨汁繪制的當地風景畫，有碼頭，有群山，也有海灣里的亂石，上面長著松樹。

“下面給你們看點有意思的，”老板說道，“看到那塊石頭了么？”我們點點頭。“看著很大，是吧？”我們又點點頭。“現在走到房間的對角處——接著走……”我們照辦了。“一下子就變小了，是吧？”他說，“這叫遠景。”

[[1]Ayatollah，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宗教領袖。](#_1_8)

# 第三部分

## 第六章 歷史站上審判席

斯圖加特

約瑟夫·施瓦姆貝格（Josef Schwammberger）的外表沒有一點能讓人聯想到他是個殺人狂。他皮膚蒼白，長著老人斑，顯示出其常年待在室內——就像公寓樓的門房大爺。他下身穿一條咖啡色棉長褲，上身套了件米黃色的休閑夾克，走起路來習慣性地拖著腳似乎蹬著一雙舊拖鞋，眼睛是那種呆板的灰色。1992年春他被判終身監禁，這一年他正好八十歲。

約瑟夫·施瓦姆貝格一案在斯圖加特的聯邦法院審理，這恐怕是德國國內最后一次審判納粹分子。施瓦姆貝格被指控要對至少三千名猶太人被害負責。但由于在世證人寥寥，證據又往往模棱兩可，他最終獲得的罪名只是親手殺害二十五人，以及在另外至少六百四十一人的遇害中充當幫兇。

以色列駐波恩大使旁聽了庭審，并借機提醒德國人，他們對過去負有集體責任。他告訴德國媒體，人們不能將歌德、席勒、巴赫和貝多芬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同納粹政權的恐怖行徑分隔開來。換言之，施瓦姆貝格是民族傳統的一部分，也是德國人身份認同馬賽克中的一塊。法庭外，新納粹青年抗議示威，宣稱德國戰爭罪行純屬猶太人的一派胡言。

施瓦姆貝格的納粹生涯可以算是“小有成就”。他于1912年出生在南蒂羅爾（South Tirol），1933年才加入納粹黨，因此也被歸入投機分子的行列，而不是早年就追隨該黨的信徒。1939年，作為黨衛隊低級軍官的他被派駐到克拉科夫[[1]](#_1_Krakow_Bo_Lan_Nan_Bu_Cheng_Sh)，擔任一個勞工營的負責人。勞工營在1942年關閉后，剩余的二百名勞工被射殺。他因此得到晉升，官至黨衛軍上士（Oberscharführer），負責管轄普熱梅希爾[[2]](#_2_Przemyl_Bo_Lan_Dong_Nan_Bu_Ch)的猶太區。每隔一段時間，該市部分居民就會被送去貝烏熱茨[[3]](#_3_Belzec_Mie_Jue_Ying__Wei_Yu_B)和奧斯維辛集中營。對于他這一級別的軍官，殘暴和幽默感集于一身并不稀奇：他養了條德國牧羊犬，起名叫王子（Prinz），除開經常放狗撲咬猶太囚犯外，他的另一件樂事是當著受害者家人的面殺了他們。

這么個劣跡斑斑的人在戰后的生活并不異于常人：憑借天主教神父的幫助，他逃往阿根廷，靠養蜂打發時光，在那兒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直到1990年才被引渡回德國，翌年開始受審。

施瓦姆貝格于法庭上的真正在場異常短暫；他人雖然在庭上，但魂兒似乎又不在。所有人——法官、律師、證人和庭審席上的聽眾——都在議論他，可他靜靜坐在那兒，偶爾會像條蜥蜴那樣努努嘴，但幾乎不曾開口說話，讓人無從知曉他到底在沒在聽。單薄嘴唇的臉上始終木無表情，即便當一位八十一歲的證人發言時亦是如此。證人向法庭講述自己和一些人試圖逃出隔離區后，遭到何種非人對待：逃跑者被命令仰面躺下，張開嘴，任憑烏克蘭看守朝他們嘴里撒尿。證人說，施瓦姆貝格覺得這特別好玩。

另一位證人、來自堪薩斯城的努斯鮑姆（Nussbaum）在兒孫們的陪同下出庭作證。努斯鮑姆過去是水管工，替施瓦姆貝格修繕在隔離區的房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施瓦姆貝格還救過他一命他本來是要和別人一起被送去奧斯維辛的，但施瓦姆貝格把他從人群里拽了出來。總得有人把這些運輸牲畜的火車車門給關上吧，而這人就是努斯鮑姆。他后來得知，其中一節車廂載著他全家人。

努斯鮑姆一直在期盼這一天的到來。他守口如瓶，從不向別人透露自己的心事，就連自己的兒子對此也一無所知。“法官大人，他講話時帶有濃重的波蘭口音，“我有太多故事可以講給您聽……比方說，在1942年的贖罪日，一位拉比堅持祈禱，不肯干重體力活結果被施瓦姆貝格一槍爆頭，還逼迫所有人目睹全過程。

努斯鮑姆的記憶似乎很清晰，情緒也很激動。法庭外，他告訴我們施瓦姆貝格是個畜生。“不，他比畜生還要壞。畜生相殘是為了活命。至于他，他，他，我沒法找到合適的詞來形容，他是個冷血殺手。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扯掉他的右手臂，提醒一句，不是要弄死他，只是扯掉他開槍殺人的右手，再安到他的左手上。”

法官和律師動身前往普熱梅希爾一睹究竟，他們測量了指揮官舊宅和據說是他行兇地之間的距離。他們需要驗證證人在法庭上的回憶是否準確。所有人都湊在猶太區地圖前，看努斯鮑姆用手一一指出過去的地標，一切依然牢記在心。就連施瓦姆貝格都難忍好奇心，移步到昔日水管工的身后，想看個究竟。

看完后，他退回到原來所站的位置。法官問施瓦姆貝格是否還認得出眼前這位證人。施瓦姆貝格的嘴動了動，法官示意他講出聲來。身旁的人聽到一句小聲的“不認識”（nein）。法官顯得有些不耐煩，問施瓦姆貝格怎么可能把所有證人都忘得一干二凈，他們倒是對他記得一清二楚呢。施瓦姆貝格喃喃道，記得他的人沒準多達五萬，但他怎么可能記得住五萬人呢。法官說自己只是想建立證人和被告之間的接觸。“我試著讓你開口，一些證人對你很熟悉。對了，他們中間有人過去還給你的狗梳過毛。”這句話讓施瓦姆貝格第一次有了活力，他粗嘎的嗓音顯示出其很久以前曾習慣于發號施令。他嚷道：“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狗交給陌生人照看？這完全不合邏輯！”

這出人意料的呵斥讓施瓦姆貝格的律師吃了一驚，他說自己的客戶已經累壞了，不能再接受盤問。他的心臟很虛弱，需要休息。法官翻了翻白眼，但還是宣布休庭。

我親眼目睹了這出迷你劇，場景平淡無奇。現代風格的法庭講究實用，幾乎完全沒有傳統司法權威的那些象征，比如假發套等英國法庭里常見的華而不實之物。庭審過程既不戲劇性，也沒有繁文縟節。檔案、測量結果和地圖才是最有分量的，而不是辯才。坐在旁聽席上的聽眾清一色都是德國高中生，他們是從巴特溫普芬（Bad Wimpfen）這一毗鄰海德堡的溫泉小鎮遠道而來的，領隊的是歷史老師、留著絡腮胡的“六八一代”伯恩特·韋茨卡（Bernd Wetzka）。

法庭外，努斯鮑姆老先生接受了美國記者的采訪。學生們圍住辯護律師，一個年齡與他們歷史老師相仿的人。他們不解，他怎能申請作無罪辯護。他們問律師，是否真的相信施瓦姆貝格無罪。律師答道，“信仰屬于教會。我的職責是確保當事人得到公正的審判，且證人沒說假話。”他解釋說，這很復雜，因為嫌犯的罪行發生在很久以前，并補充道，鑒于公共輿論，法官做出無罪判決要比有罪判定更需要勇氣。

少年們神色凝重地點點頭。韋茨卡哼了一聲，譏諷道：“是啊，我們的法官過去的確展現過這種勇氣，不是么？那些戰后沒有被清算的納粹法官又怎么說呢……”

學生中一個留著朋克頭的姑娘問，證人聲稱親眼所見之事有否可能只是道聽途說。律師剛開口，韋茨卡又哼了一聲，說證詞高度翔實，不應存疑。

這顯示出老師和學生之間有代溝。老師之所以生氣，是因為他自己的經歷不容許有質疑的余地。他后來告訴我，他的父母曾是納粹，他經常因跟他們聊起過去而發生爭執。父母堅持認為納粹時期并不只有壞事，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有關猶太人的故事有夸大之處這些辯解他都聽過，至今讓他氣不打一處來。他的學生則沒他那么感情用事，他們提的問題旨在理解庭審過程。施瓦姆貝格又不是他們的父親。

韋茨卡告訴我，這次庭審經歷對學生們意義重大。他們已經參觀過兩座原集中營，一座是納茨維勒——施特魯特霍夫（Natzweiler Struthof），一座是達豪（Dachau）。不過施瓦姆貝格案在他們心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納粹時期的歷史對他們而言已然很遙遠，只停留在書本上，但這起審判生動鮮活地還原了遙遠的事件，他說幾個月后，某位學生在校刊上發表了篇報道：“在聽到證人親口詳述他所犯下的罪行后，理解裁決就變得容易多了。”

毫無疑問的確如此，同樣毋庸置疑的是，審判對努斯鮑姆先生也是件好事。他的心事終于可以一吐為快了，這或許是種個人宣泄能看到起碼一位幸存者在德國法庭上控訴加害者，就已經很讓人動容了。但并非所有證人都和努斯鮑姆一樣堅強，有一個就因為受不了這種場面，心臟病發作，死在了法庭上。盡管如此，復仇的欲念還是得到了滿足，哪怕這只是邪惡海洋里濺起的一小朵浪花。或許正如西蒙·維森塔爾[[4]](#_4_Simon_Wiesenthal_1908____2005)希望的那樣，這會產生警示作用。總而言之雖然施瓦姆貝格晚景凄涼，但我們很難對他產生同情。

然而，坐在斯圖加特法院里的我卻感到不安，尤其是看到那些穿著花花綠綠的防風夾克、坐在旁聽席里的學生時。我的第一直覺是為西德教育喝彩，自1968年以來，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紐倫堡審判時學校停課，1963——1965年，法蘭克福舉行奧斯維辛審判時亦是如此。我想，這正中老師們的下懷，好讓學生聽聽過去發生了什么。但我疑竇漸生，正如信仰屬于教會，歷史教育必定屬于學校。當法庭被用作歷史課堂時，離走過場式審判的風險也就不遠了。也許走過場的審判會是很好的政治秀——盡管對此我亦抱有疑慮。然而，好的政治秀并不一定符合事實。

\*\*\*\*\*

就在施瓦姆貝格案公審四十四年前，另一位官階更高的德國人在紐倫堡出庭受審。恩斯特·馮·魏茨澤克（Ernst von Weiszacker）在德國征服歐洲大片疆域時擔任副外長。自1943年起，他成為駐梵蒂岡大使——這個職位當屬要害，因為德國人希望確保教皇對“最終解決方案”保持緘默。教皇倒沒讓他們失望，至于這是否可歸因于魏茨澤克的外交手腕則不得而知。他的兒子里夏德（Richard）日后成為聯邦德國總統，他比任何政客都更勤于談論德國罪行的包袱。

關于年輕的里夏德在紐倫堡參加戰爭罪審判留有一則故事。據說，他找到一個朋友，以最嚴肅的國防軍軍官的姿態，表示說應該沖擊法院，釋放囚犯。吃驚不已的朋友問為什么要這么干。據傳魏茨澤克是這么回答的，“這樣我們就能自己舉行審判了。”他的愿望過了許多年才得以實現，那時的德國法院終于可以對“小把戲們”提起公訴。但此時，年紀輕輕的他選擇加入父親的辯護團隊。

恩斯特·馮·魏茨澤克被控策劃發動侵略戰爭，并參與從各個被占領國家遣送猶太人。第一項指控被推翻了，但第二項指控成立。他曾經簽署一份文件，聲明外交部不反對有計劃地遣送猶太人。他的首席辯護律師赫爾穆特·貝克指出，魏茨澤克是老派的愛國主義者，在時局艱難的情況下已經盡其所能阻止納粹為非作歹，縱然終究無力回天。魏茨澤克只承認自己在上帝眼里有罪，盟軍無權遵照在紐倫堡起草的法律判他有罪。

1950年，貝克寫道，“很少有事情比戰爭罪審判更能阻礙德國國內形成真正的歷史自我認識。”[(60)](#_60_1)他堅信這一點。貝克的話應予以重視，因為他不是為納粹歷史辯護的右派衛道士，而是名聲在外的自由派。我去他位于柏林的辦公室拜訪，辦公室的一面墻上掛著精致的軍事圖片，另一面則有一幅以色列掛歷。

貝克并不反對舉行審判，但他相信，應該運用既有的德國法律而不是用類似反和平罪（包括準備、策劃或發動侵略戰爭）這樣具有追溯力的法律。他提到，斯大林派往紐倫堡軍事法庭的法官希望能夠澄清，需要譴責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侵略戰爭，而是具體的納粹侵略。蘇聯侵占波羅的海國家或波蘭部分領土就不能算是反和平罪。“你也好不到哪里去”（tu quoque），這一原則在探討戰爭罪時是被明文禁止的：比方說盟軍轟炸德累斯頓，或者1945年德意志人被驅逐出在中東歐的家園。這些行為都被認定和審判無關。

這樣做，是為了防止司法淪為笑柄，因為英國人贊成一不做二不休，不經審判就直接處決納粹領導人。他們擔心夜長夢多，漫長的審判也許會改變公眾輿論的倒向。拿一位英國外交官的話來講審判或許會被看成是“有預謀的勾當”。也有人擔心，國際法可能對很多罪行并不適用。如果為的就是報復，那何必把法律牽扯進去？直接做出如何懲治的政治決定豈不更好？坐在辦公室里，貝克管這叫“意大利式解決辦法”：“你在起初的六周里能殺多少人就殺多少人，接著把這茬兒拋之腦后：這么做不是很合乎法律，但考慮到清算要達成的目標，也還湊合……”他們的立場直到1945年5月才有所軟化，那時希特勒和戈培爾已經自殺，英國人方才同意對其余納粹領導人進行審判。

要程序正義還是以牙還牙，這個問題曾經困擾著古希臘的悲劇家。為了打破以暴制暴、以血還血的惡性循環，俄瑞斯忒斯（Orestes）必須為弒母罪行在雅典法庭受審。如若沒有正式審判復仇三女神（Furies）會繼續攪得生者不得安寧。

如果主審法官是德國人的話，或許可以避開報復這層因素。這在之前有先例，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一戰結束后，德國法庭被允許審判戰犯。雖然證據確鑿，但幾乎所有被告都被判無罪，而外國代表團成員則遭到了當地暴民的襲擾。另外，韋茨卡說的沒錯：德國法官和納粹政權曾經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很難指望他們會秉公執法，不偏不倚。因此，只有讓戰勝者來保障正義得以伸張。

問題在于，如何在不扭曲法律的前提下伸張正義，以及如何在不歪曲歷史的前提下讓戰勝方審判戰敗方。一種做法是，干脆就搞赤裸裸的勝利者正義，用軍事法庭審判昔日的敵人。這么做的好處是可以避免許多虛偽言行，并減少對日常生活中程序正義原則的傷害。但如果說目的是給德國人上一堂歷史課的話，那么軍事法庭就會遇到和民事法庭一樣的問題。而據當時的聲明來看，歷史教育無疑是戰爭罪審判的目標之一。

羅伯特·M.坎普納（Robert M. Kempner）是魏茨澤克一案的公訴人，美籍德裔的他寫道，“呈現了一大批重量級德方卷宗的審判，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歷史研討會。”紐倫堡審判的美方首席檢察官羅伯特·H.杰克遜（Robert H. Jackson），在同英國法官勞倫斯勛爵（Lord Justice Lawrence）對話時曾被問到，他覺得審判應達到何種目的。[(61)](#_61_1)杰克遜回答說，是為了向世界證明德國的戰爭行徑既無理也違法，同時向德國人民表明，這種行徑理應得到嚴厲的懲罰，讓他們做好準備。

這樣說來，紐倫堡審判既是歷史教訓，也是對全體德國人的象征性懲罰——這條關乎道德的歷史教訓被包裹在所有彰顯程序正義的儀式性表象之中。審判是人類——或至少是戰勝國國民——所能獲得的最接近“天道”的結果。部分德國作家無疑有這種感覺。一些人對此熱情歡迎的勁頭，可以同正在改過自新、滿心虔誠的罪人相媲美。他們是1968年“彷徨失措”（betroffen）一代的先驅，全都是左派，有些還是共產黨。

舉例而言，小說家埃里克·里格（Erik Reger）認為：“紐倫堡軍事法庭越是不用正式法律的外衣掩飾自己，其政治元素就越能光明正大地得到表達，它在歷史面前得到的評價就越正面，越啟發人心。另外，審判也不會在做作的象征主義氛圍下進行，而是在充滿道德力量的氛圍下進行，借助道德力量克服邪惡。”[(62)](#_62_1)

《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記者W. E. 聚斯金德——據我所知他不是共產黨——把審判描繪為“Ur-Prozess，地球上從未見過的審判，因此是一個真正的歷史性時刻”。[(63)](#_63_1)

從這些字里行間可以得知，法律、政治和宗教已被混為一談紐倫堡成了一場道德劇，戈林、卡爾滕布倫納[[5]](#_5_Ernst_Kaltenbrunner_1903____1)、凱特爾[[6]](#_6_Wilhelm_Keitel_1882____1946)等人則在其中擔任主演。這部劇號稱要弘揚正義、真相，戰勝邪惡。檔案、證言及場合的高度嚴肅性均是為了服務真相。這點在劇作家那里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把審判搬上了舞臺。

羅爾夫·施耐德（Rolf Schneider）是民主德國的左派作家他寫過一部名為《紐倫堡審判》（Prozess in Nürnberg）的紀實性劇作。在對證詞和盤問進行編輯后，他還原了當時的情景。在序言中他寫道，這部紀實性劇作是德語戲劇中一項發明創造：“它源自我們對歷史的記憶,源自我們對當下和當下如何描述過去的不滿。”他同時寫道：“將這一審判搬上舞臺的原因說來很簡單：它有多重意義其中之一就是為日后類似的審判提供了一個模板，比如紐倫堡的后續審判、耶路撒冷審判、法蘭克福審判……”

劇中信息量很大，對戈林、沙赫特[[7]](#_7_Hjalmar_Schacht_1877____1970)和凱特爾的盤問很有意思但究其初衷，卻并非為了盡可能客觀地呈現歷史事實。這部劇和審判一樣充滿政治意味，盡管其手法不同。施耐德很聰明，借英美檢察官之口來闡述他主要的政治觀點。比方說，他援引英國檢察官的話，“德國實業家”和被告席上的軍政官員“罪行同等，難分伯仲”。當然，這是民主德國的典型看法：法西斯是資本主義最后一道防御。

接下來，他還安排美國檢察官成功地為以恩斯特·羅姆[[8]](#_8_Ernst_Rohm_1887____1934__Na_C)和格雷戈爾·施特拉瑟[[9]](#_9_Gregor_Strasser_1892____1934)為首的納粹左翼做了回辯護。戈林稱，除掉他們是因為他們對希特勒不忠。美國檢察官在劇中說道：“這些人代表了社會目標（social goals），他們靠這點給你們招攬了支持者。而你們跟德國大企業狼狽為奸后，就把所有支持者的社會目標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對于無產階級支持納粹運動這一令人尷尬的問題，這句臺詞算是給出了交代。它對事實的呈現不能說完全謬誤，但有失偏頗。如此表現審判，政治動機很清晰，為的是賦予反法西斯共產主義國家合法性，反觀資本家和實業家，則必須被視為法西斯惡棍的傀儡。這部劇臨近尾聲時，美國檢察官就“反和平罪”發表了一段講話（不涉及種族迫害和種族滅絕的“反人類罪”，這兩條向來就和官方的反法西斯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如今，我們的法典里也印上了這條法律，檢察官說道，“這次要用它來對付德國侵略者，但以二十三國名義主持這次審判的四個大國都很清楚：我們今天用來審判這些被告的標尺，明天也將被歷史用來審判我們。”

這么說同樣不無道理。羅伯特·杰克遜現實中就是這么看問題的，但如此收尾的主要原因又是為何呢？這部劇寫于1968年，正值越南戰爭如火如荼之際。那時，不管是民主德國還是聯邦德國的知識分子，都寫過類似下面這樣的話（原作者是克里斯蒂安·蓋斯勒[[10]](#_10_Christian_Geissler_1928____2)）：“那時候，國際軍事法庭四位主檢察官中的一位以美國的名義提出了訴訟，對于當時懵懂的我們，這意味著他的陳述代表了正義自由和人性。

“我們看穿了納粹的假仁假義，希望與之劃清界限。是美國人起訴書中那份道德誠懇，讓我們萌生了學習理性政治思考的想法。

“我們也的確學會了。

“并且，我們容許自己將這一思考方式付諸當下。舉例而言今天，我們將用它來檢視公訴美國自身的道德品行。過去奧拉多和利迪策被血洗[[11]](#_11_Ao_La_Duo__Oradour_He_Li_Di)——如今換成南越的城市遭殃。”[(64)](#_64_1)

這下形式扭轉，反客為主。“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論點——不管用在這里如何不恰當——最終還是出現了。我們所有人都有罪一位劇作家，或者隨便哪位作家，當然完全有權這么做。但若就此認為這部紀實性劇作寓意質樸，這和認為政治審判是傳授道德歷史教訓合適手段的想法一樣言不由衷，甚至是愚昧，因為這樣的審判并不能平息“復仇三女神”的怒火。

紐倫堡審判過去二十年后，法蘭克福一家法院以“反人類罪這一罪名審判了奧斯維辛的部分軍官和看守。這不是第一次由德國人來主持審判。早在1957年，一位黨衛隊軍官就被控率領部隊在立陶宛邊境地區濫殺無辜。但這只能算是例外。紐倫堡的法官僅僅將這部反種族滅絕和反種族迫害的新法律用在處置戰爭過程中出現的罪行上，似乎大屠殺純粹是另一項戰爭罪行。在做陳述時，法國主檢察官弗朗索瓦·德芒東（François de Menthon）幾乎根本沒有提及猶太人。

總而言之，紐倫堡審判后，多數德國人都對戰爭罪感到厭煩直到1950年代中期，德國法院還只被允許審理德國人對其他德國人犯下的罪行。待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這一大快人心的先例出現后，德國人的懈怠才有所動搖，1946年之前所犯罪行在1965年后將免于起訴這一點也受到了挑戰。（1979年，在電視劇《大屠殺》引起轟動后，德國政府廢除了追訴“反人類罪”的時效限制。）

紐倫堡審判的規模更大，被告地位更高，但奧斯維辛和馬伊達內克[[12]](#_12_Majdanek_Bo_Lan_Di_Ming__Na)審判對于多數德國人的影響（后一場審判的地點在杜塞爾多夫，時間從1975年一直延續到1981年）要深遠得多。這部分是因為所選的時機。1945年，多數德國人饑腸轆轆，且存在逆反心理。到了1964年，新的一代已經在相對繁榮的生活中長大成人。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罪行的性質。以常規戰爭罪的罪名審判戰敗者根本難以服眾，因為同樣的罪名可以拿來控訴戰勝者。在德累斯頓大轟炸和蘇聯人的暴行仍然歷歷在目時，“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這句話即便不登紐倫堡法庭這一大雅之堂，私下說說也無妨。但是奧斯維辛卻找不到對等物。這隸屬于另一場戰爭，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根本算不上是一場戰爭；它是徹頭徹尾的屠殺，背后折射出的不是戰略或戰術動機，僅僅是意識形態。

現代歷史的一大諷刺之處在于，這些罪行——既非紐倫堡法庭（抑或者應該說，盟軍軍事目標）的主要關切，戰后絕大多數德國人也都表示并不知情——成了德國（西德）歷史紀念的主要焦點，不管是在法庭、學校還是紀念館。當軍事較量、“反和平罪行”逐漸成為歷史，“最終解決方案”依然給當下蒙上了一層陰影，且比過去更為持久。無論你是希望德國成為“普通”國家的保守派，還是“正為哀悼而努力”的自由派/左派，二戰的關鍵事件只是奧斯維辛，不是閃電戰，不是德累斯頓大轟炸，也不是東線戰場的戰事。這是紐倫堡審判留下的歷史教訓。盡管赫爾穆特·貝克對紐倫堡存在質疑，但誠如他所言：“最重要的是，德國人意識到‘反人類罪發生過，而庭審過程揭示了它們是如何發生的。”

我相信他的話是對的。但假使不是由德國法院審理的話，這一教訓或許會難以服眾。1945年，一家英國法庭審判了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Bergen-Belsen）的司令官和守衛，但效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斯蒂芬·斯彭德當時碰巧在德國，他邂逅了一位朋友，后者跟他講起拜訪一戶德國家庭的經歷，“這家人很討人喜歡，富有同情心，年紀都很輕。他們都說貝爾森審判只是政治宣傳，克拉默[[13]](#_13_Josef_Kramer_1906____1945__B)等人的所謂罪行是人類根本辦不到的……大多數德國人相信，審判就是一場有預謀的勾當，而且之所以拖這么久，是因為被告有太多自我辯護的話要講……”[(65)](#_65_1)

但即便是德國的死亡營審判，也未能打消對審判是否足以構成歷史教訓的所有疑慮。從本質上看，審判會將刑事責任集中到具體的人身上；比如說紐倫堡審判時就把問題集中到了領導人身上。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1946年曾寫過一篇分析德國罪行的著名文章，《論德國人的罪責問題》（Die Schuldfrage）。在文中他區分了四種罪過：第一種是觸犯法律的刑法罪過；第二種是參與罪惡政治體制的政治罪過；第三種是因個人罪惡行為而生的道德罪過；第四種是形而上罪過，意指未能盡到維護人類文明標準的過錯。很明顯，這些分類具有重疊性。但是雅斯貝爾斯明確表示，不管是在法律上、道德上，還是哲學思辨的意義上，都不應讓全體人民為一樁罪行負責（政治責任是另一回事。）在他看來，戰爭罪審判的最大好處是限制了權力。通過允許被告陳詞、自我辯護，奠定程序正義的規則，戰勝者限制了自己的權力。不僅如此：“對于我們德國人，審判還有另一層好處，它對領導人的罪行加以區別，且沒有牽連全體德國人。”[(66)](#_66_1)

雅斯貝爾斯沒有提到挑選合適被告的問題；部分在紐倫堡出庭受審的人其實不應成為被告（比如沙赫特和弗里徹[[14]](#_14_Hans_Fritzsche_1900____1953)），倒是另一些人更應該（比如阿爾弗雷德·克虜伯[[15]](#_15_Alfred_Krupp_1907____1967__D)），但這是另一回事了。總而言之，審判讓德國人和他們過去的領袖進一步撇清干系。這種距離感其實是好事，沒什么人想要拉近距離。這也許是納粹領導人很少出現在德國戲劇、電影或小說中的原因。當然，不管是大名鼎鼎還是聲名狼藉的歷史人物，想要把他們寫進虛構作品都絕非易事。已知事實讓人放不開手腳；歷史又過于沉重。但這無法解釋為什么關于納粹領導人的傳記也不多。歷史學家對他們敬而遠之。希特勒的正規傳記作者還是兩位記者，約阿希姆·費斯特和維爾納·馬瑟（Werner Maser），戈林和希姆萊的傳記則幾乎全部出自外國人之手。連作傳都害怕——不管是虛構還是紀實——這點或許可歸因于1960——1970年代流行的一種觀念——體系和制度能解釋過去，而個體卻不能；但肯定也緣于擔心自己會扯上干系。德國人管這種心態叫Berührungsangst，直譯就是“害怕產生接觸”。

如果對領導人是這樣，那么對籍籍無名的醫生、行政官員、毒氣室操作員等執行命令的小嘍啰們是否也一樣呢？對他們產生同情是不是會容易些？在以奧斯維辛為背景的劇作里，彼得·魏斯就以一種耐人尋味的方式交代了他們的身份。[(67)](#_67_1)昔日的受害者、如今法庭上的證人都沒有名字，但拷打他們的人都有名有姓。比如博格（Boger），他的特長是把囚犯吊在一個類似秋千的物體上，然后活活打死；又比如死亡營藥劑師卡佩修斯博士（Dr. Capesius），他竟把自己藏有齊克隆B毒氣這件事忘得一干二凈；再比如盧卡斯博士（Dr. Lucas），這位虔誠的天主教徒聲稱自己在火車站岔道口故意開小差。當然，魏斯的目的不是讓觀眾對這些人物產生同情。他想表達的是，奧斯維辛是工業剝削和資本主義失控后的極端象征。受害者和被貪婪機器挑動起來的無產階級大眾一樣，都是無名之輩。這一進程沒有中斷，第三帝國變成聯邦德國后依然如此。在這部劇的最后，集中營副官穆爾卡（Mulka）有下面幾句臺詞：

我們只是在履行職責，所有人都是，

就算這往往很難辦，

就算我們會很沮喪。

但是今天，

既然我們的國家再次

躋身強國之林，

我們就應該忙于其他事，

而不是指控，

因為這么做早已過時。

當時，這種態度在德國并不少見，事實上還相當主流。類似赫爾曼·呂貝（Hermann Lübbe）這樣虔誠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就說過太多指控會阻礙西德通往穩定、繁榮社會的道路。這倒不是說呂貝在為第三帝國辯護，恰恰相反：他認為，聯邦德國的合法性取決于徹底否定納粹政權。難點在于，如何將幾百萬納粹支持者改造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忠誠公民。呂貝稱，如果不對過去采取審慎姿態這就不可能實現。然而，戰爭結束二十年后，層出不窮的“博格”、“穆爾卡”和“卡佩修斯博士”們還是被送上了被告席。他們對此的反應往往都是氣不打一處來。“為什么是我？”他們會問。“我只是履行職責罷了，只是像所有正直的德國人一樣執行了命令。為什么非得是我受罰呢？”

馬伊達內克審判中的被告在德國電視紀錄片里也是一遍遍地問，憑什么是我？是啊，憑什么呢。然而，片子里的一句話卻深深嵌入了我的腦海。說話人是個特別兇殘的女看守，綽號“血腥布里吉塔”。“你要知道，”她向采訪者解釋道，“這些曾經的囚犯都抱怨過去日子有多苦。沒錯，集中營里是很慘。但你必須認識到一點：如果你給這些人一個手指頭，他們就會拿走整個手掌。”同樣說過這番話的還有一個傻里傻氣的小學女舍監、海關檢查員，以及地位卑微的檢票員，他們這樣的人一夕之間被賜予了上千勞工的生殺大權。

可是，盡管這些人平庸得可憐，申辯又沉悶乏味，但要對他們予以同情卻幾乎不可能。他們罪大惡極，血債累累，這為審判籠罩了一層恐怖的氛圍，報紙上每天都會曝光新發現。馬丁·瓦爾澤在奧斯維辛審判那年寫道，博格成了黑暗王子。在媒體筆下，這位駭人的主兒是“野獸”或“妖怪”。但丁的名字常常見諸對死亡營的偷懶描述。無法想象之事被濃縮在抓人眼球的新聞標題中：“女人被活生生趕進熊熊大火”，或者“奧斯維辛的酷刑秋千”。瓦爾澤寫道：“奧斯維辛的口號越是毛骨悚然，我們就越是與之劃清界限。”[(68)](#_68_1)

審判涉及的只能是個體罪行。在法蘭克福和杜塞爾多夫，站上被告席的“妖怪”和“屠夫”們犯下了滔天罪行。許多人也一樣，卻從未遭到追究。但是，瓦爾澤說道，“這些罪犯在1918年至1945年間的表現跟我們所有人如此相似，以至于難分彼此；另外，一些特定因素促使他們走上歧途，最終面臨審判；這些事情在法庭上都無法展開合理探討。”對個體惡行的分析脫離了歷史大環境，歷史則淪為犯罪病理學和法律辯論，剩下的只有對此的厭惡或癡迷。這不是說審判有什么不對，但它們不足以成為歷史教訓，也無法讓我們更貼近瓦爾澤一心求索的那種虛無縹緲之物：德國人的身份認同。

\*\*\*\*\*

距離施瓦姆貝格受審法院不遠處，約莫就在斯圖加特的市郊坐落著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這座施瓦本（Swabian）小鎮過去，符騰堡州的歷代勛爵把宅邸建于此。這里也是席勒的出生地（他的故居如今是“維也納森林連鎖餐廳”的分店，隔壁是家麥當勞）18世紀，勛爵的財務顧問、猶太人蘇斯（Suss）——他在納粹的宣傳漫畫里是邪惡猶太人的原型——就被吊死在那兒。在勛爵宮殿的大門外，有塊牌子寫著：“這座城市向您展示其活潑而歡樂的面貌訪客若愿意花時間參觀除了公園和宮殿以外的景點，會發現她生機勃勃、無拘無束的氛圍迄今依舊清晰可辨。”

我去那兒是為了參觀“清理國家社會主義罪行的州司法機關中央辦事處”[[16]](#_16_Zentrale_Stelle_der_Landesju)。辦事處設在一座昔日的女子監獄內。與之毗鄰的是建于17世紀的巨大要塞，直到1990年前都用作監獄，如今則搖身一變成了刑法博物館。為我開門的青年禮貌地沖我笑笑，列了份館藏展品的名單給我：一架一直服役到1940年代末的斷頭臺，拇指夾囚服，犯人用來上吊的繩索和皮帶，一間經過修復的死囚牢房，一把劊子手使用的斧頭、描繪酷刑的彩色圖畫，以及猶太人蘇斯最后一餐的菜單：肉湯、燉小牛肉、煮豆子和白面包。

在車站接我去“清理國家社會主義罪行中央辦事處”——請注意，這里的用詞是納粹（NS）罪行，不是戰爭罪行——的出租車司機不是很喜歡這趟差使。一開始他假裝不認識路，后來就辦事處為何應被撤銷發表了一通長篇大論：是時候忘記納粹那檔子陳芝麻爛谷子的陳年舊事了，不然搞得好像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似的。兩德合并啊，國家統一啊，干嘛不多關心關心這些？再說了，共產黨不一樣不是好東西么？他說個沒完。

辦事處的主任阿爾弗雷德·施特萊姆（Alfred Streim）告訴我，在過去，這種事情多了去了。當政府決定要在1958年開放這一機構時，路德維希堡的居民表達過抗議，還扔過燃燒彈。另外，當時選址工作進行得也很困難。但事到如今，隨著年輕一代的出現，情況有了改觀，施特萊姆說。

中央辦事處存有海量檔案，根據人名和地名歸檔。這里可以說是納粹歷史的官方存儲庫。每每接手起訴原納粹分子的案件，檢察官就會來這兒尋找檔案證據。施特萊姆的一位同事帶我在辦公室里參觀時，人們不時會來到他跟前，求他查一查諸如“1943年被關在達豪的施密特”的信息。我的向導和施特萊姆一樣，都是律師，常常僅憑記憶就能說出答案。如果實在記不起來，他會打開某個鋼質文件柜，里面整整齊齊疊放著貼有“奧斯維辛”、“布痕瓦爾德”、“達豪”等標簽的文件，然后迅速抽出要找的檔案。

施特萊姆不愛言笑。他的膚色和他巴伐利亞式大排鈕西裝一樣灰蒙蒙的。還是小學生的他經歷了漢堡大轟炸，從家里逃了出來，之后被轉移到捷克斯洛伐克，戰爭結束時不得不徒步走回漢堡。他說，今天的年輕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那代人所經受的壓力，那來自希特勒青年團、報刊查禁制度等事物。施特萊姆的父親是納粹，供職于鐵路公司：“他老說猶太人的事情不是真的。”施特萊姆為此會與他起爭執，但老爺子就是不相信事實，哪怕戰后也不例外。“我父親那代人十分天真，”施特萊姆說。“只有在我給他看過檔案后，他才改變了想法。”

中央辦事處收集了超過一百四十萬份檔案：有證人供詞、歷史案例、蓋世太保文件、法庭記錄等等。1986年，聯合國又提供了三萬人的檔案。到后來，波蘭、蘇聯、法國、羅馬尼亞、匈牙利、荷蘭，歐洲各國也陸陸續續送來了資料。只有一個地方除外：民主德國。唯獨斯塔西（Stasi），也就是東德國家安全警察，一直將資料據為己有，不愿公開。

民主德國在動用法律處置納粹歷史一事上有自己的一套辦法從很多方面來看，他們的做法和西德截然相反，其目標對象往往是西德司法體系忽略的人。東德的司法、官僚機構和工業界經歷過十分徹底的清算。大約二十萬人——包括五分之四的納粹法官和檢察官——因此丟了飯碗。東德也舉行過戰爭罪審判；一直到1947年主持審判的都是蘇聯人，這之后才由德國人的法庭審判被告。

這類審判進行得很快。與其給被告自我辯護的權利，從而捆住國家（或者說戰勝者）的手腳，共產黨法庭的做法恰恰相反。以1950年臭名昭著的瓦爾德海默案（Waldheimer trials）為例，當值的法官和檢察官被告知，由于被告罪行昭然若揭，所以根本用不著證人、辯護律師或檔案證據。這也是東德舉行的最后幾場納粹審判之一。1957年前又搞過兩場，之后就銷聲匿跡了。總的來算約有三萬人受審，五百人被處決。在聯邦德國，受審的大約有九萬多人沒人被處決，因為1949年頒布的憲法廢除了死刑。

在鏟除位居要津的納粹一事上，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國比聯邦德國做得更好。但是其他納粹小人物只要做個老實聽話的共產黨員就可以被網開一面。東德人的做法既殘酷無情又老謀深算。這一過程畫上句號后，官方總結稱民主德國再也無須承擔罪孽的負累。正如國家宣傳不斷指出的那樣，有罪之人都在西德。在那里，法西斯分子依然把持著審判席，掌管著工業，造就了經濟奇跡。1960年就在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艾希曼落網后，東德媒體曝光稱，在阿登納政府任國務秘書的漢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曾參與起草了1935年出臺的紐倫堡種族法東德的全國性大報《新德意志報》（Neues Deutschland）刊登了一條大標題，“格洛布克是波恩的艾希曼。”

在這個共產主義國家壽終正寢后，如此大赦天下的特殊做法也制造了特殊的問題。比如古斯塔夫·尤斯特（Gustav Just）一案尤斯特是社民黨政治家，他的仕途在兩德合并后扶搖直上。七十歲時，他當上了勃蘭登堡州議會議長兼議會憲法委員會主席。但就在飛黃騰達后沒多久，他栽了個大跟頭：1992年3月，某報披露尤斯特曾志愿參軍，并在1941年射殺了六名烏克蘭猶太人。他第一反應是辯解自己不過是執行命令，但在遭受巨大壓力后，只得引咎辭職。

尤斯特只是許多人中的一個，甚至還算不上是什么大魚。這件事的有趣之處在于，他在1957年時曾因為反革命行為在民主德國遭到起訴，并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罪狀是編輯過一份對當局稍有微詞的周報。審判他就是在做戲，為的是殺雞儆猴，恫嚇其他知識分子，讓他們不敢背離斯大林主義路線。庭審期間，法官其實還宣讀過尤斯特戰時日記的部分內容，其中就提到了烏克蘭的殺囚事件，但后來便不了了之。據尤斯特稱，他要是再敢惹當局不高興，等待他的就是戰爭罪審判。“斯塔西，”他說，“在戰爭罪方面是行家里手。”

有人或許會以為，東德人在經歷過擺樣子的公審和政治權力對歷史記憶的玷污后，1990年后會對政治審判和清算變得較為謹慎。其實不然。把原民主德國的共產黨領導人送上被告席，以及一絲不茍地整肅斯塔西特務和告密者，對此人們依舊樂此不疲。在東德，與路德維希堡的中央辦事處相對應的是柏林的一所機構，主事者是新教牧師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他的辦公室不僅儲存了斯塔西所有行動的檔案信息，也像是分配信息的一間“藥房”。“藥房”一詞恐怕沒用錯，因為高克是用醫學式的思路來看待自己工作的：他的職責是保障道德潔凈；他的檔案就是藥物，可以治愈一個腐朽的社會。縱然一些批評者——基本上是東、西德的老左派——管他叫大判官，但很少有人會質疑這位牧師的動機不純。他既從道德和司法層面也從歷史層面對審判表示聲援，并在一本名為《斯塔西檔案》的書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這本書幾乎每一頁都回蕩著久遠過去傳來的聲聲回響。[(69)](#_69_1)

“我們能夠大膽預測，”高克寫道，“針對個人的審判或許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對原聯邦德國納粹戰犯的審判亦是如此。而就某些罪行來看，可能已經過了追溯期。但是，就算僅僅出于對受害者的考慮，我們也絕不容許斯塔西的特務得到盡數赦免。很顯然，倘若此事成為現實，將會粉碎人們對法治的信心。”

寫到這里，法律上的教訓也就到頭了。對于歷史，他表示：“西德人已經比原東德公民更清楚地認識到，將直面罪惡過去的責任拋給下一代會釀成多大的苦果。有了前車之鑒，已經可以期待他們不會坐視德國人的疏忽大意成為一種不良傳統。”1985年5月8日即二戰結束四十周年紀念日這天，里夏德·馮·魏茨澤克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文中他提到，“在塑造當下和未來的過程中，緬懷過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現在直面自身不堪往事的姿態，為駁斥德國人大多對過去避而不談、‘無法哀悼’這一偏見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

馮·魏茨澤克引述“無法哀悼”，說明了亞歷山大·米切利希和瑪格麗特·米切利希夫婦的教誨已深入人心。這次我們必須行事正確；我們不能允許過去的事重蹈覆轍。這一觀點，或者更確切地說這一情緒，令不少西德人感同身受。抑或者應該說，西德人尤其感同身受，因為他們——或者最起碼也是他們當中一部分人——對曾經縱容身邊的納粹抱有負罪感。盡管報紙專欄作家、神職人員、學者和德國意見領袖從不間斷地指出，東、西德未被充分理解的歷史之間存在差異，但納粹德國和斯塔西德國之間的區別趨向于模糊化不僅如此，彌漫在“西佬”中間的一絲資本主義勝利情緒再次激起了對勝利者正義的指責；只不過這一次，坐在勝利者高位上的不是西方或蘇聯盟友，而是西德人。

這種局面充滿了諷刺意味：先是有這么一個德國，戴罪之身的德國，其民眾感到被自己“無法哀悼”之痛弄得茫然無措（betroffen）這個德國舉行了奧斯維辛和馬伊達內克審判，據說如今可以居高臨下地審判另一個德國——昔日的反法西斯德國；在兩種極權體制下吃盡苦頭的德國；步兵方陣整齊劃一、正步踢得鏗鏘有力的德國；經營著讓蓋世太保做夢都想不到的龐大秘密警察網的德國。隨著最后一位納粹戰犯在斯圖加特出庭受審，數以千計的斯塔西人員和共產黨爪牙正等著在第二輪司法歷史課堂上出演各自的角色。

東京

紐倫堡法庭的外觀看著屹立不變——近乎堅不可摧——然而其所在的城市并非如此。紐倫堡的老城中心經過修繕，重現了當年的中世紀之風，給這座城市平添了一種矯揉造作的氛圍，似乎紐倫堡只是歷史遐想的一面布景。這里另一棟仍保持舊貌的建筑是齊柏林廣場，這是阿爾伯特·施佩爾存世的唯一作品，過去是納粹黨一年一度黨代會的舉辦地。這棟建筑體量龐大，難以實施爆破——光是男廁就和普通電影院一樣大——同時又缺乏妥善維護。茁壯繁茂的雜草從石造觀眾席的龜裂處竄了出來。

我問一個賣紀念品（有啤酒杯、旗子和刀具）的老頭兒，去法院的路怎么走。“你是說德國軍官被絞死的地方么？”我說是的，就是那兒。他給我指了路，但我還是迷路了，只好折回酒店再問人。前臺的年輕姑娘說不上來，她的領班，一位五十來歲、皮膚白得沒有血色的金發女人走上前來，問我有何貴干。我把問題復述了一遍，她的嘴角沉了下來。“您去那兒干嘛啊？”她沒好氣地問。“那兒沒什么可看的，您干嘛不參觀參觀我們的老城呢……”我說是想了解歷史。她轉身走了，“這些個外國人，”嘴里還喃喃自語。

正如先前所言，法院堅挺如故，德皇威廉時期的風格讓人印象深刻。另外，法院和施佩爾設計的體育館一樣壯麗。歷任法官的雕塑屹立在石頭底座上，宛若一臉嚴肅的諸神，俯瞰著菲爾特大街（Fürtherstrasse）。大門上方有一片巨型檐壁雕刻，反映的是各式各樣的權威象征：刻有羅馬數字的十誡石板書，一本向上攤開、兩邊樹枝環繞的法典，一把樺枝叢中伸出的斧子，象征刑罰權、日后為法西斯所采用的古羅馬徽章。

盡管日本人也很推崇德皇威廉時期的華麗之風（或許在殖民地比在日本本土走得更遠），東京卻沒有類似紐倫堡法庭的建筑。設在日本、東南亞和亞太其他地區的盟軍軍事法庭共審理過兩千多起戰爭罪案件。然而，自1946年至1948年底，見證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二十八名日本戰時領導人——也就是所謂的甲級戰犯——的建筑，原本只是一所軍校，在戰爭末期充當過日本陸軍的大本營在匆忙鋪就木板后，演講廳被改造成法庭，室內的弧光燈亮得刺眼這讓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好萊塢影棚。為了給新市政廳騰地方，這棟建筑后來被拆毀。

不過，比起這座法院來，另一棟與審判有關的建筑更能讓人觸景生情——巢鴨監獄。在這兒的“死刑室”里，六位將軍和一位平民在東京法庭的盟軍法官宣判后，于1948年12月的一個夜晚被送上絞架。巢鴨監獄是仿造19世紀歐洲監獄的產物，1970年代被拆除。在其原址上——占星家和占卜師極力反對，說這么做會破壞風水——亞洲范圍內最高摩天大樓之一的“太陽城”（Sunshine 60拔地而起。這是一棟閃閃發光的白色建筑，隸屬“太陽城項目”后者是一個集休閑、辦公和購物等功能于一身的大型綜合體。

我無意拿這些建筑風格之間的區別大做文章。毋庸置疑，日本人樂見巢鴨監獄成為歷史，正如我下榻的紐倫堡酒店的前臺小姐不希望人們再去探訪法庭或齊柏林廣場一樣。然而，在我看來，日本從來就不曾擁有類似紐倫堡法庭這樣的建筑。不同于火車站或政府機關，在現代日本國家里，有著繁復程序的法庭從來就不是一個占據中心地位的機構。法律不是保護人們免受專制之害的手段；相反它的存在是為了強化國家對人們的管控。即使在今天，日本的律師群體相對而言仍舊弱小。為站在被告席上的某人辯護近乎于顛覆正因如此，為軍政領袖的所作所為追究他們的責任這一觀念在日本比在德國還要古怪。話雖如此，比起紐倫堡審判帶給德國的陰影，東京審判在日本投下的陰影要長且黑暗得多。

民族主義修正派對“東京審判歷史觀”大談特談，似乎審判結果完全是狂熱的反日宣傳。軍事法庭被人比作濫用私刑的暴徒，而日本左派因為在學校教科書和自由主義刊物中弘揚東京審判歷史觀，被抨擊削弱了幾代日本人的氣概。所謂東京審判歷史觀，簡言之就是指日本自1931年以來，在亞洲策劃和發動了一場侵略戰爭。然而，修正派認為，這場戰爭其實是為了救亡圖存和將亞洲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來，所進行的一場悲情而神圣的斗爭。出生于1945年的修正派史學家長谷川三千子寫道，只要英國人和美國人繼續壓迫亞洲人，“和日本的沖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并非僅僅為了日本而戰，我們的目標是打一場大東亞戰爭。鑒于此，中日戰爭和日本壓迫朝鮮就格外讓人遺憾。它們都是難以言說的悲劇事件”。[(70)](#_70_1)

退一萬步說，修正派對幾代日本人被東京審判洗腦的擔心也是杞人憂天。日本學校的教科書是諸多妥協的產物，以至于它們根本看不出任何立場。正如日本所有爭議事件一樣，越是痛苦不堪的事，留下的記載就越少。在一本出版于1980年代、供中學生使用的標準歷史教材中，提到東京審判的章節所占篇幅連半頁都不到。[(71)](#_71_1)僅有的內容也只是交代審判舉行過，并“被批評為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單方面審判”。

西德教科書對紐倫堡審判的描述要詳細得多，除此之外，其在有追溯力的反和平罪和新法反人類罪之間也做了明確的區分。[(72)](#_72_1)前者“反映了檢方以及國際法庭本身存在的主要問題：反和平罪成立的前提是針對侵略戰爭存在國際性禁令，但這并不存在”。意思就是，因為拒絕檢討盟軍自身在戰時的所作所為，盟國法官奉行了雙重標準。但話鋒隨即一轉，說到反人類罪雖然有追溯性，卻“對國際法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貢獻”。（西）德、日教科書之間的區別不僅僅是誰比誰更詳細；而是折射出一種理念上的差距。在日本人看來反人類罪針對的并不是類似屠猶的事件，而是任何戰爭中都會出現的軍事暴行。有了廣島和長崎原爆造成的沖擊，日本人在談論戰爭罪時，感到有資格反戈一擊，指責“你們也好不到哪里去”。

赫爾穆特·貝克嘗言，沒有多少德國人會想要抨擊紐倫堡審判的過程，因為被告的罪行再清楚不過了。說這話時，他所指的是反人類罪——更確切地說，是屠猶。而德國法院在紐倫堡審判后辦理的，正是大屠殺的案子。

日本從來就沒有什么戰爭罪審判，也沒有類似路德維希堡這樣的地方。這部分是因為找不到可以與大屠殺完全相提并論的慘劇縱然日軍行事風格往往十分殘暴，國家神道教和天皇崇拜造成的心理后果同納粹主義一般狂熱，但日軍暴行屬于軍事行動的一部分而不是針對一個民族（其中還包括自己的國民）有預謀的種族滅絕另外，戰爭中最令人發指、與實際戰斗毫無關聯的一些方面，比如說駐偽滿的731部隊在活人（被稱作“圓木”）身上進行的醫學試驗卻在東京審判中被略過了。1945年，731部隊軍醫采集的信息——比如極寒試驗、注射致命病菌、活體解剖等等——因為在美國人眼里具有極高的價值，他們當中的責任人只要肯交出資料，就被網開一面。部分軍醫在戰后醫學界舉足輕重。吉村壽人（Yoshimura Hisato）作為在極寒環境研究領域的權威，擔任了日本南極科考團的顧問。做過大量人體試驗的北野政次醫生則成了綠十字株式會社的社長，這是日本最大的血制品公司。

731部隊的故事在日本并非完全無人知曉，因為蘇聯人審判過該部隊的一些官兵，這段歷史被寫進過書里。[(73)](#_73_1)另外，1976年日本的電視臺還播放過一部以此為題的紀錄片。但是多數日本人第一次聽聞731是在1982年。是年，懸疑作家森村誠一發表了《惡魔的飽食》一書，這是他731部隊三部曲的開山之作。[(74)](#_74_1)盡管森村事先做的調研很充分，但書名反映了其基調，而這點對吸引學者關注毫無助益。不過，三部曲在商業上大獲成功，森村的作品也鼓勵了其他人對此話題展開研究。他同時也招來了極右翼不懷好意的關注。

有些日本人建議日本應該自己主持戰爭罪審判。史學家秦郁彥就認為，日本領導人應該根據現行日本法律受審，無論是軍事法庭還是民事法庭。[(75)](#_75_1)他相信，日本法官沒準會比東京的盟軍軍事法庭更加嚴厲，而收效也只會更好。如果被判有罪，被告的靈位也就不會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內。東京審判反而“洗清了被告的‘罪行’，把他們變成了烈士。如果是在國內法庭受審，很有可能真正的戰犯就被揪出來了”，他說道。

這番話很中肯，但日本法庭有何依據對本國前領導人提起公訴呢？秦郁彥的答案是：“因為他們發動了一場明知會輸的戰爭。”他舉了個例子，阿根廷將軍加爾鐵里（Galtieri）和部下在福克蘭海戰[[17]](#_17_Ji__Ma_Dao_Hai_Zhan___Ying_G)中吃了敗仗。簡言之，他們本該因為吃敗仗、給國民帶來巨大傷痛被判刑。秦郁彥說得就好像德國法院在1918年把興登堡（Hindenburg）和魯登道夫（Ludendorff）兩位將軍送上了被告席一樣。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但再次顯示出，日本和德國發動的戰爭不論是在記憶還是在事實上，都有著本質性的區別。德國人也發動了一場戰爭，為此他們審判了譬如博格和施瓦姆貝格這樣的德國人。這場戰爭中他們立于不敗之地，除非戰敗，否則他們的敵人休想活命。

對于凡是和戰時歷史沾邊的事，日本左派和修正主義右派的意見幾乎統統相左，在東京審判上亦是如此。這和德國左派看待紐倫堡的態度具有可比性。小林正樹于1983年推出的紀錄片《東京審判》恰到好處地闡明了這點，雖然節奏有些拖沓。小林絕對不是那種會為日本對外戰爭辯解的人。他的扛鼎之作、1959年問世的《人間的條件》對戰爭作出了嚴厲的批判。該片主人公梶（Kaji）是個愛好和平的青年，他同小林一樣，作為在中國服役的二等兵，無奈地目睹了戰爭的慘烈。

《東京審判》片長四個半小時，一上來先是放映廣島和長崎的原爆，最后以那張越南小女孩赤身裸體逃離凝固汽油彈襲擊的著名照片結束。影片并沒有暗示小林在原則上反對審判，或者質疑其判決。但在放到審判的一幕戲時，卻插入了比基尼環礁[[18]](#_18_Bikini_Atoll_Ma_Shao_Er_Qun)上核試驗的影像資料。另外，在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的片段之后——這在日本實屬罕見——緊接著出現的又是廣島上空升騰而起的蘑菇云。正如德國左派在紐倫堡審判一事上的表現，小林用審判將了法官們一軍這么做不一定就是為了淡化日本的罪過。相反，他的目的是為了表現，戰勝者如何背棄了他們自己強加給日本的反戰主義。

日本國內還有其他看法，立場介于修正主義詭辯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這一原則之間。然而，回憶起東京審判時，沒有一個日本人心里會不感到矛盾。這和缺乏法律傳統或冥頑不化的民族主義思想關系不大，倒是和審判自身的性質有更大關聯。1970年，日本最知名劇作家之一的木下順二創作了一部作品，把東京審判變成了一出悲情的鬧劇。[(76)](#_76_1)有關審判的書籍，由日本人寫就的最著名的一本出版于1974年，其以富于同情的筆觸描寫了某位在巢鴨監獄上絞架的文職官員，后來還作為電視劇題材被搬上熒屏，書名為《戰犯廣田弘毅的生與死》，作者是城山三郎。[(77)](#_77_1)

木下和城山都不是右翼修正主義者。同樣，活躍于1960年代的新左派哲學家吉本隆明也不是。然而，他在1986年寫道，“作為同時代的人和親歷者，在我們看來，這場審判從一開始就是策劃好了的。這不過是宰殺替罪羊之前的一出荒唐儀式罷了。”[(78)](#_78_1)從所有文字記載來看，大部分日本人就是這么看待審判的，即使他們對多數“替罪羊”都沒什么同情。1948年，在經歷過美國占領當局長達三年的查禁制度和對自己的歌功頌德后，人們在廣播里聽法庭宣讀審判詞時，都會以一種傷感且宿命論式的意味聳聳肩：吃了敗仗就該料到會有這種結果。

但是吉本接下來的話是修正主義者絕不會提及的：“我還記得，初次接觸這一源自歐洲的法律觀念時，心里充滿了新鮮感和好奇心。這同我們亞洲法庭草草了事的司法制度有著云泥之別。不同于以往得不到公正審判便人頭落地的命運，被告能夠做自我辯護，而謹慎下達的裁決看來遵循了公開透明的程序。”

吉本的回憶既客觀中肯，又充滿殺傷力，因為他直指審判失敗的原因。經過操縱的政治審判——即“荒唐的程序”——損害了歐洲法律理念的價值。拿約瑟夫·基南的話來講，審判的好處在于，“歷史上，國家首腦們首次由于其職責所犯下的罪行被繩之以法。”——很不幸，基南這句話是口誤，因為國家首腦只有一個，就是天皇，但他卻缺席了庭審。東京審判唯一的模板是紐倫堡，而其審理過程并不總是能一碗水端平：對辯方有利的證據有時不被采信，而對檢方有利的證人則得到青睞。不過，和紐倫堡一樣，審判還有一個更為公開的目標：為日本人，乃至全世界，上一堂歷史課。

檢察官之一的弗雷德里克·米尼奧內（Frederick Mignone）曾有幾分裝腔作勢地說，“在日本，以及整個東方世界，這場審判是軍事占領期間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它在日本媒體那里得到了鋪天蓋地的報道，而且頭一回向幾百萬日本人展現出，他們地位牢不可破的軍國主義領導人是多么陰險狡詐，多么陽奉陰違，對權力多么如饑似渴。這為歷史留下了一份亟需的檔案，倘若沒有審判的話，則根本不會留下什么記錄。”[(79)](#_79_1)

的確是亟需，因為當時人們所知甚少。政治學者石田雄當時還是學生，他“永遠也不會忘記，在聽聞帝國陸軍攻占南京不久后實施了大屠殺時，自己有多么震驚”。[(80)](#_80_1)部分庭審內容甚至讓被告自己也吃驚不小。板垣征四郎將軍為人特別殘暴，曾掌管東南亞的戰俘營，他麾下的部隊屠殺過不計其數的中國平民。板垣在日記中寫道：“我聽說了一些之前連我都一無所知的東西，也回想起了原本已然淡忘的事。”審判結束后，《日本時報》（Nippon Times）指出其內在缺陷，但是隨即補充道，“日本人民務必認真思索，為何他們的觀點與世人幾乎普遍接受的共識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鴻溝日本的悲劇屬于自食其果，而這一認識上的鴻溝，正是造成悲劇的根源。”

時至今日，這道鴻溝依然存在。沉浸在事后之明中的今人也許只會得出一個結論：審判并未促使日本人了解和接受他們的過去反而讓他們滋生出一種憤世嫉俗和忿忿不平。政治審判造就的是政治化的歷史。修正主義者在談論東京審判歷史觀時，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他們沒有說錯，盡管結論大謬不然。炮轟審判不一定等同于否認日本的罪行，這點正是木下杰作的中心思想。

《神與人之間》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審判”是基于真實法庭記錄呈現的東京審判。因為有幾幕展現盟軍矛盾心理的戲，比方說介紹廣島原爆，或蘇聯很晚才對日宣戰（原爆后兩天）等比較微妙的事件，所以很有看頭。政治上的難堪被荒謬的法律術語掩蓋起來。對該劇這一部分的常規解讀是其再次祭出“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說辭，企圖淡化日本罪行。而通過強調法庭的虛偽，木下似乎是在否定審判結果。然而，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釋。劇中的日本被告雖未開口說話，但可以看到他們坐在臺下。因此，真正坐在被告席上的實際上不止這二十八個人，亦包括觀看該劇的日本觀眾。很明顯，該劇不光是對審判過程的一種控訴，作者并未輕易放過觀眾。

該劇第二部分為“南洋的浪漫”，講述的是某人代人受過，被判處絞刑。這則故事很有典型性，無疑具有深刻的現實基礎。講故事的是個音樂廳歌手。這場近乎于鬧劇的審判是對東京審判的荒誕戲仿，證人席上坐著嘰嘰喳喳的猴子。審判以一種夢境的形式被還原出來。噩夢一結束，所有人都想將其忘得一干二凈。只有音樂廳歌手不愿忘記，也只有她拒絕抱怨審判不公：“如果這一切都建立在審判是鬧劇的基礎上，那誰又能從中吸取教訓呢？”

木下這部劇看似在為日本的罪行開脫，實則比那兩部反映戰爭罪審判的德國話劇更深入地探討了罪行和報復的問題。另外，諷刺的是，該劇比兩位歐洲人的作品更能凸顯基督教的影響（木下曾是基督徒）。彼得·魏斯和羅爾夫·施耐德觸及的是納粹罪行背后的政治根源。魏斯力圖表達是什么造就了像博格這樣的施虐者。二者都沒有質疑審判的正當性。但是木下的主旨不太一樣。他的劇顯示出，集體罪責和真相不能依靠戰爭罪審判來解決。這種方法純粹是錯誤的。與之相比，甚至連音樂廳里人為安排的說笑還顯得更為恰當。然而，單單斥責這是“勝利者正義”是不夠的，因為這么做對幫助人們正視過去無濟于事，只是另一種逃避。另外，東京審判的二十八名被告，或者官階較低的成千上萬名戰犯是否有罪，根本不能稱之為問題。反倒是坐在觀眾席里的我們，更應該審判自己的罪過。

\*\*\*\*\*

東京審判效仿的是紐倫堡審判，似乎日本在亞洲的戰爭同希特勒的戰爭大體上并無二致。可是，就連法官也承認，日本被告并不是東方的納粹。東京軍事法庭庭長威廉·韋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就認為，“德國被告的罪行要比日本被告駭人聽聞得多，種類更多，范圍也更廣。”換言之，在紐倫堡，除了反和平罪外，幾乎所有被告都被宣判犯下了反人類罪。可是，僅有一半日本被告因為政治罪行被判無期徒刑。

作為檢察官之一的弗蘭克·塔文納（Frank Tavenner）表示：“站在紐倫堡軍事法庭上的是權勢熏天的惡棍團伙，他們是罪惡環境里的渣滓，除了對作惡多端訓練有素之外一無是處。但日本被告按理說應該是國家精英，是誠實而可信的領導人，人民可是放心地把國家的命運托付給了他們……”[(81)](#_81_1)

責任問題在日本永遠都是件麻煩事，因為在這個國度，形式責任比實際的罪孽更容易認定。不光是因為許多人——比如木下劇作里的主人公——為上峰的所作所為頂了包，這在日本黑幫中間很常見，在政界或商界亦是如此，而且最上面那些人往往根本無力控制行為不檢點的下屬。亞洲各地匆忙組建了軍事法庭，但法官們都對日本國情毫無認知，因此，他們在認定日本指揮系統內部誰應該負什么責這一點上力所不逮，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日本，人們如此同情那些外國人眼中的戰犯，特別是所謂的乙級和丙級戰犯。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或者向下屬發號施令，譬如戰地指揮官、營地看守等等。

1953年，一場要求釋放所有日本戰犯的運動征集到一千五百萬人的簽名。駐東京的西德大使館向波恩的聯邦司法部發去了一份電文：“鑒于審判結果是戰勝者單方面下達的，有打擊報復的成分日本人因而認為，舉行戰爭罪審判的實際目標從未實現。（日本戰犯并未意識到自己是戴罪之身，他們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戰爭行為，是出于愛國才如此為之。”[(82)](#_82_1)

1953年也出了不少電影，譬如《太平洋之鷲》。影片將戰時領導人描繪為烈士或熱愛和平的英雄。“太平洋之鷲”說的是偷襲珍珠港的策劃者和執行人、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山本從許多方面來看其實是個溫和派，值得敬佩。與他相比，山下奉文將軍則沒那么溫和，當然，他無疑是“袋鼠法庭”[[19]](#_19_Ji_kangaroo_court_Yi_Zhi_Tia)的受害者。同山本一樣，山下也是一部英雄崇拜電影的主人公。在他的指揮下，日軍在菲律賓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暴行。1945年的馬尼拉浩劫同南京大屠殺一樣慘絕人寰。因此，影片將他描繪為一位愛好和平的紳士，而將馬尼拉的美國檢察官塑造為幾大反派之一，這一審視過去的思路似乎很不合情理。

但這么看并非全然沒有道理，因為審判的確是受到了操縱。[(83)](#_83_1)山下無疑是個強悍的軍人，但就事論事，他和遠在馬尼拉大開殺戒的部隊相隔十萬八千里，根本無從知曉正在上演的慘劇。然而，美國檢察官公開表明他一心想把“日本鬼子”送上絞架。麥克阿瑟將軍也欲為丟失菲律賓一雪前恥。于是，他加快了審判進程，并在美國最高法院兩位大法官表達不同意見之前，就決定判處山下絞刑。大法官稱其“跳過正當的法律程序動用私刑”。山下的死刑判決于珍珠港事件紀念日當天下達。有了這種先例，很少有日本人還有胃口自己來舉行戰爭罪審判，即使是那些認為把臟水都潑到“軍國主義者”頭上比較省事的人，也是如此。

政治理論家丸山真男管戰前的日本政府叫“不負責任的體制”。[(84)](#_84_1)他勾勒了三種政治性格：供人抬的“神轎”、“官吏”和“浪人”。其中，“神轎”居于最高地位，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象征，由“官吏”負責抬扛（比如節慶期間的抬神轎活動）。“神轎”是一種標志，但那些扛它的“官吏”，才是掌握實權的人。然而，一干“官吏”——包括官僚、政客、海陸軍將領——常常被最底層的“浪人”玩弄于股掌之間。這些人里有軍事冒進分子、頭腦發熱的戰地指揮官、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等暴力論者。這一不負責任的體制造成的后果是，政治因果關系完全從視野中消失了，歷史就像一根沒頭沒尾的線繩，串滿了既成事實，有的只是一段又一段處于壓迫中的沉寂。偶爾，它才會被突如其來的神秘風暴打斷，這可能是外來的邪惡勢力、大自然，或者正如日本修正主義教父林房雄所說的，是“歷史的殘酷無情”。

東京法庭被告席上的甲級戰犯是“官吏”，亦是“神轎”。他們用肩扛起至高無上的“神轎”，也就是天皇。但反過來，他們自己也被地位較低的人抬著，還會受到“浪人”的操縱。政治責任就像一曲“無窮動”（perpetuum mobile），循環往復，起起伏伏，就是停不下來。1930年代，這一體制終于失控，接二連三的事件由狂暴的浪人挑起，緊張的官吏出面應對，一切終因“神轎”的神圣地位得到合理化。說到這兒，我們觸及問題的本質，扮演“神轎”的是謚號昭和天皇的裕仁，所有戰爭罪行名義上都是為了效忠天皇，但東京審判卻對這點置之不理。

1990年夏的南京之行后，我邂逅了四十出頭、風姿綽約的佐伯裕子（Saeki Yuko）。她是撰寫日本古詩詞的詩人，作品體裁是短歌講的都是令人哀傷的家庭蒙羞史，風格極致簡約，比如這首：

父親醉了，臉紅得像個石榴，

就在爺爺被處決后的那一天。

我們守在一起，一家人，

我們的喉頭哽咽，在爺爺走后。

佐伯女士是土肥原賢二將軍的外孫女，土肥有個別名，叫“滿洲里的勞倫斯”，他因反人類罪、反和平罪和一般意義上的戰爭罪行，于1948年在巢鴨監獄被處以絞刑。此人很不尋常，雖位居要津卻是個典型的“浪人”，曾涉足恐怖行動、毒品走私，以及集中營管理等勾當。作為“偽滿洲國”關東軍的指揮官，土肥是策動侵華戰爭的推手之一。

佐伯女士的父親無法承受身為土肥原賢二之子的壓力；他頻繁換工作，并因為酗酒成性英年早逝。佐伯女士在念小學時也因此受人欺凌（不過這種事在她就讀貴族高中后就沒再發生過）。她曾滿心希望天皇能拯救自己，因為老師教導過她，天皇是“我們大伙兒的父親”。但父母告訴她，再也指望不上天皇了，因為日本戰敗了。“我們現在必須自力更生，”母親說。即使如此，天皇的畫像仍舊高掛在家里的墻上，直到1950年代她上高中時才被撤了下來，換上詹姆斯·迪恩[[20]](#_20_James_Dean_1931____1955__Hao)的海報。

佐伯女士自感家門不幸。家庭經歷變故后，她為權力的變化無常感到忿忿不平。她對天皇一直有著十分復雜的感情。她說，全賴天皇，人們才會在東京審判時對罪行問題避而不談：“被告都是他的子民。日本人對于像我外公這樣的甲級戰犯很少抱有同情，這是事實，但乙級和丙級戰犯卻被視為受害者，他們只是執行了天皇的命令。”好在天皇已經歸西，這讓佐伯女士的氣消了不少。

她對自己身為土肥原賢二外孫女這點并不感到自豪，相反，年少時對此很是不齒，但自己十來歲的兒子看法不同。他對曾祖父和一切同戰爭有關的事情都很著迷。佐伯女士說，兒子很聰明，但民族主義心理很強，拒絕承認東京審判歷史觀。當他和朋友一起觀看小林正樹的《東京審判》時，會夸口說自己是土肥原賢二的曾外孫。佐伯女士說，那時她意識到，真是今非昔比，世道不同了。

裕仁天皇不是希特勒，希特勒可不僅僅是一臺“神轎”。不過，天皇崇拜、不負責任的體制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在東京審判期間倒的確有所展現。日本人的意識形態雖然并不包含“最終解決方案”，但在種族主義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難分高低。它即便沒有驅使日軍大開殺戒，也為其野蠻行徑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亞洲的“主宰者民族”，是天神的后代。史學家家永三郎講過一個故事，故事發生在1930年代，一個日本小學生怯于解剖活青蛙，老師用指關節狠狠在他腦袋上來了一下，罵道：“為了一只破青蛙，至于哭成這樣？你長大后可還要去殺一兩百個支那人吶。”[(85)](#_85_1)

一位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兵在電視訪談節目上說，他之所以殺起中國人來能絲毫沒有良心不安，只因為他根本不把他們當人看殺人甚至還有一層宗教意味，因為這是“圣戰”的構成要素。弗朗西斯·斯科特上尉是巢鴨監獄的牧師，他問日本戰俘營指揮官，為什么要虐待戰俘。他總結了日本人給出的答案：“他們相信，但凡與天皇為敵的人都不是好東西，因此，他們越是殘忍地對待戰俘就越能顯示出自己對天皇的忠心。”[(86)](#_86_1)

裕仁天皇是個影子人物，戰后，他褪下一身海軍服，換上了灰西裝。他和希特勒在性格上并不具備可比性，但發揮的心理作用卻有著驚人的相似。米切利希夫婦曾將希特勒描繪為“一個德國人既仰仗、同時也轉嫁責任的對象。因此他是個被投注情感能量的內在客體”。[(87)](#_87_1)于是乎，希特勒象征并重振了無限權力的思想，這是我們所有人打小就夢寐以求、并希望自己也能掌握的。日本的帝制大抵也一樣，不管坐在皇位上的是無情的戰犯，還是和藹的海洋生物學家。

然而，1945年后，麥克阿瑟將軍選擇保留的恰恰就是這種權威象征，這一最神圣的“神轎”。順便提一句，這也是日本開出的投降條件之一。但是，這個要求被盟軍拒絕了，他們繼而摧毀了廣島和長崎，逼迫日本就范。1945年后，人們擔心的是，一旦沒了天皇日本將變得無從治理。但實際上，麥克阿瑟擺出一副傳統日本政治強人（許多日本人因此很崇拜他）的做派，利用帝制象征鞏固自己的權力。結果，他扼殺了日本民主制度運轉的希望，并嚴重扭曲了歷史。因為若要保留天皇的話（起碼可以迫使他退位），裕仁的過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點；可以說，象征物必須和以其名義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

保留天皇也許讓日本變得更易治理，也許沒有，但這么做激起了極大的民怨。1987年，原一男拍攝了一部驚世駭俗的紀錄片，片子圍繞帝國陸軍退伍老兵奧崎謙三展開，片名叫《浩蕩的神軍》奧崎曾在新幾內亞服役，軍銜二等兵。戰爭末期，奧崎回國后，得知排里的兩名年輕戰友稀里糊涂地被指揮官槍斃了。奧崎執念于此，發誓要弄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因此決定去尋找所有生還者。

奧崎的行為少說也算得上怪異。他曾因用彈珠射天皇、散發印有天皇淫穢漫畫的宣傳冊蹲過大牢。他開著一輛面的，在日本四處巡游，車身掛滿了橫幅和口號，要求天皇為將百萬青年送上絕路道歉。拿他自己的話來講，他之所以努力追尋事情真相，是為了“告慰那些為天皇捐軀的英靈”。

奧崎既不是基督徒，也非佛教或神道教社團成員。他信奉自己所謂的“奧崎教”，這是一種自然法則和無政府主義的結合體。我們所能想到與之類似的文學人物不是日本人，而是德國人，即克萊斯特（Kleist）筆下的米夏埃爾·科爾哈斯[[21]](#_21_Michael_Kohlhaas_De_Guo_Zuo)，一個來自勃蘭登堡州的馬販子，他一心想討個公道，卻引發了謀殺和騷亂。

原一男的手持攝像機自始至終跟隨著奧崎的腳步，拍攝的影像晃動而模糊。觀眾永遠也不知道劇情接下來將如何發展。人物的行為一直處在混亂邊緣。一幕中，奧崎怒踹一位病怏怏的老戰友，因為后者不肯說實話。另一幕中，他與昔日的長官扭打在一起，兩人雙雙倒地。警察試圖拉架，但奧崎讓他們少管閑事。他對權威的反感——不管是何種權威——從影片開頭就十分清楚。奧崎說，警察和打仗時的軍人沒什么兩樣，最大的能耐就是服從命令。但是，盡管面對無窮無盡的謊言和推諉，漸漸地，不堪入目的真相一點點浮現出來。兩名青年并非像人們認為的那樣，因為臨陣脫逃被槍斃。排長下令殺死他倆，是打算吃他們的肉。殺死袍澤以食其肉這種事并不多見，一般說來，被吃掉的多為土著和敵軍士兵。但這些人不是經常碰得到，況且兩位二等兵也不討排長喜歡。當然，排長自己從未承認過。事情真相只能通過他人敘述一點點拼湊出來。

但光找出真相還不夠，奧崎想要老排長親口承認。無休無止的謊言讓奧崎憤怒。排長是個臃腫的老頭兒，住著寬敞的大房子，生活沒有虧待他。奧崎一把揪住他，喝令他必須坦白交代，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老頭兒說事情不是奧崎想的這樣，要知道，那可是戰爭，當時那種情況下，他只是履行了作為日本軍人的職責。奧崎怒罵道：“你只會拿這個當擋箭牌！要我說，人類不負責任的最高象征就是天皇，接著是效忠他的軍官，比如你這號人……”影片結尾奧崎本想一槍斃了排長，但打偏了，子彈擊中了排長的兒子。他說這就叫天道。他自己也領教了天道，被判終身監禁。

裕仁天皇不僅逃脫了東京審判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傳喚他出庭作證。日美兩國達成協議，最高“神轎”不得受一絲牽連。阿瑞斯蒂德斯·喬治·拉薩魯斯（Aristides George Lazarus）是某位將軍的辯護律師，他被要求安排讓“軍人被告和他們的證人在陳述過程中特地指出，裕仁在召開商討軍事行動和方案的會議，只是按照慣例不得不出席，他的存在不具備惡意”。[(88)](#_88_1)毫無疑問，其他律師也接到了類似的指示。

庭審過程中，計劃只有一次險些出錯。首席檢察官基南在盤問東條英機將軍時，后者承認，“沒有日本臣民敢于違抗天皇的旨意。”[(89)](#_89_1)盡管麥克阿瑟精心布置，但這一幕出乎意料。審判中，基南還被迫誘導另一被告木戶男爵[[22]](#_22_Marquis_Kido_1889____1977__J)——他負責保管御璽，戰時大部分時間是與天皇走得最近的幕僚——設法讓東條改變證詞。東條向來對天皇忠心耿耿，一周后改口了。他說，“聽了最高指揮部給出的建議，天皇才很不情愿地同意開戰。”然而，他補充道，“直至戰事開啟前，天皇從未改變對和平的熱愛和期盼，甚至在戰時，他的這一信念也未曾動搖。”

這里的關鍵不是說多數日本人希望看到天皇上絞架，或樂見他出庭受審。問題在于，天皇的罪行問題遠遠超出了歷史公案的范疇。畢竟，作為壓制言論自由和政治問責的工具，帝制一直被沿用至戰爭末期。倘若不檢視天皇在戰時的角色，“不負責任的體制”就無法昭然于天下，如此一來，它就很可能會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其存在。

帝制的早期批評者意識到了這點。[(90)](#_90_1)1946年，左翼電影導演龜井文夫拍攝了一部名為《日本的悲劇》的影片，對天皇的戰時角色有過激烈的批判。剛開始，美國審查人員沒看出這部由新聞資料片、相片和報紙報道東拼西湊、剪輯而成的作品有何不妥之處，但是經過一次內部放映后，首相吉田茂向軍事情報處負責人查爾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將軍告了一狀，說這部電影有顛覆性。威洛比表示同意，影片因此被禁。1984年，《日本的悲劇》再度公映時，龜井與電影史專家平野共余子一同出席了放映式。龜井告訴她，差不多在電影被禁的時候，日本人停止了對裕仁天皇戰爭責任的積極討論。這讓日美官方感到欣慰，而受益的還不止他們。只要天皇還活著，日本人就會在坦白過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為天皇對發生的一切均負有正式責任，而通過免除他的罪責，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當然，部分軍人和平民替罪羊，即“官吏”和“浪人”要除外，正是他們，淪為了“勝利者正義的犧牲品”。

[[1]Kraków，波蘭南部城市。](#_1_9)

[[2]Przemyl，波蘭東南部城市。](#_2_7)

[[3]Belzec，滅絕營，位于波蘭東南的盧布林地區，共有六十萬人在此遇害，大多為猶太人。](#_3_6)

[[4]Simon Wiesenthal（1908——2005），納粹獵人，先后將一千一百名納粹送上法庭。](#_4_6)

[[5]Ernst Kaltenbrunner（1903——1946），奧地利人，海德里希之后接任納粹帝國保安總局（SS-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局長，參與組織實施對猶太人的滅絕，紐倫堡審判中被判處絞刑。](#_5_5)

[[6]Wilhelm Keitel（1882——1946），納粹德國陸軍元帥。](#_6_4)

[[7]Hjalmar Schacht（1877——1970），經濟學家、銀行家，納粹掌權初期曾出任帝國銀行行長和經濟部長，后來加入抵抗運動反抗希特勒，紐倫堡審判中被判無罪。](#_7_4)

[[8]Ernst Röhm（1887——1934），納粹運動早期領導人之一，沖鋒隊（SA）組織人，在“長刀之夜”遭希特勒清洗。](#_8_3)

[[9]Gregor Strasser（1892——1934），納粹黨早期領導人之一，后遭到希特勒以排除異己為名鏟除。](#_9_3)

[[10]Christian Geissler（1928——2008），德國作家、導演。](#_10_2)

[[11]奧拉多（Oradour）和利迪策（Lidice）分別是法國和捷克中部的村莊，二戰中納粹為報復當地抵抗運動對其進行屠村。](#_11_1)

[[12]Majdanek，波蘭地名，納粹曾在此設立集中營，二戰期間有將近五十萬人在此遭到囚禁，其中約三十六萬人死亡。](#_12_1)

[[13]Josef Kramer（1906——1945），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長官，被稱為“貝爾森野獸”，后來以反人類罪被處決。](#_13_1)

[[14]Hans Fritzsche（1900——1953），納粹德國宣傳官員。](#_14_1)

[[15]Alfred Krupp（1907——1967），德國鋼鐵大亨，納粹工業家，二戰期間曾使用奴工為德國制造軍火。](#_15_1)

[[16]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 zur Aufklärung von NS Verbrechen.](#_16_1)

[[17]即“馬島海戰”，英國與阿根廷圍繞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歸屬權，在1982年進行的一場戰爭。](#_17_1)

[[18]Bikini Atoll，馬紹爾群島北端的堡礁，美國從1946年到1958年共在此進行了六十多次核試驗。](#_18_1)

[[19]即kangaroo court，意指跳過正常法律程序的法庭。](#_19_1)

[[20]James Dean（1931——1955），好萊塢著名影星。](#_20_1)

[[21]Michael Kohlhaas，德國作家克萊斯特作品《馬販子科爾哈斯》中的主人公，因為隨從被打，馬匹被容克貴族強行征用，且備受虐待，愛馬如命的科爾哈斯氣憤難平，走上了民告官的道路，但從未勝訴，處處碰壁的他于是選擇了暴力反叛，最終落敗后被處死。](#_21_1)

[[22]Marquis Kido（1889——1977），即木戶幸一，昭和時期政治家。](#_22_1)

## 第七章 教科書風波

德國

在《美國羊棲菜》里，野坂昭如描繪了1945年日本小學生眼中的世界。戰時學英語沒什么用，歷史老師說過，只要知道“Yes和“No”就行了。[(91)](#_91_1) 1941年，山下奉文將軍要求駐守新加坡的英軍無條件投降時，只對白思華將軍（Gen. Percival）喊了句：“Yes還是No？”但戰爭既然已經結束，是時候學會說“三克油”（謝謝和“一刻斯庫私密”（勞駕）了。

歷史老師過去常說，白思華將軍是典型的白人：別看他個頭高但膝部軟弱無力。打架的時候，只要是個日本人就能把白人放倒因為日本人有強壯的大腿。白人弱不禁風，老坐椅子，而日本人坐的是榻榻米，練就了肌肉力量。然而，待到戰爭結束后，歷史——突然被重新命名為“社會研究”——老師改口了：“瞧瞧那些個美國人，他們的平均身高是五英尺十英寸。我們呢，只有五英尺三英寸。相差的七英寸決定了一切，我相信這身高的差距正是我們戰敗的原因。根本性的體力差距，勢必會在國力上體現出來。”男孩們不明白老師干嘛這么說，“但是他太擅長巧言令色這套了，讓人吃不準他的話能否當真。也許他這么說，只是為了掩飾自己的尷尬吧，畢竟手里拿著被審查官員涂黑的教科書，過去宣揚神圣日本，一轉眼卻在大談民主日本。”

結果，沒人再相信老師說的一個字了。他們一天前還吹噓日本人是天神下凡的民族，誓與盎格魯——美利堅魔鬼戰斗到最后一人，婦孺也不例外，人人有責。一天后，就滿嘴都是“三克油”、“一刻斯庫私密”和“德謨克拉西”（demokurashi）了。

動身前往東柏林郊區拜會兩位高中歷史教師的時候，我想起了野坂的這部中篇小說。就在兩年前，由工農兵組成、和蘇聯老大哥團結一致的反法西斯共和國，剛剛和同美國結盟的資本主義聯邦德國合并。政治局勢天翻地覆，作為其基礎，歷史也得來個一百八十度大反轉。對此，老師將如何解釋？學生中又有誰還會相信他們的話呢？

看樣貌，萊恩太太和納斯太太都是四十來歲。納斯太太是校長，曾是共產黨員。萊恩太太沒入過黨，因此一直當不上校長。兩個女人都有一張聰明而嚴肅的臉龐。頭發簡單地梳在腦后，露出蒼白的額頭。她們的著裝很樸素，同表情一樣一本正經：腳蹬大頭鞋，身穿厚毛衣。教學樓年久失修，牛糞色的墻壁上有因滲水留下的裂痕。我們相約在一間冰冷的房間，屋里有股卷心菜味兒。

我跟她們講了野坂的故事。兩人聳聳肩，面面相覷。年長的納斯太太先開口。她說，1945年，她們所在的德國不存在諸如此類的問題。在蘇戰區，90%的老師都被開除了，1949年后碩果僅存的那些鐵定是反法西斯主義者。至于說1990年，她倆任教的學校相對而言也沒碰到什么問題，因為都已經變得十分民主。說到這兒，兩人不約而同地用力點點頭。

當然了，她接著說道，某些歷史還是不能言說。比方說，波蘭軍官遭屠戮的卡廷森林事件就提不得，同樣禁忌的還有《莫洛托夫——里賓特洛普條約》（即《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我們對這些事并不知情，”納斯太太說道。“我們只說對的話，這點您務必要認識到我們只是繞過特定話題罷了。”

從民主德國的舊版教科書來看，這種說法并不確切。1939年簽署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普條約》使納粹德國和蘇聯得以瓜分波蘭，這在教科書里確有提及，但是得到了一種特定的解釋。我在萊恩太太給我的歷史教科書里查了查，145頁上這樣寫道：“《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以犧牲蘇聯為代價、解決帝國主義體制內部矛盾的這一計劃泡湯了。蘇聯挫敗了組建一支強大反蘇同盟的目標遏制了德國人在東歐的侵略。這份條約確保蘇聯能得到兩年的和平借此建設防御力量。”[(92)](#_92_1)蘇聯侵略波蘭不是為了搶奪波蘭人的領土而是“保護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免受法西斯侵害”。

年輕讀者在讀到這段文字時，被要求回答印在留白處的兩個問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有何意義？”以及“為何時至今日，帝國主義理論家們依然憎惡這一條約？”萊恩太太和納斯太太的任務就是要把政治觀正確的答案教給學生。

“當然了，”納斯太太說，“我們必須告訴孩子們，今天給他們講的一些事，我們過去真的不知情。他們接受了這一說法，表示能夠理解。可就算在過去，他們也心知肚明，連我們自己都不相信跟他們說的那套鬼話。我們生活在柏林，所有人都收看西方電視節目大家都是明白人，只是不說出來罷了。”我不由想起所有看過《大屠殺》的東德人，他們沒法討論劇情，是因為本就不應該看。

“這里不存在什么罪行問題，”萊恩太太說道。“我必須告誡學生讓他們在學校組織去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時表現得規矩點。我得說明，那兒的人依舊視我們為挑起戰爭的罪魁禍首。您瞧，什么兄弟情誼、團結友愛都是胡扯淡。他們依舊恨我們。但我的學生覺得這難以理解，他們真心不懂。他們當中有個人因為穿著德國國旗顏色的百慕大短褲，結果在華沙街頭叫人給打了。”

那么現如今呢？我問，學生們是否接受了另一種歷史闡釋？兩人不屑地翻了翻白眼。

“他們變得很被動，”萊恩太太說道。“再也不向我們提問，”納斯太太接話道。“沒有批判思維，只管看錄像。”沒錯，萊恩太太插話進來，“而且年齡較大的孩子只是聳聳肩，不解自己為何要關心。他們會說，‘這有什么意思呢？’”

接著，西德送來了新版教材。萊恩太太和納斯太太怎么看待這些書？

“哦，”納斯太太開口道，“看著不錯，至于內容嘛，哎……”

“一無是處，”輪到萊恩太太發言了，“十分膚淺。”

我請她們說得具體些。

“對于戰爭及其為何會爆發等問題探討得還不夠，倒是猶太人占了很大的篇幅——但所涉之事又都很膚淺，既沒框架，也沒背景……”

我很好奇，她們期待看到的是什么“背景”，她們是否懷念馬克思主義關于壟斷資本是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根源的論斷？

“噢，”兩人異口同聲地答道，“我們就是相信這個。是那些從壟斷資本主義當中獲益的人發動了戰爭。這是明擺著的。我們還是會這么教學生。但您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學生對昔日民主德國和一個新的聯邦德國間歷史根源的區別很敏感。難就難在，我們得讓他們自己拿主意。”

\*\*\*\*\*

東德歷史書對二戰的主要立場在兩篇短文中可以得到歸納，它們均出自萊恩女士提供的課本。其中一篇提及了1935年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德共代表會議：“因為希特勒政權是由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最好斗之徒組成的專制統治，其客觀上就違背了不同階級大多數人的利益。針對希特勒專政的斗爭因此必須以建立一種反法西斯民主秩序為目的。這一目標符合民主和愛好和平的各股力量的利益倡導建立這一廣泛同盟的是德國共產黨。”

另一篇文章提到了德共在戰后的第一項舉措：“就在反希特勒同盟的大軍從東西兩線迫近德國邊界之際，身處抵抗組織、集中營或流亡海外的共產黨人已經在為一個民主、熱愛和平的德國打基礎只等法西斯政權被推翻的那一刻。”

萊恩太太和納斯太太的學生怎么可能有負罪感？他們出生在這個民主且熱愛和平的德國，他們可是抵抗力量的后代。他們的長輩跟希特勒政權斗爭過（斗爭的對象不是德國甚至不是納粹德國；善良的德國一直存在，存在于地下，存在于海外流亡人士中間，也存在于共產黨人中間）。在德國漫長而動蕩的歷史長河中，第三帝國這段往事不是一次悲劇性的背離，它也并非是脫胎于德國理想主義（German idealism）陰暗一脈的必然產物——事實上，德國理想主義者中那些沙文主義色彩最濃厚的，譬如《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一書的作者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或人稱“體操之父”的弗里德里希·雅恩（Friedrich Jahn），在民主德國都是備受尊崇的偉人。恰恰相反，第三帝國的歷史首尾一貫遵循顛撲不破的歷史法則。“希特勒政權”只不過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最殘暴的終極階段。正如某位東柏林喜劇演員所言：過去屬于西德，未來屬于我們。

東德教科書所選的插圖驗證了這種看法。里面印有共產黨抵抗英雄的畫像，比如統治東德將近二十年的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以及1941年臨刑前高喊“共產黨萬歲！”的海因茨·卡佩勒（Heinz Kapelle）。俄國女游擊隊員索婭·科斯莫德米楊斯卡婭（Soya Kosmodemyanskaya）的照片也赫然在列，她在莫斯科附近就義前也曾高喊：“同志們，堅持斗爭，無所畏懼！”除此之外還有希特勒的照片，他身旁簇擁著實業界的大佬，點明了抵抗力量要對付的是哪類人。除開一兩張東線戰場上的蘇聯軍人外，關于戰爭本身的照片很少。集中營的照片倒是有幾張：幾乎全部攝于布痕瓦爾德，那里關押著不少共產黨人。不過，其中一張里，一名蘇聯兵正和一個身穿集中營條紋囚服的囚犯握手，這一幕斷不可能發生在布痕瓦爾德，因為率先趕到那兒的是美國人。

暴行和種族滅絕在這些文字當中的地位，沒有蘇聯解放者和共產黨起義者的英雄氣節來得明顯。民主德國的孩子不會被要求對父輩或祖輩所犯罪行進行懺悔或反思。奧斯維辛不是他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他們受到的教導是向英雄看齊。

誠如萊恩太太和納斯太太所言，西德教材展現的是迥然不同的過去。這種過去肯定會讓那些“并不知情”的人感到震驚。聯邦德國的課本里鮮有抵抗主義英雄的照片，大屠殺的照片倒是有很多。幾乎每本教材里都配有一張著名的照片：黨衛隊軍官腳蹬锃亮的皮靴，筆挺地站在比克瑙的火車站匝道處，挑選出要當即處決的犯人。對納粹文獻的引用十分詳盡，我們甚至可以看到某個具有代表性的集中營懲戒規則、1935年的《種族法》、戈培爾或戈林的演講文，以及海德里希就1938年“水晶之夜”所作的官腔濃重且故弄玄虛的報告。

帶著全班學生旁聽施瓦姆貝格案的中學老師伯恩德·韋茨卡告訴過我，西德的學校按照慣例，建議老師每年講授六十小時左右的納粹歷史。韋茨卡是歷史老師，在施瓦本地區的一個小鎮上教書，鎮子鋪著卵石路，一座中世紀古堡與成排的17世紀房屋相映成趣。他帶著我參觀猶太公墓，我倆來到一對兄弟的墓前。哥哥是德國軍官，一戰中陣亡在法國；弟弟于二十五年后死在了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這一“模范”集中營內[[1]](#_1_Te_Lai_Xi_En_Shi_Ta_Te_Ji_Zho)。

我同韋茨卡和他的女友一起啜著茶，后者也是教書匠，三十出頭，比韋茨卡年輕十歲左右。兩人都說自己的學生對納粹時期有著濃厚興趣。比對民主德國的興趣還要大么？“絕對要更大，”韋茨卡說，“因為我們真心不覺得東德——譬如斯塔西這種東西——是我們民族歷史的一部分，反之，第三帝國則肯定是。”

韋茨卡的父母都是隨大流的人，換言之，他們過去都是微不足道的納粹。父親在武裝黨衛軍（Waffen SS）服過役，參加過東線戰事；母親是希特勒少女聯盟里的積極分子。老爺子至今仍保存著飾有納粹黨徽的鐵十字勛章。韋茨卡感到很難和父母探討過去，老師也沒怎么給他講過。那些戰時尚年幼的人沒有傾訴的需求，而戰時業已成年的人則不愿提及往事。不過，有位韋茨卡不太喜歡的老師，這個老頭兒打仗受過傷，為人專橫霸道。一天孩子們問起第三帝國是怎么回事的時候，他突然情緒崩潰，放聲大哭。“我們都有罪，他邊哭邊說，“我們看到墻上‘宰了猶太人’的標語，卻袖手旁觀什么也沒做，我們都有罪。”

區別于民主德國的做法，負責編寫聯邦德國教科書的并不是聯邦政府遴選的學者。每個州的課本都不一樣。出版商將需送審的課文遞交至州政府，后者任命教師委員會（委員由家長和學生推薦審查內容。原則上講，課本通不通得過，取決于其是否符合憲法和意識形態沒有關系，只要合乎憲法和教育法，就能通過審批。

教育法某一條款明確規定，教學材料“不應阻礙學生形成自己的主見”。以巴伐利亞州一本典型的高中歷史教材來看，這一條款得到了嚴肅的對待。[(93)](#_93_1)課本每一章節的提問用意不在考驗政治正確性，而是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比方說，書里摘錄了一段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話，他在寫于1933年的這段話里為納粹黨的法律地位做了定性。他認為，納粹既非私人組織，也不是國家它自成一體，法庭無權過問。緊隨這段引言之后的，是黨衛隊軍校某校長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講詞。作者告訴學員，他們將要成為新型希臘城邦國家里的貴族，只對希特勒惟命是從。學員在讀完語錄后，被要求圍繞“在一個建立于錯誤規范之上的國家，個體應如何行事”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諸如此類的課堂討論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韋茨卡有些吃不準，除了講述事實外，還應怎樣探討第三帝國，又如何分析其意義？他的女友更青睞后現代式的教學法。她傾向于讓學生閱讀希特勒的演講，對之進行解構，分析聽眾為何盲從于他。韋茨卡因為年齡大出她一輪，很難接受“特殊道路”（Sonderweg）的理論。這種看法認為，德國歷史發展的軌跡獨一無二，存在致命缺陷。他覺得，“很難說納粹主義是不是德國人的專利，不如跟孩子們講，當某一特定群體為多數人所厭惡時，局勢會急劇惡化。也許這樣來得更好。”

或許這就是兩位東柏林教師所說的缺乏“框架”的含義。然而，西德教科書還是有框架的，雖然同共產主義國家的宣傳不一樣，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卻和東德的課本別無二致。巴登——符騰堡州的高中老師人人分到一本手冊，上面詳述了給孩子們講授“國家社會主義專政”需取得的成果：“學生應了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以及專政是如何建立的。他們還應了解納粹實行迫害和大屠殺體制的慘無人道。在認識到‘第三帝國’的極權特征后，學生必須承認，我國的自由民主秩序保障了我們的基本權利。”該手冊強烈建議組織參觀集中營。

這么做是為了促進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謂的憲法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憲法愛國主義是唯一能讓我們不與西方疏離的愛國主義。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對普世憲政原則的忠誠，只有在奧斯維辛之后——也端賴奧斯維辛——才在德意志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樹立起來。”[(94)](#_94_1)

這種做法，我們也許能稱之為歷史研究的社會科學思路。學生再也不用被要求對國旗、歌曲、英雄或某種精心打造的歷史延續性的觀念產生認同。認同對象換成了自由民主秩序。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這都和東德的社會主義秩序形成了反差，因為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不相信個人基本權利，而是秉持為集體理想獻身的信念為了灌輸這種信仰，使用的卻盡是舊政權的那套繁文縟節：旗幟火炬游行、偉大領袖、軍事化青年團體，等等。崇拜共產黨抵抗領袖，就是崇拜名義上由他們所創立、實際上間或由他們所支配的國家。哈貝馬斯和西德課本編寫者構想的憲法愛國主義，則明確反對國家崇拜。在哈貝馬斯看來，既然自由愛國主義“端賴”奧斯維辛才能產生，這就意味著要斬斷和過去、和“文化民族”的聯系。

自由愛國主義所欠缺的，是民族身份認同的象征意義。人們批評其枯燥、抽象、淺薄。“我們正處于淪落為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危險之中”，聯邦德國總統瓦爾特·謝爾（Walter Scheel）在1975年如是說。十年后，歷史學家米夏埃爾·施蒂默爾（Michae Stürmer）對西德人的精神空虛和喪失民族定位表達了擔憂之情這也是始于1986年的“歷史學家辯論”的若干問題之一。拉開這場辯論序幕的是《法蘭克福匯報》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保守派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名叫《往事并不如煙（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諾爾特、施蒂默爾等保守派主張，不應讓奧斯維辛成為阻斷德國歷史延續性的一枚楔子因為歷史必須為一個民族提供身份認同——不僅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也是審美上的。德國人理應認同民族英雄，拿著名史學家安德里亞斯·希爾格魯伯（Andreas Hillgruber）的話來說，認同對象甚至可以是1944年的普通德國兵，因為他們抗擊了侵犯德國領土的共產勢力。哈貝馬斯指責保守派意圖復辟反動的歷史決定論，企圖散播反共的德國民族主義。

但實際上，西德教科書提供的仍是一種基于民族和地域歸屬上的身份認同。同東德教科書一樣，它立足于抵抗的概念；這一身份誕生于同納粹政權的對抗。有人稱，1933——1945年的德國并未完全被納粹運動滲透，“盡管盟軍在戰時不會承認”。每本教科書都詳盡介紹了形形色色的抵抗組織，包括共產黨、神甫、牧師、學生（比如“白玫瑰”[[2]](#_2_Die_Weisse_Rose_Er_Zhan_Qi_Ji)）、社民黨人。當然，最后還要算上申克·馮·施陶芬貝格男爵（Count Schenk von Stauffenberg）和他多為貴族出身的軍隊同僚。1944年7月，他們刺殺希特勒的計劃失敗。后者繼而發動瘋狂反撲，數以千計的德國人慘遭殺害。主謀者被吊死在普勒岑湖（Plotzensee）監獄內一個暗無天日的大牢里，這片傷感之地至今仍被人們奉為圣地。據傳，就在臨刑前，施陶芬貝格高呼：“神圣德國萬歲！”希特勒愜意地待在巴伐利亞山區的療養地，把絞刑的錄像看了一遍又一遍。

盡管施陶芬貝格無疑是英雄人物，但由于他參與了“資產階級軍人”陰謀，而這群人并無意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東德教科書就必須闡明，他不是我們中的一分子。不過也并未鞭笞他。我們得知，施陶芬貝格的交際圈里存在具有“進步政治思想”的人，同共產黨有聯絡。但是在西德，他的聲名一樣存在爭議。“神圣德國萬歲！”這句口號可不對左派的胃口。況且，就算某人再怎么憎惡希特勒及其心腹，暗殺預謀在右翼分子眼中終歸等同于叛國。雖然柏林的一條馬路在1955年被命名為施陶芬貝格大街，但直到1967年柏林市議會才決定，在昔日施陶芬貝格策劃政變的軍事司令部舊址上建造一座紀念館和檔案中心。

宗教在德國抵抗運動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巴伐利亞州的教材在這點上大做文章。編者稱，希特勒的施政方針和施陶芬貝格的宗教人文精神相對立。由于是在巴伐利亞，編者對天主教會給予了格外關注。舉例而言，課本里寫道，多數篤信天主教的巴伐利亞人在1932年沒有把票投給納粹黨。神職人員單槍匹馬的英雄行為得到了放大，譬如奧古斯丁·羅施（Augustin Rosch），一位慕尼黑的耶穌會教士。這些事跡固然都很光明磊落，卻并不意味著納粹在巴伐利亞不得人心，僅僅顯示出天主教徒遵照神父吩咐，把票投給了天主教保守派。后者在1933年后還是被迫解散了。

然而，這些地方的特殊關注最終還是讓位給了一條強有力的政治信息，或者拿一些人喜歡的話來說，讓位給了政治框架：“德國共產黨、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宗教人士、軍人和貴族階層為反抗希特勒付出了代價，不是喪失自由，就是失去了生命。但這一反抗納粹專制的聯盟開啟了戰后德國憲政和社會秩序的發展進程……抵抗運動和德國自由運動聯手，從而使得在聯邦德國憲法中確立人文價值、法治原則、民主、福利國家、聯邦制度的努力變得較為容易。”

從當時各自教科書中呈現的歷史來看，東、西德都建立在抵抗運動的遺產之上。這種觀念很有感召力，而倘若對歷史人物的認同是得到提倡的話，那么認同馮·施陶芬貝格男爵顯然要好過認同海因里希·希姆萊（東德的英雄恩斯特·臺爾曼[[3]](#_3_Ernst_Thalmann_1886____1944)和埃里希·昂內克就不那么具有榜樣效應了，當然總還是強過希姆萊）。

但這么做的影響并不總是好的。在東德，推動英雄崇拜是極權主義宣傳機器的任務之一，它嚴重歪曲了歷史。當英雄形象化為烏有，宣傳機器勢力不再后，數以百計、興許是數以千計大失所望的年輕人就會站起來造反。他們祭出過去專制時期的英雄和符號，在街上高喊“勝利萬歲！”（Sieg Heil）[[4]](#_4_Na_Cui_Jian_Mian_De_Zhao_Hu_Y)，崇拜納粹領導人，仿佛是在緬懷一個更加英雄輩出的年代。而辜負他們期待的長輩封殺了這段光榮歲月。

在西德，抵抗運動的官方說法讓不少“希特勒的孩子”[[5]](#_5_Hitler_s_children_Ci_Chu_Zuo)認為，任何反抗國家的舉動不僅因為過去可以得到正名，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勢在必行。不管赤軍派的手段和目標有多么令人毛骨悚然，還是可以博得“六八一代”的同情，哪怕僅僅因為他們敢于做大多數德國人在三十年前都沒能做到、卻具有重要意義的事。

退一步講，同樣是“六八一代”，一些頭腦冷靜的人卻明白，德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必須立足于對納粹歷史的公開批判。謹小慎微、緘口不語和避重就輕，曾被認為是將數百萬原納粹分子改造為共和國公民的必要條件，但是時候與之一刀兩斷了。如果說這種一刀兩斷有時來得太唐突、太粗暴、太自以為是的話，那么它所激起的辯論和智力上的交鋒，也為時代氣氛注入了一絲清風。不同于或因心生厭惡、或因不屑一顧而遠離政治的老一輩德國知識分子，許多“希特勒的孩子”積極投身其中。而當他們察覺到異樣的苗頭后——反應偶爾會有些歇斯底里——至少能挺身而出，表明立場。1992年，當身穿納粹行頭的暴徒縱火焚燒避難者住所、殺害外國人，嚴重威脅社會時，上百萬德國人走上街頭抗議示威。半數以上的慕尼黑市民參加燭光游行，表明反對暴力排外主義的立場。起碼從表象上來看，德國人明白了異見的價值。

日本

家永三郎是日本歷史教授，過去做過高中老師。1952年，他編寫了一本高中歷史教材，后被廣泛采用。但四年后，麻煩找上門來。文部省認為，家永對日本亞洲戰爭的描寫太過“一邊倒”——換言之，太負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寫。1964年，家永終于忍無可忍，并于翌年起訴政府違憲。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別和政府又打了兩場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刪除有關南京大屠殺、日軍奸淫婦女和日本在偽滿的醫學實驗等段落。家永稱，審查教科書有違戰后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經七十九歲的家永仍然在東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間經歷了不斷的上訴和被駁回。

初識家永，首先留意到的是他的年邁體弱。他走起路來有些吃力，很容易累著。體格瘦小的他看起來弱不禁風，蒼白的腦袋因為謝頂，形似一枚雞蛋。寬大的眼鏡看著跟身體其他部位不太協調我很納悶，他哪來的精力和動力堅持斗爭二十七年。坐在位于東京郊外寓所的書房里，他講述了自己的戰爭經歷，算是回答了我的疑問。

“1941年12月，聽到日本偷襲美國后，我就知道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但當時我斷不能這么說，所有一切都受到嚴密監控。那時的我還在新潟一所中學教歷史，文部省命令高中和初中老師教授關于天皇的神話，關于日本民族的神圣血統，等等。”

他編了本教材，書中將遠古日本諸神和神話中的天皇描繪為日本獨特價值觀的傳承者。神話被當成了歷史。家永邊嘆氣，邊翻著這些一碰就破的舊紙張，坦言他不希望日本孩子再讀這種書。

“教室成了離經叛道的地方，我們身居其中，不得不踐踏自己的原則。我很慚愧，沒有拒絕講授國家倡導的歷史觀。我將一輩子因此蒙羞。請注意，我不是鼓吹戰爭的宣傳家，但也沒有出力制止。

1965年，家永在法庭上首次為自己辯護時，稱自己心懷愧疚：“我那時只惦記著自己的良心，但我有罪，在我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遭到蹂躪時，我只是袖手旁觀。數以百萬計的同胞死在這場戰爭中我命大，才活了下來。我對自己眼睜睜地看著山河破碎感到無比羞愧……我只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輕，但就算只能盡綿薄之力，我也希望為過去沒能奮起反抗做出補償。這就是我今天打這場官司的原因。”

有句話反復出現在家永的著作和演講中：日本沒有抵抗。199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出庭后又復述了一遍。在高等法院不遠處一間租來的大會堂里，家永對其支持者說道：“納粹德國及其軸心國伙伴日本之間的最大區別在于，不少德國人抵抗過，并為之獻身。而在日本，幾乎沒人抵抗過。我們是個唯命是從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們是否打贏這場官司，而是應該毫不動搖地斗爭下去。”臨走時，支持者起身歡送家永。他緩緩挪動著步子，走出會堂，瘦弱的肩膀低垂著，仿佛背負著沉甸甸的包袱，厚底鏡片后的雙眼不住地眨動。

他輸掉了官司，輸得一敗涂地，這點毫無懸念。1993年3月16日，法院下達判決書。家永早料到會是這個結果，但就連他都對裁決的草率程度吃驚不已。他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氣氛很是激烈。會上，他說自己難以抑制怒火，裁決書讓日本蒙羞。一個月后，我給他打了電話，想再見見他，但他推辭說自己已精疲力竭。還會再斗爭下去么？“那當然，那當然，教科書這樁案子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他表示，相較于大城市報章發表的不溫不火的社論，地方媒體對他的支持力度則要大得多。“你離東京越遠，”他說，“就越享有批評政府的自由。”家永案并不是檢驗這句話的唯一例證。

戰爭結束時，一切都顯得那么鼓舞人心。日本投降后不久，新的教科書尚未發放，因此舊版本得以沿用，只是里面的軍國主義段落被用墨水涂黑了。然而，1946年，一本名為《我國的道路》的新教材問世。這是自1881年以來，第一部一上來就描述石器時代，而非遠古神明及皇族后裔等民族神話的教科書。一年后通過的《教育基本法》限制了政府對教育資源的控制權。教育的宗旨是“培養熱愛真相與和平的人民”，并且“遵循日本憲法”，建設“一個推行民主和崇尚文化的國家”。學校有權自行選用私人編撰和出版的教科書。德育課被取消了，而歷史則成了社會研究課程的一部分。

這掀起了一場革命。至少從1890年頒布《教育敕語》以來，日本教育就一直是帝國的宣傳喉舌。時任首相的山縣有朋嘗言，“教育和軍隊一樣，應該奉行皇道。”[(95)](#_95_1)他還說過，在國家危難之際所有日本人都應遵循教導，“勇敢地”為國家獻身，“保衛和維護我國皇權的繁榮昌盛”。

就連地理課都是為帝國事業服務的。某本戰時地理課本描述“日本的形狀”具有“重大意義。我國看上去處于亞洲前沿，雄赳赳地探向太平洋。與此同時，我們也顯示出已做好準備，保衛亞洲大陸，防范外部入侵”。

德育課被抬到了極高的高度。諸如自我犧牲、軍事紀律、祖先崇拜、忠君尊王等民族美德就是以此方式灌輸的。20世紀上半葉軍旅英雄在多數國家都受到推崇，成為人們競相效仿的楷模，日本也不例外。《君之代》原本是祝愿皇權千秋萬代的頌歌，后來成為人們傳唱的國歌，旭日旗也插遍了亞洲各個角落。所有日本人在聽到神圣天皇的大名后，都有義務迅速繃緊身軀，立正站直。每所學校內都設有一尊供奉天皇畫像的神社。要是相片沾上一點灰，或者掛得不夠周正，就將招致嚴厲的懲罰。

1947——1948年，隨著國會兩院宣布《教育敕語》作廢，上述做法都被官方取締了。取而代之的是憲政主義、反戰主義（口號是“真相與和平”）、民主制度和社會研究。家永三郎第一部教材完稿付梓時，官方并未從中作梗。但大約在朝鮮戰爭爆發一年后，情況開始生變。政府某個教育改革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提出了若干看法其中一點是：“我們的體制效法一個國情不同的外國，且一心追求理想，導致許多不良因素糅入。”[(96)](#_96_1)

為了對抗這些因素，教育理事會不再通過選舉產生，而是由地方政府直接任命。文部省重新負責編撰和出版教科書。這讓政府站在了左翼日本教師工會的對立面。長期對抗致使雙方立場都趨于極端。教師工會懷疑政府在復辟軍國主義；反觀政府，往輕了說將左翼教師——其中就包括家永——視為危險的理想主義者，往重了說則視他們為賣國賊。這一永無止境的拉鋸戰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日本歷史教科書兩頭都不討巧。左派和自由派至今仍批評其內容失實，閃爍其詞，且有民族主義傾向。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則認為其帶有太多左翼意識形態“異端”的痕跡。雙方都有一定道理：被“閹割”過的教材確實避重就輕，而馬克思主義者自戰后便占據了史學界的半壁江山。

家永從不掩飾他的政治傾向。在1962年版的歷史教材里，他用一張殘疾日本老兵的照片作為插圖，圖中人物的一條斷臂綁在皮革護具里，脖子還掛著個錢盒。文字說明是這樣的：“這一悲劇性的景象雄辯地向我們揭示了《憲法》序言里用詞的深刻含義。原文如下：‘……（我們）決心，再也不重蹈因政府行為招致的戰禍的覆轍。’”[(97)](#_97_1)這完美地歸納了家永和教師工會的“憲政愛國主義”和反戰傾向。戰爭，無論是何種類型的戰爭，都是罪惡的，但最壞的莫過于“帝國主義”列強在亞洲大陸上打的一仗。家永對日本為何沒能剿滅中共的解釋是，“紅軍有民主的力量。”[(98)](#_98_1)日本的侵華戰爭是“一場政治價值觀的較量：對壘雙方是中國的民主思潮，日本的軍國主義和專制作風”。二十年后，他對越戰的分析亦是如此。

家永的左翼反戰思想和親華傾向恰恰是日本保守派試圖從教科書中抹去的。文部省希望將殘疾軍人插圖連同文字說明一并刪去，因為二者傳遞出的是“一種對戰爭極端負面的印象”。

家永在書里還用了其他照片，比如即將奔赴戰場的學生，以及在兵工廠里勞作的年輕姑娘，搭配的文字說明是這樣的：“人民生活遭殃。”然而，文部省對這些照片的看法傾向正面，“照片拍得很好，獻身國家的學生們臉上都泛著紅光。”

我翻了翻1984年出版的某本全日本通用的教材，里面沒有描繪殘疾軍人或日軍暴行的照片，有的是淪為廢墟的廣島，珍珠港內緩緩下沉的“亞利桑那號”戰艦，當年報紙的頭版頭條，轟炸中被轉移的日本人，以及參與演習的民眾。[(99)](#_99_1)最后一幅照片的文字很契合文部省的精神：“居委會在防火演習時幫忙。穿著扎腳褲、包著頭巾的婦女正勤懇地練習傳接水桶。”

家永編撰的教材提到過在幾千名囚犯身上實施致命醫學實驗的“偽滿洲國”731部隊，但后來被刪掉了，原因是該問題未經“可靠的學術研究”（開展研究的確很難，因為大部分資料都掌握在美國人或蘇聯人手里）。但到了1980年代，已經涌現足夠多的證據，證明當初家永的研究是正確的。1992年，他信心滿滿地認為，今后再版的日本教科書會將731部隊列入。

在1962年版的教材里，家永還提到，在華作戰期間，“許多日軍官兵曾奸淫中國婦女”。文部省決定把這句也刪了。“侮辱婦女”文部省表示，“是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及任何戰場上都發生過的事不應將矛頭對準日本陸軍”。

事實上，日軍的強奸行為泛濫成風，以至于一些將領開始擔心其后果——暴行將招致中國人的頑抗。因此，他們決定在靠近前線的地方建立軍中妓院（即“慰安所”），里面的女性有中國人、朝鮮人、東南亞人，以及部分歐洲人，她們都是從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村莊、城鎮和戰俘營里擄掠來的。多數“慰安婦”后來死于疾病，有些被謀害，有些死在交火中。除了家永所著的《太平洋戰爭》一書外任何日本教科書里都不曾提及過她們。事實再次證明家永是正確的后世史籍里必然有這一群體的一席之地。

證據出現的方式頗為耐人尋味。直至1980年代末，韓國人要想出國，都必須獲得政府的特批。1965年，韓國政府同意接受日本的一次性賠償，以抵銷日本的戰爭責任。這之后，個人就不得再提出索賠要求。無論怎么說，慰安婦的歷史總是令人尷尬的，因為這讓幸存者的家人感到恥辱，況且，戰時“韓奸”比比皆是。不消說這些內容不會出現在韓國的教科書里。但到了1980年代末，社會氛圍變得較為寬松，韓國人可以去日本旅行了。在女權主義團體的鼓勵下，部分原“慰安婦”決定提出索賠。然而，日本政府矢口否認自己負有責任，稱戰時組織賣淫純屬私人行為，沒有證據顯示官方曾參與此事。

如果不是因為歷史學家吉見義明恰巧在電視上看到了這番抵賴之詞，事情很可能就此不了了之。吉見記得，自己在自衛隊資料室做研究的時候，曾翻閱過一些文獻。于是，他回了趟資料室，幾天后，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東西：建造“慰安所”的官方命令，上面還有日本帝國陸軍最高指揮部的落款。一時間，日本媒體紛紛密集報道“慰安婦”的故事。日本首相不得不向韓國人民道歉。當BBC的一名記者詢問內閣官房長官，日本政府為何過了那么久才承認事實時，他辯稱，政府方面的研究者之前并不知道存在這方面的檔案。記者禮貌地表達了他的驚訝，畢竟，一位學者可是單槍匹馬、僅花了幾天工夫就挖出了檔案。這之后，電視上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整整一分鐘，內閣官房長官默不做聲，只是咬著嘴唇，不敢抬頭直視記者。最后，他開口說，這個問題問得“很失禮”。

家永用“侵略”一詞描述日本的對華戰爭。文部省任命的審查員閱后提出以下建議：“侵略這個詞包含了負面的道德含義。出于教育下一代公民的考慮，用這么個有負面影響的字眼來形容我們國家的行為，十分欠妥。因此，應使用諸如‘軍事挺進’這一表述。”他的建議得到了采納。中國政府不失時機地選擇在不同政治場合對這一措辭表達抗議，結果卻只是加劇了日本國內的政治分歧。侵略歷史剝奪了日本使用武力的權利，這解釋了右派為何對其矢口否認，左派為何執著于此，主流保守派又為何傾向于只字不提。只要自民黨依舊執政，就有必要安撫右派，他們當中一些年事較高的人自己身上也沾有戰爭污點。1989年，日本國會的一位共產黨議員質問首相竹下登，日本是否在二戰期間犯有侵略罪行，竹下回答說，這個問題“應該留給后世的歷史學家來評判”。

家永其實打贏過官司，在1970年。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官杉本良吉裁定，文部省對教材的審核不應超越修改錯別字和勘正事實錯誤的范疇。對實質內容的審查被視作違憲，家永案就是這么判的下達判決書后，法官告訴媒體，教師的立場應得到尊重，自由應得到保護。右翼極端分子對法官、辯護律師和家永本人都發出了死亡威脅。家永的住宅外面日日夜夜都圍著暴徒，他們高喊口號，像擂戰鼓一樣敲打鍋碗瓢盆，吵得他沒法睡覺。東京地方法院的氣氛高度緊張，以至于家永和他的律師不得不在警方保護下，從一道暗門進入法院。

文部省不服判決，發起上訴，家永沒能再勝訴，或者說至少沒贏得那么干凈利落。1974年，另一位法官也認為審查過程“過分了”，但并未違憲。到了1980年代，又有一位法官宣布，審查得出的所有建議都合情合理。參與家永案時間最久的辯護律師尾山宏稱1970年代早期是“日本司法的黃金年代”。我問他，那之后又如何他回答說事情簡單得很：“跟政府作對的法官不會被晉升到更高級的法院。因此，除非你不考慮仕途，才會做出公正的判決。”杉本法官的職業生涯就是如此。

然而，讓所有人大吃一驚的是，1993年10月20日，東京高等法院裁定，文部省對家永的教材做出多處刪改，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殺的記錄，實已超出職權范圍。自民黨在選舉中的落敗興許促成了這股新風氣。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年輕一代的日本歷史學家們提供了證明日軍暴行的大批新證據。

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在攻擊從事教育工作的左翼對手受到“外來”思想影響時，當然沒有說錯。但這并不是說，本土主義者的思想就是純凈的，只不過他們在堅持傳統一點上似乎確有更強的話語權。正如德國保守派曾抨擊魏瑪共和國憲法不符合德國國情，“是猶太人制定的”、不配得到擁護一樣，日本右派也曾炮轟戰后日本憲法及支撐其的教育體制是舶來品，因此在日本水土不服。著名的比較文化學者入江隆則還煞有介事地對比了魏瑪共和國和戰后日本。[(100)](#_100_1)他說，日本憲法是由那些“仇視國家”的猶太人起草的。

德國的憲政愛國主義和戰后憲法本身就是德國法學家和思想家創造的產物，如有必要，他們會從歐洲啟蒙運動、歌德的人文主義思想和德國反希特勒抵抗運動中獲取一種延續性。日本人面對的局面要困難些，因為催生憲法和教育改革的是占領它的美國，而不是日本人自己。而且正如家永所言，日本沒有什么抵抗傳統，有的是馬克思主義，它在日本和西方知識界都頗有淵源，也提供了對抗民族主義迷思的一劑良藥。

1984年版的高中教科書用了一整頁篇幅，完整講述了日本的戰時抵抗——或毋寧說是沒有抵抗——的傷感故事：“1933年，日共領導人放棄了他們的政治信條，此舉對社會主義者有著廣泛的影響，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效而仿之。就連為數不多還堅持社會主義信仰的人，譬如日本無產黨的鈴木茂三郎，在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后，也于1937年終止了他們的活動。”

教科書簡短地提到了發生在美濃部達吉教授身上的一段復雜往事。美濃部是憲政法學家，他在1935年拋出一套理論，將天皇定性為“國家機關”之一。在他看來，國家享有最高統治權，而天皇只是其中的最高統治機構。他隨即招來一片批評聲，人們罵他是國家政體的敵人，因為只有天皇才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教材接著寫道：“圍繞美濃部的理論所引發的爭議，導致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就連自由主義也被抨擊為某種反國家思潮。不久之后，軍部激進派策劃的內政改革就主導了大眾媒體。這點在文化事務上亦是如此。與官方文化政策一致的是，軍國主義反動趨勢正益發增強，對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在得到反思。重新審視日本傳統文化正成為一股洶涌的潮流。”[(101)](#_101_1)

所謂的抵抗也就止于此了。但上述這段話并沒有將鳳毛麟角的抵抗者——比方說美濃部——立為楷模，反而明顯存在模棱兩可之處。軍國主義和思想鉗制當然應該譴責，但對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不是什么好事。再說了，重新審視“日本傳統文化”又有什么錯呢？不管怎么說，用“反思”和“重新審視”這種字眼來形容赤裸裸的政府審查，顯得很是奇怪。

其實，即便沒人公開支持軍國主義死灰復燃，許多日本民族主義者也深感有必要捍衛日本傳統文化，反對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從政治上講，這意味著捍衛日本主權，包括其發動戰爭的權利，并抵制馬克思主義和反戰主義的影響。從宣傳上講，受圍困的“文化是個模糊的概念，指的是家族制國家，其古老的價值理念經由名義上沒有斷代的皇族血脈世代傳承。由于建立戰后秩序的主體不是那些繼承反抗舊制度（ancien regime）衣缽的日本人，他們看待過去的態度必然會較德國要模糊些，不管是東德還是西德。實際上，捍衛日本人的身份認同往往就是捍衛舊制度：不光要反對日本左派而且也反對那些來自東方或西方、批評日本所作所為及其歷史記憶的外國人。

這就是為何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這么對我說：“日本近代史上沒有令人羞愧的篇章。”1986年，他因為發表朝鮮人對朝鮮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也負有部分責任的言論，影響日韓關系，被首相革除了職務。接受采訪時，他說東京審判是一場“種族復仇”，目的是“剝奪日本的權力”。藤尾這么說，是因為他希望“通過歷史和傳統來恢復日本精神”。

藤尾既非另類，也不是戰后第一個發表上述想法的人。1971年即將卷入一樁貪腐丑聞的首相田中角榮表達了對日本教育缺乏德育培養的擔憂。他建議恢復《教育敕語》，因為“其總體來講闡述的是普世的道德準則”。但早在1957年，文部省就已觸及問題的核心在針對家永三郎編寫的首版教科書出具的報告中，文部省給出結論“家永不遺余力地促使人們反思過去，已經遠遠偏離了教授日本歷史的正道，即承認我們祖先的歷史成就，從而強化我們身為日本人的認識，激發對本民族的愛。”[(102)](#_102_1)

1991年，盡管左派和自由派強烈反對，官方還是宣布原帝制時代的國歌《君之代》和旭日旗是日本的國家象征。這一決定并未通過立法產生，而是體現在文部省下發的一份指導手冊里。它批準通過修改后的教材，在戰后首次加入了正面描寫日本軍旅英雄的段落。至少松江日大高校（Nichidai Matsue）這一學府私自恢復了《教育敕語》。校長岡崎功號召學生每天清早朗讀《教育敕語》，因為這是“讓你成為具有真正日本精神的日本人的絕佳文章”。

1992年秋，我和大約二百五十人一起等候在東京高等法院外。法庭內空間有限，因此不得不抽簽決定誰能旁聽家永三郎最后一次庭審。很多人都隸屬于某個支持家永的團體，有些是從北海道和沖繩千里迢迢趕來的。人群里有男女老少，有學生、老師，公司職員和家庭主婦。盡管家永案前景不容樂觀，但現場氣氛格外輕松。人們分到的宣傳冊介紹了將要舉辦的會議，有探討人權或言論自由的，也有探討賠償昔日“慰安婦”等日本軍國主義受害者的。人群對遠道而來的參與者報以歡呼，家永案前幾次庭審中的證人更是贏得了滿堂喝彩。

但是現場最熱烈的歡呼聲——好似感情猛然迸發——還是出現在家永登場的那一刻。只見他走在律師團隊最前方，進入法院前向人們脫帽致意，雙眼在鏡片后眨了眨，神情看起來既孱弱，又頑強。

法庭莊嚴肅穆，不帶任何世俗或宗教意義上的權力裝飾。法官穿著歐陸式樣的簡約黑色法袍，身后是一片蒼白的大理石墻壁。律師做陳辭時的腔調一板一眼，甚至有些了無生氣。家永的辯護律師團隊里有一位女性，文部省的律師則清一色都是男性。

尾山宏自1965年家永案開審起就一直擔綱辯護工作。我聽著他的陳述，他口齒清晰，辯才出眾，一一論證：日本如何逐步倒退回戰前的教育方法；日本的人權標準如何之低；日本相對于德國，在面對自己歷史上的黑暗篇章時有著何等糟糕的紀錄。他引用了孟德斯鳩所說的“法的精神”，指出憲法保障人們可以不服從國家對事實真相的壟斷。他說，這就是為什么編寫教科書的作者理應有權自由表達觀點。因為沒有思想自由的話，就不會有民主。

法官和文部省的幾位律師背靠座椅，雙目緊閉，不是在聚精會神，就是已酣然入睡。也許他們感到無聊，因為這一切就是炒冷飯也許他們覺得這是沒有意義的走過場，因為事先已得知會有怎樣的裁決。但這并非沒有意義的走過場，因為家永三郎以實際行動延續了一場長達二十七年的重要辯論。一個討人嫌的教書匠和聚集在法院外的幾百名支持者也許沒什么了不起的，但卻足以顯示，這一回終于有人奮起反擊了。

[[1]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位于捷克境內，納粹當局將其宣傳為“模范猶太人保留區”。前期一些享有特權的知名猶太人在此處居住，后成為奧斯威辛等集中營的中轉站。1944年，為了迎接國際紅十字會的來訪，納粹宣傳部門特意舉行“美化運動”，拍攝了記錄片《元首賜予猶太人一座城》，掩蓋猶太人遭到種族滅絕的大屠殺真相。——編注](#_1_10)

[[2]Die Weiße Rose，二戰期間德國出現的一個地下反納粹組織，散播反納粹文學作品。成員主要為女學生蘇菲·朔爾和其兄漢斯·朔爾，兩人后被蓋世太保逮捕，并被處以死刑。](#_2_8)

[[3]Ernst Thalmann（1886——1944），德國共產黨領袖，1933年因“國會縱火案”被捕囚禁多年后被殺害于布痕瓦爾德集中營。](#_3_7)

[[4]納粹見面的招呼語。](#_4_7)

[[5]Hitler’s children，此處作者應是借用了1977年描寫德國極左赤軍派的一部書名：《希特勒的孩子：恐怖主義團伙巴德爾——邁因霍夫的故事》（Hitler’s Children: The Story of the Baader-Meinhof Terrorist Gang）。——編注](#_5_6)

## 第八章 紀念堂、博物館和紀念碑

維滕貝格市的瑪麗安教堂曾是馬丁·路德布道的地方。站在教堂的東南角，可以辨認出教堂墻壁上突出的一尊有趣的雕塑，外形酷似滴水獸，距離地面大概三十英尺。雕的是一頭母豬，正在給三只豬崽喂奶。一個戴著尖頂帽子的小人兒抬起它的一條后腿，帽子表明他是15世紀的猶太人。在猶太人和豬崽上方——有人告訴我，母豬代表“撒旦的猶太教堂”——用希伯來語寫著上帝的大名。這個裝飾物叫猶太豬（Judensau），作為猶太人屈辱的見證，過去被廣泛用來裝點德國教堂，有一些迄今還在，不過導游多半不會提及。

這座破敗的東德城市，正式名字叫路德城維滕貝格（Lutherstadt Wittenberg），如果不是因為教堂的公告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也不會留意到“猶太豬”的雕塑。公告是1988年教堂修繕后張貼起來的。修繕工作始于1983年，在此期間，路德派的年輕教友決定，得做點什么，不能讓“猶太豬”就這么杵在那兒，無人關注。于是，教友集資后托人刻了一塊碑，提醒世人這一雕塑的重要意義。這是塊警示碑（Mahnmal）。然而，由于當時仍然處于民主德國時期，官方并不承認存在反猶主義，紀念碑揭幕儀式并沒有市政府官員露面。

警示碑就豎立在“猶太豬”雕塑正下方的過道上，以銅鑄成四塊方板拼接在一起，活像形狀奇怪的窨井，四處摸索的銅手指從下方微微將其托起。碑的一側寫有詩文：“十字架下，猶太人在基督徒面前無力念出上帝的大名，它如此神圣，卻被用來施暴六百萬猶太人就這樣命喪黃泉。”銅手指象征的，是反猶主義的受害者正從萬人坑中站起來。除此之外，它還蘊含更抽象的寓意，也許與警示碑更為搭調：可恥的回憶不會磨滅，如同反復發作的夢魘它觸動著我們的良知。維滕貝格的警示碑不過是德國境內成千上萬座警示碑之一，但它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塊不以特定事件、而以記憶本身為對象的碑。

二戰爆發前，德國是沒有警示碑的，有的是戰爭紀念堂，用以緬懷為國捐軀的軍人。大理石質地的雕像好似基督像。民族共同體的紐帶因為他們的犧牲得到強化。在一戰紀念碑上，戰爭是一種神秘的體驗，是祭奠勇氣、犧牲和重生的地方，類似基督受難地。德意志帝國時期曾修建哥特式的大型紀念碑群，為的是從戰敗中挽回一絲顏面。二戰后沒有出現這樣的事。德國人立碑，不是為了美化戰爭，而是警示后人；紀念碑（Denkmal）成了警示碑。

紀念碑多散落于西德各地，它們就像一串串連而成的念珠，印證著人們對記憶的憂慮，對遺忘近乎神經質的擔憂，以及對將過去定格在石頭中的癡迷。事情并非向來如此，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人們更傾向于遺忘。勾起人們回憶過去——不光是希特勒這段歷史——的東西都被推翻、爆破和拆除了。蘇聯人和西方盟軍利用昔日的集中營關押德國俘虜，這種情況維持了一陣子，但一等條件成熟，這些設施不是被夷為平地，就是被廢棄。第三帝國僅存的一點外在遺跡不是無人關心，就是任憑其經受日曬雨淋，典型的譬如施佩爾設計的堅不可摧的紐倫堡體育場；而在東德，它們遭到冷落則多半出于政治原因。警示碑和紀念地大多誕生于1960年代，是戰后一代人大力倡導的產物。不同于巴不得甩掉過去的父母，他們一心想要警示后人，銘記歷史。

警示碑多種多樣，形態各異。昔日集中營如今成了紀念地，集博物館、旅游景點和紀念館各種功能于一身。其中一些，譬如東德的拉文斯布魯克，基本上完好無損；而另一些，比如西德的貝爾根——貝爾森，則只剩遺跡。

柏林郊外的萬湖（Wannsee）邊有棟別墅，1942年1月20日，用完早餐的萊茵哈德·海德里希在這里同幕僚邊啜飲干邑，邊商量“最終解決方案”的具體布置。事隔五十年后，萬湖別墅改作紀念地，對外開放。當天下午，有關方面安排了一場題為大屠殺和記憶的會議，完后還有香檳酒會，以示慶祝。

萬湖會議紀念地的博物館里沒什么新鮮展品。墻上所掛照片較少涉及策劃“最終解決方案”的納粹官僚，倒是多和受害者有關。為他們拍照的施虐者十分仔細，一點一滴都沒漏過，再一次定格了受害者身陷苦海的形象：華沙的猶太隔離區里，男孩高舉雙臂；人們被關在密不透風的載貨車廂里，透過車門上的縫隙窺視車外，眼神充滿恐懼；火車匝道口的“死亡遴選”；被迫騎在各自背上、供人取樂的拉比，等等。我翻了翻參觀者的留言簿，閱讀著抒發民族恥辱的自白：“不得不自稱德國人，這可真叫人難為情、傷感和無地自容啊。”“德國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居然會出這種事？”“參觀過這里后，我對身為德國人感到羞恥。”

西柏林市中心有座警示碑，正對著一些門庭若市的百貨商店。每天，都會有好幾萬人途經這里，手里拎著裝得滿滿的購物袋，他們見過這座碑，卻從未留意過它。這是塊指示牌，羅列了西德幾座大型集中營，告誡我們勿忘歷史。類似的標志遍布這座城市。

生于1940年的藝術家約亨·格爾茨（Jochen Gerz）出了個點子：立一塊看不見的警示碑。他對常規的紀念館和紀念碑持批評態度，因為它們將歷史凝固在銅像中，是對過去的美化，意義深遠的個人緬懷因此也就成了一種集體儀式。他認為，這不啻為另一種形式的掩蓋過去。對歷史的重現會替代記憶本身，尤其是在親歷者與世長辭后；這么做只會阻礙個體的反思。問題在于：那你如何將記憶具體化？格爾茨的回答是：辦不到。

既然不行，他轉而以德國猶太公墓的名字為線索，追尋猶太人生活和文化的痕跡。格爾茨和他的學生參照猶太人掃墓時在墳前留幾塊石頭的風俗，挖開了薩爾布呂肯市（Saarbrücken）一座城堡外馬路上的鋪路石。城堡過去是蓋世太保的監獄。格爾茨在每塊石頭上都刻了一座猶太公墓的名字，以及其被發現的日期。完后，他再將石頭放回原處，確保有字的一面朝下。格爾茨的團隊共撬開了1926[[1]](#_1_Yuan_Wen_Ru_Ci__Ying_Wei_2146)塊鋪路石，依照此法刻上字后再放回，并用記號標出“看不見的警示碑”所在的位置。

在一篇名為《過去永不能正常化》的文章里，于爾根·哈貝馬斯一如既往地批評了德國保守派。他們一心想把不久前的歷史說得不那么突兀，而是比實際情況正常，且符合歷史主流，從而拋卻這一包袱。他引用了赫爾穆特·杜比爾（Helmut Dubiel）的一段話描述的正是這一態度：“人們說起民族歷史，就如同說起放射性廢料無處堆放的核電站一樣。”[(103)](#_103_1)讀到這兒，我想起了瓦爾特·本雅明的話，他把歷史形容為一堆堆積如山的殘骸。然而，盡管一些（也許是很多，甚至是大多數）德國人希望放射性廢料能得到掩埋，但也有人竭盡所能地試圖找回每塊石頭、每堆爐渣，然后保存在紀念碑和博物館里。

比方說，柏林的原蓋世太保總部舊址除了石頭外，就什么也沒剩下。希姆萊給自己手下人挑選的辦公地址，都是柏林最好的地段蓋世太保的辦公地點設在阿爾布萊希特親王大街的原工業藝術和工藝學校內，海德里希掌管的保安處則在威廉大街上的阿爾布萊希特親王宮殿里辦公。這是座漂亮的巴洛克式宮殿，由弗里德里希·申克爾[[2]](#_2_Karl_Friedrich_Schinkel_1781)在19世紀初翻新。兩棟建筑合在一起，構成了集中營和秘密警察網絡的中樞神經。大規模的屠殺便是在此一步步付諸謀劃。蓋世太保還在藝術學校的地窖里建造了刑訊室。

同柏林各處一樣，兩棟樓都毀于空襲。倒不是說毀壞得無法修復，可是，正如諸多歷史遺跡的命運，宮殿在1949年被拆除。1953至1964年期間，原先的藝術學校也被實施定向爆破。連一尊紀念這個地方的警示碑都沒有。除了堆積成山、從未被妥善清理的殘磚碎瓦外，這里什么也沒剩下。

1983年，決定有所作為的柏林市政府舉辦了場競賽，看能否征集人們對這一歷史遺跡恰當的藝術改造創想。倒是涌現了一些創意，但都無果而終。六年后，政府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委托后者調研興建博物館、檔案中心或警示碑的可行性。在官方層面，這次依然沒什么下文，但與此同時，一個名為“柏林法西斯和抵抗運動活動博物館”的團體，在被認為是蓋世太保刑訊室的遺址上搭起了一座簡易博物館。實際上，所謂“遺址”不過是洗手間的頹墻殘垣罷了。盡管如此，聳人聽聞的坊間流言還是傳了出來。馬路對面一座賓館曾是黨衛隊中級軍官的招待所，后被拆除。有個當地人壓低嗓音，像說悄悄話似的告訴我，賓館的一些家具都是從蓋世太保的刑訊室里搬來的。

數年前，人們確實挖出過刑訊室的地基，但州考古部門將之封存了起來。這個機構同負責歷史建筑的主管單位杠上了。后者想將整個遺址變成“黨衛隊的龐貝”[[3]](#_3_Pang_Bei__Pompeii__Gu_Luo_Ma)——這里借鑒的是1968年來一直擔任柏林首席考古學家的阿爾弗雷德·肯德爾（Alfred Kernd’l）的原話。肯德爾計劃在刑訊室周圍造個紀念館，再種些不起眼的苗木，借此標注出刑訊室的邊界。

到了1992年年中，依舊全無動靜。名為“恐怖地形圖（Topograpie des Terrors）的臨時博物館依然屹立在那兒。肯德爾擔心刑訊室地基是否保存完好，而博物館外，孩子們已把山地車騎上了瓦礫堆。人們對舊址利用繼續建言獻策。某政客建議，也許可以取一段柏林墻擺在廢墟后方，再附上一段恰當的文字介紹，比如“兩個獨裁政體的滅亡”。最后，待到年底時，分管文化事務的參議院作出決定。不僅“恐怖地形圖”要擴容，還要再造一個“國際中心”可供召開探討納粹歷史的學術研討會、座談會和大型會議。

與此同時，爆發了另一場考古風波。1990年6月，柏林人即將在原希特勒總理府遺址上迎來平克·弗洛伊德樂隊，借一場搖滾音樂會慶祝柏林墻的倒塌。此處距勃蘭登堡門不遠，過去是一片荒地宛如一條塵土飛揚、地雷密布的護城河，橫亙在柏林墻以東。逃往西德的東德人曾被擊斃于此，四周野兔竄來竄去。就在柏林墻倒塌前不久，這里建起了灰色的住宅樓。演唱會前夕，工人翻挖瓦礫堆搜尋未爆炸的地雷，希特勒的地堡就此重見天日——這是建于戰爭末期、用來藏匿希特勒及其侍從的混凝土迷宮。曾宣稱“地下一切都是我的地盤”的阿爾弗雷德·肯德爾跳上自行車，火速趕到現場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因為地堡內部自1945年來一直保持原狀。火焰噴射器留下的奇怪斑痕說明蘇聯紅軍來過這兒，但不知為何，他們居然忘了將其炸毀。

地堡里有供黨衛隊衛兵就寢的床鋪，木桌上擺放的空瓶、刀叉和瓷碗上積了幾十年的灰。某位業余畫家曾在墻上作畫，畫的是高大的黨衛隊軍人，身穿緊身長褲，腳蹬锃亮黑皮靴，守護著正在德國橡樹下玩耍的金發碧眼的德國孩子，以及和金發碧眼的士兵手挽手、坐在格子桌布邊呷著啤酒，金發碧眼、胸部豐滿的德國姑娘平克·弗洛伊德樂隊演唱會的策劃人有著搖滾樂演出經紀人慣有的品味，他想辦法搶在肯德爾鎖門前站在壁畫前，讓人給留了張影演唱會如期舉行。平克·弗洛伊德樂隊唱啊唱：自己坐在地堡里，身前是一堵墻，等待蠕蟲的到來……這之后，關于地堡的爭論就拉開了序幕。

保守派對于又發現一處不受歡迎的歷史遺跡感到很難堪，想要毀了它。部分自由派和猶太社團成員則憂心忡忡，擔心這會成為新納粹的圣地，因此也欲除之而后快。但肯德爾堅稱，作為重要歷史文物，其理應得到保留。

肯德爾在夏洛騰堡宮有個辦公室。一走進這棟建筑，就能看到奈費爾提蒂（Nefertiti）[[4]](#_4_Ji_Ai_Ji_Yan_Hou)佩戴過的珠寶。肯德爾為人心直口快，柏林口音很重，這在西柏林并不常見。“典型的德國人”這個詞一直掛在他嘴邊，而且每每說起，都帶著鄙夷之情。想要埋葬過去的是“典型的德國人”。他說，日本人把歷史扔在一邊，其實德國人也一樣。赫斯[[5]](#_5_Rudolf_Hess_1894____1987__Na)死后才一個月，施潘道監獄就成什么樣了？“砰的一聲，炸成碎片，我們又一小段歷史就這么沒了。典型的德國人！”

我問他，保存地堡的幾率有多大。他表示，希望不大。“他們只想在博物館里展示歷史。”但他為何會覺得地堡值得保存呢？我追問道。“悲哀啊，”他說，“這一切所在的位置，過去是皇室名媛的宮殿和俾斯麥的故居，也是浪漫派詩人筆下的天堂。可惜如今剩下的就只有這黨衛隊軍人的地堡了。怎么也要把它保留下來。你瞧，可以打上德國人身份烙印的東西如此之少，為什么還要把我們僅有的這些給毀了呢？”

又是那一套身份認同：我回想起所有去過的德國城鎮，它們都有屬于自己的鄉土博物館（Heimatmuseum），每座城鎮都拼命守護著代表本邦風土人情的文物和當地歷史，似乎是在抵御變革帶來的破壞。拿破侖建造博物館是為了彰顯王權，炫耀戰功。維多利亞時期，英國諸多偉大的博物館為社會進步和帝國疆域歌功頌德。而德國的鄉土博物館則展現了本邦人的形象，或者說昔日的形象，抑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們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和過去的模樣。但有一點，是許多歐洲歷史博物館——起碼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所共有的：它們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展示，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習俗、品味甚至于社會治理方式，皆為歷史發展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結果。這個目的可能被政治化，為一場革命、一個國家和一種特定政府的形式授予合法性。當政府的意識形態基于對歷史鐵律的信仰，這種情況實屬在所難免。

\*\*\*\*\*

魏瑪郊外有座青山，歌德和朋友艾克曼過去常常坐在山頂上背靠橡樹，一邊欣賞圖林根鄉村綠意盎然、天鵝絨般細膩的風光一邊探討文學和人生。艾克曼記下大師的話：“坐在這里，心情舒暢自由自在。”

1937年，當森林被砍光、騰出地方以建造集中營時，納粹當局頒布了一道特別法令，歌德背靠過的橡樹因此得到保護。得益于《自然保護法案》，橡樹周圍筑起了籬笆，這才撐到了戰爭末期。那一年美軍空襲，樹的一角著了火，納粹決定將其砍掉。集中營一個囚徒在醫療室里給死者做過遺容模具，他取了些橡木，雕了張人臉至今，我們仍能在布痕瓦爾德國家警示和紀念地（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atte Buchenwald）看到這件作品。

1991年冬，我再次探訪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導游為我指出歌德之樹的具體位置。他身材瘦長，舉手投足之間的迎合反襯出內心的緊張。“朝這兒看，您能體會到典型德國人的精神面貌，”（導游也是德國人）說完他大手一揮，指向原集中營所在地。“歌德的橡樹代表文化和浪漫情懷，焚尸爐代表野蠻殘暴，動物園則代表多愁善感。”

我之前沒聽說過這里還有動物園。它就在鐵絲網外面，靠近正門的位置，建造初衷是為了給黨衛隊看守找樂子（不消說，動物的待遇比集中營囚犯要好多了）。另外，導游所勾勒的德國人“精神面貌”實在沒什么新意。

但對這番陳腔濫調，世人近來才有所耳聞，因為布痕瓦爾德過去是“紅色的奧林匹斯山”（Red Olympus），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神圣的圣地。許多重要的共產黨人曾被關押在此；而戰前德共主席恩斯特·臺爾曼就是在這兒就義的。據說，1945年4月，囚犯中的共產黨人在最后時刻領導了一場起義，這件事被收錄進共產黨人的英勇事跡中，成了一段歷史佳話。現如今，五十年前發生在布痕瓦爾德的事被歸咎于德國人的民族性。這顯示出，過去兩年里，東德經歷了何種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年前，我首度造訪布痕瓦爾德。當時，一切還很正常——也就是說，很傳統。同多數西德參觀者一樣，我被矗立在萬人坑遺址上、雄偉壯觀的紀念碑震懾到了，甚至還有點心懷畏懼。民族路（Street of Nations）沿途共有十八座巨型石頭高塔，上面立著巨大的圣杯，象征有國民不幸落入納粹魔爪的國家。據導游手冊稱，一座高達四十五米的鐘樓其鐘聲可“響徹大地”。鐘樓內部，一塊銅板下蓋著從若干集中營里帶回的泥土。鐘樓外屹立著幾組囚犯的巨型雕像，只見他們打碎了身上的鐐銬，高舉起石質拳頭。鐘樓檐壁畫上的英雄人物正在懲罰拷打他們的人，或者借1945年4月布痕瓦爾德解放后誕生的《布痕瓦爾德宣言》來說，正在“連根鏟除納粹惡勢力”。

我參觀了斯大林主義英雄恩斯特·臺爾曼遇害的牢房。一塊銘牌上寫著：“德國人民的偉大兒子，德國工人階級的領袖，死于法西斯分子的毒手。”牢里還有一盞長明燈，以及兄弟黨派和工會組織敬獻的花圈。

然而，布痕瓦爾德的神化同遍及蘇維埃帝國的類似傳說一樣，都有一個明顯的漏洞。共有六萬五千名男男女女和兒童死在了這個集中營里，猶太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但這點幾乎鮮有提及。與奧斯維辛或特雷布林卡不同，布痕瓦爾德并不是專為滅絕猶太人而設的死亡營。這里的囚犯不是活活累死，就是死于疾病、饑餓、酷刑或處決。所有囚犯都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不過據大部分記載來看，猶太人是最慘的。可是，我只發現了一塊很小的銘牌，紀念那一萬名在1938年“水晶之夜”期間被捕、后來在拘留營的惡劣環境下吃盡苦頭的德國猶太人。至于從奧斯維辛運來的上萬名猶太人[[6]](#_6_Ying_Shi_Zhan_Zheng_Mo_Qi__Su)——當悶罐車到達時，許多人已經死亡，成堆的干癟尸體只能從車里摳出來——則只字未提。

在共產主義信條中，根本不存在針對猶太人的戰爭。二戰是一場階級戰爭，是法西斯分子和財閥發動的針對人民的戰爭。猶太人同吉卜賽人一樣，和法西斯主義的其他受害者并無本質性差別。我那本1988年版的導游手冊是這么說的：“粉碎馬克思主義、為一戰戰敗復仇、無情鎮壓所有反抗者，這些從一開始就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公開目標。但真正起到決定作用的是壟斷資本集團，其一擲千金，就是為了給納粹運動鼓與呼。”

不過，布痕瓦爾德博物館倒是展示了一堆女人的頭發、童鞋和一顆被子彈打穿的人類心臟，這些都是“奧斯維辛紀念地”慷慨捐贈的。導游手冊里有兩張描繪比克瑙火車站匝道旁“死亡遴選”的照片，但是照片上方唯一的文字說明卻是恩斯特·臺爾曼的一句話“資產階級說要將共產黨和整支工人階級先鋒隊一網打盡時，是動真格的。”

和所有集中營遺址一樣，布痕瓦爾德吸引的多半是游客（黨衛隊的一間營房被改造成了賓館）、幸存者和以他人苦難為樂的好事者。集中營臭名昭著的鐵門上刻有“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這句口號。就在鐵門外的停車場上，一個美國退伍老兵找我搭訕。他告訴我，自己每年至少來參觀一次，過去他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在巴頓將軍的率領下，于1945年4月11日解放了布痕瓦爾德。“當時焚尸爐還是熱的，”他慢吞吞地說，“爐子還是熱的。”

這種說法與民主德國的正統觀念格格不入。關于布痕瓦爾德的神話認為，是關押在集中營里的共產黨人帶領囚犯組織武裝暴動，才解放了大家。誠然，集中營里確實有一支抵抗組織，成員繳獲過若干武器。但這些武器是否使用過，則有待商榷。如今生活在西方國家、目睹此事的個別幸存者表示，解放集中營的是美軍，而且沒有發生流血沖突。巴頓指揮的坦克包圍集中營時，黨衛隊看守不是逃之夭夭，就是束手就縛。

但這個故事很重要，因為它構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建國神話，每個東德學生都必須閱讀布魯諾·阿皮茨（Bruno Apitz）的小說《裸露在狼群中》。而阿皮茨正是那個用“歌德之樹”橡木雕刻面具的人。這是本蹩腳的社會現實主義風格作品，書中，共產黨抵抗委員會的成員在策劃最終暴動時，不惜以身犯險，救下了一個猶太小男孩。小說圍繞一個問題展開：是集體利益重要，還是個人利益重要？值得為一個小毛孩危及大伙兒的命運么？這個問題讓人痛苦，但卻從未真正得到解決。最后，孩子和大伙兒都獲救了。在結尾的高潮部分，英雄穿過集中營正門，“順著勢不可擋、潮水般的人流，踩在解放浪潮的浪尖上，徐徐前進”。

于是，借《布痕瓦爾德宣言》的話來講（解放當天于集中營校場上宣誓生效），一場為爭取“和平自由新世界”的奮斗拉開了序幕。這個世界的本質很快變得清晰起來。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任總理奧托·格羅提渥（Otto Grotewohl）在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對八萬名集會者發表講話。他宣布，《宣言》在社會主義德國已經成為現實。為了歌頌這一成就，數以萬計的學生、工人、社會主義青年、軍人、農民和外國同志每年都要前往“紅色奧林匹斯山”，敬獻花圈，聆聽演講，參加火炬游行，并展現他們堅持邁向共產主義千禧年的決心。

到了1991年我再度踏入布痕瓦爾德時，事情開始出現變化當然，氣勢恢宏的紀念碑依然矗立在那兒。影院里仍舊播放著紀錄片，銀幕上，奧托·格羅提渥、瓦爾特·烏布利希[[7]](#_7_Walter_Ulbricht_1893____1973)和臺爾曼的遺孀沿著民族路邁步前行。但在博物館里，有人塞給我一份新的宣傳冊冊子以一種相當微妙的口吻，宣布于1990年春通過決定，“只要技術上可行，應有所改變，糾正某些一邊倒的表述。”

這番話很難概括在重寫民主德國立國神話一事上存在的爭議在某個歷史遺址、某個承載著沉甸甸象征意義的“警示和紀念地上重寫傳說并非易事。舊的神話是應該受到質疑，但不是說要用新的來替代。布痕瓦爾德這片圣地出了狀況，是因為一兩具骸骨從其櫥柜里掉了出來。[[8]](#_8_Ying_Yu_Yan_Yu_Zhong_You_skel)

1983年，建筑工人在這座納粹集中營外圍的森林中挖出了一堆人體骸骨，都被埋在一個亂葬崗里。東德政府當即勒令把這個萬人坑填埋好，這件事也就到此為止。但1989年后，人們發現了更多骸骨，四十年來提都不能提的事如今可以公開討論了：布痕瓦爾德以及東德的其余集中營，比如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和拉文斯布魯克，一直運轉至1950年前。蘇軍一抵達魏瑪，布痕瓦爾德立即重新投入使用，這次是用來懲罰昔日納粹、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包括拒絕讓共產黨接管的社民黨人。沒有證據表明蘇聯人像納粹的殘暴政權那樣強制囚犯進行勞役。然而，三萬名被關押在蘇聯人看管的布痕瓦爾德的囚犯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后來都一命嗚呼大多死于饑餓和疾病。

我在西柏林邂逅了幸存者之一的羅伯特·采勒（Rober Zeiler）。幾年來，他不斷對人講起他的故事——聽眾有學生、記者、幸存者協會——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史詩般的傳說。采勒的父親是管弦樂隊指揮，是“雅利安人”，母親是則猶太人。采勒年滿十一歲時正值首部種族法出臺；不久后，父母就離婚了。作為混血（Mischling）的采勒還能靠住在母親家來保護她幾年。他的姐姐則沒那么幸運，被送往拉文斯布魯克，原因是窩藏她的猶太未婚夫。

到了1943年，納粹下決心不放過任何一個猶太人，采勒的母親被送往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沒過多久，二十歲的采勒也被捕了，原因是窩藏猶太人——即窩藏自己的母親。他被送往布痕瓦爾德。沒過多久，他的體重只剩下九十磅（約四十公斤——編注）。看著今天穿著運動衫、身材圓滾滾的他，實在難以想象其當時的模樣。

從集中營里重獲自由后，采勒駕著美軍的吉普車，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尋找母親。她活了下來，兩人一起開車返回柏林，中途在波茨坦過夜。趁母親還在睡覺的間隙，采勒開著吉普車駛往柏林，想去看看自家的老房子還在不在。但半路上，他被蘇聯秘密警察攔住，并被指控為美軍間諜。他辯稱自己是被納粹迫害的猶太受害者，但蘇聯人說他是騙子，因為猶太人都死光了。之后的幾個月里，他被人從一所集中營送往另一所集中營。最后，采勒發現自己陰差陽錯地回到了布痕瓦爾德，而他還要在那兒待個三年。據他回憶，原納粹集中營里負責共產黨囚區的那些年輕獄頭更為狠毒，蘇軍看守還不算太壞，他們多數是思鄉的年輕人，喜歡哼傷感的小調。采勒表示，蘇聯集中營里最難熬的，就是無聊。

我問采勒，他最終回到家，跟別人講述了自己的遭遇后，聽者都作何感想。他端詳著桌上的茶巾，上面繡有廣島和平紀念館的照片。他說，自己的故事很多人聽過，有德國人，也有占領當局官員。說完便陷入沉默。我打量了下房間，里面擺滿了小物件，和他父親留下的與音樂有關的紀念品。我又重復了遍問題，他回答說當時根本沒人感興趣，所有人腦子里想的還是納粹。一些西德人已經開始抱怨盟軍對待德國戰俘的態度——比如說在達豪集中營。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蘇聯集中營這一話題根本就不存在。

我再度探訪布痕瓦爾德時，伊姆加德·賽德爾博士（Dr Irmgard Seidel）依舊是紀念館副館長。她的辦公室過去是黨衛隊的某間營房——這是棟大體量的建筑，長長的走廊由集中營囚犯所建里面飄著一股蠟和洗衣粉的味道。賽德爾博士辦公室房門邊的墻壁上掛著一幅圖，畫面中的黨衛隊士兵手執皮鞭，身前是一名遭受酷刑的受害者，雙手反綁后被吊在桿子下。配圖文字如下：“上帝啊原諒他吧，他壓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過去根本不知道有蘇聯集中營這回事，”當被問起此事時賽德爾博士如是答道。“1989年12月，我頭一回聽說這事。您知道1945至1950年間發生的事是個禁忌話題，根本沒法展開討論。”

賽德爾博士的語氣倒不是說很失禮，但看得出來她沒好氣，且有幾份慍怒。她過去是黨員，如今卻生活在一個由保守派政府統一的嶄新德國，形勢徹底扭轉：魏瑪市內一個由好事居民組成的委員會正吵著要開除她。賽德爾博士的上司已經被炒魷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西德歷史學家。但當后者同西德共產黨的關系被公之于眾后，他旋即也被撤換。

賽德爾博士急切地想給我看能自證清白的材料，她特別想讓我知道，自己已擺脫共產黨宣傳的控制。對于社會主義德國如何無視屠猶一事，她心知肚明。但這并不意味著她接受部分保守主義反對派的看法。在他們口中，蘇聯人比納粹還要壞。為了證明自己也有人支持，她拿出一封紐約大屠殺幸存者社團出具的信件。信的內容是抗議任何將蘇聯秘密警察（NKVD[[9]](#_9_Su_Lian_Nei_Wu_Ren_Min_Wei_Yu)）的受害者同納粹受害者混為一談的企圖。信里還提到了德國政治犯的英勇氣概，“他們的犧牲為德國的道德涅槃奠定了基礎……”

“沒錯，”賽德爾博士說道，“我們忽視了猶太受害者，但我們打算做出改變。我們的猶太朋友清楚這點，充分支持我。”或許他們的確支持她，或許賽德爾博士有理由感到被人冤枉了，但我不太相信她的辯解。她肯定對集中營的戰后歷史有所知曉。1988年，魏瑪市出版了一本宣傳冊，并在集中營博物館書店里免費發放。冊子里提到，有了蘇聯官方的熱心配合，布痕瓦爾德才得以被改造為紀念地。這在1950年就已實現，那時，“關押納粹公職人員的集中營在四個星期內就人去樓空了”。

然而，既然現在真相——或至少是部分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么又該如何呢？德國保守派急于指出蘇聯和納粹罪行之間的相似之處。一位投書《法蘭克福匯報》的作者寫道，是時候重新擦去覆蓋在極權主義理論上的塵埃了。這一理論認為，左翼和右翼暴政“也許不完全一樣，但應得到一視同仁的看待。還有什么地方比布痕瓦爾德更能證明這套理論的價值呢”。魏瑪市的基督教民主同盟希望將集中營改造為“所有專政受害者的紀念地”——似乎第三帝國只是另一個獨裁政體而已。

自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覆滅后，某種思想變得大行其道，在右翼圈子中頗有市場。布痕瓦爾德就成了這一思想十分受用的焦點：這種思想認為，共產主義德國是第三帝國的某種延續。還有人認為，從某種方面來看，民主德國比納粹德國還要壞：前者維持了四十多年，而希特勒在位時間不過才十二年。這種論點很有蠱惑力，因為它使第三帝國的罪行顯得更常見，也不那么駭人了。但同時，它也輕易掉進了掀起1986年歷史學家大辯論的那種結論：納粹主義只是針對蘇聯暴政的一種防御性姿態。這套理論的始作俑者、保守派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認為，希特勒是在試圖保衛歐洲免受斯大林的“亞細亞野蠻之風”的侵襲。歷史學家辯論肇始的時間，距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邀請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并與之手牽手肅立在比特堡（Bitburg）軍人公墓只過去了一年。去比特堡之前幾小時兩人還一同參觀了貝爾根——貝爾森紀念堂。科爾覺得，在尋求和解的偉大時刻，再去區分墳墓是黨衛隊軍人的還是其他戰爭受害者的會顯得十分狹隘，甚至完全不得要領。是時候將這一區分拋之腦后了。借恩斯特·諾爾特的話說，是時候讓往事遠去了。

受害者與受害者是不同的，此墳也非彼墳。自1988年以來一場圍繞這類區分的風波在柏林不斷醞釀。負責文化事務的市議員同意在希特勒總理府的舊址上建造一座猶太大屠殺紀念館。這么做的初衷是想用一座豐碑來緬懷遇難的歐洲猶太人。但吉卜賽事務中央委員會表示抗議，要求紀念碑銘記所有種族迫害的受害者[[10]](#_10_Chu_Le_You_Tai_Ren_Wai__Ou_Z)。規劃方表示反對，說這會讓整件事喪失意義。爭論愈演愈烈，甚至變得荒誕不經。甚至出現這樣的觀點，問是否四分之一的猶太人遭迫害就比八分之一的吉卜賽人遭迫害情節更惡劣？很快，爭論雙方的口氣都變得像納粹的種族理論家一樣迂腐。

究其根本，歷史就是一門關于區分的學問。這也就是為何在1990年，德國政府任命了一個由杰出史學家組成的委員會，負責處置因布痕瓦爾德而起的歷史論爭。納粹和蘇聯的受害者是不是應該一同緬懷？如果答案是不的話，又該如何將二者分開？民主德國的紀念碑應當拆除么？那博物館呢？諸如此類的問題一連串。這項差事很棘手，因為委員會多數成員來自西德。而“東佬”又向來反感“西佬”對他們國家的歷史誤區指手畫腳。一旦過于突出蘇聯的罪行原共產黨人就會拍案而起，相反，也有人覺得委員會在“反蘇倒蘇一事上還不夠徹底。艾伯哈德·雅克爾博士（Dr. Eberhard Jäckel是委員會的西德史學家之一，他告訴我，“我們同原民主德國人的關系相當尷尬，因為他們把我們也看成是1945年戰勝的同盟國。到頭來，委員會只提議作出一些局部改變。關押過恩斯特·臺爾曼的監獄換了塊牌匾，上面的文字較過去更加言簡意賅：“德共主席曾被囚禁并殺害于此。”另外，根據規劃，在已有一座納粹歷史博物館的基礎上，布痕瓦爾德舊址上還將建造另一座博物館，用以展示蘇聯管轄的那段歲月，不過規模較小。

然而，一座歷史博物館能否同紀念堂或警示碑合二為一，且不歪曲其目的，這個問題依舊有待解答。紀念堂是宗教化或半宗教化的豐碑，在這里，緬懷過去是一種集體儀式。人們在紀念碑前祈禱，點燃火把，敬獻花圈。反之，博物館是世俗機構，在自由社會中，它的職責是謀求學術獨立。在專制國家，所有一切——政治、學術、追憶——都被簡化為公共儀式，不存在什么內部張力；但在自由民主國家，這種張力是存在的。

\*\*\*\*\*

盡管二戰已過去四十七年，但直到1992年，日本仍然只有一座戰爭博物館，而且古怪得很。當然，廣島也有和平博物館，但僅僅關乎廣島本身。此外，九州南部的原空軍基地遺址上也有一座小型博物館，陳列著神風突擊隊某中隊的紀念物。但只有東京的靖國神社博物館，涵蓋了整場戰爭的歷史。

神社本身就充滿爭議。這座神道教寺廟供奉著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所有為天皇捐軀的日本人的靈位。博物館發放的介紹冊寫道，這些愛國者是為“國家”獻身的，但天皇即國家這個等式從未得到過認真思考。這點很符合神社的基調；事實上，這恰恰是它存在的理由。供奉在靖國神社的亡魂多達數百萬，其中包括東京審判后被列為甲級戰犯并判處絞刑的軍政大員。一些保守派政客歷年參拜神社，祭奠戰歿者，他們聲稱，靖國神社同弗吉尼亞州的阿靈頓國家公墓或倫敦的陣亡將士紀念塔沒什么分別。但是它們確有不同。

1860年代，以天皇為名義上政治首腦的新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是謂“維新”，這一過程伴隨著流血。出于祭奠那些效忠皇權對抗幕府的亡魂的目的，明治天皇建造了靖國神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靖國神社是一片獻給革命者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獻給波拿巴主義者（Bonapartist）的圣地。發動維新的是武士階層直到1945年前，只對天皇負責的武裝力量往往處于日本社會秩序的核心。走近神社的巨型鳥居，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軍事戰略家、日本帝國陸軍創始人大村益次郎的銅像。他于1869年被政治對手暗殺身亡，同年，靖國神社落成并開放。

盡管有史料記載以來，每一屆日本政府都會確保自己獲得當朝天皇的恩澤，不管后者是出于自愿還是被迫，但軍國主義化的天皇崇拜（有時亦稱國家神道）是脫胎于明治時期的產物，不過分地說是一種日本版的現代民族主義。這一個人崇拜的頭號圣地就是靖國神社。打仗是“為了天皇”，執行命令是“為了天皇”，為“天皇捐軀后魂歸神社，供人膜拜。

戰后，為了實現政教分離，美國占領當局堅持要日本人擯棄神道教的國教地位。包括靖國神社在內的神道教寺廟自此成為私人場所。多數日本人欣慰于擺脫了軍事壓迫，對此表示歡迎。但到了1951年，原來的軍官組建了右翼團體，要求釋放所有戰犯，并為靖國神社正名。這在后來一直是右翼的一大目標。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至今仍在發表言辭憤慨、哀嘆喪失“民族身份”的書籍，諸多壓力集團渴望能恢復部分戰前價值觀。在一篇關于靖國的文章里，批評家江藤淳寫道，日本人不同于其他民族，“向死而生”。[(104)](#_104_1)因此，他總結道，在靖國慰靈對日本民族的繁衍生息極其重要。

日本戰歿者家屬協會有一百多萬會員，其中多數人都會把票投給保守派自民黨，這是一個很有分量的壓力集團。那些希望修憲恢復天皇神圣地位以及戰爭主權的右翼政客，自然而然地堅稱靖國是個官方祭拜場所。因此，右翼的聒噪和個人信仰結合起來，促使包括首相在內的日本政客每年都參拜神社。

為了將爭議降到最低限度，他們以“個人名義”參拜，即使如此他們的集體參拜也成了公共事件，還上了晚間新聞。到了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開創先河，以官方身份參拜神社，并在訪客留言簿上署了自己的大名。他向神社的獻祭是從一棵圣樹上掰下的名貴樹枝，所產生的費用也是由公共財政埋單。基督徒、左派人士、反戰主義者和中韓兩國政府均表示抗議。日本一佛教團體的成員還起訴首相，指責他“花納稅人的錢，卻在對我們造成精神傷害”。可是，中曾根堅稱參拜是為和平祈福。靖國神社的官方宣傳冊也是這么說的——這座廟宇的存在是為了追求和平。“靖國”的詞意便是“為國家帶來和平”。

這是種奇特的和平觀。神社前栽著櫻花樹，樹上掛著寫有帝國陸軍各師團番號以及著名戰艦名稱的白色標簽。神社后方有尊石碑，形似地球儀，是為紀念憲兵隊而立。憲兵隊相當于日本的黨衛隊。附近一堵綿延的混凝土墻面上鑿開了幾個洞，里面擺放著顏色各異的石塊，分別來自萊特島、瓜達爾卡納爾島、關島、威克島等昔日的戰場。此外，還有一尊“母親之像”：由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看著像擁有一道深喉，湍急的水流從中貫穿而過。從碑上所刻銘文可以得知，這要表達的是“因口渴而奄奄一息的軍人，他們腦海中浮現出的母親形象”。

一條石子路通向神社主殿，沿途停著幾輛藍色和卡其色的卡車，車身扎滿民族主義標語，車載喇叭震天響地播放戰時軍隊進行曲。卡車隸屬于一些極右翼團體，他們希望在裕仁天皇離世前恢復戰前秩序，也就是他們口中的“昭和維新”（昭和是裕仁的年號）。剃著光頭的制服青年齊聲高喊，整齊劃一地朝皇宮方向鞠躬。

“游就館”前方陳列著老式機槍、一輛二戰時期的坦克、一門榴彈炮、一枚魚雷和第一節行駛在泰緬鐵路上的火車頭。這些東西都得到了精心維護。此地在“游就館”手冊中被喚作“圣地”，而這些公開展示的武器曾為“神社內的英靈倍加愛惜地使用”，是“游就館”館藏的“神圣遺物”。

踏進一號廳，率先映入參觀者眼簾的是一幅巨型油畫，鑲著厚重的鍍金邊框。這幅畫所描繪的是裕仁天皇1930年代參拜靖國神社他身穿戎裝，兩側是一襲白袍、頷首鞠躬的神道教僧侶。除了畫以外展品還包括一口由神社附屬僧侶鍛造的神圣的靖國刀，以及參加過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軍人遺物。

另一些展品比如“人體魚雷”——形似香腸的一根鋼管，可以容納一個人。此人的使命是操縱著載滿炸藥的爆炸裝置，撞向敵人艦船，與之同歸于盡。再看戰旗，士兵在上面寫下血書，時至今日他們的名字已然褪色，只留下一些褐色斑痕。再比如一架仿制的“櫻花”戰斗機，神風隊員曾駕著它發動自殺式襲擊。軍人寫給母親和妻子的家書被封存在玻璃柜中。一堆沾了污漬的戰旗中間還夾帶著一件血跡斑斑的破襯衫，它的主人是一位戰死在菲律賓的軍人。一旁還有張皺巴巴的照片，軍人陣亡時隨身攜帶著，照片上是他的母親。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油畫，清一色具有和“天皇參拜靖國圖”一樣的華麗風格——有的描繪了日軍在長城邊上和感恩戴德的蒙古人的親善場面，有的描繪了人體魚雷或櫻花戰機慷慨赴死的景象。一個形似迷你花園的巨大模型重現了當年毫無勝算的緬甸和菲律賓戰役。“奉命玉碎”的微型塑料坦克從毛氈做的懸崖邊“栽落”了下去對于戰后被蘇軍俘虜、并關押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日軍遭遇，館藏品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最后一件展品是個玻璃柜，里面裝著緬甸軍人獨裁者奈溫將軍（Gen. Ne Win）呈給日本的一面緬甸國旗和其他物件。奈溫戰前曾在日本受訓。因此，文字說明寫道，送這面旗的人“拜日本所賜，才贏得了民族解放”。印尼總統蘇加諾則送了只塞了填充物的天堂鳥標本，以表感激。

每個展品間的文字說明介紹了當時的戰爭背景，是十足的戰時宣傳。1931年吞并滿洲，是為了保護亞洲大陸免遭蘇聯共產主義和中國人染指的必要步驟。侵華戰爭不可避免，因為英美兩國慫恿中國起義者進行抗日活動。而日美戰爭是關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日本戰俘及數以百萬計的人在共產主義政權手中所受的煎熬，證明了日本自始至終都是正確的。簡言之，拿“游就館”書店里一本歷史書的話來講，“大東亞戰爭并非‘侵略戰爭’，恰恰相反：這是一場為了將全世界從共產主義手中解放出來的圣戰。”

我們很容易從上述發現中得出一條結論，即靖國神社的戰爭博物館美化了軍國主義。事實上，情況比這要更復雜。“游就館”以準宗教化方式贊美的，不是好戰心理或仇恨，而是自我犧牲。“游就館”乃至整個神社的基調，在一塊由“祭奠特別攻擊隊聯合會”（“特別攻擊隊”即神風特攻隊）所立的大型銅質牌匾上得到了歸納。這塊匾于1985年珍珠港事件紀念日當天揭牌。所刻之字筆法瀟灑遒勁，出自聯合會總裁竹田宮恒德之手：“六千壯士死于自殺式襲擊，他們的壯舉前無古人，震懾敵心。整個國家都為他們的無比忠誠和無私奉獻感激涕零。”

在主殿旁的一間小屋內，我跟一位年輕的僧侶攀談起來，他的長袍白得晃眼，象征其所從事職業的純潔性。他年齡不會超過三十歲，父親也是神道教僧侶。交換過名片，寒暄了幾句后，我問他對太平洋戰爭有何看法。他說，首先，管二戰叫太平洋戰爭大錯特錯，應該叫大東亞戰爭。同樣，認為大東亞戰爭是侵略戰爭的想法也是錯誤的。“我們沒得選擇，打仗純粹是因為這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還有，這么做的初衷是為了解放亞洲。亞洲人民對此至今心存感激……”

他肯定注意到我有些不耐煩，因為他停了下來，問我究竟想了解什么。于是，我問“游就館”到底是派什么用場的。這一回，他的回答倒是既誠懇又可信。他說，“游就館”不具備教育功能，只要戰爭幸存者仍然在世，它就不能算是正規博物館，只是用來存放靖國英魂遺物的場所。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它肯定會成為一座像模像樣的戰爭博物館，他說道。

我追問，這該如何實現，如何遴選館藏品，又如何進行介紹？會不會任命史學家來從事這項工作？

他需要思考片刻，不過沒用太久。“問題在于，”他說，“一旦你把史學家扯進來，就會碰釘子，會產生歪曲。這里是神社，我們必須考慮英靈和家屬的感受，得讓他們高興。正因如此，史學家加入的話只會捅婁子。比如他們所謂的侵略戰爭，其實是一場救亡圖存之戰，我們可不想讓戰歿者家屬覺得我們供奉的是侵略者的牌位。”

如果暫且忽略神道教和基督教之間差異的話，那么有著“遺物”“圣地”和向殺身成仁精神致敬的銅牌匾的靖國神社，和一戰后修建的不少歐洲紀念堂的確沒什么兩樣。總的說來，歐美的二戰紀念館（蘇聯的除外）已不再歌頌陣亡士兵的舍生取義。奧斯維辛之后再歌頌犧牲、把戰爭浪漫化并拔高其精神高度，顯得不合時宜。為國王和國家承受苦難的基督教騎士再也不會還魂了。但在日本，戰爭依然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爭（不是屠猶），而其象征意義依然能勾起人們的宗教熱忱。諸如靖國神社這樣的廟宇依然傳承著19世紀民族主義思潮的薪火，并繼而傳遞出這樣一種印象，即國家“復興是戰歿軍人用生命換來的。

九州南端的知覽附近有座“特攻平和會館”，館外的木牌完美地印證了我的看法：“我們”——也就是日本人——“對他們以壯烈犧牲換來的新生感激涕零……我們對國家走向繁榮昌盛感激涕零，對日本今天的和平盛世感激涕零……我們相信，（神風特攻隊也期盼恢復和平與繁榮”。

也許他們的確祈求和平，但在我穿越一座小型觀音殿——觀音是慈悲女神——外的花園，走向“平和會館”的時候，我著實弄不明白，他們到底為和平作出了哪門子貢獻。神社沒給出答案。在由退伍老兵協會捐贈、用來告慰亡靈的石燈群之間，停著一架銀色的自殺式戰機，神風特攻隊員曾經駕駛過它。他們有個綽號，叫“櫻花”——美麗繽紛但轉瞬即逝。

神社和博物館建在空軍基地舊址上。在過去，神風隊員就是從這里起飛，奔赴沖繩執行自殺式任務的。鹿兒島是離這兒最近的城市，地處風景旖旎的海灣口，跟珍珠港十分相似，因此日本海軍1941年選在這里進行軍事操練。一踏進“平和會館”，就有人遞來一份冊子，介紹說這座博物館“之所以建立，是為了保存二戰的真實歷史檔案，為真正的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大半個博物館——這是棟丑陋的現代建筑，由政府撥款，建于1985年——都圍繞著“櫻花們”的遺物而建。其中包括“千人針”腰帶，據傳經由一千名女子之手縫制而成，飛行員佩戴后可獲得力量。此外還有破舊的軍裝，以及飛機爆炸后從海底打撈上來的部分殘骸。但是最最重要的遺物，還是飛行員留下的書信和日記，許多都寫得感人肺腑，令人動容。

按照慣例，飛行員要寫好遺書，留給親人。遺書中流露的部分情感俗不可耐，這點可以預料：比如為天皇和他的神圣土地捐軀乃無上榮耀的愛國言辭，履行軍人義務的自豪感云云。但這些都是常規套路，之所以這么寫是因為上頭要求，比方說向父母謝罪兒子忠孝不能兩全，言辭之悲切，令人唏噓。許多信件用詞大抵相似，都是勸父母和兄弟姐妹莫要流淚，莫要悲傷，而是應舉起一杯清酒，拿出和軍人慷慨就義時一樣的氣概把酒言歡。

歡聲笑語是重點。這不光在信里得到了強調，也體現在墻上掛著的青年遺照中，它屬于當時媒體報道的一大特色。縱然面對無法逃遁的死亡，也要發出少年般的歡笑，這點和愛國情緒一樣普遍，且備受贊美。“平和會館”的某張寫真里，一群樂呵呵的飛行員正準備起飛，其中一人不過是個小孩兒，他剛和自己的寵物狗訣別。配圖文字如下：“在這些不久之后注定命喪黃泉的人歡笑的臉龐上，洋溢著一種別樣的美。”

當然，這份故作淡定并非日本人獨有，英軍轟炸機飛行員也是笑口常開。年輕人對壯烈赴死的浪漫想法沒有抵御力。但現如今看到這被當成一種美好的事物，在“平和會館”里得到大力歌頌時還是讓人心里發毛。因為愛國口號和爽朗笑聲無法掩蓋生命被白白葬送的悲劇。相反，它們平添了一絲蒼涼的凄楚，在歡聲笑語的背后其實掩藏著一種絕望的情緒和難以抑制的歇斯底里。

一名十八歲的青年在寄給雙親的遺書結尾寫道：“我真是個窩囊廢，媽媽，竟然無法拋開一切，大聲呼喊您的名字，盡管我很想這么做。媽媽！請原諒我，您一定覺得很孤獨，但我現在要使出全力大聲呼喊您的名字：媽媽！媽媽！媽媽！”

這兒還有一封，是個叫阿茂（Shigeru）的少年寫的，年齡不詳“是時候出發了。登上神圣戰機的櫻花正在怒放。我要加入他們的行列，開得一樣絢爛。爸爸，媽媽，各位，請別為我擔心。大家保重我祝愿你們在世上都能活得幸福……”

這些信件和照片對參觀者造成的影響不言而喻。男人沉默不語不一會兒便抽身去看模型戰機。上了年紀的女人則低聲啜泣，用疊成小塊的方巾擦拭眼淚。“太年輕了，”她們嗚咽著，“太年輕了。只比“櫻花”年幼幾歲的學生排隊經過展品。有些人哈哈大笑，有些在閑聊，還有些默不做聲。

令人悲傷的并不只是神風飛行員的過早凋零。但凡打仗，無論哪國的軍人（乃至平民）都是如此。但他們的死讓人最難過的地方莫過于泛濫到讓人反胃的煽情元素，而這居然被拿來為自我犧牲正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神風飛行員根本不相信那套櫻花凋零和殺身成仁的愛國主義說辭，畢竟這在當時非常普遍。而這正好切中了問題的本質：他們被教育為自己的死歡欣鼓舞。正是這種對他們懵懂理想的利用，讓勸之赴死的做法顯得無比邪惡。但這點在“平和會館里至今完全沒有提及。

至于虛假的理想和膩味的詩意，它們依然是此地氛圍的構成要素。通往會館的馬路兩旁栽著櫻花樹；人們大肆吹捧所謂的“歡笑臉龐之美”；導游指南稱會館為“淚之閣”；一幅駭人的4×3米的油畫里，六個身裹白袍的天使將一位飛行員的遺體抬離正在燃燒的機體，托著他升向天堂；最最重要的是，拒不承認自殺式任務完全是白白葬送生命，僅僅起到了延緩戰爭結束的作用。幾千人的死被賦予了一種子虛烏有的意義：年輕人為了和平與繁榮而死，他們的犧牲是愛國主義的光輝典范。

松本先生是負責管理會館的當地公務員，他站在主樓里一架綠、白、紅三色相間的自殺式飛機前，身旁簇擁著三百來個身穿海軍藍和黑色校服的學生，他們席地而坐，正聽松本訓話。松本的口氣像極了過去放幻燈片的解說員的腔調，帶著婉轉悅耳的鼻音。他問孩子們從哪兒來。“喏，這是你們的前輩，”他邊說邊拿出一張和孩子們是同鄉的飛行員照片。照片里的死者笑容可掬地看著鏡頭。松本舉著照片，講述他們的生平故事；關于犧牲、勇氣、單純無私的情感，以及美好理想。結束演講時，松本說有人恐怕會批評他將戰爭理想化了，或者在鼓吹軍國主義。但這種想法大謬不然，他表示。戰爭太壞了，壞透了，我們再也不能重蹈戰爭的覆轍。

然而，事后我在他辦公室追問道，如果說故事的主人公都那么英勇，他們的理想又如此純潔的話，為什么孩子們還會得出戰爭太壞了的結論呢？“這是因為，特攻隊的飛行員是如此真誠地信奉和平。”

我知道多說無益，松本和會館創始人既不是嗜血之徒，也不是為戰爭辯護的衛道士。然而，戰爭宣傳向來立足于理想之上——犧牲、誠實和神圣事業。他們對于理想的信念太過堅定，難以撼動。

\*\*\*\*\*

要想精確洞察變化總是不甚容易，因為事物一直都在發生變化多數悄無聲息，無人留意。但就戰爭記憶而言，1990年代初在日本可謂是一段大變動的時期；或者起碼看似如此。自1980年代末以來退伍老兵開始公開談及往事。1991年，原韓國慰安婦及部分幸存中國勞工赴日索賠。在大阪和京都，兩座著重反映日本侵略歷史的新博物館對外開放。總而言之，似乎打開了幾扇窗，放進來一縷清風對此有兩種常見的解釋，一是1989年裕仁天皇撒手人寰，二是里夏德·馮·魏茨澤克于1985年在德國國會所做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談到，“任何對過去視而不見的人對現在也一樣盲目。不論是誰只要他拒絕銘記過去的慘無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風險。”演講稿被譯成日文，讀者甚眾。許多日本人都跟我談起過此文，說這為他們樹立了榜樣。

但日本的侵略史之所以重新得到了突出，還有一個更為政治化的原因。海灣戰爭引發了一場對日本武裝力量今后扮演之角色的嚴肅討論。一部新法案（《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案》，簡稱PKO法案）獲得通過，使得日本自1945年以來首次能夠以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的名義向海外派兵。這乍聽起來好像很轟動，實則不然，因為自衛隊只能攜帶輕武器，且不能參與任何戰斗。但這一尺度對不少日本反戰主義者而言已經夠過分的了，他們將其視為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又一跡象。呼吁在平和會館設立“侵略者一角”的廣島活動家是這么想的，作家兼政治活動家小田實也是這么想。兩座嶄新的戰爭博物館——大阪國際和平中心和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背后也折射出強烈的和平主義思潮。二者均非日本政府撥款所建。大阪的博物館由大阪縣政府和市政府建立，而京都那家則隸屬于立命館大學。

兩座新博物館都是世俗機構，并無義務供奉任何人的靈位；這里既沒有“遺物”，也不存在“圣地”，更不見對舍生取義的頌揚。話雖如此，反戰主義并非沒有自己的宗教氛圍。一走進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館大廳，就能看到漫畫家手冢治蟲所繪的兩幅巨型壁畫，內容是兩只驚慌奔逃的鶴——一只飛離幽暗而殘酷的過去，另一只正飛向光芒萬丈的未來。用宣傳冊的話講，藝術家傾盡全力，想要“歌頌生機勃勃的宇宙，歌頌讓所有生靈都能活出精彩的上蒼”。

大阪國際和平中心位于一幢富麗堂皇的現代建筑三樓，中心最后一個展廳呈現了人類依然面臨的危險：核威脅、生態危機和社會危害。耳畔縈繞著新世紀風格的音樂，空靈而飄逸。世界各地的人們通過錄像，闡述自己對和平的見解。一名美國女性表示，戰爭屬于男人，只有女性的治愈力量才能帶來和平，因為她們會紡紗織布，培育后代。

撇開上述景象，兩座博物館的宗旨簡單明了：改變戰時日本的形象，使之從受害者變為侵略者。日本人的苦難并沒有被忽略；大阪博物館的一個展區就十分詳盡地——尤其是從孩子的視角——展示了大阪是如何被燃燒彈摧毀的，以及遭到打擊是何種滋味。在當時兒童所繪的一幅彩色圖畫里，逃命的人群驚慌失措地飛奔過橋，身旁炸彈爆炸，嬰兒的頭顱被炸上了天，鮮血四濺。可是，不同于廣島博物館，在這里人們小心翼翼想表達的是，這一切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日本發動的戰爭。

滿滿一屋子“十五年戰爭”的文物、檔案和照片清楚展現了這點。沒有什么是被粉飾的；南京大屠殺、化學戰部隊、慰安婦，這些都有介紹。但除了只言片語外，解釋并不詳盡。很明顯，這么做是因為不想過多觸及戰時宣傳的本質——國家神道鮮有提及——而是讓年輕的參觀者對戰爭的殘酷性有所體認（據悉，他們多為初中生，因為高中生正忙于應付考試）。

由于對日常生活的軍事化管理、壓制言論自由和民族主義宣傳給予了更多關注，京都博物館的啟迪意義更大，涉及政治的內容更多，對戰后歷史所做的簡短概括也符合左派常有的結論。比方說，某本供小學生使用的插畫書就寫道，越戰是美國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但“渴望自由和獨立的越南人民經過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最終取得勝利”。

話說回來，這么做的目的與其說是鼓吹反美主義，不如說是為了彰顯戰爭都是邪惡的。用大阪國際和平中心宣傳冊的話來說：“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而富饒的日本，但戰爭陰云依然籠罩在我們上空‘十五年戰爭’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根本沒有所謂的正義戰爭。”

大阪博物館創立人之一勝部元（Katsube Hajime）教授在一本由他撰寫的、名為《日本的角色》的小冊子里，進一步厘清了反戰主義的政治背景。在書中，勝部探討了《日美安保條約》和PKO法案在他看來，政府故意歪曲或掩蓋日本戰時歷史，以此為日本軍事大國地位的恢復背書。他希望日本能斬斷“如今同美國的霸權主義全球伙伴關系，并成為民主和平陣營的一分子……”，另外，“如果選擇走這條路的話，日本就必須承認它在‘十五年戰爭’里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并對戰爭受害者作出賠償”。

勝部教授為人光明磊落，他似乎一向如此。由于在私人研究團體內部質疑日本的戰事，他于1943至1945年間蹲了兩年大牢。他指出，同所有政治犯一樣，釋放他出獄的不是本國政府，而是美軍這段經歷給他造成了創傷，打那以后他就一貫以最大的惡意揣測日本政府。他的穿著一副年邁進步主義者的模樣，很是隨意：灰色運動衫、蝶形領結、寬松長褲。他向我解釋大阪國際和平中心標志的意義——紫色的圓圈中央有個綠點，他說，綠點象征大阪，傳遞著和平的訊息，紫色圓圈則代表世界各國。

參觀完博物館后，某位館員領著我來到天臺。站在那兒，我們俯瞰圍繞大阪城天守閣而建的大型公園，那里曾是日本帝國陸軍操練和演習的地方。我回想起先前參觀過的日本戰爭博物館，有大阪的，有京都的，有設在九州原神風特攻隊基地的，有廣島的，還有靖國神社里的“游就館”。誠然，戰后的日本確有變化，可是基本的爭論依然如故。正方心目中的日本，已從罪行中吸取教訓，再也不會走向戰爭。反方認為，日本應有重新成為“普通”軍事強國的自由。只要一方運用歷史罪孽來支持其和平暢想，另一方就會加以否定。

\*\*\*\*\*

迪特·舒爾特（Dieter Schulter）是我在德國遇到過的怨氣最重的人之一。七年來，他一直擔任波茨坦歷史博物館館長。該市位于原民主德國，是諸多宮殿和軍營的所在地。兩德合并后，他被開除了。一位來自西柏林的中世紀史學家接替了他，并被指派修繕博物館。她形容舒爾特是個“死硬派黨員”，還告訴我，秘密警察斯塔西的辦公室就在他頭頂上。

我們約在一座破敗宮殿裙樓內的季諾咖啡館，這個地方很現代，光線昏暗。舒爾特衣冠楚楚，身穿熨燙過的藍色牛仔褲和花紋毛衣，腳蹬一雙柔軟的便鞋，一頭白發梳得整整齊齊，指甲富有光澤，說明最近剛修剪過。他講話時，視線不停地在屋內游移，不說話時則撅起嘴唇。

他說，放棄在博物館的工作并不容易，因為這曾經是他生活的重心。另外，他對時局的變化也很不滿。他談到波茨坦的歷史地位。自腓特烈大帝以來歷朝歷代都將波茨坦作為展現其形象的工具，他解釋道。波茨坦在1920年代是右翼政治活動的中心。戰時，希特勒的高級將領都駐留于此，就連策劃1944年未遂政變的那批人也不例外。然而，這一切在博物館里都沒有被給予足夠的重視。舒爾特相信，博物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展現歷史的法則”。

在面見舒爾特之前，他的繼任者比爾申克太太已經帶我在昔日博物館的一些地方轉了轉，包括陳列二戰館藏的展廳，那里迄今未改作他用。自德國統一后，這些展廳就對外關閉了。里面散發出一股霉味，聞著有點像熟蘑菇。新館長開了燈，揭開蓋在玻璃展柜上的一塊白布，露出“新制度的象征”，即共產主義德國誕生前的舊政權。標志物排成一行：有個一戰的德式尖頂鋼盔，一頂財閥戴的高帽和一頂沖鋒隊的褐色軍帽。它們排列的次序就跟歷史法則一樣順理成章，和多米諾骨牌一樣整整齊齊。在展廳的其他角落，我學習了法西斯主義為何是“魏瑪共和國內部民主體制和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必然產物。

我問舒爾特，這些文字是誰寫的，他是否還相信這一套。他撅撅嘴，望向我身后，開口說道，聲音輕得幾乎像是在耳語：“這些差不多是七年前寫的，科學知識后來進步了……”

他的想法發生了哪些變化？“我仍然相信，社會主義必須是探尋社會關系和語境的基礎。歷史不能只是由細節拼接而成的馬賽克只展示物品的博物館算不上是博物館。”

接著，他話鋒一轉，談起自己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不易，比方說每次辦展都必須得到審查人員批準，然后才能落實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資，譬如印刷用的紙張。

他是否覺得德國比過去更自由？“不，我們從來就不自由，從來就沒自由過！”哪怕是相對而言么？“沒錯，你瞧，就跟我們過去為了拿到紙張或資金，不得不作出妥協一樣，現如今某件事如果和資本主義制度不合拍，那你照樣什么也辦不成。必須噱頭十足必須如何如何。好吧，也許歷史博物館會更有趣……”

我對舒爾特無甚好感，他是個共產黨官僚，跟前人沒啥兩樣他的口氣聽著甚至很像1945年突然發現自己的世界轟然崩塌的那些納粹低級官僚。當被問起辦公室樓上的斯塔西時，他說自己一無所知：“從沒人告訴過我，我不知道，這種事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啥，我啥都不知道。”

但他關于博物館的一番話有一定道理。一座博物館，特別是歷史博物館，不能只是隨隨便便展示些物品。展品必須根據觀念進行排布。沒有故事的歷史是令人費解的。這不是說，世上根本就沒有真相，所有故事都是宣傳。但要是想抓住真相，就必須有對抗，有爭論，有闡釋，還有重新闡釋——簡言之，有一種無休無止的敘述。問題在于，如何在博物館里呈現這點。

東柏林或許給出了一種答案。民主德國解體前，每棟住房、每所學校、每家工廠、每座軍事基地都有一個所謂的“傳統之屋”（Traditionskabinett）。這些屋子實為一間間微型博物館，概括性地展示了一系列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德國工人運動，共產主義反法西斯抵抗運動，蘇聯紅軍解放易北河以東的德國領土，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國。這里呈現的是最純粹的歷史“傳統”，為共產主義國家提供了合法性。同無處不在的列寧胸像一樣，這些地方中的大多數在1990年后已被拆除。然而，在東柏林某公園一角，一間“傳統之屋”仍保存完好。不過，它的主題不再是歷史，而是宣傳。展品四周貼滿了標簽，在解釋展出內容的同時，也進行批評。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可以說是在解構舊政權留下的神話。

雖說兩者并不完全一致，但我還是聯想到了漢堡一座著名的警示碑，作者是雕塑家阿爾弗雷德·赫爾德利奇卡（Alfred Hrdlicka）。赫氏的作品刻畫了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的尸體和骨瘦如柴的囚犯，是對一旁一座年代更為久遠的紀念碑的批判——此碑丑陋至極，形似巨型地堡，立于1936年，目的是紀念第二漢莎步兵團76營。浮雕上刻著成排一模一樣的士兵，正環繞石碑行軍。在他們佩戴的頭盔上方，刻著一行哥特字體的文字，摘自海因里希·萊什（Heinrich Lersch）作于1914年的一首詩：“我們終有一死，而德意志永垂不朽。”（Deutschland muss leben, und wenn wir sterben müssen.）幾乎所有納粹紀念碑都難免被拆毀的命運，但這塊碑卻逃過一劫。人們選擇將赫爾德利奇卡的尸體石雕立于其側，是一種更為妥當的回應。這座警示碑存在的意義是進行反駁。

然而，諸如此類的例子十分罕見，也并未為歷史博物館或紀念碑存在的問題提供一種實際解決途徑。當總理科爾于1983年提議聯邦德國建立屬于自己的德國歷史博物館時，他腦子里盤算的肯定不是上述做法。為了向柏林建城七百五十周年獻禮，其博物館計劃要到1987年后才開工。

赫爾穆特·科爾在保守派學者米夏埃爾·施蒂默爾等顧問的熏陶下，對歷史很有興趣。同其他保守派一樣，他擔心聯邦德國缺乏歷史認同感。在醞釀建造博物館的計劃時，里夏德·馮·魏茨澤克還是柏林市長。魏茨澤克表示，東德人起碼有更為連貫的歷史觀——東柏林還有一座德國歷史博物館，一座大號的“傳統之屋”，位于壯觀的巴洛克式軍械庫內。米夏埃爾·施蒂默爾曾寫道，“追尋我們丟失的歷史”不僅“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在政治上具有必要性，因為這關乎聯邦德國的內在延續性和外交政策的可預測性”。[(105)](#_105_1)基民盟國會議員阿爾弗雷德·德萊格爾（Alfred Dregger擔心，倘若對“德國整體歷史”了解不夠，年輕一代的德國人就不會充分支持“民主國家”。“整體歷史”（die ganze Geschichte）是句黑話。他要表達的是——而且在一些場合確實說過——對于納粹時期歷史給予的關注過多了。簡單地說，上了一定歲數的德國保守派擔心，國家被一分為二，聯邦德國的公民會自感不是完整的德國人。歷史——即“整體歷史”——會幫他們增強認同感。

因此，當科爾在1985年就博物館項目再次做國會演講時，他指出有必要知道“我們從哪兒來，作為德國人今天又身居何處，以及將向何處去”。[(106)](#_106_1)不過，他還提到了和東德的關系，所謂的“德國政策”（Deutschlandpolitik），這觸及“我們的民族認同感、我們國家和歐洲命運的核心”。

一個由史學家和博物館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應運而生，接踵而至的是一場辯論。左翼政客和知識分子對科爾的想法完全不感冒。他們懷疑保守派政府的計劃背后動機不純，對保守派民族認同思想更是極度不信任。可以說，在他們心目中，身份認同壓根不關政府的事。社民黨政治家弗萊穆特·杜維（Freimut Duve）在1986年聲稱：“歷史不屬于政府，也不屬于政治。在民主國家中，政府既不能、也不應以過去封建領主的方式建立博物館。”[(107)](#_107_1)就這樣，正反兩方你來我往，相持不下，直到1990年整件事變得多此一舉后，這場口水仗才告一段落：兩德合并，又只剩下一個“德國”了。

今天，最接近官方歷史博物館的，是坐落在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其位于東柏林的軍械庫內，過去是共產主義德國歷史博物館。早在1989年柏林墻倒塌后不久，就有人試圖改造它。那時，門口的一塊牌子上寫道，“我們如今知道，這座博物館反映的是一種為越來越官僚和集權的社會正名的歷史觀，它禁止人們同過去和現在建立積極而主動的聯系……所有一切都有待改變，有待得到新的評價。歡迎您不吝賜教，協助我們以真正可取的方式呈現歷史。”

這番話里能讀出一絲急切，暗示東德人盡管有世上最強的意志，但單靠自己也無力應對。因此，西德人參與了進來，軍械庫內部被拆除一空，代之以新博物館。嶄新的德國歷史博物館沒有設永久性館藏；歷史主旨和話題呈現于各種臨時展覽中。據館長克里斯托弗·施托策爾（Christoph Stölzl）介紹，“如此設計，是為了促使人們思考。”

施托策爾來自慕尼黑，是個品味考究的自由派，儀容整潔，很有英國范兒（style anglais），扎真絲領結，穿花呢西服：他既是美學家，也是經驗豐富的行政人員，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像個做廣告的。施托策爾出生時恰逢戰爭末期，不過他身上沒有折磨許多“六八一代”知識分子的那種對罪行的道德關切。他以一句評論開啟了我倆的談話：“你不可能為某件你沒做過的事進行心理哀悼。”無疑，他指的是奧斯維辛之后身為德國人這一老生常談的話題。

“你能做的，”他說，“只是些象征性的事，形式上的。比如設立一年一度的奧斯維辛日，給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捐款，這些都不錯，總比自我反省更有建設性。可是，德國理想主義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幻想不切實際的事，卻忽略那些可以做到的。

我來拜訪施托策爾，是想就他供職的博物館請教幾個問題，可他卻滔滔不絕地談起了紀念館。不過，他嘗試對二者進行區分：“我認為，應該用象征性和藝術性的姿態來面對過去，但有不少德國人覺得，應以話語取代儀式。問題在于，他們把探討變成了一種準宗教活動，而不是政治活動。”

在博物館，審美和政治話語的結合是行得通的，縱使總有些人會抱怨，說藝術成了話語的犧牲品，或者倒過來，話語成了藝術的犧牲品。而在紀念館里，儀式和分析恰恰無法相融。施托策爾也許會因為過于強調藝術性而遭人指摘，畢竟，現在談的可是歷史博物館他關心的是外在形式，就紀念館而言，這也許是他應有的關切。但就連他，也會將博物館和紀念館混淆起來——盡管這有時或許在所難免

比方說，對設在萬湖別墅內的大屠殺博物館，施托策爾就持批評態度，因為其選擇的形式是錯誤的。據他稱，博物館把大屠殺中的猶太人描繪成“永恒的受害者”。他反對展示死亡營和隔離區的照片。在他眼里，寫不寫實不是重點。他希望記憶的形態能鼓舞人心。相比較下來，他更青睞天主教公墓對逝者的呈現方式。透過墓碑上的照片，逝者可以活在人們心中。“這么做，”施托策爾表示，“才像是復活。我覺得，最好還是把逝者當成活生生的人來緬懷，而不是被卷入工業化殺戮機器的骷髏或尸體。”

然而，萬湖別墅的問題在于，它究竟是博物館還是紀念館？這點存在模糊之處。想必二者皆有，這就是問題的核心。你能通過藝術作品、儀式、分析和話語來銘記大屠殺，但這一切不能在同一時空進行。我向施托策爾指出，儀式化和藝術性對待歷史的態度是天主教的立場，而強調道德話語更符合新教的傳統。他認可了我的說法，稱沒準是這么回事。事后，我覺得這一概括或許可以進一步延伸，因為德日兩國的紀念館和博物館面臨的問題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記憶既可以是宗教化的，也可以是世俗化的。兩種說法都成立，但不能混淆。德國在避免二者被混為一談這點上，做的并不比日本要好多少。宗教思維依然在相同程度上糾纏著這兩個國家。

[[1]原文如此，應為2146塊。——編注](#_1_11)

[[2]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普魯士建筑師、畫家、城市規劃師，德國古典主義的代表大師。](#_2_9)

[[3]龐貝（Pompeii），古羅馬城市，公元79年因火山爆發被徹底淹沒。整座城市的遺址直到18世紀中期才重見天日。](#_3_8)

[[4]即埃及艷后。](#_4_8)

[[5]Rudolf Hess（1894——1987），納粹德國政治人物，曾任納粹黨副元首，1987年死于柏林施潘道軍事監獄內。](#_5_7)

[[6]應是戰爭末期，隨著盟軍在東部的不斷推進，被迫轉移的奧斯維辛囚犯。——編注](#_6_5)

[[7]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共首任主席。](#_7_5)

[[8]英語諺語中有skeleton in the closet的說法，直譯是壁櫥里的骷髏，意指見不得人的丑事。這里是指布痕瓦爾德臭名昭著的過去。](#_8_4)

[[9]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即克格勃的前身。](#_9_4)

[[10]除了猶太人外，歐洲吉卜賽人（羅姆人）也是納粹德國種族滅絕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死者約有五十萬。](#_10_3)

# 第四部分

## 第九章 一個正常國家

1988年11月10日，波恩。距離“水晶之夜”過去了整整五十年聯邦議院議長菲利普·耶寧格（Philipp Jenninger）堅持由他親自主持紀念日，對西德議會做演講。他不希望任何人搶他的活兒，就連猶太社團領袖海因茨·加林斯基（Heinz Galinski）也不行。如果同意讓加林斯基發言——他日后在維也納告訴我——就得讓天主教會大主教也說兩句，那新教教會要不也來？不行，這樣下去沒完沒了，再說聯邦議院又不是這些人的舞臺。總之，議長菲利普·耶寧格博士態度堅決，只有侵略者的后代才有資格發言并緬懷這一天受害者可不行。

于是，他站起身，與其說是在發言，不如說是在照本宣科，操著拖沓無比的官腔，仿佛宣讀一項草案。下文摘錄了他的發言內容：

……我們今天齊聚聯邦議院，紀念發生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排猶暴動。因為，理應銘記并為發生在我們中間的罪行負責的人，不是受害者，而是我們，我們德國人必須清楚地了解本國歷史，吸取有利于當下和未來施政的教訓……

受害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很清楚1938年11月在他們的苦難歷程中意味著什么，可我們清楚么？……

總體而言，德國人對反猶活動和措施的反應很漠然；他們過去幾年來一直如此。積極參與暴行的人數并不龐大，但也沒人起來反抗，沒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抵抗行為……

回首過往，女士們先生們，很明顯，1931至1938年間，德國發生了一場真正的革命——這場革命將一個法治國家變成了犯罪國家，變成了摧毀法律、倫理準則和道德根基的工具，而國家顧名思義，本是為了保護和捍衛它們而存在的。

就德國和歐洲猶太人的命運而言，希特勒獲得的成功甚至比他的罪行和劣跡更加意義深遠。即使時隔多年再回眸，即使我們已經知道后來發生了什么，1933至1938年這段時期依然讓人捉摸不透，起碼從希特勒最初幾年在政治上的無往不勝幾乎史無前例這點來看，事情確是如此……

對于大體上將魏瑪共和國看成一連串外交政策恥辱的德國人而言，所有這一切看起來一定像是奇跡。還不單單是這樣。人們不再失業，重新走上工作崗位，之前大家都過苦日子，之后多數人都過上了基本富足的生活……

至于猶太人，喏，他們是不是太妄自尊大了呢？當時的人就是這么說的。他們難道不應該學著謙卑點么？難道不應該被敲打敲打么？最重要的是，撇開無法信以為真的夸大其詞外，當時的宣傳難道不是基本符合人們的猜測和想法么？當事情到1938年11月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時，人們總還能找到說辭，比如借當時某人的話來講：“我們干嘛要關心？如果很嚇人，不看就是了，這又不關我們的事。”

女士們先生們，早在希特勒冒出來之前，德國就有反猶主義，許多別的國家也有……

誠然，國家社會主義者竭盡全力想要掩蓋他們犯下大屠殺的真相，但所有人都知道紐倫堡（種族）法案，所有人都目睹了五十年前的事，遣送猶太人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

許多德國人任由自己被國家社會主義蒙騙和引誘。許多人漠不關心，使罪行成為可能。許多人自己也成了罪犯，有關罪行和掩蓋罪行的問題是人人都應回答的。

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抵制的是對歷史真相的質疑，是將一群受害者與另一群受害者對立起來的做法，以及對事實的否定所有希望減輕我們的罪孽、聲稱過去并非暗無天日——或其實沒那么暗無天日——的人，都在試圖為無法辯解的事進行辯解。

為了闡述他的觀點，耶寧格引用了一段描述1942年猶太人遭集體處決的目擊者證詞。所有細節——嬰兒流著血，身體不斷抽搐；赤身裸體的母親；年輕的劊子手在開槍間隙抽煙——在他不動聲色的嗓音中娓娓道來，一點沒有遺漏。他還引用了希姆萊的話后者曾開導手下的黨衛隊軍人，說不要因為看到一百具、五百具甚至一千具堆積如山的尸體就心里發憷。耶寧格套用當時流行的話說猶太人是“害蟲”，諸如此類；他引經據典，甚至把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搬了出來。但這一切都無濟于事，錯誤已經鑄成，演講是一場災難。

在他開講后沒多久，綠黨的大部分議會代表便起身離場，以示抗議，待到演講結束時，有四成的社民黨人也已離席。據一篇新聞報道稱，耶寧格本人所屬的基民盟的黨員“羞得無地自容”。在耶寧格演講前，年邁的猶太女演員伊達·埃雷（Ida Ehre）曾朗讀保羅·策蘭的詩歌《死亡賦格》，引起巨大反響，此時卻以雙手掩面耶寧格離開議會大廳時形單影只，蒼白的額頭上淌著汗。就連最親密的政界友人都沒跟他握手。耶寧格本想給眾人上一堂歷史課，但他的講話往輕了說是口無遮攔，不知所云；往重了說是不知廉恥地妄圖為德國人開脫。

“丟人現眼！”演講剛結束，某位基民盟黨員就大聲斥責。“黑暗的一天，”一位自由民主黨人哀嘆道。“一場災難，”某社民黨人評論。“痛心疾首，”另有人說道。國外媒體一概義憤填膺：意大利某日報的頭版頭條是“德國議會的反猶主義”。荷蘭某報的標題寫道：“希特勒崇拜在德國議會興風作浪。”倫敦的《泰晤士報》稱這一天為“西德的國家災難”。兩天后，耶寧格辭職。頗有些吊詭的是，大約一年后，他被任命為駐維也納大使。

時隔多年后重讀耶寧格的演說詞，很難理解其為何會掀起軒然大波，他自己恐怕也會感到不解。或許他用詞欠妥，或許旁征博引屬于聰明反被聰明誤，但光看表面是不夠的。要理解人們為何群情激憤，就必須想象當時的場景，或者事情的經過。

耶寧格在位于維也納的辦公室里——房間摩登、實用且無個性——向我坦言，他那時犯了個大錯。在伊達·埃雷念完保羅·策蘭的詩后，他不應該緊跟著發言。“這首詩太有感染力了，”他說。嗯？這怎么說？“喏，用它為嚴肅的歷史演講做鋪墊并不合適。”對，沒錯，不合適，我迎合道。

清晨的黑牛奶

我們夜里喝

我們中午喝

死神是來自德國的大師……[[1]](#_1_Ci_Chu_Cai_Yong_De_Shi_Bei_Da)

想不被感染是不可能的。用《法蘭克福匯報》的話來說：“ （埃雷）洪亮的聲音在顫抖。你能聽到她的喘息和講稿捏在手里的窸窸窣窣聲。議會大廳里的所有人無不為她話語中的力量和悲慟所打動。接著，耶寧格走上講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女士們先生們……’”

耶寧格相貌平平，不是那種能輕易打動聽眾的人。身材矮小臃腫、來自萊茵地區的他出身農家，靠打拼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在德國隨便哪家啤酒館的餐桌旁都能見到這號人。他笑聲粗嘎，西裝看著太緊身了，這一切都不利于當天的發揮。他乍看就是那種稀里糊涂笨嘴拙舌、后知后覺的人。

一位社民黨黨員抱怨稱，他一次都沒有使用Trauer這個詞，這可以翻譯為“悲痛”，也可以譯作“哀悼”。惹惱很多人的，正是耶寧格演講的基調——不夠“痛心疾首”（betroffen）。擅長道德姿態的大師、西德首相維利·勃蘭特曾在原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前雙膝下跪，為納粹的所作所為謝罪，他稱耶寧格事件為“戰后德國史上黑暗的一天”。耶寧格“之所以栽跟頭，不是因為他是個壞人，而是因為他所談論的已經大大超出了他的能力”。

耶寧格的講話，被人拿來同里夏德·馮·魏茨澤克三年前于德國議會所做的著名演講作對比。后者在浸透悲痛之情（Trauer）的演講中提到，“單純、誠實地緬懷過去”的必要性，已經成為“一個人內心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把耶寧格的表現同其好友赫爾穆特·科爾一天前所做的演說進行對比。科爾平素并不以風度或圓滑著稱，但在法蘭克福的韋斯滕德猶太教堂，就連科爾都老練沉著從容應對，稱大屠殺“有理由讓人感到深深的恥辱”。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耶寧格栽跟頭，是因為挑錯了場合，當時需要的是追思會而不是“不帶感情的歷史演講”。

但是，耶寧格發言的場所不是猶太教堂，他也不是以德國人的身份向一群猶太人發表演講；他置身于世俗的德國議會，這里是德國政治的殿堂，面對的聽眾是其他德國人。日后在維也納的辦公室里回憶起那痛苦的一天時，耶寧格嚷道：“我們必須發聲！但不能老是那一套。光說我們感到慚愧、不會讓其重演是不夠的。我是想拿面鏡子，讓德國人照照自己！”

我對耶寧格生出一絲同情。有意思的是，許多從受害者角度看問題的人也同情他的境遇。德國猶太社團中央委員會成員米夏埃爾·福斯特（Michael Fürst）就覺得耶寧格沒必要辭職。畢竟，他說，耶寧格所述均屬事實。除了他以外，紐倫堡審判的檢察官羅伯特·坎普納（Robert Kempner）也認為耶寧格的演講“甚至算得上精彩”。

那么，德國人為什么討伐聲一片？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硬要錯誤理解耶寧格的引經據典？他們為何認為是他，耶寧格——而不僅僅是他援引的那些人——視希特勒為令人癡迷的政治家，而猶太人是“害蟲”呢？或許，他的演講場合和內容都不足以充分解釋其遭遇的滑鐵盧，這還同德國國內的猜疑氛圍有一定關聯。綠黨、自由黨和左派懷疑保守派在利用一切機會為戰爭洗白，相反，保守派則懷疑綠黨、自由黨和左派借奧斯維辛一事讓德國人下不來臺。“水晶之夜”五十周年紀念之際，德國的猜疑氣氛達到巔峰，當時正值一個十年即將落幕。在這十年中，保守派屢次試圖篡改歷史，甩掉罪孽的包袱。早在六年前，右翼基民盟黨員阿爾弗雷德·德萊格爾就呼吁全體德國人“走出希特勒的陰影——我們必須恢復正常”。

往前推四年，赫爾穆特·科爾造訪了以色列。訪問期間，他談到自己“所幸生得晚”——也就是說，因為生得晚，所以沒動手殺過猶太人。他也使用了“正常”這個詞，譬如論述德國和以色列之間的“正常關系”。這時距離科爾的比特堡之行過去了三年，距離恩斯特·諾爾特稱大屠殺是對斯大林的“亞洲野蠻之風”的自衛性效仿、從而掀起“歷史學家辯論”過去了兩年；換言之，大屠殺并非德國特有，只不過是人類恐怖歷史中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罷了。

講話磕磕絆絆、支支吾吾的耶寧格一頭闖進了這片戰后德國的戰場。固守一方陣地的是那些希望德國正常化，因為生得晚所以毫無罪孽感的人；盤踞另一方陣地的則是將奧斯維辛化為自我認同一部分的人。到頭來，耶寧格兩頭不討好，因為他一方面揪著罪行不放，另一方面又沒有顯示出足夠的愧疚感。

同赫爾穆特·科爾一樣，耶寧格幸虧生得晚，沒能成為納粹的信徒。他生于1932年，即希特勒上臺前一年。耶寧格回憶稱，他的父親是畫家，曾經反對納粹。耶寧格有幾位兄長，均投身軍旅有兩人并非出于自愿：其中一個剛參戰就死在了意大利，另一個死在了俄國。

耶寧格只比君特·格拉斯（生于1927年）年輕幾歲。他們那代人很特別，要加入納粹已經晚了，但年紀尚小，足以被教育成納粹：譬如少年團、希特勒青年團，等等。這段經歷讓許多同齡人對過去沉默以對（倒是他們的子女在大談特談）。“生得晚”賦予他們或許是幾代人中對過去最為復雜的看法：太年輕，不必擔責，但卻沾上了罪行的污點。像格拉斯那樣談論并描寫戰爭的人，往往從不停歇，甚至走火入魔，而且時常是從孩子的視角述及戰爭，譬如格拉斯的《鐵皮鼓》。他們的心結是要為父母的行為作出解釋。這是最難辦的，因為要解釋父母的行為，就得嘗試想象他們眼中那個世界。這意味著產生共鳴，哪怕只是在思想層面上，而感同身受能夠輕而易舉地蛻變為辯解。這就是為何耶寧格的多數同齡人傾向于只字不提。

針對耶寧格演講的諸多批評之一——說這話的是某位自由民主黨政客——是他試圖“解釋無法解釋之事”。這是一種普遍的指控普里莫·萊維曾寫道（關于大屠殺，而非耶寧格）：“也許我們無法理解，毋寧說，我們不可以去理解所發生的事，因為理解幾乎等同于為之正名。讓我來解釋一下：‘理解’一種倡議或人類行為，意味著‘克制’情緒，隱去始作俑者，把自己代入他的位置，對他感同身受。如今，人類再也不能夠去認同希特勒、希姆萊、戈培爾艾希曼等數不勝數的這類人。這一方面讓我們沮喪，另一方面也給了我們一種慰藉，因為他們的話（不幸的是，還有他們的行為）如果無法理解的話，沒準還讓人好受些。這都是非人的言行，十足的反人類，無歷史先例可循……”[(108)](#_108_1)

我們會猶豫要不要和萊維這樣的親歷者爭論。然而，倘若認為“水晶之夜”乃至大屠殺是無法解釋的、“反人類的”，抑或者是某個隱藏在人類黑暗深淵中反基督者的行徑，這其實是在淡化責任問題。當然，我們無從探索希特勒的內心世界。另外，人類暴行最深刻的根源或許神秘莫測，但諸如此類的暴行背后隱含著政治原因。這些原因既可以、也必須得到解釋，特別是在德國國會內。耶寧格是個政治家，不是詩人，也不是上帝的信徒。

在談及過去時表現得“痛心疾首”、滿口宗教話語相對容易。耶寧格想要解釋他父母的行為——也許有欠妥當——或至少是與他父母同輩的人的行為。正是那些人，想把他教育成未來的納粹。“希特勒上臺時，那些教授和作家在哪兒呢？”他的聲音響徹辦公室，邊說還邊跺腳，跺著那雙看起來很廉價的土黃色鞋子。“我怎么老聽說大家其實都反對希特勒呢？那是什么讓他們選擇了同流合污？我覺得，我們只有透過事實真相，才能同自己國家的歷史取得和解。解釋意味著講實話！”

耶寧格松了松領帶，這仿佛是根絞索，緊緊勒住了他粗短的脖子。額頭上細密的汗珠泛著亮光。他告訴我，演講結束后自己收到了三萬封來信。聲援他的人不是垂垂老者，就是青蔥少年。老一輩的人感謝他，是因為總算說出了“當時究竟是什么狀況”。年輕一輩則對知道了事情發生的真實原因心存感激。

揭開過去的神秘面紗，把歷史看成是一系列大致有內在連貫性的事件——而不必囿于固定法則——并對它們作出批判性解釋和評估，這些是史學家的任務。這項任務很艱巨，而且當這些事件尚歷歷在目、罪與恥的問題依然至關重要時，或許難以完成。1933——1945年間發生在德國和被占領國家的事件并不屬于“正常”歷史的一部分。對于德國學童而言，這是課堂上講授的政治道德寓言。為警示碑揭牌，或紀念諸如“水晶之夜”等事件時亦是如此。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段不同以往的歲月，在時間的長河之外，他們忍受著罪惡的沉重負擔。但自從1960年代末以來，人們試圖將1933——1945年的這一時期看成是“正常”歷史，不是道德寓言，而是大歷史當中的一個片段，同之前和之后發生的事存在結構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關聯。描述這一進程的德語詞叫“歷史化（Historisierung）。但“歷史化”有個悖論，這一進程的目的雖然是形成更為客觀的歷史觀，但實際上卻催生了愈加分化的主觀看法正常的歷史意味著多樣化的闡釋。

比方說，某位保守派民族主義者也許會認為，大屠殺固然可怕但依然可以算是一種一般性的種族滅絕，需要放到當時的大環境下加以理解，那段時期很不幸地涌現了大量種族屠殺事件。抑或者他也許會說，第三帝國的德國人當時行為舉止相對正常，因為希特勒畢竟提振了德國人的精神面貌。同樣可以理解的是，希特勒作為一位精于禮節儀式的大師，有能力將一個從骨子里熱愛歌劇式大場面、滿懷浪漫主義情懷的民族迷得團團轉。事實上，這些觀點過去都出現過。只是耶寧格不太走運，聽眾認為他對此表示贊同。

“歷史化”的另一個悖論牽涉到身份認同。“歷史化”的目標是拉開與過去的距離，冷眼看歷史。然而，諸如安德里亞斯·希爾格魯伯等部分保守派史學家之所以想將納粹這一時期放在綿延不斷的常規德國歷史中來看，是為了更方便對當事人——即非猶太裔德國人——產生認同感；也就是認同加害者的看法。倘若1933——1945年這段歷史被看成是特殊的（sui generis），史無前例，邪靈轉世同主流格格不入，那么除了部分邊緣化的狂熱分子外，世人幾乎不會對其建立什么認同。而對那“區區十二年”給予過多關注的結果就是，德國人被剝奪了歷史自豪感。好，假使說第三帝國也算“正常”不過是另一個時代的話，那么希爾格魯伯以同理心推度德國士兵背后的故事——他保衛祖國免受亞洲野蠻之風的戕害——借此強化德國人的身份認同和自豪感的初衷，就會更有可行性。但在這種刻意認同的過程中，客觀性兩次受損：元兇一次是講故事的人自己，一次是將罪責歸咎于他人的故事主人公。

這樣說來，認同就站在了“歷史化”的對立面。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鴻溝依舊如此之寬，彼此記憶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探尋客觀看法的人（特別是德國人）都可能跌入這道鴻溝之中。特奧·索默（Theo Sommer）在《時代周報》里，就耶寧格的演講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社論，標題是《論作為德國人的負擔》。[(109)](#_109_1)看來耶寧格是想說實話咯，索默寫道，“好吧，我同意。但請讓我們知道全部的真相——有關受害者的真相與加害者的真相一樣有說服力，而且還要帶有感情——對于被獵殺之人命運的憤慨，應該同對獵手動機的同理心一樣富有感染力，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強有力的用詞，高尚的情感，但話依舊沒說到點子上，因為耶寧格無法代替受害者說出真相，他也不打算憑區區幾句懺悔之詞懇請寬恕。他想要做的是探討歷史，站在一定距離開外了解過去。這么做并不可恥，但他本應意識到，即便戰爭過去了四十三年，“歷史化”依舊是一項高度危險的工作。因為一個“普通”社會，一個不為過去陰影所攪擾的社會，不可能靠對歷史“正常化”或搖晃十字架和大蒜就能到達。情況往往截然相反：只有當社會在面對過去時變得充分公開和自由——不是從受害者的角度，也不是從施害者的角度，而是從批評者的角度——陰影才會淡去。

\*\*\*\*\*

長崎，1988年12月7日。這一天是偷襲珍珠港四十七周年紀念日：天皇每天都在大失血，正緩緩走向死亡。要他命的是癌癥。但是處在“自制”氛圍中的日本媒體對此只字不提。在昭和時代即將落下帷幕的這些天，日本國內氣氛沉悶，壓抑，似乎山雨欲來。傳統的新年祭被取消了，平時無比艷俗的櫥窗展品也做了調換，以使其顯得不那么扎眼。12月7日當天，長崎市議會某位共產黨代表直言不諱地向市長本島等發問：是時候談談天皇的戰爭罪行了吧？

本島答道：“距離戰爭結束已經過去了四十三年，我認為我們有充足的機會反思這場戰爭的本質。我讀過不少國外文獻，也當過兵，受過軍事教育，因此我相信，天皇對戰爭是負有責任的……”

1988年12月8日，長崎市議員及自民黨地方分支機構要求市長收回他說過的話。

1988年12月12日，本島市長說，都走出這一步了，他不能“背叛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但會辭去自民黨顧問的職務。辭呈未被批準，相反地他被解職，永不敘用。本島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并不是說只有天皇對戰爭負有責任，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都有責任。但我真心覺得，目前的政治狀態是不正常的。任何關于天皇的言論都會讓人意氣用事。言論自由不應受到時間或地域的限制在民主國家，哪怕我們不同意一些人的觀點，也應予以尊重。”

1988年12月19日，二十四個極右翼組織共駕駛三十輛裝有擴音喇叭的卡車，浩浩蕩蕩穿行在長崎市內，叫囂要索本島的命，還說這是“天譴”。自民黨希望長崎縣知事拒絕同市長進行政治合作知事答應了。

1988年12月21日，六十二個來自日本各地的右翼團體共駕駛八十二輛裝有擴音器的卡車，在長崎市內游行示威，要求市長以死謝罪。

1988年12月24日，新成立的“長崎市民自由言論委員會”將13684名市長支持者的簽名提交給長崎市政廳。收集這么多簽名只用了兩個禮拜。包括長崎縣神道教寺廟管理辦公室在內的多個保守派協會代表則呼吁彈劾市長。

1989年1月7日，天皇去世。

1990年1月18日，本島市長被人開槍擊中背部，襲擊者是一名右翼極端分子。接受日本媒體采訪的右翼人士宣稱本島終獲“天譴”。

市長差點喪命，他的肺部被子彈擊穿，一邊咳血，一邊等在車里向人求救。[(110)](#_110_1)警方沒有向他提供保護，因為保守派議員反對這筆開支。

從表面上看，本島事件和耶寧格的議會滑鐵盧完全沒有共同點。耶寧格受到的指控是他為屠猶辯解，本島則被控將戰爭責任推給天皇。對于耶寧格，他流露的愧意太少，而本島過多地談及了罪行。耶寧格掩蓋真相，本島揭露事實。耶寧格粉飾過去，本島自曝家丑。耶寧格惹毛了自由派和左派，本島開罪了右派。在許多支持者眼里，本島是英雄；耶寧格則灰溜溜地跑去了維也納。然而，這兩位的為人和遭遇還是有些許共通之處。這些共同點或許能揭示德日兩國的某些國情。

本島比耶寧格年長十歲，思維也更縝密，但二者身上都有地方政客那種莽撞和刻板的做派，他們也同是在戰后保守主義政壇揚名立萬：耶寧格是基督教民主聯盟黨員，本島在惹上麻煩前隸屬于自民黨。本島在1979年借他人之力當選市長，而日后正是當初助選他的組織把他趕下臺。另外，即便險些死于槍擊，他依然樂意同保守派合作。

1992年，建筑工人在緊挨著長崎和平公園（這座公園比廣島和平公園小多了，基本算得上是一片寄托懺悔之意的土地，里面遍布著現今多已不復存在的“人民共和國”贈送的紀念碑）的地方作業時，挖到了一座昔日監獄的地基，位置就在原爆中心附近。這之后爆發了一場風波。戰時，來自朝鮮和中國的囚犯葬身于此，部分死于日本人之手，另一部分死于原爆。一群長崎市民希望保留監獄遺址，以顯示日本人不只是受害者，原子彈也不是平白無故投下來的。保守派表示反對：和平公園是個“歡樂的場所”，有人說，“游客干嘛要來看一座監獄呢？”本島站在保守派這邊，他需要拉攏他們才能留任。他在建筑行業人頭很熟，監獄的遺跡于是被埋在了一座新建停車場下。因此，不管他發表天皇戰爭責任論出于何種動機，可以肯定的是，他和左翼激進主義不沾邊。

本島和耶寧格挨批，更多是由于他們不聰明地選在錯誤的時間發聲，不善于審時度勢，而不在于說過什么話（當然這肯定也是挨罵的原因）。耶寧格選在舉行紀念日當天給人上歷史課；而本島在天皇臨終前的行為幾乎是大逆不道（lèse-majesté）。自民黨紀律委員會在評估本島事件時，表示即使個人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一名政府官員公開發表這樣的言論，是極端不檢點的行為”。[(111)](#_111_1)我甚至從公開支持市長的人口中聽到過類似的話，其中一位還是服務于本島的長崎市政廳官員。

在天皇大殮這周我與他見過一面，那是1989年2月的一個晚上天氣清冷。我倆受邀前往一位共同的朋友家里吃飯。這位公務員年近中旬，體態發福，笑起來有些諂媚，頗像那種見慣了遲鈍學生的校長。他從藍色西裝的翻領上摘下辦公徽章，喝了口清酒，開口道“現在我可以以個人身份跟你們聊上兩句了。”說完他一個勁地搖頭以表達困惑：“老實說，我不明白市長干嘛要那么說，真的不明白。

跟我一起的是個美國朋友。他問官員，市長所言到底有沒有道理。官員嘬了嘬牙，閉上眼，似乎在承受巨大痛苦，又似乎是在沉思他扭了扭粗短的脖子，雙目依舊緊閉，答道：“哦……沒錯，其實沒說錯……”那他說的是實話咯？“這么個，對，可以說他沒說錯但我還是不明白，他干嘛要那么說。”朋友臉上的不耐煩已有幾分失禮，問道，既然這樣，他是否認為市長應該說謊。官員的眼睛再次消失在厚厚的眼瞼后，他的表情此時不再作煎熬狀，而是一種痛苦的無奈。“在日本，”他說，“我們都知道真相，但卻保持沉默你必須理解我們的文化……”他扯了扯襯衫領子，嘆了口氣，領角已經濕了。

我們的文化……我想起一個旅日澳洲人在聽到本島言論后的反應。“很明顯，”他在電話里對我說，“本島不懂日本文化。”我沒和他爭。他的話和露絲·本尼迪克特所謂的罪與恥的文化范式[(112)](#_112_1)不謀而合：德國人心中充滿負罪感，覺得有必要承認罪孽，卸去其包袱獲得世人的原諒；日本人則希望保持沉默，最要緊的是，希望別人也保持沉默，因為重要的不是在上帝眼里是否有罪，而是公開出丑、難堪和失了“面子”。總而言之，耶寧格坦白程度不夠，而本島則話太多。兩人的缺心眼雖不盡相同，但本質是一樣的。他們沒有循規蹈矩，他們破壞了本國文化的規則。

本尼迪克特的說法得到了一條重要細節的支持：本島是基督徒。這也恰好解釋了一些對手為何對他抱有成見。套用某位批評者的話說，本島“表現得不像個日本人”。

市長收到一封信，寄自某位神道教神官，作者在信中指出，天皇已經承擔了道義責任，要求他承擔更多責任的做法“不符合日本人的習慣”。[(113)](#_113_1)難道說天皇在一年一度的日本戰敗投降紀念日上沒有表現出深切的悲痛么？另外，神官寫道，像本島那樣談論天皇是不對的，更何況整個國家的人都在密切關注后者的健康狀況。接著，他寫到了重點：“基督徒和言必稱西方的人，包括所謂的知識分子在內，普遍會犯一個錯誤，他們不明白，西方社會和日本社會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宗教觀念上……他們忘記了這一前提，企圖將西方的結構加諸于日本的基礎之上。我認為，這種錯誤解釋了為何會有人要求天皇承擔全責。”

本島等出生在九州沿海一個小島上，這里是天主教傳教士在日本唯一留下過印跡的地方。早在17世紀，長崎市的大部分居民經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神甫施洗，皈依了基督教。后來，對此憂心忡忡的幕府將軍下令大肆拷打和屠殺基督徒。基督徒被迫踐踏圣母瑪利亞的畫像，宣布退教，這一遭遇倒是同1930年代的共產黨人頗為相似。但日本南部的基督徒還是堅持了下來，盡管迫害從未間斷。本島的爺爺曾被人逼著跪倒在地，然后朝膝上加石板，直到骨頭折斷。一旁還有警察向他吼：“基督，天皇，到底誰更重要，基督還是天皇？”

本島自己在1930年代上小學時，也被迫朝神道教寺廟鞠過躬。天皇生日當天，老師會因為他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敬意而責罰他。他們會拋出與當年擊垮他祖父一模一樣的問題折磨他：“基督，天皇誰更重要，是基督還是天皇？”

在日本，長崎是一座很特別的城市。曾幾何時，它是面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狹小窗戶，這段歷史是這座城市引以為傲的資本。長崎有著大型唐人街，當地的一些菜肴從名字可以看出它們起源于中國17至18世紀，日本幾乎全面鎖國。在此期間，荷蘭商人被允許住在長崎灣內的一座小島上，他們唯一的訪客是官員和妓女（部分長崎人至今依然擁有祖先留給他們的高鼻梁這一特征）。在長崎，一些勇敢的學者通過孜孜不倦地翻閱詞典和醫書，從中汲取精華，開創了“蘭學”，首次給予日本人管窺歐洲科學的機會。長崎還有推行“洋學”的學堂、一座修道院，以及一座別致的大教堂。投到日本的第二顆原子彈（投彈的飛行員恰好是羅馬天主教徒）偏偏在教堂上空爆炸，將修道院夷為平地。關于長崎原爆，最著名的一本書叫《長崎之鐘》，作者是信奉基督教的醫生永井隆。他相信，世上沒有意外。投到教堂上空的原子彈是上帝一手策劃的，73884名死難者同幾個世紀前被釘死在山上的永井祖先一樣，都是不折不扣的殉道者。

對于本島市長而言，正義是基督教里的觀念。他同前文所述的澳洲人和神道教神宮一樣，相信這賦予他一種不同于其他日本人的生活態度。槍擊案發生前差不多一年，我和他見過一面，他向我闡述了這種思想。他說，日本人為自己在戰時的野蠻行徑承擔責任這具有重要意義。責任是個道德命題，而道德又是個宗教命題。日本人身上的問題是，“他們崇拜自然，卻又不具備宗教性或哲學性的道德基礎”。

我一邊思忖，一邊瞟了眼本島市長。他的衣著打扮像個體育教練，身穿一套運動衫，這在日本是一種很流行的休閑服飾，但一位市長穿成這樣接受采訪并不多見。看到我在瞥他，他也瞥了我一眼并牢牢盯住我的雙眼，那種目光雖談不上兇，但透過鏡片，總還是讓人感到幾分厲色。他飽滿的嘴唇繃得緊緊的，這讓他歪斜的嘴部看著有些執拗。多數日本官員身上總有那種怯生生的緊張情緒，或者是因為心懷戒備而生的狂妄自大。但本島身上沒有半點這種氣質。這是個有信仰的人，他知道自己是對的。

“在歐洲，”他接著說道，“人們的情緒有幾個世紀的哲學和宗教傳統做基礎，但日本人只崇拜自然。這已經內化于心。在一個由自然統轄的世界里，是不會出現個體責任這一問題的。”

既然如此，那有什么解決辦法呢，我問道。日本人應不應該全民皈依基督教？“我是基督徒，所以你說得沒錯，我就是這么想的。”

他的口氣聽著像是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小說里的人物。格雷厄姆·格林[[2]](#_2_Graham_Greene_1904____1991__Y)對遠藤推崇備至。和本島市長一樣，遠藤相信他那些信奉萬物有靈的同胞缺乏基本的道德原則及善惡觀念，但他同時也認為日本人永遠無法習得這種觀念——也就是說，他們永遠也成不了基督徒。遠藤的所有作品都刻畫了這種絕望之情；他的一部名作、出版于1966年的《沉默》，講的就是一位耶穌會傳教士背離信仰、放棄規勸日本人入教的故事。在遠藤的作品中，東西方永遠不會相遇。不過，盡管他或許是唯一一個從基督徒的視角描寫個體戰爭罪行責任的日本小說家，他筆下的日本人并非全然泯滅良知。他們只是缺乏供表述的語言；或難以為其命名。在《海與毒藥》中，戶田大夫參與了一起活體解剖實驗，結果導致一名美國戰俘死亡。[(114)](#_114_1)良心有愧的他回到手術室，也就是犯罪現場，卻并未感到“特別痛苦”。“我猜我沒有良知，但不光我一個人沒有，其他人也沒對自己在這里的所作所為感到有何不妥。”

也許那位神道教神官所言不虛，也許要靠基督徒才能打破日本的禁忌（本島的同仁、廣島市長荒木雖然慣于高談闊論，但他不是基督徒，也拒絕在1988年支持長崎市長）。不管右翼民族主義者和神道教神官如何極力辯稱天皇崇拜不是宗教，而是日本的“風俗”但其無疑就是一門宗教。要攻訐一種信仰，似乎得借助另一種信仰譬如用另一位“天皇”——可以是佛祖、馬克思或基督——來挑戰日本天皇崇拜的政治信仰。這或許就是基督徒和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對天皇體制及其政治用途不遺余力抨擊的原因，恰如幾個世紀前某些佛教徒的做法。但實際上，事情還不止這么簡單。

由于多數日本人在昭和天皇臨終前已經喪失了信仰，民族主義者因此想為宗教恢復元氣。天皇的病入膏肓成了他們的機會。帝制崇拜是他們眼中日本的“正常狀態”——“正常”和“自然”兩個詞一直掛在他們嘴邊。大約在天皇離世前后，文化批評家江藤淳在某份知名月刊里撰文道，美國人把虛假的天皇形象強加給了戰后的日本人。[(115)](#_115_1)他寫道，日本人被禁錮在“戰后民主和僅僅存在于名義上的天皇體制中”。但是，他接著寫道，當天皇病危時，甚至連常年被西方洗腦的自由派媒體都無法掩飾作為日本人的個體悲慟。這顯示出，“我國皇家的神圣性和莊嚴性”得到了保留，并將永世長存右翼自民黨政客石原慎太郎在同一份刊物里寫道，天皇和日本人之間的紐帶遠遠高于國家元首和公民的關系：“這反映了日本和日本人的獨特性……”

英文名叫“托尼”（Tony）的加瀨英明是原日本駐華盛頓大使之子，也是聞名遐邇的政論家。他曾為日本版的《花花公子》雜志寫過一篇精彩的文章。文中，他描繪了神道教的“新嘗祭”儀式。[(116)](#_116_1)根據這一儀式，新任天皇在父皇駕崩后，會迎來天照大神的冊封他要鉆進她的子宮，獲得重生，加冕成為一位神圣的統治者。“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加瀨寫道，“早在有歷史記載之前就已成形……日本國誕生時，天皇就已經是最高祭司和國家元首了。皇室同日本神話水乳交融，無法分割。傳說等同于日本的誕生。天皇之所以神圣是因為他同創造我們國度的諸神有血緣關系。”

這就是浪漫主義者希望日本人信奉的內容。同世界各地諸多知識分子一樣，甚至可以說，同不少德國保守派一樣，他們對物質主義和經濟繁榮造成的精神真空憂心忡忡。恢復種族和帝制神話（兩者歸根結底是一回事）是日本修正主義者眼中恢復日本普通國家地位的出路。本島的言論對他們追求和諧和自然福祉的理想構成了挑戰。這在本質上是一種反自由、反民主的理想，是威權主義政治的完美宣傳。

同許多思想（mentalité）沖突一樣，日本的修正主義思潮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和年齡有關。最積極的修正主義者是那些年過五旬的人，他們在戰時接受教育，軍事占領讓他們受到打擊。同耶寧格的情況相似，給本島寫信、表達支持的人往往要么年邁，出生時沙文主義集體癲狂尚未達到頂峰；要么就十分年輕，從未受其影響。沒準，對可怕的精神真空感受最強烈的，正是被歷史奪去賴以成長的天皇信仰的那批人。耶寧格和本島的言論大相徑庭，這使我們不便作對比，甚至會認為對比沒有意義。畢竟，耶寧格被人和修正主義者、歷史粉飾派和新民族主義者聯系在一起。可我覺得對比還是成立的。由于通過世俗手段對待歷史，耶寧格和本島都觸怒了試圖填補精神真空、彼此卻截然不同的團體：在波恩是宣讀反戰自白書的左派和綠黨，在長崎則是意圖復辟天皇崇拜的人。

這就是我為何覺得本島的基督教信仰其實并沒有表面看起來那么重要，而他面對的挑戰也不單是一場信仰沖突。他的個人動機毫無疑問和宗教有關。正義對他而言或許真的是個基督教觀念。但他的言論是世俗化的，造成的效果亦然。他的支持者中部分是馬克思主義者，部分是基督徒，但從信件判斷，所有人都抓住了要點，即這件事涉及政治，而非宗教。

發表言論兩周后，本島收到了一萬封對他表達支持的來信。又過了幾個月，數量攀升至三十多萬封——寫信人有家庭主婦、上了年紀的退休工人、退伍老兵、高中學生、辦公室職員、為和平奔走的活動家、電影導演、大學教授等等。雖然除了個別人以外自由派知識分子均令人費解地保持沉默——日本沒有出現寫下“我控訴（J’Accuse）的左拉式人物——自由主義立場的《朝日新聞》來信專欄里還是筆仗不斷，好不熱鬧。我在這里只摘錄其中一封，不是因為這封信有什么特別，而是因為其具有典型性。信的作者是一位七十三歲的退休機修工：

“天皇體制引發了軍事統治，釀成了日本史上最慘烈的悲劇保守派當局如今再度祭出傳統君主制，攻擊民主權利……我們應當科學地分析自明治時代以來影響大眾意識、并導致戰爭爆發的機制這是我們對歷史的責任……唯有這樣，我國領導人的戰爭責任問題才能得到充分解決，不是靠‘勝利者’正義，而是靠日本人民自己。”[(117)](#_117_1)

這不是上帝、馬克思或神圣祖先的聲音，這是理性的聲音。

當然，對于那些徹底取締政治活動或對個人的任何行為——除了不執行命令外——都不追究責任的政權而言，政治責任的問題的確比較微妙。正如先前所見，哪怕是其他日本領導人的責任，都因為天皇的幽暗身份而變得不那么明朗了——他既是制憲君主，又是神圣祭司兼帝王。待到他們將國家引向一場自取滅亡的戰爭中時一切無疑為時已晚。卡爾·雅斯貝爾斯在討論戰爭罪行的文章里寫道，人們應為統治他們的方式承擔集體責任。如果統治國家的是個罪惡政權，人民就不可能逃脫罪責。說這話時，浮現在雅斯貝爾斯腦海中的也許是1930年代的德國市政廣場，上面擠滿了狂躁的暴民呼喊著他們的元首。但雅斯貝爾斯的觀點也有問題。什么樣的政權才叫罪惡政權？罪不罪惡，又由誰的法律說了算？另外，人們又能否因為他們無從選擇的局面被追究責任？

實際上，德國人的選擇權比日本人要大。希特勒和他的褐衫軍可不是靠一己之力摧毀魏瑪共和國的。許多德國人在1932年把票投給了納粹黨。但在戰后，希特勒已經歸西，所以臟水大可朝他頭上倒。德國人越是朝他潑臟水，就越是感到自己得到了解脫。都賴他他們只是被灌了迷魂湯，在當時的情形下，這是可以理解的。耶寧格并未認真挑戰這一看法，這就是他的演講被視為狡辯的原因。

另一方面，本島關于天皇的言論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在日本，不存在可以投票選舉的納粹黨，天皇也無需參加競選。天皇不會退位，也不會被妖魔化——只有鳳毛麟角的人敢這么做。1945年，在把一身戎裝換成生意人的西裝，并在東京審判上逃脫罪責后，他實實在在地成為了民族象征。他無辜，就是日本人民無辜；同天皇一樣，他們也是被軍事領袖給“騙”了，從沒有人告知他們戰況如何，一心企求和平的他們是被拖入戰爭的。

事實上，天皇掌握了大量當時戰局的情況，盡管他的政治影響力或許十分有限。自從19——20世紀之交以來，大部分日本人都心甘情愿地聽任好戰宣傳誆騙他們，這種情況出現了不止一次。戰爭結束后，多數人卻都不愿承認。然而，天皇受到蒙騙、清白無辜、熱愛和平的形象必須得到捍衛，因為這是戰后日本團結民心的一大要素——這是其一，其二是反戰主義；一旦海陸軍將領得到清算，日本人和他們那位幾乎同阿米巴蟲一樣千變萬化的“國家象征”——天皇——就能一起清清白白地安享榮華、否極泰來了。

有人對這番惺惺作態提出了批評。導演伊丹萬作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里談到了戰爭罪行的問題。[(118)](#_118_1)他諷刺了那種認為所有人都被騙了或者受騙之人必然無辜的看法。他認為，受騙之人必須和騙子一起承擔罵名，因此“雙方都肩負戰爭責任，只是程度不同罷了”。那些被騙的人僅僅因為任由自己被騙就擺脫了罪名；這可不行，全民族都應為怯于批評、卑躬屈膝、不會思考受到責備，他如是寫道。同許多左派知識分子一樣，伊丹對“日本人尚未能夠擺脫封建主義和閉關鎖國的桎梏，只能借助外來強權獲得基本人權”倍感氣憤。

“如今我們得到了政治解放，”伊丹寫道，“但只要日本人堅持把責任推卸給軍隊、警察或官僚，那么他們永遠也不會嚴肅反思自己的罪行、反思自己是如何任憑這些人擺布的，日本民族也就永遠不會有希望。”

伊丹接著得出了和卡爾·雅斯貝爾斯一樣的結論。人們必須對自己生活的社會負責。這是句殘酷的評價，等于在說奴隸要為自己的境遇負責，或者更進一步說，要為主子的行徑負責。但這種看法很重要，缺了它，維系公開、自由社會的必要制度就無法存續。這就是本島的言論為何如此重要且如此令人振奮。他既然要天皇為戰爭負責，就不是在為日本人開脫。相反，通過揭露這位不負責任的大祭司身上的名不副實，他對其追隨者的自我形象提出了質疑——這是一種逆來順受的受害者形象，是某個謎一般的大棋局中小卒子的形象。

雅斯貝爾斯和本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和市長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其正義感也源自信仰。但伊丹和那些贊同他意見的人一樣，并非基督徒。基督教——比如恥文化和罪文化之間的區別——其實從來就不是重點。打破日本社會禁忌的本島在為一個更公開、更正常的政治社會作斗爭，并險些為之喪命。我傾向于認為耶寧格也想為同一目標奮斗，但他失敗了，丟了烏紗帽。也許他并不勝任這項使命抑或者，也許那時的西德還不夠正常，聽不進他的話。

[[1]此處采用的是北島先生的譯文。](#_1_12)

[[2]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國小說家、劇作家、評論家。](#_2_10)

## 第十章 兩座普通小城

帕紹

同許多德國大河沿岸的小城一樣，帕紹雖漂亮，但談不上美。這座城市太多愁善感，不適合用美來形容。它仿佛一個小巧玲瓏的珠寶盒，坐落在多瑙河、因河和伊爾茨河的交匯處。帕紹綠草茵茵，風光旖旎，別致的小屋嵌在郁郁蔥蔥的山坡上。這番自然景致宛如德國童話中的仙境。齊格弗里德（Siegfried）的遺孀克里姆希爾達（Kriemhilde）曾途經帕紹[[1]](#_1_Qi_Ge_Fu_Li_De_Tong_Ke_Li_Mu)，因此，早在12世紀，沃爾夫格主教（Bishop Wolfger）便在此謄錄過《尼伯龍根之歌》。這座小城有著巴洛克式的大教堂、狹窄的卵石路、低矮的拱門，每個街角都有灰泥砌成的圣人像和天使像。這些建筑物粉刷一新、保存妥善的程度，不由讓人隱隱感到，整座城市猶如一具精心整理過遺容的尸首，經過一番熟練的化妝后，看著就像起死回生了。

一如所有廣受歡迎的旅游景點，帕紹之美很容易落入俗套。帕紹的俗，體現在一種過了頭的德國鄉土氣息：紀念品商店兜售的木雕，刻畫了頭戴高帽、皮膚粗糙的農民，他們一只手握著獵刀，骨質刀把上刻有哥特式文字，一只手端著大號啤酒杯，上面有雕花玻璃的圣人圖案。有著“尼伯龍根”、“克里姆希爾達”等名字的游船載著旅客，穿梭在河面，甲板上傳來約德爾山歌（yodel）。我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館里，一邊品著奶味兒濃郁的咖啡，一邊讀著當地報紙，連著好幾個版報道的都是射擊俱樂部大會（會員是身穿綠色制服、頭戴羽毛帽的漢子）。我身旁不時有德國和奧地利游客經過有的拿著冰激凌蛋筒，有的端著盛啤酒的塑料杯。男的穿著短褲襪套和拖鞋，女的穿著花布連衣裙。

河岸兩旁墻壁上的涂鴉顯示出，這座“尼伯龍根之城”除了多愁善感外，還有較為黑暗和兇惡的一面。一些涂鴉文字怪得離譜：“因為愛或狠而燃燒”；“死人才會害怕”；“薛恩胡伯，你必須呱呱叫！（薛恩胡伯，Schönhuber，指右翼共和黨黨首）。其中最荒誕不經的一句是：“我們不會等待圣誕老人的到來。”

我回到酒店房間，從那兒能將因河風光盡收眼底。沿著河往上幾英里是小城布勞瑙（Braunau am Inn），希特勒的故鄉。他在帕紹度過了部分童年時光。我摁下開關，電視上正播放一部1940年的德國電影，差不多快結束了。這是部浪漫喜劇片，背景設在1870年代，講的是普魯士軍官和他們身穿襯裙的女伴。我換了頻道，另一個本地臺正放映一部名為《我們的家園》的紀錄片。靜謐的村莊掩映在綠意蔥蔥的巴伐利亞山谷中，粉白色的教堂外鱗次櫛比地點綴著紅瓦小屋。湖面上天鵝暢游，山霧籠罩大地。襯托這一切的背景音樂是貝多芬的奏鳴曲。旁白的語調故作詩意：“云層后的土地如此廣袤，如此陌生，卻又如此熟悉，恰如我童年的故土……”

我的帕紹之行，緣于幾個月前在倫敦看過的一部電影，片名叫Das schreckliche Mädchen，翻譯得很蹩腳，叫《壞女孩》。片子基于一則真實故事改編而成，主人公是一位參加全國作文競賽的高中女生。作文題是“第三帝國時期你家鄉的日常生活”。這個姑娘過去一貫表現良好，是老師眼中的優等生，而且和自己為人保守、篤信天主教的父母相處融洽。她為了作文，開始四處跟人打聽，訪談對象有高級修士、報紙編輯、自己的祖母、城市檔案保管員，等等。但當她逐漸發現有證據顯示，那些在她記憶中一直是納粹反對者甚至是“抵抗主義戰士”的人，其實是納粹同情者甚至還做過納粹官員的時候，她遇上了麻煩。有人讓她別寫了。干嘛不寫些更重要的題材呢，比如歐洲歷史什么的？她一個黃毛丫頭，懂什么叫過去呢？若干年后，當女孩決定把自己的發現付梓成書時，她遇到了更大的麻煩。圖書館和檔案館將她拒之門外。對她本人和家人的死亡威脅就像開了瓶的毒藥一樣，源源不斷地通過電話傾倒過來。她養的貓被人弄死后釘在門上。還有人從窗外朝她家扔炸彈。整座城市的名流都跟她過不去。她備受尊敬的雙親——母親是神學教師，父親任小學校長——感到無地自容。然而，在祖母和一位年邁的原共產黨員的鼓勵下，她堅持不懈地寫完了書，一舉成為全國名人，并因此讓自己的家鄉——或起碼是其最顯赫的居民——蒙受了恥辱。

這部影片很引人入勝。故事反映的是被掩蓋的歷史，但內在的主題是代際沖突。盡管女主人公生于1960年代，但影片表達的卻是老一代人的憤怒，即同該片導演米夏埃爾·維赫文（Michael Verhoeven）一樣的“六八一代”。有趣的是，德國人討論第三帝國歷史時，年輕人和他們的祖輩總能尋得共識——他們也正是那些給長崎市長和菲利普·耶寧格寫信表達支持的人。“壞女孩”年紀太小，沒來得及成為“希特勒的孩子”，但她的祖母是納粹上臺前德國理性聲音的典型代表。失憶往往是父母這一代的毛病。對此，另一部有關記憶的德國電影、由埃德加·萊茨執導的《故鄉》也有述及。這部影片中，出生于19世紀的祖輩同樣象征著未受現代物質主義和極權主義宣傳腐蝕的傳統美德：正直、誠實、自力更生、家庭價值觀。

從某種意義上講，萊茨的《故鄉》和維赫文的《壞女孩》系出同源，這一源頭在1970——1980年代為不少德國藝術家和學者提供了素材：地方史（Heimatgeschichte）。失落的天堂、兒時的村莊、“云層背后的大地”無時無刻不面臨沒有靈魂的現代性的威脅。地方史的出現，給予這種傳統鄉愁新的轉折。人們過去將歷史看成是一出以偉人意志為轉移的木偶劇，這一想法后來被日常生活史所取代過去就像由一百萬個故事組成，貫穿于蕓蕓眾生的生活之中。這些小歷史的舞臺不是大都會，而是小城鎮和村莊。這一類型的歷史部分是對那些試圖用結構和制度來解釋歷史的人的反擊，后者往往容易陷入枯燥的理論。當然，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2]](#_2_Emmanuel_Le_Roy_Ladurie_1929)對法國農民生活的描繪一樣很有影響力。但是，在德國地方史的治史習慣中，有一種同19世紀浪漫主義音樂一樣豐富的懷舊氣息，這或許會賦予第三帝國歷史一種別樣的視角。

萊茨的《故鄉》為這種特別性提供了有趣的注腳。影片除了充斥對舊時代價值觀的懷念——比如依靠雙手勤懇勞動、溫馨的家庭生活，等等——還有對1930年代“普通”日常生活的留戀。導演滿懷感情地創造了沙巴赫（Schabbach）這一虛構的萊茵河畔村莊，影片謳歌了簡單而愉悅的鄉村生活，以及當時的流行文化夜幕降臨時觀看薩拉·勒安德（Zarah Leander）[[3]](#_3_Zarah_Leander_1907____1981__R)的電影，等等。然而，富有地主的兒子成為黨衛隊隊員；一些片段描繪了從事勞役的奴工；某位默默無聞但素來正直的人加入納粹黨，成為某個地方小城的市長。因此，影片并未繞開納粹崛起的歷史，但這并沒有敗壞當地生活的溫馨常態。比起只字未提的“水晶之夜”，影片里納粹主義特有的現代性——比如高速公路等事物——對舊有價值觀的威脅更大。沙巴赫是個村子，也許那兒什么大事都沒發生過，但人們也很少提及其他地方出過什么事。

這部電影是建立認同感的一次真正操練，因為我們是透過親歷者的視角來看待過去的。它就是一次回憶。對于沙巴赫的善良居民而言，1930年代留給他們的記憶總體上是美好的，直到戰爭帶走他們的兒子，并時而奪走后者的生命。《故鄉》似乎是對戰后多年來否定德國人鄉土認同的一記反擊。“六八一代”的知識分子總是嘲諷這種鄉士情結的庸俗品位。他們可是歐洲人。現在是時候回眸過去、追根溯源。《故鄉》在尋回故土——抑或轉述萊茨對《大屠殺》的評論，在奪回被美國人盜走的“我們的敘述”——一事上，可以算是一次大放異彩的努力，而且構思甚為精妙。

但從年輕得多的“壞女孩”來看，情況恰恰相反。其主題一樣是鄉土歷史，但她自小沒離開過家鄉，從未喪失過對地方的認同；反而是反對者試圖通過讓她喪失歸屬感，從而奪走她的故鄉，比方說罵她是“猶太婊子”，這個字眼反復出現在她收到的恐嚇信中。然而，她設法從刻意遺忘的黑暗沼澤中挽回的過去，和萊茨重塑的鄉野田園一比，則沒有那么美妙。

電影《壞女孩》讓人想起一本影集，作者是當地一位攝影師，取景地在距離萊茨虛構的沙巴赫不遠的某個鎮子。1932年，奧托·韋伯（Otto Weber）成為一名攝影師，他拍了些克萊維鎮（Kleve）的照片，直到工作室在1944年被炸彈摧毀。1987年出版了他的影集，名為《絕對正常的一千年》（據稱第三帝國可以存在那么久）。[(119)](#_119_1)起初，照片稀松平常，拍攝的是下過雪的一條古老卵石路。人們拿著鏟子，齊聚在市鎮廣場上，幫忙清掃積雪，不時互相問好。天主教唱詩班的孩子列隊走過人們身旁。頭幾張照片里，鎮民們表情滿足，和藹，可敬，略有幾分無趣。接著事情開始發生變化；一塊褐色的污漬悄然侵入。先是有位名流站在廣場上，穿著嶄新的制服，神情既疑慮又不無驕傲。接著，又出現了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這樣的人，最后，整個廣場都被黑褐色制服、納粹黨徽橫幅、行進的軍靴以及成千上萬雙被火炬照亮的眼睛給填滿了。這也是地方史，圖中人不是什么罪大惡極之徒；他們是校長、教堂管事、市政廳官員報紙記者、牙醫、工廠監工、油漆匠、屠戶和面包師。而地方史的這一頁，正是“壞女孩”被禁止窺探的。

起初，坐在“壞女孩”本人——本尊，而非演員——的起居室里有種奇怪的感覺。她名叫安雅·羅斯穆斯（Anja Rosmus），留著一頭卷曲的金發，藍眼睛炯炯有神。穿著挺考究的，但略顯俗氣她不再是小女生了，如今離了婚，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從寫就第一篇文章以來，她已經發表了幾本關于帕紹褐色歷史的作品。起居室的一面墻上掛著羅斯穆斯自己所繪的畫，有兔子、大胡子猶太人還有幻想中故鄉荒漠灰撲撲的村子。墻上掛著個死者遺容面具，原型是德國諷刺作家庫爾特·圖霍爾斯基（Kurt Tucholsky）。在從納粹德國逃至瑞典后，絕望的他于1935年自殺。面具是圖霍爾斯基的遺孀贈送的禮物。

“還算挺真實的。”她如此評價影片。不過個別細節除外，譬如從窗戶里扔進來的炸彈，這個情節是杜撰的。她倒是給我看了些恐嚇信。“猶太婊子”絕對算不上是最惡毒的用詞。有人發誓要用毒氣毒死她和她的兩個幼子，此外還有其他威脅。好多個夜里，她聽到有人猛敲家里的窗子，還使勁搖房門，嚇得她無法入睡。某人的兄長還起訴她誹謗，但此人的過去其實比她說的還要不堪。他叫埃米爾·楊尼克（Emil Janik），是當地天主教會的頂梁柱，戰時人稱“褐色埃米爾”，理由是他同情納粹。某次公開會議上，羅斯穆斯被問起她是否真的認為楊尼克是納粹，她說即便他不算名副其實的納粹，也肯定不是什么抵抗組織戰士。楊尼克的兄長為此把她告了于是乎，她必須拿出檔案，為自己舉證。檔案顯示，楊尼克不僅反猶，而且還教唆所有天主教徒投希特勒的票。針對她的指控最終撤銷。然而，庭審期間，法庭試圖對她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因為她某種程度上危害了國家安全。

當然，幾乎所有針對她的恐嚇信都是匿名的，但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封不僅有署名，而且不帶臟字。寫信人過去是陸軍軍官，戰時在西歐和東線戰場服過役。他曾申請加入武裝黨衛隊這一“我軍的精英”，但未獲批準。在他的軍旅生涯中，“從未見過不尋常的集中營或人”。戰后，美國人逮捕了他，“像對待犯人一樣對待他”，盡管他“既沒犯下過，也沒目睹過罪行”，只是“履行了職責”。

這封信之所以有意思，是因為其用詞同耶寧格十分相似。不過，寫信人認同耶寧格引用的觀點。這位老兵描繪了一幅魏瑪共和國走向覆滅的常見景象：失業，民族恥辱，“被猶太資本摧毀的小企業”。因此，很明顯，納粹當政后，“大部分德國人都很欣慰，總算有所改變了……”

無疑，怨天尤人者、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人，以及存心阻撓的家伙是不受歡迎的，因而“被清理出了公眾視線”。他們去了所謂的防范性拘留營，后來被稱為集中營……要想把德國從《凡爾賽條約》的利爪中拯救出來，有件事必須得到明確：你要么是敵，要么是友……

必須坦言，我年輕時，事情在朝好的方向發展。我們互相教育，防止自己遭受任何反常之事的侵害，另外，我們也沒受到任何負面影響……

猶太人在德國不討人喜歡，后來越發明顯，他們不受歡迎。但是，正常人不會縱容煽動仇恨，也不會容忍所謂的“水晶之夜”。畢竟，我們過去可是包容過猶太人的……

我們這些親歷那一時期的人有必要捫心自問，為何要辱沒自己的名譽。很顯然，把事實描得更黑對我們沒有好處。我覺得，像加林斯基（德國猶太社團領袖）和西蒙·維森塔爾先生（納粹獵人）這樣的人起勁煽風點火是很壞的做法。我從沒覺得自己做錯過什么，也無法忍受子孫后代被迫背負罪孽感。

這樣說來，安雅·羅斯穆斯就在辱沒她的故鄉，甚至是她的國家然而，實際上，她發現有些人的表現值得敬佩，卻并未收獲應有的贊揚。比方說，人們丑化戰時的市長，說他是個納粹惡魔，什么臟水都朝他身上潑。事實情況卻是，他曾試圖制止驅逐猶太人，同意讓他們逃命。除了市長外，羅斯穆斯發現還有其他人也冒著風險搭救受迫害者。市政廳職員簽發護照；她的祖母給當地一個集中營的囚犯送吃的；家庭主婦為人提供避難所。他們默默無聞的英雄行為從沒得到過認可，也沒人對之有多大興趣。另外，她發現這些人自己也不太愿意談論過去。

我問她為什么會這樣。她說，他們根本不關心政治，出手相助純粹出于人道主義。但也有另一層理由：“多數人不想因為違法挨批這兒的人對于抵抗的看法極度矛盾，他們將愛國主義和秉公守法這些事混為一談。這就是為何抵抗向來不為人所接受，哪怕抵抗的是納粹。帕紹的居民中96%都是天主教徒。有人抵抗是出于宗教原因有個牧師因為在教堂里庇護猶太人遇害。另一位牧師拒絕宣誓效忠希特勒，也被殺害。但人們談起這兩人時，卻不曾流露出一絲敬意他們違反了規則，他們不聽話。公民不服從被認為是一件壞事。我自己的祖母對于當年幫助別人從而觸犯法律仍舊抱有負罪感。這就是我在這里如此遭人痛恨的原因。哪怕我說的都是大實話，也是在給官方添堵。”

我好奇于她本人的宗教思想，這對她的行為有影響么？她笑了說道：“我二十五歲時離開教會。這對我父母是個巨大的打擊，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教會。直到現在，他們依舊不明白，也拒絕正視我不是虔誠信徒的事實。”這番話并沒有提供足夠的解答，我的目光停留在墻上那些關于正統派猶太人的繪畫上。安雅·羅斯穆斯太年輕，體會不到她父母那輩人近乎神經質的“愛猶主義”。不過轉念一想，也許年輕不是問題，也許這種事超越年齡界限。我聯想到在柏林見過的年輕人，那些新一代的德國人在圍繞破損猶太教堂殘垣而建的猶太咖啡館里品著茶；雖然不是猶太裔，卻在脖子里圍著繡有大衛星的圍巾。

安雅·羅斯穆斯似乎能看穿我的心思，說道：“我的確受猶太教的影響。依我看，耶穌是個典型的猶太人。畢竟，你知道，基督教里很多東西都和宗教無關：圣誕節，復活節——這些都是德國的傳統習俗。而我們每逢周日則會在教堂里舉行許多猶太儀式。后來我讀了弗洛伊德的書，他寫出了我一直以來的感受，即人們出于深切的心理需求，才創造了宗教。”

如果把她的努力輕描淡寫地說成是宗教沖動，對這位勇敢的女士是不公平的。我沒有理由質疑她對追尋真相的執著，而且她很有政治智慧。她看起來對自己毀譽參半的名聲安之若素，這點并不讓我感到困惑。事實上，她的自負在十分艱難、甚至是危險的局面下毫無疑問是她前行的動力。然而，她身上還洋溢著一種熱情，就算不是宗教催生的，也一定有道德驅使的因素。在跟我講述一個又一個有關家鄉的駭人故事時，她眼中閃爍著光芒。帕紹首份印刷品出現在1476年，展示了被摧毀的猶太教堂圖片。過去是猶太社區禮堂的地方，如今換成了一座煤氣廠。一位鄰居在奧斯維辛做過看守。他在那兒藏匿了一堆金銀財寶，后來重回故地尋寶，在得知幫過自己的朋友是猶太人時，開槍打死了后者。這則故事后來被搬上銀幕，影片名叫《亞伯拉罕的金子》（Abraham’s Gold）。我沒有理由質疑羅斯穆斯。她對于真相的追求一絲不茍。但是傳說曝光到一定程度時，自身也會衍生出傳說。

比方說納粹黨徽面包的故事。每年，極右翼德國人民聯盟（DVU）的黨員都要在帕紹的尼伯龍根會堂集會，成群結隊相伴而來的還有光頭黨、形形色色的時代落伍者、心懷怨氣的老同志。他們夸夸其談，放聲歌唱，豪飲啤酒，肯定把老生常談的故事又聽了一遍，除此以外，沒準還交換了些納粹紀念品。但似乎這些行為還不夠邪惡，一則故事逐漸傳開了，說是集市廣場上在售賣納粹黨徽形狀的面包，剛烤出來，還是又熱又脆的。這個故事傳到記者耳朵里他們用它為帕紹的形象又添上了一筆。這個無可救藥的小城過去是希特勒的家鄉，也是艾希曼成婚的地方。安雅·羅斯穆斯并沒有傳播過這一后來證明子虛烏有的故事。然而，黑暗的地方出現這類傳說可謂十分正常。

不過，羅斯穆斯跟我講了點別的，無疑是真人真事。帕紹郊外有座小型集中營，是隸屬毛特豪森集中營的所謂“附屬營（Außenlager）。在安雅·羅斯穆斯成長期間，這是帕紹人從來不會談論的話題之一。她所就讀的中學過去是希姆萊之父教授拉丁文的地方。人們圍繞如何恰當地懷念戰爭紛爭不斷。1946年，帕紹決定為市鎮中心重新命名，以緬懷國家社會主義的受害者；另外還計劃建造一座紀念館，用作同一目的。兩個項目最后都落空了。幾年后因河區（Innstadt）公墓里筑起一塊紀念碑。那兒埋葬著軍人，以及納粹主義更直接的受害者。市長聲稱，能做到這樣已經很好了若不是社民黨當地分支機構決定在1983年贊助修建一塊紀念碑的話，集中營舊址很可能會徹底淡出公眾記憶。

這個地方不好找。一座水壩將湖泊一分為二，我朝湖邊走去途經一塊標牌，上面寫著：“從長遠來看，只有電才可靠。”耳邊唯一的聲音是鳥兒的啁啾，以及狹長的木質牛棚里傳來的牛哞（也許牛棚過去是營房？）。水壩旁有個頭戴藍色鴨舌帽的老頭兒正在干活兒，我問他水壩是不是“過去”的囚犯建造的，他“嗯”了一聲接著繼續干活。那他知不知道紀念碑在哪兒？“不知道。”連頭都沒抬一抬。我正想放棄，卻瞥見了紀念碑，它藏在灌木叢后，幾乎完全看不到。豎立的灰色石碑外觀樸素，上面寫有一行字：“獻給奧博里爾茨穆勒（Oberilzmühle）毛特豪森集中營附屬營的遇難者1942——1945。”碑文下方刻著五個十字架，以及立碑的時間，1983年篆刻的字體形似如尼文字（Runes），這是一種十分古老且據傳很神秘的條頓式字體，深受納粹的喜愛。

選用如尼文字的決定顯得對歷史無知，但無疑并非出于惡意。在德國，這樣或那樣的復古之風隨處可見。某個政權或制度越是新近成立，越是缺乏安全感，就越會去仿古。早在19世紀時，一股仿冒中世紀之風就吹遍了大半個德國。納粹以自己的方式延續了這一風尚，而這在戰后德國城市修葺一新的外觀中也得到了承繼。畢竟，區區十二年和神圣羅馬帝國、條頓騎士或巴洛克、洛可可時期的光輝歲月一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帕紹市政廳內有一些后哥特時代的遺物，盡管大部分其實誕生于19世紀。費迪南德·瓦格納（Ferdinand Wagner）從尼伯龍根傳說中選取素材，在市政廳內墻上繪制壁畫。市政廳的外墻正對多瑙河，屬于后哥特式風格。我與人約好在這里相會，來者是安雅·羅斯穆斯的某位死對頭，名叫戈特弗里德·多米尼克，他是市政廳隔壁游客咨詢處的主任。

多米尼克年齡四十五歲上下，留著八字胡，日漸稀疏的一頭金發下，粉紅色的腦門亮堂堂。他身穿一件牛角紐扣的巴伐利亞式西服，表情談不上不友好，但很擰巴，似乎正在忍受消化不良的煎熬。他一激動就臉紅。

我在他辦公桌前剛落座，多米尼克便手指墻上的一個鏡框，里面套著一句名人名言，落款處是一位德國紅衣主教的簽名。“這是我的人生格言。”多米尼克說道。格言這么寫來著：“那些有夢想、并準備好為實現夢想付出代價的人是幸福的。”我點點頭，問起安雅·羅斯穆斯的事。多米尼克隨即擺出一副十分痛苦的表情，并向我解釋原因。他說，這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帕紹的好名聲，二是羅斯穆斯女士的性格。帕紹地處巴伐利亞一塊很特別的地區，這兒的人既自信，又略顯保守。可這位羅斯穆斯女士跳出來說帕紹是個納粹城市，侮辱了左派不算，還侮辱右派，整個就是“一個女人一臺戲”。這么做對帕紹很不好，會掀起這么大的風波，當真不足為奇。

對，我附和道，這我知道，但羅斯穆斯的指控難道不是確有出處么？多米尼克咬了咬胡子，翻開辦公桌上的一個棕色文件夾。他從中抽出一份刊登在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的剪報，食指叩擊文章，臉漲得通紅。“一派胡言，”他叫道，“純屬一派胡言！”能說得具體點么？“這篇關于納粹黨徽形狀面包的稿子是在胡說八道根本就沒有這樣的面包。”但這是從羅斯穆斯那里傳出來的么？多米尼克答不上來，卻一口咬定羅斯穆斯是幕后黑手。

我想暫時回避納粹黨徽面包這一話題，于是問多米尼克，他認為羅斯穆斯有關戰時帕紹的那本書在事實上是否經得起推敲。他方才的怒氣退去了不少，擰巴的表情重新浮現在臉上。這個很難回答他告訴我，因為他自己不是帕紹本地人，他的家人才是。說完他指了指墻上兩幅亮閃閃的照片，是旅游咨詢處常見的那種巴伐利亞風景照。“瞧瞧，”他說。“真相不僅關乎細節，還關乎色彩，關乎基調。他的注意力轉回到報紙文章上，說：“不過這些東西是存心偽造的這些可怕的謊言抹黑了我們這座城市的形象，而她卻蜚聲海外，成了與罪惡城市勢不兩立的好姑娘。”

我試探性地表示，或許問題源自歷史被長期掩蓋這層因素？不對，多米尼克答道，完全不是這樣。“我一向很了解過去，我見過阿爾伯特·施佩爾，還認識戈林的女兒。對了，我甚至還見過希特勒的秘書。所以你說的不對，我對歷史一直充滿興趣。我讀過施佩爾的回憶錄，也讀過安妮·弗蘭克的日記。我奶奶挨過納粹的打我媽媽親眼目睹過死亡行軍。你必須認識到，我們活得比別人更艱難。我生于1946年，老師沒教過我們啥。但對于羅斯穆斯女士這代人而言，情況大為不同了。沒有什么是遮遮掩掩的。”

我告訴多米尼克，自己走訪過集中營舊址，并問他1983年才進行官方公祭是不是有點晚。他樂呵呵地揮了揮手，邀請我去隔壁喝杯上好的本地啤酒。他一邊走，一邊跟我說，集中營是很糟糕糟糕透了，但與之相關的無稽之談也有不少。人們老說達豪是個死亡營。“才不是呢！那兒不過是個勞工營。”

我們呷著啤酒，他的胡須上沾了泡沫，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顯老。我再次把當地集中營和紀念碑為何小而隱蔽的問題拋給他。多米尼克看著有些沮喪。“很難回答，”他承認，“真的很難回答，但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就讓我談談個人想法吧。假使說你一條胳膊是廢的，你不會想讓人看見吧。那段時期是我們國家歷史的低谷，但這在漫漫幾千年歷史中不過才占了十二年。因此人們傾向于對其遮遮掩掩，這和胳膊殘疾的人不太可能穿短袖襯衫是一個道理。”

我注視著多米尼克粉紅色的面龐和他掛著泡沫的白胡須。他人不壞，只是十足中規中矩。他和奉行激進反法西斯思想的知識分子同屬“六八一代”，但當其他人在抗議或揭露法西斯殘余，或審判各自的父母時，戈特弗里德·多米尼克和許許多多的人一樣，只是個聽話的小男孩，是當地天主教青年協會的成員，是習慣成自然的保守主義者。他從沒審判過自己的父母，他的腔調和他們別無二致。

我倆聊得很投機。他問我在忙什么，我回答說在寫書。啊，他叫道，我去過一次日本，去的是東京。但他發現和日本人沒法交流。他們對德國人面對本國歷史的做法完全無法理解。“他們認為我們坦誠直面過去是示弱，讓我們在昔日的敵人面前失了面子。哎，我完全無法理解他們是怎么想的，理解不了保留天皇的那套理由。哎，他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觀，面對歷史的方式也和我們完全不同。”

花岡

1945年夏，戰爭結束前不久，谷地田恒夫（Yachita Tsuneo）只有五歲，但他至今仍記得“花岡事件”。當然，他那時還不知道后來會這么叫，也不知道7月30日晚到底發生了什么。他只記得看到一群人把跪在村會堂前、瑟瑟發抖的中國勞工團團圍住。人群高喊：“殺死支那人！殺死支那人！”據說，“支那人”殺了個日本人，還把他給吃了。谷地田記得自己看見竹竿像雨點般砸落在赤身裸體的中國人身上，但隨即便被母親帶走了，這場面少兒不宜。

實際上，事情的真正經過如下：7月30日晚，日本東北某小鎮的八百多名中國勞工逃進了深山。多為農人、商店主組成的當地民兵手持竹槍和棍棒，協助警察追捕勞工。他們管這叫獵兔。中國人被驅趕至村會堂前的空地上，雙手反綁，雙膝跪地，赤裸著上半身跪了三天三夜，期間沒吃沒喝。當時正值一年里最熱的時候。谷地田后來聽說，有些中國人嘗試喝自己的尿。而在村會堂內，有大約五十人被折磨致死。一些人被繩子拴住拇指，吊在天花板下并遭到毒打。其余的被掰開嘴，強行往喉嚨里灌水，之后被人用腳踩肚子老師教唆學生朝“支那人”吐口水，他們還分到了用來毆打“支那人的棍棒。在距離谷地田見到囚犯不遠處的某個村子，當地青年團體的少年用棍棒打死了好幾個中國人。

這批奴工于1944年從中國被帶到秋田縣的花岡。這種做法并不罕見。日軍將戰俘和強擄來的平民交給日本企業，作為奴工使喚從中獲取報酬。戰時，大約四萬人因此來到日本，約七千人后來客死異鄉。這一數字，和七百八十萬在納粹德國從事勞役的外國人中的死難人數相比，也許并不算什么，但中國人遭受的野蠻對待可謂駭人聽聞。當時約有二百萬朝鮮人旅居日本，但由于朝鮮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而且所有朝鮮人都被視作日本國臣民，他們與中國人的境遇就不太一樣了，雖然未必好多少。約有一半旅日朝鮮人都是戰時強征來的民夫，往往受盡虐待。從數據來看，“花岡事件”的規模并不大，而且八成有諸多類似“事件”，但機緣巧合的是，這是人們清楚來龍去脈的唯一一起。

花岡的華工為鹿島建設組賣命，這是一家大型建筑公司，與同和礦業株式會社有合同關系。華工負責開銅礦。到了隆冬時節，他們被勒令在河道上架設水壩，改變其流向。即使在冬天，整個秋田都被覆蓋在皚皚白雪之下時，他們身上也只穿著破舊的單衣。每日的伙食是爛蘋果皮和一碗稀薄如水的米湯。一次，某位厚生省[[4]](#_4_Jin_Xian_Dai_Ri_Ben_Guo_Jia_J)官員造訪花岡，指出這么對待華工太客氣了，“應該像絞一塊濕毛巾一樣榨干他們，直到一滴水都不剩下”。九百八十六名華工多為農民和戰俘，只有五百六十八人熬過戰爭，活了下來。

7月30日的暴動經過了粗略的策劃——華工打算與關押在附近一所小型集中營里的美澳戰俘會合，一起逃往海邊，再找條漁船，駛向北海道。他們估計那里已經解放。一旦計劃失敗，將會葬身大海。事實上，他們到達的最遠地方不過是勞工營附近的山林。戰后很久，勞工營舊址附近才豎起一塊紀念碑，形容暴動是為“捍衛人類尊嚴”所作的殊死一搏。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秋田市一座法院審判了幸存的華工。他們因為在戰時暴動，危害日本國家安全，被判有罪，并處終身監禁。

若不是因為鹿島建設組的員工挖掘亂葬坑，以隱匿虐待華工罪證時湊巧被美國占領當局發現，“花岡事件”也許永遠也不可能稱之為事件——換言之，它會同其他戰時日本外籍勞工的遭遇一樣，變得無人知曉。這一發現的結果是，日本國內舉行了唯一一場將私營企業列為被告的戰爭罪審判。中國囚犯從秋田的監獄獲釋，出庭作證，指證他們過去的雇主。1948年，八名鹿島建設組的當地職工被設在橫濱的盟軍軍事法庭裁定有罪，其中幾人被判處絞刑。但他們當中沒有一個重要人物，于是所有人在1956年都獲釋了。幾年后，同樣獲釋的還有戰時勞工項目的正式負責人岸信介，我們都知道，他后來升任首相。而鹿島建設組如今更名為鹿島建設株式會社，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在華擁有巨大的經濟利益。

在“花岡事件”中幸免于難的個別華工后來留在了日本，其中一位在1972年中國同日本政府簽署協定后選擇了自殺。在這份協定中，中國表示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昔日的受害者不僅被斬斷了獲賠的念想，而且在當時的排外邏輯中，那些戰時待在日本的中國人本身就值得懷疑。“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的勞工被控做過日本間諜。我們只能想象他們在紅衛兵手里的遭遇。

但起碼還有相關記載，雖然大部分都保存在美國的檔案館。根據《信息自由法案》，大部分資料在1980年代末被公之于眾。與此同時，所剩無幾的中國幸存者也可以赴日提出索賠要求了，哪怕告不了日本政府，至少也可以把鹿島建設株式會社告上法庭。1990年一支由四名幸存者組成的團隊在戰后首次造訪花岡。但他們幾乎什么也認不出，因為所有地標都不見了。他們唯一能依賴的只有記憶在花岡——如今是大館市的一個區——他們受到了幾位日本人的接待。有兩個人盡管面臨各種艱難險阻，也拒絕讓記憶消亡。其中之一便是谷地田恒夫。

\*\*\*\*\*

谷地田從事的是工會組織者的工作，他請了假，帶我游覽當地他操著一口濃重東北口音、吐字短促的土話，據說，這和當地寒冷的氣候很契合。他穿著隨意，有那種自豪于擺脫了企業生活的日本人的風范：花襯衫領口敞開，下身是寬松的長褲，上身套了件運動夾克。前一天晚上，我倆在一家朝鮮餐館小酌，因為他希望我見見經營這家店的朝鮮夫婦，聽他們講日本人排朝的故事。夫婦倆是當地為數不多的朝鮮僑民之一，是谷地田的朋友。當晚，谷地田不止一次地指出，日本人曾視朝鮮人和中國人為劣等人。他記得，在他就讀的學校有個朝鮮女孩，他和他的日本同學都不把她當人看。而且這還是在戰后。

過去是中國勞工營的地方，如今依然歸同和礦業所有。在標注昔日勞工營位置的石碑前，泥土地上豎著塊標牌：“危險！請勿擅入。”我們沒理睬，繼續朝前，這時看到有輛同和礦業的車遠遠地跟在身后。谷地田哈哈大笑，說一直都是這樣。四周風景雖美，但這是種有毒的美。淡紅色的土壤上鋪著冰冷堅硬的石板，上面附著青苔。同和礦業把一個大湖當成了有毒廢料的傾倒池。湖面漂著層橘紅色的薄膜，但朝水里扔塊石頭，厚厚的黏液下會泛起黑色的水泡。原華工營就位于湖底。

站在距原勞工營不遠處的一座小山山頂，谷地田用手指出幾個主要地標。花岡坐落在一片廣袤而平坦的盆地中，四周山巒環抱，山頂覆蓋著積雪。從遠處看，就好像巧克力蛋糕上裱了層奶油。不光是平原上的城鎮和村莊有了變化，就連自然風光本身，和1945年一比也已大變樣了。湖泊是新近形成的，河道改了流向。一些山巒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公路和新建大樓，或者是另一些由板巖和泥漿堆積而成的山巒。當年的一個湖泊如今已經干涸，只剩下一片濕漉漉的灌木叢。市政廳消失了。村會館在1960年代被夷為平地，代之以一棟乏味的混凝土建筑。其矗立在空地一端，另一端是過去扣押中國囚犯的地方。昔日村里店鋪的位置，現在是一家大型超市。稻田則被擴張的城市所占據。

但并非一切都消失了。谷地田指向成排破敗的營房，這里以前是美國戰俘的住處。我問他美國人是不是也開過礦。“沒有，”他說，“我們日本人對白種人總是很關照。”說罷嘴一咧，擠出一絲狡黠的笑。我也沖他笑笑，并想起自己聽過的所有關于緬甸鐵路和荷屬東印度“鬼子營”的故事。不過相對而言，谷地田說得真是沒錯。

他還指出華工逃進深山時走過的那條路。路旁遺留著一堆密密麻麻的木屋。谷地田說，上了年紀的人還記得，大逃亡當晚曾聽到有人光腳走路時發出的沉悶腳步聲。他還模仿了下這種聲音：啪嗒啪嗒，啪嗒啪嗒。1945年，華工已無鞋可穿。

我們參觀了公墓，那里矗立著兩座紀念碑。一座緬懷戰死日本軍人的“忠魂”，另一座憑吊“犧牲的中國英雄”。在經過一連串的激烈爭論后，該碑于1963年落成，由大館市、同和礦業和鹿島建設株式會社共同設立。1985年，大館的社民黨市長決定將7月30日宣布為“和平紀念日”，并計劃每年在紀念碑這兒舉行儀式。但光看外觀，此碑似乎已被人遺忘。地上擺著一束塑料紙包著的花花朵已經枯萎。紀念碑基座前有個開了蓋的塑料飯盒，里面的飯團早已腐敗變質。

河道曾是中國人和朝鮮人干活的地方，他們常常因為遭到毒打饑餓和體力透支而葬身于此。河道附近也有塊石碑，不過體積要小多了。上面的字難以辨識。石碑表面龜裂得就跟碎玻璃一樣。地上橫七豎八散落著一堆罐頭盒和供奉給亡靈的食物殘渣。碑文這樣寫道：“獻給中國死難者的佛碑。”紀念碑的由來與其要緬懷的歷史一樣不堪。鹿島建設的員工在挖掘華工遺骨時被當場抓獲，后被勒令修建一座像樣的佛教墓穴，用以陳放遺骨。但他們不肯，轉而將骸骨移葬在一座佛教寺廟的后山。1949年，鄰近中國勞工營的地方又挖出了更多骸骨。新發現的遺骸和原有尸骨一同歸葬，不久后，石碑便立了起來。近年來，鹿島建設株式會社主動提出想修建一座體積更大的紀念碑，但是為幸存華工權益而奔走的小型團體拒絕了這一請求，說除非先交付一定數額的賠償金，并建立一座博物館。“他們造起紀念碑來挺在行的，”谷地田說道，“但一說起歷史研究和經濟賠償，我們就一點幫助也得不到了。”

\*\*\*\*\*

從大館到東京，乘火車的話約七個半小時，和從柏林出發到帕紹用時差不多。與日本中南部相比，日本東北，特別是秋田地區的蕭索程度至今令人吃驚，甚至可以算得上貧窮。市中心不僅晦暗而且毫無亮點：混凝土建筑外觀粗糙，昏暗的購物街上架著塑料頂棚，防止冬季時大雪封門，堵住商鋪。城市郊外的木屋邊上被人漫不經心地扔了一地的垃圾。這些說是房子，但常常只能算是窩棚。除開無處不在、同日本各地別無二致的廣告牌外，為大館增色的只有小小的居酒屋了。暮色降臨，男人們會在里頭喝得酩酊大醉。

盡管是日本的產糧區，但東北地區向來很窮。戰前，尤其是大蕭條時期，農民窮得走投無路，只好出賣自己的女兒。日本和南洋的妓院里總是擠滿了來自東北的姑娘。另外，由于長子要繼承家業，他們的胞弟常選擇參軍。雖然軍旅生涯很凄慘，但起碼還能吃飽飯。東北地區的艱苦生活讓人們心生怨氣，矛頭直指政客和商人，后者被認為既貪婪又腐化。這種看法并非全然沒有道理。身為共產黨員的小說家小林多喜二出生在花岡附近，在比花岡還要靠北的北海道長大。1933年，他因為傳播危險思想，被警察拷打致死。我有種感覺，谷地田的左傾思想，以及他的朝鮮裔朋友對朝鮮的政治認同（即使他們出生在韓國），是與此地的傳統一脈相承的。他們并非脫離實際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反對腐敗、歧視和貪欲，視之為“資本主義”。基于同樣的理由，激進的右翼“農耕思想”在戰前也很流行。

寒冷的北方孕育了一種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自我形象：人們具備忠誠、誠實、勤勞等品質。大館的車站前有一尊塑像，原型是在日本人見人愛的一大偶像，忠犬八公。小狗每天早上都會始終如一地守候在車站前，等著迎接主人的到來。一天，主人在抵達車站前身故了，但八公依舊守在原地，一步也不肯挪。狗兒就這樣一直堅守崗位，直到老死的那天。今天，八公石像的脖子上依然裝點著鮮花——且比所有華工紀念碑前擺放的花束都要新鮮和茂盛。

東北的村莊和城鎮是民歌里歌頌的對象。它們還是日本版《故鄉》或鄉土故事的絕佳背景。志在尋根的導演通常會選東北作為取景地。秋田和青森至今仍彌漫著一種遠古的神秘氣息。套用城市知識分子中間流行的一句話來講，東北“散發著泥土氣”。出生在那兒的人往往渴望逃離，背井離鄉者還真不少，但對于遠在東京的作家、藝術家和詩人而言，同樣的鄉土（furusato，顧名思義是指“老村落”）在他們眼里則籠罩在一層溫潤的鄉愁之霧中，這是日本人闊別已久、泥濘不堪的“故鄉”（Heimat）。

阿信是日本迄今最風靡的電視肥皂劇的女主人公，她就出生在東北的一個村子里。該劇名為《阿信》，由準國有的NHK電視放送協會在1984和1985年間播放。這恰巧也是《故鄉》在德國上映的時間。這部總共297集、每集十五分鐘的電視劇于每天早上首播（收視率可達63%），下午重播（收視率降至20%）。從風格來看《阿信》和《故鄉》有很大差異。德國電影是個人化的藝術創作《阿信》則是一部精心制作的情節劇。而且，盡管《阿信》同《故鄉一樣，既是對傳統鄉村價值觀的謳歌，也是對其淪陷的挽歌，但日本女主人公很小就因為家里無力供養她而背井離鄉。故鄉的失去是實實在在的，這點對于工業化時期的許多日本人而言（德國人和許多其他地方的人也不例外）亦是如此。但是家的概念并不一定局限于地區。在《阿信》中，整個國家都成了某種故鄉。尤其是戰爭年代正是透過家的角度來審視它，這在萊茨的《故鄉》中也一樣。德國電影和日本電視情節劇都是對好萊塢式歷史的一種本土化回應，是“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記憶中的歷史。兩部作品的感染力主要源自于此。

在《故鄉》中，母親是家族歷史的基石，同樣，阿信也是所謂傳統價值觀的集大成者。她象征著保守日本社會的理想：堅忍、勤勞誠實、開朗、禮貌。她待人接物溫文爾雅，同時嚴于律己，說話輕聲細語，客客氣氣，但為人也很堅強；是所有人仰仗的對象。如果說埃德加·萊茨屬于左派鄉愁浪潮一分子的話，那么《阿信》或許能被稱作是官方認可的歷史記憶。阿信是個安分守己的女人。她反對戰爭，但對其無能為力。正如旁白不止一次告訴我們的那樣，她的職責是“照顧好家人”。這部劇在響亮地表明反戰立場的同時也歌頌了多數日本人對戰爭發自內心的支持。

故事里所有的日本兵都是相貌堂堂之輩，為人誠懇，正直，且彬彬有禮，就連阿信的小叔子也是如此。他是個激進的愛國者，老是慫恿阿信把兒子送去軍校。阿信的丈夫龍三后來也沉迷于軍國主義宣傳。他并不掩飾自己的投機傾向；作為軍隊的供應商，他的生意蒸蒸日上。但他對老婆孩子越來越專橫，思想也愈發沙文主義。從某些方面來看，這部有日本官方背景的肥皂劇在對劇中人物的批判上，要比萊茨的《故鄉》更不留情面。沙巴赫善良的人們既不是狂熱分子，也不是沙文主義者；只有邪惡的黨衛隊軍人才是這般模樣。不過，阿信的丈夫并不缺乏同情心。他其實是個好人，發自內心地相信國家（而若要勾勒一個善良而真誠的納粹形象則明顯要困難些）。當阿信抗議說為部隊提供物資無異于充當戰爭同謀時，龍三答道，日本打國仗的時候，每個日本人都應盡到自己的義務。

攻陷南京值得歡慶。在一幕構思精妙的慢鏡頭中，我們看到整座小城傾巢而出，打著燈籠參加游行。人們那幀數被放慢的笑臉看著很瘮人，甚至十分猙獰。盡管阿信信奉和平主義，但她也很高興。念旁白的女聲介紹到，阿信“感到有一股正在塑造日本未來的強大力量，但不知道這股力量的本質是什么。南京已被征服，全家人都出門參加游行。阿信也是歡聲笑語的日本人中的一員”。

緊接著的下一集里，我們看到阿信對發生在亞洲大陸上的戰爭的殘酷性一無所知（同樣，觀眾也一無所知：敵人從未出現，遑論落入日本兵之手的敵人的遭遇了）。阿信在得知兩個兒子變得和他們的父親一樣狂熱、表示愿意為國家捐軀（注意，不是為天皇捐軀：在NHK版的歷史里，天皇被小心翼翼地剔除了出去）后既憂心忡忡，又郁郁寡歡。我們看到了阿信作為母親的痛楚，但同樣觸動我們的，還有她兩個兒子的年少輕狂、一腔熱血和單純思想。在家里的餐桌旁發表愛國演講時，燈光照亮了他們俊朗的臉龐，這跟好萊塢電影里播放詹姆斯·史都華[[5]](#_5_James_Stewart_1908____1997__M)前往華盛頓時的鏡頭是一樣的。與沙巴赫不同的是，這里沒有害群之馬，沒有類似黨衛隊惡徒那樣的人。

這也許是德國“故鄉”（Heimat）和日本“鄉土”（furusato之間最大的區別：日本的村莊里沒有納粹，有的只是軍人。從未出現過驅逐，附近也沒有集中營。沒有“水晶之夜”，鄰居也不會在夜里消失。人們也許不喜歡戰爭，不喜歡其帶來的經濟困窘，也不喜歡鄉村學究和軍隊惡霸的趾高氣揚，但幾乎所有人都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說戰爭本身，這發生在其他地方，與家門口相距十分遙遠。不過也有例外。對于那些不幸生活在沖繩的島民而言1945年，戰火慘烈地燒到了家門口。沖繩人被視為二等國民，帝國軍隊信不過他們，許多平民百姓因此成了與美國海軍陸戰隊交戰時的犧牲品。約有十六萬平民——超過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于交火，另有上百號人選擇了集體玉碎。撇開東京大轟炸、廣島和長崎的原爆，這段經歷留給沖繩的苦澀感要遠甚于日本其他地區。

但是，與花岡一樣，廣島和長崎同時也是勞工營所在地。類似的勞工營遍布日本全境，日本老百姓肯定知道它們的存在。每天花岡的良善之人都能在路邊看到監工手執皮鞭，抽打形銷骨立的中國奴工；但同樣是這些良善之人，卻在奴工逃跑后協助警察“獵兔”在大館的時候，我和谷地田喝個不停，期間，他跟我談到自己的父親，說老頭兒從骨子里憎惡戰爭，以至于在征兵體檢前喝下一整瓶醬油，好讓自己不達標。在國內，他也盡力不去做和戰爭有關的工作但是“獵兔”開始后，他卻參與其中，跟著一群暴民上了山。和所有人一樣，他盡了自己的義務。所以戰后人們不愿談論過去的事1979年前，當地歷史教科書里甚至對“花岡事件”只字不提。

當年，一些學童被教唆朝“支那人”吐口水，野添憲治便是其中之一。他從未忘記那段經歷：“每當我就‘花岡事件’向人發問，往事就會掠過腦際，而我也會變得難以啟齒，并開始顫抖。我意識到，自己也是侵略者中的一員。”然而，野添從未停止發問。三十年來，他一直在設法弄清當晚到底發生了什么。正因如此，他的家人遭到威脅，孩子在夜里沒法走出家門，窗玻璃也叫人砸了。他還接到過匿名電話，多半是后半夜打來的，對方向他發出死亡威脅。1975年，在他將自己的發現整理成書出版后，局面進一步惡化。沒人否認書中的事實，但他還是被罵成是出賣同胞的叛徒，辱沒了“故鄉”、“鄉土”的名聲。[(120)](#_120_1)

我在野添的家里拜訪了他，他住在距大館市不遠的一座小鎮上。這是座典型的日本東北小鎮：街上空空蕩蕩，鐵皮屋頂呈波紋狀，房屋破破爛爛。野添家的大門藏在一家干貨鋪子后的狹窄小巷內。屋里聞著有股潮氣，以及陳年木材和下水道堵塞后的氣味。他的書房在二樓。我倆坐在榻榻米地板上，身旁圍著成堆的書籍、檔案和期刊。野添穿著一套舊和服，又大又圓的腦袋上長著一綹綹白發，亂蓬蓬的，沒梳過。論氣質，他像個教授，但實際上連高中都沒畢業。他過去靠干零活為生，一生清貧，如今靠撰寫“花岡事件”系列叢書勉強度日（至今已發表四本）。這些書成了他畢生的事業，也是他唯一想寫的話題。

在和野添交談的過程中，我想起了把他介紹給我的人，一位年逾五旬、身居大阪一室戶公寓的華僑。他叫中八戒（Chu Hakkai），這是日本官員強迫他把自己的姓名日本化后所取的名字。中八戒是垃圾場的卡車司機，他把自己的收入全部花在了搜集戰時華工歷史的相關資料上。同野添一樣，他也沒什么機構背景。有人告訴我，沒有一位日本學界的歷史學家就此課題做過研究。因此，跟野添一樣，中八戒得親自跑去中國尋找檔案，找生還者做訪談。

剛開始，野添遇到了巨大的困難。關于“花岡事件”，根本沒有留存檔案，因此，他能做的只是尋找目擊證人。他說，起初登門拜訪時，吃過四五回閉門羹。有些人還報警攆他走。這之后，盡管不情不愿，但有人在掃了眼巷子里里外外，確信沒鄰居看見后，會請他進屋喝茶。起初，他們只扯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但漸漸地，見了四五回后，真相開始浮出水面，一個個人名蹦了出來，話匣子打開了。這一過程進展得如此緩慢，以至于他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才為自己的第一本書湊齊了素材。

“我從沒挨過打，”他告訴我，“但同和礦業株式會社雇了幫會成員，確保我不會在原勞工營周圍游蕩。幫會還有警察撐腰。”

他從同和公司那里當然得不到任何幫助，但工會也不希望趟這灘渾水。我問他是否和其他調查戰時歷史的人有聯系。我知道有這么一群人存在，因為其成員幫忙介紹不少人給我認識。中學老師森正孝與中八戒相識，而中八戒又把我介紹給一位幸存華工的代理律師，后者又認識長崎市的某人……就這樣，我結識了一連串的人。“沒有聯系，”野添回答我，“直到三年前，我一直都是孤軍奮戰。”

這么說或許略有些夸大其詞。畢竟，1985年前后，官方的確做出過樣子，在花岡市舉行了紀念“花岡事件”的活動。另外谷地田也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雖然時間沒有野添那么長。但是，在和這個圈子里的若干成員聊過后，很快就會意識到他們之間的關系并不總是十分融洽；對別人的冷漠評價折射出嫉妒心理和嚴重分歧當然，對于堅持一項不得人心事業的邊緣群體，事情向來如此。總之到了1980年代末，情況稍許好轉。那時，華工和韓國人已能自由赴日，尤其是戰后被遣返至韓國的朝鮮僑民。秋田廣播公司制作了一部“花岡事件”的電視紀錄片，不僅得了獎，還在全國播放。

話說回來，野添是個真正的勇者，因為他清楚自己畢生的心血只會招致社會對他的排斥，而鮮有日本人會為了獻身事業甘于接受這一命運。好奇心再度涌起，是什么在驅使谷地田、野添、家永或安雅·羅斯穆斯，激勵著他們獨自堅持？我把這個問題拋給野添他模棱兩可地回答說希望把真相傳遞給下一代，此外很難再讓他多說什么。不過他曾經寫到過自己的學生生涯，寫到校長命令學生朝中國人吐口水。他是個恃強欺弱的家伙，這樣的人當時很常見。他逼男孩子拿棍棒互毆，說是要錘煉他們的氣魄。這位軍國主義的信徒成天叫囂要跟盎格魯——美利堅惡魔戰斗到底，但在戰敗后卻若無其事地照常過日子，對他做錯過事或說錯過話沒有半點表示。別的老師也一樣，在鄉里名流的撐腰下聲援戰爭。“正因如此，”野添寫道，“我才對那些自稱老師的人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的不信任。”[(121)](#_121_1)

依我看，將野添、羅斯穆斯和其余同道串聯起來的，正是這種基本的不信任、對官方控制他們思想的拒斥，以及堅持提問和認識真相的那股子韌勁。無論在日本，還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這樣的人都不會多。我猜，不管他們身居何地，恐怕都不太討人喜歡。如果說羅斯穆斯在德國不像野添和谷地田在日本那樣孤立無援，這僅僅因為聯邦德國過去是、現在也依舊是個更開放的社會。那兒總有擁護羅斯穆斯事業的律師、報章和學者。但在日本，單個學者所能獲得的機構支持則要少得多。

然而，就多數人的情況而言，國與國之間的區別其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當直面令人不悅的事實時，日本人的反應和德國人差不多。多數人不是轉身離開，就是捶胸頓足。1990年，大館市舉辦了一場題為“花岡事件”的小型展覽。我見到一份特地為此準備的問卷。參觀者被要求寫下自己的年齡，是如何得知“花岡事件”的，以及對此的感受。人們的回答和德國紀念館留言簿上的話差不多——都在表達“民族”恥辱。

“日本人是全世界最野蠻的民族！”一位年過三十的男人寫道，“作為日本人，我感到深深的愧疚。”關于花岡事件，他是從父母那里聽來的。另一名參觀者是年逾花甲的老媼，事發當時便知情。她寫道：“作為花岡人，作為日本人，我感到無地自容。這跟‘花岡事件’相比或許只能算是樁小事，但我希望人們知道，家父過去利用華工為他工作，自己卻借用上司的名義，假裝是他們下的命令。”公開悔過——或者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叫“自我批評”——并不只在基督教文化里才有。

谷地田打小就是基督徒，但他說自己“恥于”提及。他自視為一介凡人，一位社會主義者。基督徒在日本東北的小鎮里并不鮮見傳教士吸引的是窮人，這在哪兒都一樣。谷地田的老婆孩子既不是基督徒，也對他有關華工的研究毫無興趣。太太因為他常去中國怨言頗多，希望老公能帶她去歐洲度假。女兒小時候曾幫爸爸分發工會傳單，但年紀一大，就對他的事再也不聞不問。兒子則向來不感興趣。跟我說起這些的時候，谷地田臉上仍掛著笑容。

基督教背景的社會主義者身上往往都有一種宗教傾向，不管他們自認為多么世俗化。我在谷地田身上沒有察覺到這點。他身上沒有一點宗教熱忱的元素——野添亦是如此。谷地田為何會如此關注“花岡事件”呢？為什么歷史會將他牢牢攥在手心里？他的回答和野添一樣含糊其辭，但聊到后來，在我以為他已經忘了我問過什么的時候，他卻殺了個回馬槍。二十來歲時，他曾在京都呆過幾年在郵局工作。一次，有人讓他別用某個杯子喝水，他吃驚不已，因為這杯子是專供“部落民”（burakumin）使用的。“部落民”是指昔日社會棄兒的后代，他們的祖先從事污穢的行業，譬如屠宰和制革。社會對這類人的歧視在中南部地區尤為嚴重。在北方，也許是因為開發比較晚，很少存在這一問題。谷地田沒有留在京都，但這段經歷為他打上了烙印：“我下定決心，永遠都要與被歧視的人站在一起。這就是我會對探究花岡事件經過感興趣的原因。不光是為了替幸存者索賠，不完全是這樣。我是想讓日本人承認事實，還受害者以自尊。”

\*\*\*\*\*

谷地田驅車帶我來到昔日村會堂的舊址，被人五花大綁的華工曾跪在那兒的空地上，遭人唾棄，被人毆打，其中一些還被凌虐致死。院子里種著幾棵參天大樹，地面灰暗而冰冷。“那棵松樹，”谷地田邊說邊指向一棵看似最老的樹，“一定目睹了行兇過程。”新建的社區中心對面矗立著三座大型雕塑：一座是男性半身銅像，一旁是塊巨石，光滑的表面刻著一首歌。銅像旁有座裸女塑像，她正引領一群鴨子走向銅質平臺的邊緣。一塊小小的銘牌躲在樹叢后，不仔細找的話幾乎看不見，牌子上刻著“花岡事件”的來龍去脈。

谷地田說，“趕鴨子的裸女”所在之處恰好是過去村會堂的位置。這點無文字為證，雕塑上找不到一句銘文。從一本大館市政府發放的名為《和平之城大館》的介紹冊上，我得知這座雕塑名為“和平雕塑”：誓將維護中日友誼。同樣是這份冊子，還（用英日雙語）解釋道：“和平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原則。基于這一觀念，1983年12月12日，大館市成為秋田縣首座宣布自己為‘反核和平之都’的城市，一直在為每位居民倡導和平之城的目標。”并不是所有人都樂見這一和平塑像，或歡迎反核政策，但畢竟是一個由社會黨執政的城市所取得的成果。

男性雕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倒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特殊之處；諸如此類地方名人的銅像在日本隨處可見。然而，眼前這尊卻格外華麗，微笑著俯視整個庭院，臉上的神情似乎很滿意于自己的諸多成就。此人是畑澤京一（Hatazawa Kyoichi），銅像下方刻著他的一系列職位和頭銜。畑澤曾是一位舉足輕重的地方官僚、相撲界的頂梁柱、幾屆奧委會成員，以及數項日本最高榮譽的獲得者。光溜溜的石座上所刻的歌詞，是專為歌頌他的精彩人生所作。據紀念碑碑文來看，畑澤的人生經歷只有一個很小的缺口：1941——1945年期間是一片空白。但他那時其實并沒閑著，是主管花岡礦場勞工事務的負責人。

“日本人對歷史也就這么點重視了，”谷地田表示。“我沒法說服自己帶中國參觀者來看這個，這可真叫人羞愧難當。”盡管我能理解他為什么尷尬，但他大可無需如此。在我看來，畑澤京一的塑像所象征的，不只是公眾對慘痛真相的無動于衷。我又打量了眼這位成功的地方大員。看著他那得意的笑容，我明白了是什么在驅使野添和谷地田等人堅持過那樣的生活。

[[1]齊格弗里德同克里姆希爾達都是《尼伯龍根之歌》里的人物。](#_1_13)

[[2]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　）法國著名學者，年鑒學派第三代史學家。](#_2_11)

[[3]Zarah Leander（1907——1981），瑞典喜劇女演員，曾被認為替納粹宣傳體制工作。](#_3_9)

[[4]近現代日本國家機構，主要承擔日本的國民健康、醫療保險、藥品和食品安全、社保、就業、救助弱勢群體等職責。](#_4_9)

[[5]James Stewart（1908——1997），美國著名演員。在電影《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中，他扮演一個深受愛戴的地方童子軍領袖，當選為參議員后來到華盛頓與腐敗體制斗爭。](#_5_8)

## 第十一章 告別廢墟

假使說《鐵皮鼓》是全世界關于二戰最著名的一本虛構編年史的話，那么其主人公、三歲就停止長大的男孩奧斯卡·馬策拉特（Oskar Matzerath）可以算是這場戰爭最有名的文學見證人了。挎著鐵皮鼓、嗓音能震碎玻璃的奧斯卡·馬策拉特是最理想的回憶錄作者，他有著早熟兒童那種不可思議的好奇心。不管有些事在成年人看來多么不堪，都逃不過他的眼睛，而鼓聲是對他目睹的慘劇的見證。與此同時，奧斯卡還象征著大人們的恐懼和渴望，尤其是渴望在一個黑暗、溫暖、子宮般的世界里尋找安樂窩。這樣的世界，就存在于他祖母安娜·布隆斯基寬松的裙底下。她坐在卡舒比亞人的土豆地邊上，奧斯卡只要鉆進她那“肥大的裙底”下，就能置身另一片世界。對于孩子，這個世界尚未有事可記；而對于成人，一切都可以是過眼云煙。

君特·格拉斯的這部權威著作是從孩子的視角審視過去的扛鼎之作，但絕非僅此一部。由于鮮有成長于第三帝國的德國成年人愿意回顧自己的經歷，取材于那一時期的諸多小說便出自當時尚未成年的男男女女之手。在日本，軍旅作品多為退伍老兵寫就。但若想了解納粹專政下的日常生活，我們大體上只能仰仗孩子奇幻而痛苦的視角。

對戰時日本日常生活的描寫則要少得多。即使如此，一些描寫戰爭末期——也就是戰火燒到日本本土的時候——的佳作都和孩子有關，或者將孩子作為敘事主體。井伏鱒二以廣島為背景的杰作《黑雨》講的是一位天真少女的遭遇。而大江健三郎早年的小說《抽嫩芽，打孩子》則是一群被轉移至偏遠村莊的孩子的故事，情節類似《蠅王》[[1]](#_1_Ying_Guo_Zuo_Jia___Nuo_Bei_Er)的倒敘版：溫和、懵懂的孩子淪為殘酷、野蠻的成人世界的犧牲品。不論在日本還是在德國，以戰火中兒童為題材的書籍多擁有一個相同的主題：天真與邪惡之間的較量。

諸如此類的小說，為一個靜止的宇宙和生來邪惡的成人世界提供了一種感傷且往往帶有道德說教色彩的看法。盡管它們多數具有政治意義，但講述的故事本身不牽扯政治。由于成人世界壞透了它很難真正發生改變，除非在某個遙遠的烏托邦。這其實算不上是孩子的視角，而是大人對童真的渴望，對祖母“保護傘般”裙擺的向往。

德國戰敗后，奧斯卡決定長大。他將鐵皮鼓埋入沙中，身體開始發育卻又無法自然成長；最后成了一個駝背怪物。盡管活到了三十歲，但他從未脫離魔幻的兒童世界，從未擺脫魔鬼對他的糾纏“總在我身后徘徊，黑廚娘。如今迎面朝我走來，漆黑……”[(122)](#_122_1)

\*\*\*\*\*

日本東北的某個小鎮有座高兩米、寬一米的石碑，由某個退伍老兵聯誼會的成員在1961年所立，那時正值日本經濟奇跡發軔之際。不過，他們絕非普通老兵，在美占期，他們可都是遭到清算的戰犯。紀念碑表面有行碑文寫道：“獻給蠢人的紀念碑。”到底誰蠢，則沒有說明。是軍官自己么？還是盟軍戰勝者當中的法官？他們清算和指控起人來隨心所欲，也不是一貫公正。還是說，蠢的是人類，因為其沉溺于自我毀滅？也許三者皆有吧；所有人都是蠢貨，當然，天真爛漫的孩子除外。

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紀念日臨近之際，檀香山市市長曾提議布什總統邀請日本官員前來參加儀式，不過前提是他們必須為戰爭道歉。這樣就能開啟“一個新時代”，他表示。日本政府對此予以拒絕。內閣官方副長官石原信雄稱，“全世界都負有戰爭責任”。美國也應該道歉，他說。“因為戰爭無法避免，參與其中的各方都應反思……究竟誰對戰爭負有責任這個問題，要再過個十年二十年才能得出正確結論。”

日本人沒通過測試，他們并未獲邀，他們仍然是個危險民族。珍珠港幸存者聯合會的主席一直都持上述看法。當聽說有計劃要邀請日本老兵時，他評論道：“你覺得猶太人會邀請納粹參加探討大屠殺的活動么？”

把珍珠港和大屠殺拿來作對比當然很荒唐，年邁的日本帝國海軍幸存老兵和納粹也是八竿子打不著。但是美國人頭腦中的疑問可以理解：在一個國家的官方發言人仍死不承認本國對挑起戰爭負有責任的情況下，這個國家還值得信任么？日本人的這番遁詞就好像一個任性的小孩在跺腳，邊跺還邊嚷，自己又沒做錯什么，因為人人有份。這種“別人與我無異”的論調很是奇怪，因為我們習慣聽日本人談論自己在文化上、民族上、政治上和歷史上如何獨一無二，與眾不同。

很容易將這種小孩子脾氣看成是文化特質，也許其并非日本獨有，但無疑在日本相當顯眼。戰后日本文化的幼稚病著實發展到了極為惱人的程度：隨處都能聽到成年婦女嘰嘰喳喳的說話聲，好像她們還是青春少女一樣；日本主干道沿途的建筑風格好似迪士尼樂園，清一色的可愛之風甜到讓人發膩；“電視達人們”聲嘶力竭大喊大叫不算，還在地上撒潑打滾，吵鬧不休，跟幼稚園小丑一樣；一身藍西裝的工薪族大軍在地鐵上手拉吊環閱讀少年漫畫；對老掉牙的校園歌曲和萬人迷媽媽桑（mama-san）[[2]](#_2_Ri_Wen_Yin_Yi__Zai_Ri_Ben_He)的喜愛又顯得十分矯情。

套用麥克阿瑟將軍的話說，日本這個國家像個十二歲的孩子充滿了渴望停留在十二歲的國民。但有時候它看著更小。在這個黃金年齡，一切安穩有著落，尚無需承擔責任，也不必遵從規范。日本人會坐在柏青哥（Pachinko）彈球游藝廳里，腰桿挺得筆直，目光呆滯地鎖定在彈子游藝機上，對過去和未來均充耳不聞，只盯著傾瀉而下的銀色小球，耳邊鬧哄哄地響著背景音樂《軍艦進行曲》[[3]](#_3_Ri_Ben_Di_Guo_Hai_Jun_Jun_Ge)

然而，我不相信日本人天生就是個幼稚民族的說法，同樣，我也不相信他們本質上就是危險民族。世上沒有危險民族，有的是危險的情境，這既不是自然法則或歷史規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結果。當然，這些安排背后有文化和歷史因素的影響，但后者并不起決定性作用。如果我們把政治因素注入戰后日本迷幻的迪士尼世界里，事情會變得清晰起來。麥克阿瑟將軍說的沒錯：1945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群小毛孩。在此之前，他們被迫完全屈服于一個由專制官僚和軍人管理的國家，聽從一種宗教崇拜——這一教派的教主同時還是武裝力量的名義首長和帝國的最高首腦。

自那時起，這一局面有所改觀，但還不夠。既然日本人得到了危險民族的評價，就得被迫——尤其是屈從于麥克阿瑟本人——從邪惡的世界當中抽身而退，躲藏在美國的裙擺之下。實際情況是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爾賽條約》之下：雖喪失主權，財政卻未遭壓榨。美國鼓勵日本人致富，但他們危險的雙手不得再染指戰爭。此時的國家管理者，和當初管理日本帝國的幾乎是同一批官僚。選舉體制被人操縱，使得一個腐朽的保守派政黨在幾乎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里一直大權在握。這一安排既合乎美國的心意，也很對日本官僚、自民黨政客、大財團的胃口，因為其確保日本一直會是一個富強、穩定的反共盟友。但這種安排扼殺了政治辯論，阻礙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從二戰歷史來看，這一辯論止步于1940年代末冷戰開始之時：官僚和保守派政客靠為過去辯護，或至少無視過去，為他們的統治授予了合法性；而人數較少、大致左傾的反對派，則把矛頭對準了軍國主義亡魂和人類的邪惡本性。

許多人相信日本人無藥可救，他們勢必永遠都會是一個危險、神秘和孤立的民族。就連一些日本人也相信這一說法。坂口安吾在戰后不久即寫道，日本人“在面對歷史時，就像聽天由命的小孩”。[(123)](#_123_1)他們要是想成為人，只有在墮落到只剩下基本人類欲求的層次，且被剝奪偽裝的謙虛、習俗、傳統和理想后，方有可能。他們倒的確是墮落了一陣子，但人類無力長期消受這一類型的自由，安吾說道。他們很快建立了新體制，以及一套新的習俗、傳統和理想，將自己圈禁其中。這一新體制不可避免地會建立在舊體制的廢墟之上：“若不發明一套武士準則，或天皇崇拜的話……人就活不下去。”

如果安吾說的是對的，如果說日本人真的不可救藥的話，那么理想的情況是，日本動武的能力應該受到一份和平憲法和一個外部強權的永久性束縛。反之，如果他們并非無藥可救，那么現狀就應維持下去，直到日本人態度轉變，真誠地面對過去，更徹底地向昔日的對手道歉。諸如此類的表達，不一而足。但或許我們把日本問題給看顛倒了。沒有對政治責任——準確地說，是對戰爭與和平的責任——的承擔，日本就不可能產生一種面對過去的成熟態度。必須先有政治變革，然后才會有心態變化。修憲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換政府起碼同樣重要。因為只有一個新政府才能與戰后秩序一刀兩斷，而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戰時政權的玷污。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區下跪的一幕，發生在聯邦德國建立有效民主體制之后，而不是之前。然而，日本在與邪惡世界分道揚鑣后，成了個“奧斯卡·馬策拉特”：投機取巧、發育受阻、被魔鬼纏身，而它一直試圖通過將魔鬼埋進沙中——就像奧斯卡埋鐵皮鼓一樣——來逃避它的糾纏。

韓國首任民選非軍人總統金泳三曾接受日本記者的采訪。當后者問及日本政府應如何賠償原日本帝國陸軍軍中的朝鮮籍慰安婦時，他答道：“我們要的不是你們的錢，我們要的是你們澄清真相只有這樣，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不出一年，1993年夏，也就是柏林墻倒塌后四年，期盼終于成為了現實：自民黨的政治壟斷被脫黨的年輕保守派、社會黨、公明黨（一個佛教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打破了。新任首相是細川護熙，近衛文麿親王的外孫。近衛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擔任首相，并于1940年簽署了軸心國協約，1945年被控為甲級戰犯后自殺。作為日本新首相，細川上臺后的首項舉措就是公開聲明，日本在1930至1940年代的軍事行動是“一場侵略戰爭和錯誤戰爭”雖然這只是個開端，但也是不錯的苗頭。懷揣著新燃起的一絲希望我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領教老一套說詞的經歷，這種說教已經盛行了四十八年。那么多地方，偏偏就被我在迪士尼樂園里見識到了。

東京迪士尼樂園坐落在東京都和成田機場之間一片荒蕪的城郊空地上，幾乎就是加州迪士尼樂園的翻版，除開某個娛樂項目只在東京才有，名為“與世界相遇”（Meet the World），由松下電氣贊助建造。松下是戰后日本最成功的企業之一。“與世界相遇”設在一棟大型白色穹頂建筑內，里面有座旋轉影院，散發著一股淡淡的塑料味兒。影院放映的是日本和世界關系簡史，講故事的是一只友好的蒼鷺，為其配音的女聲歡快而活潑。聽眾說是兩位幼童，實則為機器人。然而，這其實是相當片面的歷史：雖承認中國文明的影響，但只是為了突顯日本后來獨樹一幟，自成一派。比中國近得多的鄰國朝鮮則壓根沒有提及。

但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我期待看到的，是1895至1945年那段時期。當時，日本與世界的相遇引發了一系列戰爭。這一幕緊跟在海軍司令佩里率領如惡靈般的“黑船”登場之后——但實際上，“黑船”駛入日本近海是在1853年。軍艦淡出視線后，銀幕上出現了一門大炮，隨著一聲炮響，劇院變得一片漆黑。“哦，”兒童機器人開口道，“好黑啊！”歡快的蒼鷺附和著，是好黑啊，“現在讓我們面向未來吧”。之后就是大結局：一連串幻燈片掠過眼前，友善的日本人向心存感激的外國人介紹高科技工具——其中有馬來西亞人、印度人、中國人……還有美國人。耳旁歌聲越來越響，副歌不停重復一句歌詞：“我們用愛迎接全世界，啊，我們用愛迎接全世界，我們用愛迎接全世界，啊……”

音樂還在放，燈亮了。我環顧四周，發現影院里只剩下我和女兒兩人。

\*\*\*\*\*

瓦爾特·本雅明對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描述是最美妙的歷史比喻之一。新天使是歷史天使；他長著一張人臉，卻有鳥兒的翅膀和腳：“他面朝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不斷堆起尸骸，并將它們拋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將破碎的一切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一場風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無法將它們收攏。風暴無可抗拒地將他推向背對著的未來，而面前的殘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際。這場風暴，正是我們所謂的進步。”[(124)](#_124_1)

進步觀連同英國炸彈一起，把德累斯頓變成了一座遍布廢墟和畸形巨物的城市。走在德累斯頓市中心丑陋的大街上，看著老城只剩下殘磚碎瓦，宛如一個精致的古董廣口瓶摔成的碎片，我心中無端生起一股自己也牽連其中的罪惡感。在寫到奧斯維辛和廣島時我曾抨擊過同樣的罪惡感。究其原因，與各自死亡人數無涉（德累斯頓死了大約三萬人），因為不管實際上有多少人罹難，大規模的殺戮總歸令人震驚。（正如某人指出被殺害的猶太人要遠多于被害的同性戀者時，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反問：“你干嘛呢，在聊不動產么？”[[4]](#_4_Ci_Chu_Bei_Jing_Ke_Can_Jian_h)）而我格外遺憾的情緒談不上有多高尚。因為就德累斯頓大轟炸而言，最令人震驚的莫過于，幾個世紀以來凝聚的美一夜間就這么毀了。同布拉格和威尼斯一樣，德累斯頓是世界建筑奇跡之一。其被毀純屬喪心病狂之舉，就好比拿斧子將一把齊彭代爾[[5]](#_5_Thomas_Chippendale_1718____17)設計的椅子砍個稀巴爛，拿刀把米開朗基羅的作品刮花，或燒毀一座價值連城的圖書館。由于轟炸沒有令人信服的戰略依據，因而更反襯出其喪心病狂。從人性的角度而言，這并不是說轟炸丑陋的貧民窟沒有摧毀德累斯頓的巴洛克式心臟那樣可怕。只是，置身德累斯頓新形成的空洞中——過去那是心臟的位置——時不時都會感到若有所失。

老城的一部分戰后本可保存下來，一些宮殿和教堂的殘址足以進行修繕和復原，這點同紐倫堡和慕尼黑的情況相似。但是東德首任共產黨領袖瓦爾特·烏布利希認為，過去必須連根鏟除。他的口號是“德累斯頓，當下最美”（Dresden, schöner als je）。于是乎這座城市再次淪為了喪心病狂的犧牲品：藝術史專家被迫起草方案摧毀德累斯頓殘余的部分；御用文人拿著傭金，負責設計一座將成為社會主義樣板的丑惡城市。建于18世紀的茨溫格宮對面是索菲亞教堂，它曾是德累斯頓最漂亮的哥特式教堂，卻慘遭拆毀，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低矮的混凝土堡壘，里面是工人食堂。這就是烏布利希的進步觀。

但不是所有殘磚碎瓦都被清理一空。茨溫格宮于1960年代修復一新，同樣被復原的還有一兩處別的廢墟。18世紀興建的圣母教堂遺跡則維持原狀，因為無論是烏布利希還是別的什么人都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在里面造什么好。就這樣，這堆傷感的石頭成了一塊警示地，一座“獻給上萬死難者”的紀念堂（套用官方銘牌上的說法），以及對于那些活著的人來說，作為他們“對抗擊帝國主義野蠻行徑、為人類和平幸福而斗爭的一種勉勵”。

我問市立博物館新館長馬蒂亞斯·格里貝爾（Matthias Griebel），帝國主義野蠻行徑到底指什么。格里貝爾回答：“指每一場帝國主義戰爭：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島、美國入侵越南，以及除開社會主義戰爭之外的所有戰爭。”

格里貝爾光頭，留著濃密的連鬢胡子，這讓他像是一只碩大的德國老鷹。在德累斯頓，一小群人試圖通過舉辦講座和非正式展覽，維持歷史意識的鮮活，格里貝爾正是其中之一。起初，共產黨政府反對這么做，因為德累斯頓的“封建”歷史屬于歷史的垃圾箱。只有到1980年代，共產主義教條徹底喪失對公眾的吸引力后，當權者才試著通過宣揚歷史合法性，來鞏固其公信力：從農民起義領袖閔采爾（Münzer）一直講到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就連卡爾·邁（Karl May）都被當成自己人。這位19世紀浪漫派作家筆下的老沙特漢德（Old Shatterhand）是德國的狂野西部英雄。希特勒和愛因斯坦都愛他的小說，讀起來手不釋卷。沿著易北河順流而下，“沙特漢德別墅”就在德累斯頓西北，對游客開放。

沿易北河順流而上幾英里，在德累斯頓的另一邊，是小城皮爾納（Pirna）。小城雖然破敗，卻古色古香，不僅有19世紀的精巧別墅，居然還保留了部分后哥特時期的建筑。我前去尋找一處歷史遺址，它在德累斯頓地區的所有旅游手冊上都不見記載。皮爾納有座古老的醫院，曾收治過精神病人。我之所以知道它還在那兒，是因為先前看過照片。格里貝爾也跟我確認有這么個地方。這座精神病院很有來頭，因為正是那兒的醫生率先在病人身上試驗名為“齊克隆B”的毒氣。逾一萬人死在了索能斯坦（Sonnenstein）安樂死研究所。

這地方挺難找。一位老太太愉快地送我上了山，但隨即我便迷路了。“你說這地方叫啥？”過去叫安樂死研究所。“什么時候的事啊？”希特勒時期。“抱歉，這我可真不知道。”

最后還是被我找到了。索能斯坦城堡毗鄰一座風景怡人的公園內有幾棟建于世紀之交的房屋。一棟別墅的黃色墻壁上刷著一行字“為病患和老人提供桑拿設施。”我進了屋。一位姑娘問我有何貴干我告訴她所為何來。她皺皺眉說道：“不，不在這兒。我們這兒只收需要特殊治療的病人。您要找的是那邊那棟建筑，過去是座工廠造渦輪機的。”

“那邊那棟建筑”外圍著生銹的鐵絲網，看外觀著實夠陰森想必就是安樂死研究所。我還看到塊牌匾，紀念一位名叫阿爾伯特·巴特爾（Albert Barthel）的人，“我黨同志，于1942年被納粹殺害。”

結果也不是這里。我走進一間屋子，見到幾個年輕人正在吃午飯，他們是負責照看智障兒童的教會執事。“原安樂死研究所？不不，感謝上帝，不在這屋里。不，應該是在隔壁那幢樓里。”

我來到隔壁屋子前，這是棟別致的法式別墅。我朝地窖里瞥了一眼，下面一塊牌匾也沒有。門閂著，周圍雜草叢生，高及膝蓋我聽著沙沙作響的樹上傳來鳥鳴聲，想起方才在教會執事房里看到的一堆泰迪熊，橫七豎八地躺在過道上。

格里貝爾先生說過，建筑是時間凝固在石頭中的表達。可問題是，石頭提醒德累斯頓市民記住的是一段他們想要忘卻的歷史。第三帝國不過是一場恐怖的噩夢，但從烏布利希再到昂納克，他們的專制作風在每個粗制濫造的住房項目、每座混凝土工人餐廳背后都清晰可見。你無法責怪人們深深迷戀那個有著宮殿和教堂尖塔的老德累斯頓。正如格里貝爾所言，“我們活在一個城市的屁股里，當然想幫她恢復原貌。”

為了抄錄紀念匾上的文字，我最后去參觀了圣母教堂遺址，卻不見它的蹤影，有的只是一堆被圍欄圍起來的碎磚塊。一個身穿藍色制服的男人正對著一伙工人發號施令。我翻過圍欄，想湊近瞧上一眼，結果被身材敦實的小個子“制服男”看見了，他大步流星朝我奔來，滿臉怒氣，帶著濃重的薩克森州口音沖我吼道：沒什么好看的，嚴禁擅入！一瞬間，所有孩提時代的偏見再度涌上心頭。這可真是典型的德國人，我暗自思忖。但我還是屈服于他的喝令，退回至圍欄后，遠離了這個依舊怒火中燒的男人。我又打量了眼工人，他們正在堆石塊。一兩年后，圣母教堂就會再次矗立于此，并完全恢復其往日的風采，就像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

\*\*\*\*\*

戰后，奧斯卡·馬策拉特和他的朋友克萊普成立了一支爵士樂隊。兩人周游西德，去過杜塞爾多夫，或者準確地說，是杜塞爾多夫與凱塞爾威爾斯（Kaiserswerth）之間的萊茵河流域。他倆坐在岸邊，演奏拉格泰姆音樂[[6]](#_6_Ragtime_Mei_Guo_Liu_Xing_Yin)。那是在1949年，一年前的貨幣改革見證了德國馬克的誕生。他們被邀請在一家名為“洋蔥地窖”、收費高昂的“高檔”夜總會里演出。夜總會的裝修是仿古的德式風格，有著圓形玻璃窗，門外的熟鐵絞架上掛著塊琺瑯牌子。夜總會客滿時主要娛樂活動就上演了。客人們分到一塊小砧板、一把削皮刀和一個洋蔥。洋蔥用來干嘛？“它做到了全世界和全世界的悲慟都做不到的事：它讓人落下一顆淚珠。它讓人哭泣。他們總算可以再度哭泣了。是正確地哭，不加克制地哭，發瘋一樣地哭。”[(125)](#_125_1)

當然，對于治療“無法哀悼”即戰后德國人普遍的道德和精神麻木而言，“洋蔥地窖”只是一劑昂貴且治標不治本的藥方。我遇到過的許多有思想的德國人都很討厭這個詞：無法哀悼。哀悼什么呢？他們問。哀悼誰呢？你會哀悼逝去的親人，但你如何悼念死在自己手里的受害者？我的德國自由´¾友人會問。反思么，沒錯；道歉么，肯定的；賠償呢，那是自然；但哀悼呢，萬萬做不到。因此在有思想的自由派人士圈內（這些圈子估計會歡迎那些愛管閑事的友人加入他們）已經做了——現在仍在進行——大量的反思和道歉但是憑吊德國死難者，不管是軍人，還是被盟軍炸彈炸死或被一心尋仇的波蘭、捷克或斯洛伐克鄰居趕出家園后殺害的平民，這種憑吊都令人難堪。這么做的多半是右翼民族主義分子，或是驅逐行動的幸存者，滿懷對失去故土的鄉愁。

在西半邊的德國，村莊廣場上和教堂墓地里有不少憑吊一戰戰歿者的紀念堂，但紀念二戰死難者的就鳳毛麟角了。一個例外是鄉下啤酒館臭烘烘的地窖，那兒不太歡迎外國人。實際上，東德的二戰紀念堂似乎要多于西德，或許是因為對過去的罪惡感在民主德國從來就不稱之為問題。

赫爾穆特·科爾試圖通過將羅納德·里根拉到比特堡公墓，來實現某種平衡，但他行事既笨拙又冒失，挨罵也就理所當然了。不過在游歷德國期間，我時常感到，一味道歉或許會造成一種妄自菲薄。畢竟，哀悼有其目的。儀式性地表達悲傷和失落會強化了延續感和共同體意識。但有思想的自由派德國人擔心的恰恰就是這點民族共同體（Gemeinschaft）過去曾遭到扭曲，淪為殺氣騰騰的種族主義，而在一個歷史上背負血債的國家中，文化延續性已成為一種很微妙的東西。

1991至1992年我旅居柏林，在這一年中，我覺察到德國的親猶主義思潮出現了一種有趣的新老交替。在那些經歷過戰爭的德國人家里，時而能看到墻上掛著以色列日歷。對此，罪惡感起碼有一定解釋力。但是，那些泡在東柏林原猶太教堂外咖啡館里的非猶太裔德國青年又怎么說呢？一些德國青年干嘛非要給自己取個祖父或伯叔祖那代人的猶太姓氏呢？但凡是來自中歐的猶太作家，幾乎都能拿文學獎，難道不有些奇怪么？或許與一種或殘存于內心、或繼承自祖輩的罪惡感有關，但我相信，還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對一種消逝文化的追憶，以及嘗試對被抹去的過去建立認同。簡言之，這是一種哀悼之舉。

瑪琳·黛德麗[[7]](#_7_Marlene_Dietrich_1901____1992)不是猶太人，但她屬于柏林猶太區被毀的那個世界。她死后葬在柏林，葬禮很低調，排成一字走過她墳前的吊唁者，年齡幾乎統統在四十歲以下。這同該市官員拒絕為她舉行官方葬禮的小心眼形成了鮮明對比。一些德國人永遠都不肯原諒黛德麗，因為她在德國城市遭到轟炸的時候正穿著美軍軍裝。但她代表了另一個德國，一個那些年輕吊唁者渴望認同的德國。

所謂的缺乏認同感和共同體意識，是聯邦德國人反復對靈魂進行自我解剖的一個原因——問題是，似乎已經沒什么靈魂可供解剖了。這也就是為何左右兩派的一些浪漫主義者都將東半邊的德國視為蘊藏德國身份認同的寶庫。但在我看來，讓聯邦德國在智識上變得令人振奮的，是其對歷史神話建構和國家浪漫主義的懷疑。我喜歡“憲政愛國主義”這一說法。也許光有這點還不夠，也許在改造一個昔日的危險民族上，還有很多事要做。但我很難認同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擔心，他在兩德合并時說過，德國人缺乏“對聯邦德國那種至高無上的感情”，另外，“聯邦德國似乎并未帶給他們情緒上的大起大落，即便對那些視其為德國公民意識從戰爭廢墟中崛起并獲勝的人而言，亦是如此”。[(126)](#_126_1)無疑，德國人在過去的一百年里經歷了太多這樣的大起大落。米勒擔憂的是，德國人在面臨危機時也許不會捍衛他們的民主體制，因為“沒人為其誕生灑下過一滴熱血”，況且這是舶來的民主。

借一位早已被人忘卻的納粹理論家的話來講，永遠都會有德國人（還有他國的同道）想要“從德國神話的廢墟中挑選石料，在經過清洗和打磨后，修建一座全新的德意志神廟，在斷壁殘垣的遺跡之上，打造一種嶄新的德意志世界觀”。[(127)](#_127_1)但我認為，德國的神廟已經夠多的了，是廢墟的就由他去吧。

君特·格拉斯不是唯一擔心德國統一的人。多數自由派在這一問題上的焦慮同擔心西德沒有靈魂恰恰相反。不少人警告道，統一會使德國民族主義卷土重來；剎車已經松開了，危險的德國人就要開始挪動他們龐大的身軀了。然而這點并沒有直接的證據。兩德統一當晚，我身在法蘭克福，除了寒空中鳴響的舊爆竹外，我并未發現民族主義狂歡的跡象。一家時尚的夜總會里，喜劇演員拿神圣的德國馬克和“香蕉民主”[[8]](#_8_banana_democracy_Lai_Yuan_Yu)開著并不好笑的玩笑。不過，多數人選擇待在家里，坐在電視機前，跟平時晚上沒啥兩樣。一年前，德國隊問鼎世界杯時，人們可要熱情多了。

這之后，新納粹粉墨登場，光頭黨青年高喊“勝利萬歲！”揮舞老式戰旗。他們面目可憎，殘暴成性，殺人不眨眼。1992年，德國發生了4587起針對外國人的襲擊案，有十七人遇害。一年前英國就有7780起種族主義襲擊事件，但納粹黨徽、口號和“勝利萬歲！”的敬禮使得歷史對比在德國難以回避。從歐洲媒體關于德國青年犯下種族主義罪案的報道中能讀出一絲幸災樂禍的意味，老一套的“我們和他們”又上演了。

我在哈勒[[9]](#_9_Halle_De_Guo_Cheng_Shi__Wei_Y)待了一天，等著看一場新納粹游行。這座東德城市十分敗落，那天是11月9日，正巧是“水晶之夜”和柏林墻倒塌紀念日。哈勒的居民提心吊膽，警方封鎖了每條主要街道。該市主廣場上，一個老頭兒沖市長叫罵，說這么大張旗鼓的，搞得好像希特勒時代又卷土重來了一樣。一家咖啡廳的老板在放我進來后，鎖上門，驕傲地給我看了看他的槍。終于，新納粹出現了，男的后腦勺和兩側頭發剃得精光，女的腳穿白襪，長長的金發扎成辮子，活像希特勒少女聯盟成員。一位帶有維也納口音的胖男人和英國史學家大衛·歐文（David Irving）向他們發表了講話。戰前設計的老式電車吱吱嘎嘎地行駛在銹跡斑斑的軌道上。穿著汗衫的胖墩從窗戶里探出身來一看究竟，《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lied）這首歌詞對仗的禁曲（“從馬斯到默默爾，從埃施到貝爾特，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響徹空中。這一切讓人很不自在，而且荒誕不經——野蠻的子孫穿著他們祖父母的衣服，歷史以大木偶劇[[10]](#_10_Grand_Guignol_Yi_Wei__Da_Mu)的形式自我重復。

但這不是在演戲。極端分子的行為——他們在一年后燒毀了東西德的難民收容所，致人死亡，一旁的警察卻無能為力——證明了一點，德國人仍能做出傷天害理之事。大喊大叫的德國青年抬起穿靴子的腳，蹬向可憐無助的外國人的臉部時，鄰居居然還嗤笑叫好，這一幕著實讓人作嘔。然而，在歐洲其他地方——更別提其他大洲——也發生過類似事件，有些情節更為惡劣，這證明國籍、種族和文化不足以解釋人類野蠻的根源。當領袖掌握的權力不受限制，追隨者又獲準可以欺凌弱者時，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為危險分子脫韁的權力會勾起個體和暴力團伙心中的野蠻。盡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奧斯維辛和南京大屠殺永遠都是其例證。可是，在聯邦德國，或者說在日本，今天的形勢并不是這樣。人性并未改變，政治格局卻已今非昔比。這兩個國家的人可以用選票把卑鄙無賴趕下臺。那些選擇無視這點而去尋找民族性“該隱記號”[[11]](#_11_The_mark_of_Cain_Lai_Yuan_Yu)的人，并未從過去當中吸取教訓。

1993年，德國最成功的一部電影是約瑟夫·維爾斯麥爾（Joseph Vilsmaier）執導的《斯大林格勒》，片長兩個半小時，重現了當年德國人經歷的煉獄。至少有十五萬德國人死在了戰火中，這既是希特勒對蘇聯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是對德國人對自己犯下的罪行。該片講述的主要是德國人的苦難，而非對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暴行影片中的德國士兵死于饑寒交迫或蘇軍火力。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解讀德國年輕人為何尤其鐘情于《斯大林格勒》。歷史好奇心或許是原因之一；另外，德國人新近產生的逆反心理或許是原因之二：我們受夠了奧斯維辛，現在來哀悼哀悼自己吧。是有這種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新一代德國人可以在沒有罪惡感的前提下進行反思。這些人興許是少數，不過我覺得其人數總要多于那些根本不會反省的光頭黨惡棍。

1992年，慕尼黑的電影博物館放映了維特·哈蘭（Vei Harlan）的影片《猶太人蘇斯》（Jud Süss），叫人看著不作嘔都不行。這是經戈培爾授意、攝于1940年的反猶主義政治宣傳片。蘇斯這個邪惡的猶太人由費迪南德·馬利安[[12]](#_12_Ferdinand_Marian_1902____194)飾演，他意圖破壞18世紀符騰堡公國的罪惡計劃險些得逞。最后，猶太人像耗子一樣被驅逐出城。該片的公映在慕尼黑市掀起了一連番公眾討論，有一次還吸引了兩位右翼激進分子的參與。他倆試圖否認大屠殺。出了這種事也是無可奈何，作為討論發起人的德語文學教授說道：“不管怎樣，作為民主國家，我們理應放映該片。”

是年，我觀看了《猶太人蘇斯》，地點在柏林電影學院。片子是放給學生們看的，結束后一樣引發了討論。多數學生來自西德，部分來自東德，都才二十出頭。他們的裝束是“國際標準制式”：牛仔褲、防風衣配工裝襯衫。授課教授年逾花甲，名叫卡斯滕·維特（Karsten Witte），屬于“六八一代”。發起討論時他說，希望學生偏重影片的審美層次，而非故事情節。他說，如果只是介紹政治宣傳的話，那可就太單調了：“我們都知道‘發生了什么’，所以現在來談談‘怎么會發生的’吧。”我聯想起十五年前在東京電影學院讀書時的同窗。他們當中有多少人知道日本的亞洲戰爭“發生了什么”？或者更一陣見血地說：他們的教授當中，有幾個會想到要去放映過去的政治宣傳片，好讓學生知道“怎么會發生的”呢？

維特就影片的配樂發表了些看法：片頭字幕出現時，巴赫的合唱樂一點點被領唱人口中的希伯來語贊美詩所蓋過。一個二十歲上下的男生舉手發言，說他留意到在影像呈現上，還有一處也運用過類似手法：符騰堡的徽章熔化后成了希伯來符號。另一名學生指出，在猶太惡人被公開處決的最后一幕里，天空中飄起了雪。他試著轉述導演想表達的意思：“雪洗凈了德國，滌蕩了大地。冬天過去了，春天這個萬物復蘇的季節就要來臨。”還有人說，影片一直在展示符騰堡宮廷的財富：寬敞的房間、精美的畫作、雄偉的宮殿，等等，而猶太人的財產則被藏在暗柜里，藏在逼仄骯臟的屋內。“這旨在說明，德國人的財富是漫長而光榮的傳統結出的果實，是歷史和文化結出的果實，而猶太人的財富除了錢以外還是錢。”

卡斯滕·維特皮膚蒼白，嘴唇紅潤，再加上一頭金色短發，讓他像極了納粹藝術作品中的北歐人典范。他顯然對學生們很滿意。他們仔細分析了影片，一點細枝末節也沒放過。種族主義宣傳較為毛骨悚然的范例雖然引發了一片竊笑聲，但學生們都很專注。我聽著他們的評論，犀利，深思熟慮，具有批判性，但不會滿嘴道德話語；自信，但不顯得咄咄逼人。最重要的是，都沒有因為罪惡感而縮手縮腳。我不禁想起小說家兼和平活動家的小田實曾對我說過的話。海灣戰爭期間，我在日本拜訪過他。他說我從小接受的是從被害者角度出發的教育，而他成長期間被灌輸了自己是侵略者的觀念坐在柏林這間狹小的放映廳里，距離當年戈培爾發表廣播演講的大樓只有五分鐘的路程，我不無欣慰地意識到，在觀看這部丑惡的影片時，大家的視角完全一致。

[[1]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戈爾丁的代表作，借孩子的天真探討了人性的惡這一嚴肅主題。](#_1_14)

[[2]日文音譯，在日本和臺灣等地對中老年婦女或老板娘的稱呼。](#_2_12)

[[3]日本帝國海軍軍歌，從明治維新時期沿用至今。](#_3_10)

[[4]此處背景可參見http://www.gorevidalpages.com/essay-selections/。衣修伍德指出同性戀者也遭到了慘無人道的屠戮，但年輕的猶太導演不為所動，因為猶太人死難人數遠比同性戀多。于是衣修伍德反詰：“這算哪門子話，這又不是在買賣不動產，還要斤斤計較！”](#_4_10)

[[5]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18世紀英國最杰出的家具設計家和制作師，被譽為“歐洲家具之父”。](#_5_9)

[[6]Ragtime，美國流行音樂形式之一。產生于19世紀末，采用黑人旋律，為爵士樂鼻祖。](#_6_6)

[[7]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國著名女演員。生于柏林，1930年代往好萊塢發展，戰爭爆發后加入美國籍，是二戰期間勞軍藝人中最受歡迎的一個。](#_7_6)

[[8]banana democracy，來源于香蕉共和國，banana republic，指經濟形態單一（主要依靠經濟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擁有不民主或不穩定的政府。](#_8_5)

[[9]Halle，德國城市，位于薩克森——安哈爾特州，是該州主要大城市之一，相鄰萊比錫。](#_9_5)

[[10]Grand Guignol，意為“大木偶”，原為19世紀末成立于巴黎的一家木偶劇場之名，由于上演極度血腥寫實的恐怖劇，后來也用來指代此類型戲劇。](#_10_4)

[[11]The mark of Cain，來源于《圣經》，寓意是“殺人罪”。據《創世記》記載，該隱犯有弒兄之罪，上帝把他逐出家園，并在他身上做了一個記號，標明他犯有殺人罪，同時也警告別人，誰要是殺該隱就要遭報七倍。](#_11_2)

[[12]Ferdinand Marian（1902——1947），納粹德國時期奧地利男演員。](#_12_2)

# 注釋

第一章　反對西方之戰

[(1)](#_1_4)“阿摩司·奧茲采訪記”，阿摩司·奧茲，《法蘭克福匯報》，1991年2月14日。

[(2)](#_2_3)“莫以鮮血換石油”，沃爾夫·比爾曼，《時代周報》，1991年2月。

[(3)](#_3_2)“敬虔主義的核心”，戈登·克雷格，《德國人》（紐約：企鵝出版社，1984年），87頁。

[(4)](#_4_1)“他把薩達姆比作希特勒”，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明鏡周刊》，1991年2月刊

[(5)](#_5_1)“最獨一無二的糅合”，阿爾布萊希特·福斯特·馮·烏拉赫，《神秘的日本力量》（柏林NSDAP中央出版社，1944年）。

[(6)](#_6_1)“談論世界新秩序時”，中村哲，《朝日新聞》，1991年2月22日。

[(7)](#_7_1)“林房雄的反西方民族主義”，林房雄，《大東亜戦爭肯定論》（東京：大和文庫，1964年）22頁。

[(8)](#_8_1)“海灣戰爭正式結束幾個月后”，松本健一，《東京新聞》，1991年4月8日。

[(9)](#_9_1)“對于古希臘人”，奧雷爾·科爾奈，《反對西方之戰》（倫敦：Victor Gollancz出版社1938年），24頁。

第二章　廢墟中的浪漫

[(10)](#_10_1)“城市的廢墟”，斯蒂芬·斯彭德，《歐洲見證人》（紐約：Reynal & Hitchcock出版社1946），15頁。

[(11)](#_11)“如何營造詩意”，維克托·克蘭普勒，《第三帝國的語言》，或簡稱LTI（哈勒：尼邁爾出版社，1957年）。

[(12)](#_12)“聽到諸如民族這樣的字眼”，吉本隆明，《戦後詩史論》（東京：大和書房，1956年），72頁

[(13)](#_13)“所羅門稱美國人”，恩斯特·馮·所羅門，《問卷》（法蘭克福：羅沃爾特出版社, 1951年）648頁。該書英文版由康斯坦丁·菲茨·吉本翻譯，紐約Doubleday出版社1954年出版

[(14)](#_14)“他描繪空襲”，坂口安吾，《墮落論》（東京：角川書店，1946年），95——96頁。

[(15)](#_15)“存在一股熱望”，沃爾夫迪特里希·施努厄，引自《祖國的母語：1945年至今的德國作家和他們的國家》（柏林：Wagenbach出版社，1979年）。

[(16)](#_16)“伯爾同情”，海因里希·伯爾，《關于廢墟文學的自白》，1952年。

[(17)](#_17)“消費者”，海因里希·伯爾，《在我們這里》（1960年），367和373頁。

[(18)](#_18)“無法哀悼”，亞歷山大·米切利希，瑪格麗特·米切利希，《論無法哀悼》（紐約：Grove出版社，1975年）。

[(19)](#_19)“所有那些被剝奪公職的人”，赫爾穆特·沃爾塔特寄給經濟部主任秘書萊茵哈德的信件，1951年6月30日，藏于聯邦德國經濟部。

[(20)](#_20)“短暫歷史中出現的一部杰作”，野坂昭如著，J. 魯賓譯，《美國羊棲菜》，收錄于《當代日本文學》（紐約：Alfred A. Knopf出版社，1977年）。

[(21)](#_21)“他還記得有多么渴望”，大島渚，《體験的戦後映像論》（東京：朝日新聞社，1975年），72頁。

第三章　奧斯維辛

[(22)](#_22)“ 過去深入骨髓”，克里斯蒂安·邁爾，《奧斯維辛后的四十年：今天的德國歷史記憶》（慕尼黑：Deutscher Kunstverlag，1987年），63頁和75頁。

[(23)](#_23)“人們開始明白”，喬治·斯坦納，《語言和沉默：1958——1966年散文集》（倫敦：Faber& Faber出版社，1967年；紐約：Atheneum出版社，1967年），137頁。

[(24)](#_24)“ 這些格言”，斯蒂芬·斯彭德，《歐洲見證人》，7頁。

[(25)](#_25)“ 僅剩的雛形”，漢斯·于爾根·西貝爾貝格著，約阿西姆·諾伊格羅舍爾譯，《希特勒：德國制造》（紐約：法勒·施特勞斯和吉魯出版社，1982年），9頁。

[(26)](#_26)“ 彼得·魏斯參觀奧斯維辛”，同樣，這次經歷在阿摩司·艾隆的《穿越冤魂之地的旅程》（倫敦：Andre Deutsch出版社，1967年）一書中也有記載。

[(27)](#_27)“ 穿過千重黑暗”，彼得·狄美茨，《大火之后：在德國、奧地利和瑞士寫作》（倫敦：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86年），47頁。

[(28)](#_28)“ 魏斯寫下一部戲劇作品”，同上，55頁。

[(29)](#_29)“ 精神勞動”，引自A·索爾納的《彼得·魏斯和德國人》（威斯巴登：Westdeutscher出版社，1988年），184頁。

[(30)](#_30)“ 少數支持霍赫胡特的文人之一”，馬塞爾·萊希·拉尼茨基，《時代周報》，1964年3月6日。

[(31)](#_31)“ 沒有哪個方面”，狄美茨，《大火之后》，29頁。

[(32)](#_32)“ 真的難以形容”，艾隆，《穿越冤魂之地的旅程》，244頁。

[(33)](#_33)“ 作為講述這一故事的人”，阿爾布萊希特·格斯，《燔祭》（法蘭克福：S. Fischer出版社，1954年），新版序言作于1965年。

[(34)](#_34)“ 他把這個故事講給……”， 沃爾夫岡·柯朋，《雅各布·利特納寫自地洞里的筆記》（法蘭克福：Jüdischer出版社，1992年）。

[(35)](#_35)“ 一部美國電視劇”，安東·凱斯，《從希特勒到故鄉：電影中的歷史回歸》（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89年），31頁。

[(36)](#_36)“最后一個階段”， 海納·穆勒接受（柏林）《跨大西洋報》采訪，1990年7月刊。

[(37)](#_37)“看過《大屠殺》后”，海納·利施登斯坦，米夏埃爾·施密特·奧斯帕赫，《致西德的大屠殺信件》（烏帕塔爾：Peter Hammer出版社，1982年）。

[(38)](#_38)“他不用感慨”，馬丁·瓦爾澤，《談談德國》（法蘭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9年），25頁

第四章　廣島

[(39)](#_39)“應該保留廣島滿目瘡痍……的樣子”，宇野正美，《ドルが紙になる日 いまこそユダヤの知慧に學べ》（東京：文藝春秋株式會社，1987），234頁。

[(40)](#_40)“比較荒誕不經的一本”， 河內朗，《ヒロシマの空に開いた落下傘》（東京：大和書房1985年）。

[(41)](#_41)“這種歷史健忘”，德國《日報》，1991年1月18日。

[(42)](#_42)“就算到了1949年”，平野共余子，《史密斯先生來東京：1945——1952年美占期的日本電影》（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學會出版社，1992年），62頁。

[(43)](#_43)“1983年一批精選集”，《日本の原爆文學》（東京：ほるぷ出版，1983年）。

[(44)](#_44)“諸如《廣島》這樣的電影”，唐納德·里奇和約瑟夫·L. 安德森，《日本電影》（紐約Grove出版社，1960年），219頁。

[(45)](#_45)“發生在世界末日的某件事”，理查德·米尼爾編譯，《來自廣島的三位目擊者》（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0年）。

[(46)](#_46)“所有準宗教元素”，小田實著，D. H. 維塔克譯，《原子彈》（東京：講談社國際出版社1990年）。

[(47)](#_47)“他眼中的世界末日”，《來自廣島的三位目擊者》，102頁。

[(48)](#_48)“再次感到氣憤難平”，《朝日新聞》，1992年7月20日。

[(49)](#_49)“只有英國作家”，阿蘭·布斯，《朝日晚報》，1992年7月20日。

[(50)](#_50)“少數幾部文學杰作之一”，井伏鱒二著，約翰·貝斯特譯，《黑雨》（東京：講談社國際出版社，1969年），283頁。

第五章　南京

[(51)](#_51)“森的錄像和小冊子”，錄像名為《無法談及的戰爭：侵略》，小冊子則叫《因此，我們全上陣打仗了》。

[(52)](#_52)“她……做了區分”，露絲·本尼迪克特，《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類型》（倫敦：Routledg& Kegan Paul出版社，1967年；紐約：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89年，首版于1946年）

[(53)](#_53)“標題頗為惹眼”，《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11月30日。

[(54)](#_54)“我軍攻占南京后”，引自本多勝一，《南京への道》（東京：朝日文庫，1989年）。

[(55)](#_55)“作為自己一系列文章　”，本多勝一，《中國の旅》（東京：朝日文庫，1981年）。

[(56)](#_56)“1984年，出版了一本駁斥本多的書”，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虛構》（東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

[(57)](#_57)“家永三郎就寫道”，家永三郎，《太平洋戰爭》（紐約：Pantheon出版社，1978年），187頁。

[(58)](#_58)“海納·穆勒嘗言”，海納·穆勒接受（柏林）《跨大西洋報》采訪，1990年7月刊。

[(59)](#_59)“殺死敵軍士兵”，石川達三，《生きてゐる兵隊》（《活著的士兵》），引自唐納德·金，《西方的黎明》（紐約：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出版社，1984年），913頁。

第六章　歷史站上審判席

[(60)](#_60)“ 很少有事情比……”， 赫爾穆特·貝克，《數量和質量：教育政策的基本問題》（弗萊堡：Rombach出版社，1968年），74頁。

[(61)](#_61)“ 美方首席檢察官問……”，克朗茨布勒，《14 DePaul L. R. 333》，1965年。

[(62)](#_62)“ 紐倫堡軍事法庭越是……”，埃里克·里格，摘自《祖國的母語》（柏林：Wagenbach出版社，1979年），35頁。

[(63)](#_63)“ 從未見過的審判”，《南德意志報》，引自克勞斯·R. 薛普：《每日都遭到強迫》，摘自J. 赫爾曼德、H. 派奇、克勞斯·R. 薛普編，《1945——1949年的戰后西德文學》（柏林：Argument出版社，1982年）。

[(64)](#_64)“ 四位主檢察官中的一位”，《祖國的母語》中提到的克里斯蒂安·蓋斯勒，219頁。

[(65)](#_65)“ 斯蒂芬·斯彭德……邂逅了一位朋友”，《歐洲見證人》，221頁。

[(66)](#_66)“ 對于我們德國人”，卡爾·雅斯貝爾斯，《罪行問題：種族滅絕無法追責》，此處是我的翻譯，不是要借此批評E. B. 艾什頓的譯本（紐約：Dial出版社，1947年）。

[(67)](#_67)“ 在以奧斯維辛為背景的劇作里”，彼得·魏斯，《調查》（法蘭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65年），英文版（紐約：Atheneum出版社，1966年）由強·斯萬和烏爾姆·格羅斯巴德所譯。

[(68)](#_68)“ 馬丁·瓦爾澤寫道”，馬丁·瓦爾澤，《我們的奧斯維辛》（柏林：Kursbuch出版社，1965年）。

[(69)](#_69)“ 他……闡述了自己的看法”，約阿希姆·高克，《斯塔西檔案》（漢堡：羅沃爾特出版社，1992年）。

[(70)](#_70)“ ……和日本的沖突就是不可避免的”，長谷川三千子，《中央公論》1983年4月刊，轉載自《日本回聲》1984年11期。

[(71)](#_71)“ 在一本……標準歷史教材中”，《日本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5年）。

[(72)](#_72)“ 西德教科書”，《基本德國歷史教程》（法蘭克福：Cornelsen出版社，1988年）。

[(73)](#_73)“731部隊的故事”，《731部隊的傷害——恐怖史》，制作人：吉永晴子，東京廣播公司。

[(74)](#_74)“ 開山之作”，森村誠一，《悪魔の飽食》（東京：晩聲社，1982年）。

[(75)](#_75)“ 日本領導人應該……受審”，秦郁彥，《諸君！》，1987年8月刊。

[(76)](#_76)“ 1970年”，木下順二，《神と人とのあい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神與人之間：戰爭罪定性》由埃里克·J. 岡洛夫所譯。

[(77)](#_77)“ 出自日本人之手、最著名的一本”， 約翰·貝斯特譯，《戰犯：廣田弘毅的生與死》，日文版名為《落日燃ゆ》（東京：講談社國際出版社，1977年）。

[(78)](#_78)“在我們看來”，吉本隆明，《文學者の戦爭責任について》，收于《戦後詩史論》全集（東京：大和書房，1986年）。

[(79)](#_79)“在日本，以及整個東方世界”，米尼奧內，引自阿諾德·C. 布拉克曼，《另一個紐倫堡東京戰爭罪審判未被講述的故事》（倫敦：柯林斯出版社，1989年），231頁。

[(80)](#_80)“永遠也不會忘記……有多么震驚”，石田雄，《平和·人権·福祉の政治學》（東京明石書店，1990年）。

[(81)](#_81)“站在紐倫堡軍事法庭上的是……”，布拉克曼，《另一個紐倫堡》，441頁。

[(82)](#_82)“……日本人……”，西德外交部長致司法部中央執法機關的信，II 16338/52。

[(83)](#_83)“審判的確是收到了操縱”，有關山下受審，詳見：梅侖·哈里斯，蘇珊·哈里斯，《日照大神的戰士》（紐約：蘭登書屋，1991年），464頁；貝克，《數量和質量》，68頁。

[(84)](#_84)“不負責任的體制”，丸山真男著，伊萬·莫里斯編，《現代日本政治思想和行為》（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63年）。

[(85)](#_85)“家永三郎講過一個故事”，家永三郎，《太平洋戰爭，1931——1945》，107頁。

[(86)](#_86)“他們相信”，《另一個紐倫堡》，276頁。

[(87)](#_87)“一個德國人既仰仗……的對象”，瑪格麗特·米切利希，亞歷山大·米切利希，《論無法哀悼》，23頁。

[(88)](#_88)“軍人被告”，阿瑞斯蒂德斯·拉薩魯斯寄給《遠東經濟周刊》的投書，1989年7月6日

[(89)](#_89)“東條英機將軍……承認”，《另一個紐倫堡》，395頁。

[(90)](#_90)“早期批評者”，平野共余子，《史密斯先生來東京》，143頁。

第七章　教科書風波

[(91)](#_91)“戰時”，野坂昭如，《美國羊棲菜》，摘錄自《當代日本文學》，詳見370頁。

[(92)](#_92)“《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九年級歷史課本》（柏林：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出版社1989年）。

[(93)](#_93)“一本典型的高中歷史教材”，《基本德國歷史教程2：從1918年到今天》（希爾施格拉本Cornelsen出版社，1987年），該書作者是任教于慕尼黑威廉中學的魯道夫·貝格和羅爾夫·塞爾普曼。

[(94)](#_94)“憲政愛國主義”，于爾根·哈貝馬斯，《狡辯的傾向》，再版收錄入《一種彌補損失的方法（法蘭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7年）。

[(95)](#_95)“教育和軍隊一樣”，山住正己在撰于《日本季刊》的文章　中引用山縣有朋，1981年。

[(96)](#_96)“我們的體制效法”，《日本季刊》，1981年。

[(97)](#_97)“這一悲劇性的景象”，《教科書里的真相：為孩子們謀求和平和教育自由》，出版方為全國支持學校課本審查訴訟聯盟。

[(98)](#_98)“家永對日本為何……的解釋”，家永三郎，《太平洋戰爭，1931——1945》，96頁。

[(99)](#_99)“我翻了翻”，面向高中生的社會研究教材《日本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4年）。

[(100)](#_100)“著名的比較文化學者”，入江隆則，《アメリカが作った戦後神話》，《中央公論》，198年8月刊。

[(101)](#_101)“教科書接著寫道”，《日本史》（同上）。

[(102)](#_102)“不遺余力地促使人們反思過去”，森川金壽，《教科書と裁判》（東京：巖波書店，1990年），13頁。

第八章　紀念堂、博物館和紀念碑

[(103)](#_103)“人們說起”，于爾根·哈貝馬斯，《無法正常化》，再版收錄于《一種彌補損失的方法》。

[(104)](#_104)“在一篇關于靖國的文章　里”，江藤淳，《靖國論集》（東京：日本教文社，1986年）。

[(105)](#_105)“追尋我們丟失的歷史”，米夏埃爾·施蒂默爾，《法蘭克福匯報》，1986年4月25日。

[(106)](#_106)“我們從哪兒來”，赫爾穆特·科爾于德國聯邦議院所做的演講，1985年2月27日。

[(107)](#_107)“歷史不屬于……”，弗萊穆特·杜維，引自克里斯托弗·施托策爾編，《德國歷史博物館：思想——爭論——觀點》（柏林 & 法蘭克福：Propyläen出版社，1988年）。

第九章　一個正常國家

[(108)](#_108)“也許我們無法……”，普里莫·萊維，《如果這是一個人》和《休戰》（倫敦：企鵝出版社，1979年），395頁。

[(109)](#_109)“一篇言辭激烈的社論”，特奧·索默，《時代周報》，1988年11月18日。

[(110)](#_110)“他的肺部被子彈擊穿”，諾瑪·菲爾德對本島槍擊案有記載，詳見其著作《在奄奄一息天皇的國度里：世紀末日本的眾生相》（紐約：Pantheon出版社，1991年），270頁。

[(111)](#_111)“極端不檢點的行為”，自民黨紀律委員會，《朝日晚報》，1988年12月16日。

[(112)](#_112)“罪與恥”，魯斯·本尼迪克特，《菊與刀》，156頁。

[(113)](#_113)“市長收到一封信”，神道教僧侶，《長崎市長 への七三〇〇通の手紙 天皇の戦爭責任をめぐって》（《寄給長崎市長的7300封信：論天皇的戰爭罪行》）（東京：徑書房，1989年）。

[(114)](#_114)“戶田大夫”，遠藤周作著，邁克爾·加拉格譯，《海與毒藥》（佛蒙特州拉特蘭德：塔特爾出版社，1973年），157頁。

[(115)](#_115)“大約在天皇離世前后”，江藤淳和石原慎太郎，《文藝春秋》，1989年3月刊。

[(116)](#_116)“他描繪了神道教的儀式”，加瀨英明，《プレイボーイ》（《花花公子》），1989年1月刊。

[(117)](#_117)“天皇體制……”，《朝日新聞》，1989年2月28日。

[(118)](#_118)“伊丹萬作在一篇文章　里……”，引自大島渚，《體験的戦後映像論》（東京：朝日新聞社），275頁。

第十章　兩座普通小城

[(119)](#_119)“《絕對正常的一千年》”，《絕對正常的一千年：奧托·韋伯的普通法西斯主義相冊》（諾德林根：Die Andere Bibliothek，1987年）。

[(120)](#_120)“在他將自己的發現整理成書”，野添憲治，《花岡事件の人たち》（東京：思想の科學社，1975年）。除此之外野添還寫過兩本花岡事件的書，分別為《聞き書き花岡事件（1983年）和《証言·花岡事件》（1986年），他還出版過《聞き書き花岡事件》修訂版（1990年）。

[(121)](#_121)“……發自內心的不信任”，野添憲治，《私たちの昭和史》（東京：思想の科學社，1989年）66頁。

第十一章　告別廢墟

[(122)](#_122)“總在我身后徘徊”，君特·格拉斯著，拉爾夫·曼海姆譯，《鐵皮鼓》（紐約：企鵝出版社1961年），580頁。

[(123)](#_123)“日本人在面對歷史時”，坂口安吾，《墮落論》（東京：角川書店，1946年），90頁和98頁

[(124)](#_124)“他面朝過去”，瓦爾特·本雅明著，漢娜·阿倫特編，H. 宗恩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紐約：Shocken出版社，1969年），70頁。

[(125)](#_125)“做到了全世界……都做不到的事”，格拉斯，《鐵皮鼓》，517頁。

[(126)](#_126)“阿瑟·米勒的擔心”，阿瑟·米勒，《衛報》，1990年5月29日。

[(127)](#_127)“從廢墟中挑選石料”，庫爾特·尼德利希，《作為德意志世界觀源泉的日耳曼神話和童話世界》（萊比錫，1936年），引自克勞斯·安東尼，《天上的統治者和他的國家》（慕尼黑：Iudicium出版社，1991年），111頁。

# 鳴謝

在我構思、調研和完成本書的過程中，有許許多多的人幫助過我，鼓舞過我，激勵過我，在這里沒有辦法對他們一一表示感謝但有些人和機構如此重要，理應提出，以表達特別之謝意。

首先，若不是有機會在柏林的科學研究所（Wissenschafstkolleg待上九個月的話，我就不可能完成書中有關德國的章節。對于所長沃爾夫·勒佩尼斯博士（Dr. Wolf Lepenies）、于爾根·科卡博士（Dr. Jürgen Kocka）、鮑滕利太太（Frau Bottomley）和她一流的圖書館館員，以及耶胡達·艾爾卡納（Yehuda Elkana），我欠諸位很大一個人情。

我還要感謝路德加·庫恩哈特博士（Dr. Rudger Kühnhardt）弗蘭克·席爾馬赫博士（Dr. Frank Shirrmacher）、卡斯滕·維特博士（Dr. Karsten Witte）、伯恩哈特·加特納博士（Dr. Bernhard Gattner）、阿摩司·艾隆（Amos Elon）和達利爾·平克尼（Darry Pinckney），感謝你們為我指引方向，好讓我在德國暢行無阻。

在日本，外國媒體中心的北村文雄（Kitamura Fumio）、矢野淳一（Yano Junichi）、小泉和子（Koizumi Kazuko）都以超乎尋常的熱情與高效，屢次為我提供幫助。除了他們以外，我還有以下各位領路人和導師，分別是：林加奈子（Hayashi Kanako）、“日本映畫圖書館協會”的工作人員、新見雄（Niimi Takeshi）、森正孝（Mori Masataka）、中八戒（Chu Pa-chieh）、尾山宏（Oyama Hiroshi）、小山優子（Oyama Yuko）、西里扶甬子（Nishisato Fuyuko）和南享（Minami Toru）。而在所有人里面，最重要的，還是理查德·內森斯（Richard Nations）和吳少英（Koh Siew-eng）給予我的好客、啟迪和友誼。

最后，我要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和威廉·威塞羅（William Wetherall）表達深切的謝意，他們的聰明才智和淵博學識對書稿的改進大有幫助。法勒·施特勞斯—吉魯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的喬納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喬納森·凱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的內爾·貝爾頓（Neil Belton）和阿特拉斯出版社（Atlas）的E. 布拉格曼（E. Brugman）都是極其出色的編輯，不消說，書中若有任何錯誤逃過了施特恩教授、威廉·威塞羅和以上三位的注意，責任完全在我自己。

